

民主与市场

——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

[美] 亚当·普沃斯基 著
包亚军 刘忠瑞 胡元梓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 亚当·普沃斯基著, 包亚军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1

ISBN 7-301-

. 中... . 李...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号

书 名: 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

著作责任者: 李安山 主编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7-3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印张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致莫莉、她的朋友、她朋友的朋友

译者前言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是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之一,现任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于1961年在波兰华沙大学获哲学与社会学硕士学位,1966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69年至1973年在华盛顿大学、1973年至1995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曾到瑞士、德国、法国、智利、印度、波兰等多个国家作访问学者,从事学术研究。除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外,普沃斯基教授还独著、合著、或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本书即是其中之一。其它的还有《民主与发展:1950至1990年间的各国政治体制与福利》(2000)、《民主、责任与代表》(1999)、《可持续性民主》(1995)、《新兴民主国家的经济改革:社会民主之路》(1993)、《资本主义下的国家与经济》(1990)、《故纸堆:选举式社会主义的历史》(1986)、《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1985)、《社会科学的系统分析方法》(1975)、《比较社会调查的逻辑》(1970)、《波兰的地方政治》(1967)。其中的许多著作一版再版,并被翻译成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汉语、土耳其语等多国文字。

在当代政治理论中,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过渡国家而言,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从总体上说,有冲突论、兼容论与怀疑论三种观点。冲突论认为,在这些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兼容论则正好与此相反,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政治民主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巩固政治民主。第三种则正好位于这二种极端观点之间。怀疑论认为,从发展中国家、过渡国家的经验来看,在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两者之间既不总是处于冲突状态,也不总是处于协调状态。这种理论强调,在民主与经济相互关系上,政治制度本身并非关键,人们必须重视向民主过渡的策略与条件与要求。政治民主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但不稳定、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

诚如本书名所言,民主与市场,研究的就是在东欧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在迈向民主与市场的途中,会遇着什么样的结局?普沃斯基教授并没

有给出一个定论,相反,他以学者的认真与严谨,探讨的是向民主过渡的策略与条件。他所秉持的态度如上所言,正是一种怀疑,或者说是一种不安。甚至可以认为,他的基调是低沉的。读者翻开这本书,您首先选择看的应当是普沃斯基教授自己所作的序言,他已经对全书的内容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这远甚于译者所能做的一切了。作者所强调的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相互依赖性,在分析中所引用的广泛的各方数据,运用的源于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一些模型,都将会给大家留下畅快淋漓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民主的价值并不因为它与经济改革、发展的复杂关系而黯然失色。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无人能阻挡。它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人们不仅不应阻碍它,还应殚精竭虑,去倡导它、完善它。

通读全卷,普沃斯基教授所抱有的对民主的热爱,对各国人民福祉的关怀,跃然纸上。然而他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盘否定,把共产主义在局部地区的暂时挫折看作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鉴于这种情况,希望读者在阅读时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译者
二零零三年初冬于北京

导 论

财产权利与言论自由——使人免于饥饿,不受压迫:这些基本价值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一场对政治民主与经济理性的热切追求。过去的十五年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阿根廷、波利维亚、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南韩、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都举行了民主选举,这些民主选举若不是亘古第一回,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甚至在苏联,谨小慎微的初步政治解禁也引发出民众意愿的强烈表达,并把民主纳入了政治议事日程。这么多的国家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也从未尝试去建立民主制度。

同时,过去的几十年里,曾在某些国家获得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奏效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于是,我们看到,人们正在急切地寻求一种能保障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与新策略。许多国家的改革屡屡失败。现在,其整体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之中。

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里,我们都看到了试图同过去彻底决裂的种种努力。事实上,在许多国家,“过渡”一词最能描述它们政治经济改革过程的特征。这种过程就是从各式各样的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过渡,从各式各样的国家统治的、垄断的、封闭的经济体制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这两种过渡都是根本性的转变,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那些义无反顾地走上民主与市场之路的国家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过渡研究的目的是要回答通向政治民主与物质繁荣的条件与途径等问题。过渡将结出民主之果?抑或重蹈或新或旧的专制之覆辙?新民主会保持稳定吗?新的民主由哪些制度构成?新的政治体制在衍生实质性结果方面将卓有成效吗?它会促进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吗?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哪一种财产权形式将居主导地位?何种机制来配置资源?人们将寻求什么样的发展战略?这些体制会带来一种使人人都能享受物质安全的发展吗?

对这类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社会科学家要知道得越多越好。然而要揣测未来,要理解当前我们面临的选择,我们就不得不事先做出种种假

设。具体说来,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四个关于民主与发展的问題。这四个问题似乎一直为人们所置疑。

1. 哪一种民主制度最有生命力?

2. 哪一种经济体制——财产权形式、资源配置机制、发展战略——最能导致经济增长且使福利分配合乎人道?

3. 经济体制的成功运作和所有人共享物质安全的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条件?

4. 巩固民主,使各团体为追求自身利益与价值不虞恐惧而又谨守规则地组织起来,这又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条件?

本书以东欧剧变开始。这个事件没有人预先料想到。但是,它却在短短几周之内为成千上万的东欧人民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这个新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国家会找到一条通向民主与繁荣、通向“西方”的平坦大道吗?或者他们将发现自己像亿万生活在“南方”的人民一样,正在不幸与压迫下苦苦挣扎?这是序言提出的问題。

第一章提出了持久民主制度的理论。我认为,唯有当民主能够唤起各主要政治力量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主动地遵从民主制度时,民主才能长久存在。随后我阐明,为了唤起这种遵从,民主必须同时给所有这些力量提供公平的机会,使之能在制度的框架内竞争,并产生实质性成果。即民主必须是公平而有效的。然而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任何一种民主制度都不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经济上进行深刻转型的历史时期最符合这样的条件,使得民主更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即使能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也无法保证,那些为了未来民主制度下的有利机遇而不断争斗的各派政治力量会采纳这样的民主制度。第二章一开始便谈到了权威主义政权的自由化,然后集中讨论向民主过渡进程中的制度选择问題。我认为这样的制度只能从谈判协商中产生。个别转型案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类协商是包括与先前权威政权有联系的力量,还是仅仅包括和权威政权作斗争的同盟者。“解脱”——通过与原权威政权谈判而达成的过渡——极有可能留下旧制度的印痕,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军队的自主权问題。然而,即使支持民主的力量不害怕受压制,当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新政权时,他们也是倾向于采用被其中的某些力量视为权宜之计的制度框架。因此,根本的制度问題不可能在过渡期间得到解决。最后我指出,如果制度问題一直在次要的政治冲突中彰显出来,那么意识形态的因素就会直接摆在人们面前。但是,许多新生民主政权中的主流

意识形态,无助于形成人们对内生于民主竞争中的分裂和冲突的宽容。

第三章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财产权形式和资源配置机制——最能导致经济增长且使福利分配合乎人道?我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独特的非理性:当自利的经济主体以分权的方式配置稀缺资源时,生产潜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除非各经济主体从其投入中获得完全的收益。但是,社会主义——通过集权命令配置资源——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有关计划者、工人和消费者行为的经不起检验的假设基础之上的。面对这样一种困境,我认为财产权形式远不及资源配置机制重要。最理性最人道的经济体制是这样的:它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要受到约束,由国家来保障所有人都享有最低限度的物质福利。这种体制可能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效率不高,也无平等。但是我不能找到比它更好的体制了。

即使我们知道哪一种经济体制最好,通往它的道路也必定充满曲折。第四章专门探讨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问题。我阐明,由改革带来的种种过渡性影响有可能包括通货膨胀、失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人们相对收入的变化无常。问题在于,这种转型成本在政治上是否能被容忍。通过采用一些简单的假设,我证明,能够起到最大推动作用且为政治家们偏爱的改革战略并不能使社会成本最小化。即使这种战略一开始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但是,当人们尝到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时,相应的政治对抗就会接踵而至。对此,政府开始在内生于市场取向的治理方式与用以维系政治支持的参与方式间摇摆。这种摇摆腐蚀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并有可能威胁到民主的稳定。

上述预言暗示出本书的基调是冷静的,也许甚至是低沉的。正如波兰人所说,悲观主义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然而,我的用意不在于提供预言,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而是在于阐明民主建设与经济转型中的典型障碍。我相信,所有向民主过渡的国家都会遇到其中的一些障碍,因为它们虽起点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各个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结局不尽相同,因为这取决于各自天赋的历史条件、善良的意志、智慧与运气。

序 言

东欧剧变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南欧——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出现了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过渡。80 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南部,除智利外,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外也启动了民主化进程。随后,在东欧,1989 年秋天,它也隆重登场。我们能用前者的经历中来解释后者吗?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尽管南欧与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浪潮在先,东欧各国的剧变仍然让人惊奇不已。因其坚不可摧,共产主义体制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极权主义模式。然而,谁也没曾想到,它竟然突然间和平地崩溃了。究竟是什么使东欧剧变成为可能?是什么使之如此迅速而又顺利?

既然把东欧剧变当作整个分析的“序言”,这决定了我要按自己的理解构建全文。不过,我们不能轻率行事。从 1989 年秋天来开展分析,在政治科学研究上必定会失败。关于东欧剧变的任何反思评论,不但要解释历史发展进程,还要弄清楚妨碍我们预见这些发展的理论假设。如果说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明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事先没想到呢?

大多数的癌症晚期患者都死于肺炎。相比起来,社会科学就不善于分析事物的深层原因和推动条件。从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有关魏玛共和国覆灭的争论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对“为什么东欧发生剧变”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于对“为什么它在 1989 年秋发生”的回答。解释东欧国家必然会发生剧变,比解释剧变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发生要容易得多。

“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不能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它无法诊断出癌症,也无法诊断出会导致肺炎的症状。极权主义模式远比它如此这般描绘的现实社会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该模式认为建立在意识形态与集权统治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存在冲突。然而,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用葛兰西的话说,意识形态不再是把社会粘合到一起的水泥了。记得 1964 年波兰五一节间的头条标语——“社会主义是国家的保证!”——让我多么吃惊!社会主义——一个全新的未来——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的了,相反,它成为捍卫传统价值的工具。到 70 年代,压制有所松缓:随着东欧国家共产主义

领导层的资产阶级化,他们无法严格要求自己以压制所有异端。党的官僚们晚上不开会了,不穿工人阶级制服,不参加游行,不喊口号;他们过上了奢侈的生活。随后出现的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卡达尔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它们都暗含某种社会契约:精英向大众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以换取他们的沉默。达成这种契约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就是:社会主义不再是崭新未来的模式,而是别的一种不发达的事物。赫鲁晓夫把赶上英国作为苏联的目标。到了70年代,西欧成为比较的标准对象,而这种比较越来越使苏联和东欧国家感到羞耻。

在匈牙利和波兰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最后形成的是物质至上、原子化且玩世不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鼓噪着他们自己不相信的,也不指望别人相信的公式化语言。言论变成了一种仪式。我常常想起一个苏联笑话:有个人在红场散发传单,但被警察逮住。警察没收了所有传单,却发现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警察惊叫起来,“你发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空白的,什么都没写!”。得到的答案是“何必要写呢?大家都知道……”。

言论变成一种危险。它甚至会变得足够危险,以至于1968年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援引的一条理由即是在布拉格出现的“二千字声明”。相比之下,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性”、“平等”甚至“工人阶级”这些观念最具有颠覆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波兰的调查就表明,工科学生在批评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最激进,而他们恰恰是浸淫理性价值的一群人。在70年代中期,波兰的持不同政见者采用了一种简单的策略来颠覆当时的政治体制。他们决定行使宪法宣称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不过对这个体制最致命的威胁来自工人阶级。该体制一直宣称代表着工人阶级从而获取自身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成为它指导下的社会秩序的威胁。人们需要保持某种认知的连续性,当他们的思想与言论脱节时,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此,要粉碎该体制,呼唤“真理”就至少同争取面包一样重要;当体制摇摇欲坠时,历史就格外引人迷恋。因此,就有一位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反对派领袖出自国家档案馆主任,而高中历史考试则被暂停了两年。作家和知识分子成为后共产主义体制的领袖。

但是,我们中有些人认为,无需区分权威主义与集权主义;还有些人认为,西班牙、希腊、阿根廷、巴西或菲律宾向民主的过渡为匈牙利、波兰和苏联提供了现成模式。他们都在寻找肺炎的症状,却没有诊断出癌症。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知道怎样去分析其动因,但不知道怎样分析引致爆发的条件。尽管阿什(Timothy Garton Ash)(1990:252)在1988年9月谨慎地写

道了苏联帝国“长凳化”——“因腐败而解放”的可能性，但是谁也没有察觉到共产主义体制在苏联已经变得多么地脆弱，以至于它会一触即溃。

“东欧剧变”由一个或一个半事件引起。亨利·基辛格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胜出了。他未能预料到的只是骨牌倒下的方向。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一切是由先前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引起的，而后者又是由东德垮台造成的。是匈牙利的政治变迁使东德民众走上街头，而波兰谈判的成功则为匈牙利人指明了出路。我知道，许多从事宏观历史比较研究的社会学家会写出成千上万的著作与文章，把上述所说的各个国家的背景条件与结局联系在一起。但是我认为，他们这样只是浪费时间，因为整个事件就是一个雪球。从技术上讲，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有了发展，其它国家的人民成功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再随着下一个国家局面的改观，对最终的结局人们就会越来越有信心。我相信，最终所有的国家都会走上这条道路。

1976年波兰首次出现了公开反叛，并于1980年形成燎原之势。促使“东欧剧变”发生的第一例事件不是发生在1989年，而是追溯到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发动的政变表明，再也不能依靠民众的消极服从来统治了，权力必须以武力为保障。随着70年代波兰经济发展策略的失败，随着知识分子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工人接管了他们的工厂，党的官僚们再也无法维持他们的统治了。为继续享受特权，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政治体制，而动用了有组织的暴力压迫。统治军事化了，因为唯有如此，它才能在社会动荡中生存下来。

从那时起，只是由于人们对内部或外部有形暴力的恐惧，才使这个体制勉强支撑着。1988年夏天，工人再次罢工，这表明即使是暴力也不足以维持统治。幸好雅鲁泽尔斯基理解这一点。是军队促使波兰共产党同反对派达成妥协的。在没有面临来自下面的压力、没有军队的干涉时，匈牙利共产党高层就已经分裂了。1989年春，波兰谈判成功，这为匈牙利人指明了一条权力和平交接的道路。在那个时候，这两个国家共产党的官僚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还能保住手中的政治权力，那么，正如汉基斯所言，他们就会趁早把它“转变”为经济权力。

匈牙利人决定让东德难民过境前往西德。这点燃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东德人了解到可以从布达佩斯到达西德之后，他们又尝试从布拉格是否能走得通。此时东德领导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同意让难民迁往西德，但决定要“侮辱”这些人。他们要这些人乘火车穿过东德，使之面受有组织的示威者的嘲弄。然而，民众非但没有谴责难民，反而把示威矛头直指

现政权。后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其余的都已成为历史。一旦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莱比锡、德雷斯顿、柏林的街头,一旦柏林墙倒下了,捷克斯洛伐克就受到了无法抵抗的压力,而匈牙利共产党人能做的也就只能是限制它们所带来危害的范围了。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革命,对于引发东欧一系列事件十分关键。但它仅仅是推动性的事件,是“肺炎”。不过,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

苏联干预的威胁,深烙于 1956 年匈牙利人和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记忆之中,构成了对东欧内部发展的一种约束。但它仅仅是一种约束,是承受水压的堤坝。当堤坝溃决时,里面的水就一泄而出。苏联的变化并没有推动匈牙利和波兰的转型,而只是清除了一直阻碍它们转型的关键因素。约束是外在的,而动力则是内生的。因此,“苏联因素”并不表示拉美模式对于东欧是无效的。

再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现在回顾起来,很清楚,使东欧体制破裂的压力在苏联也同样存在。不能永远安抚与压制异端,不能使国民吃饱穿暖,对阿富汗山野部族束手无策,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呆滞落伍——难道这不是 1984 年的苏联吗?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有多大分歧,要是完整地列出这个清单,我们难道还得出这种体制不能持续的结论吗?

1981 年苏联本可以入侵波兰吗?苏联还可以维持它的帝国吗?它的国内和平与繁荣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我看来,苏联的变化,包括它对东欧战略态势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性的:即,它部分地是由于东欧的发展导致的,是由于维持帝国的政治经济代价越来越高导致的。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人,在过去都相信,如此重大的政治变迁肯定充斥着暴力。然而除了罗马尼亚和煽起民族主义狂热的苏联与南斯拉夫外,在这场革命中没有死一个人。这是为什么?

东欧剧变发生地如此迅速平和,可以从意识形态与暴力两个方面去寻找原因。对我来说,与这场变革中最动人心的方面相比,最有意义的是,官僚们对保卫手中权力无话可说。他们只有沉默;他们再也不说什么社会主义、进步、未来、繁荣、理性、平等、工人阶级的口号了。他们只能计算一下,如果不让步的话,他们得打倒多少人;如果妥协,他们得让出多少内阁职位;如果屈服,他们还可保留多少工作岗位。他们最多只能宣扬一下爱国奉献精神,但是他们的信誉受到人们的怀疑。甚至到现在,当已改头换面或转型了的共产党宣称他们是忠于民主社会主义时,他们仍然是言不由衷地说:波

兰社会民主党成立纲领一开始就声称波兰是该党坚持的最高价值；该党致力于促进政治民主，赞同“经济上最有效率的任何财产权形式”。这种宣言或许有助于党在新体制中找到一席之地，但是它们决不是该党用以为原政党辩护的价值观。到1989年，官僚们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的宣言了。人因为有某种信仰才会不宽容与他们对立的人。当握有扳机的人完全无话可说时，他们怎能扣得动呢？

再说，他们没有枪了。在这些国家里，和警察不一样，军队没有出来挽救时局。在波兰，军队主导着改革。1989年2月，当三位将军从中央委员会会议中走开时，官僚们就知道末日来临了。在其它所有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军队都拒绝出兵镇压。尽管我承认，这里头也许爱国动机起了某种作用，但我有一个讽刺性的理由。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我从东欧将军们的神圣话语中发现了某种凶兆。当军队宣称“不是为政党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时，我明白，军队想借机摆脱文人的控制，从而使自己成为国家命运的裁决者。事实上，无论我的看法正确与否，官僚们是没有控制住枪杆子。我不由地想起波兰讽刺这全部故事的一个笑话。一个老头决定去买肉。肉铺前排起了好长的队，就是没有开始卖。人们渐渐不耐烦了。那个老头开始诅咒领导人、党和制度。这时，另一个人过来指着他的头说，“同志，要知道，如果你以前这样说，我们会去‘Paf’，你一切就全完了”。老头空手回到家中，他的妻子问道，“他们没有肉卖吗？”老头回答说，“岂止如此，他们连子弹也没有了。”

在东欧崩溃的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共产主义”只是一个中性回答，因为它只是一个无人响应的标签。许多相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人认为，在东欧失败的制度也许是斯大林主义、国家主义、官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决不是社会主义。然而，我担心的是，历史的教训会更激进些。在东欧灭亡的正是理性地支配事物以满足人类需求的观念——通过中央指令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可行性、以无私合作为基础的社会蓝图、把个人报酬与其社会贡献分开的可能性。如果说，当今关于社会新秩序的观念都出自右派，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成于1848年至1891年的西欧，并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诚然，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观一直是像我这样的社会民主者的指南，但是，社会民主只是缓和私有制与市场配置后果的一种程式，它本身并不是可替代的社会蓝图。

现在，在波兰为首的好几个东欧国家，又开始进行、或即将进行自1929年斯大林主义者强迫式工业化以来的，最伟大的历史实验。尽管现在阿德勒(Adenauer)“勿做实验”的格言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憧憬的

经济转型,却反映出共产主义计划式的特征。他们实行的是一种智力蓝图,它在美国学院围墙内形成,由国际金融组织塑造成形。这些国家也很激进,意图颠倒现存所有社会关系。它们都祭出某种灵药或魔杖,企图轻轻一挥,就治愈百病。用“私有财产”取代“生产方式国有化”,用“市场”取代“计划”,同时保持意识形态结构原封不动。难道革命就是针对这些体制的?

那么东欧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以愚之见,东欧社会可能有三条走向:走自己的路,南欧模式,拉丁美洲及南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有关东欧未来的讨论莫过如此:哪一条道路最有可能成功?

这些国家的左派看到了实现原先被称为第三条道路而今则应称为第二条道路的历史机遇:发展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体制。这一体制将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市场配置资源同时加上大规模的部门协作。虽然这一蓝图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讨论,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一体制真的发展起来,它将有重大缺陷。在国内储蓄水平很低、同时又担心外来控制的情况下,把整个公共部门出售给私人一点也不现实。因此,许多公司因为没有私人买主,要么仍由国家控制,要么转让给了雇员。这种财产结构是否会对企业的运作、企业中工人的角色、企业外工人的政治组织及整个政治制度产生重大影响,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我本人对此很怀疑。

无论出现的是什么样的所有权混合形式,东欧新的精英分子和民众都希望走向欧洲。“民主、市场、欧洲”是他们前进的旗帜与方向。乐观的前景就是追随西班牙的道路。自1976年以来,仅15年,西班牙就成功地巩固了民主制度、和平地交接了权力、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提高了国际竞争力、由文人控制了军队、解决了复杂的民族问题、扩大了公民权利、改造了本国文化,使自己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部分。这正是东欧国家人民梦寐以求的。东欧人深信,要不是制度的原因,他们早就像西班牙人一样了。现在,他们有望重回欧洲的怀抱,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但是西班牙是一个奇迹,它只是自一战以来有幸逃脱贫穷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命运的少数国家中的一个。葡萄牙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希腊现在经济上异常困难,政治上动荡不安。土耳其也一样,试图进行经济、政治、文化转型以重归欧洲,但以失败告终。

那么,我们应该期待东欧如愿以偿吗?东欧是在走向西方?或者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将和南方资本主义国家亿万人民一样,在不幸中苦苦挣扎?请参看最后一章“结论”。

目 录

导论	(1)
序言 东欧剧变	(1)
第一章 民 主	(1)
第一节 民主	(1)
第二节 民主政治的结果何以形成？	(5)
第三节 向民主过渡	(23)
附 录:为什么结果不确定？	(25)
第二章 向民主过渡	(35)
第一节 导论	(35)
第二节 权威体制的自由化	(37)
第三节 民主化	(47)
第四节 竞争	(65)
第五节 结论	(70)
附 录:过渡研究的模式	(72)
第三章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75)
第一节 引言	(75)
第二节 方法论的说明	(76)
第三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79)
第四节 我们能够改革什么？	(95)
第五节 我们能养活每一个人吗？	(105)
第四章 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	(107)
第一节 导论	(107)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过渡性代价	(109)

第三节	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一个模型	(129)
第四节	经济改革的政治影响	(146)
第五章	结论	(154)
参考文献	(158)
后记	(171)

第一节 民主

苏亚雷斯,领导着向民主转型的西班牙首相,在制宪会议的开幕式上宣布,“只有人民才能书写未来”(Verou,1976)。他举出了民主的两点精髓:1.民主进程的结果是未知的,事先无法确定;2.是“民众”以及为增进自身利益与价值而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决定着民主结果。这无异于宣布西班牙从此进入了一个未知的时代。

在选举中政党会遭受失败,民主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存在着众多政党,他们有不同的利益、价值与观念。在这里有按规则组织起来的竞争,有定期的输赢。显然,并非所有的民主都是一样的。人们可以列出很多差异,把民主体制分为多个类型。但是在制度多样性下面,有一个基本特征——允许参与的竞争(Dahl,1971)——足以使我们把政治体制确认为民主的。

正如林兹(Linz)所言,民主是一种临时性控制。冲突在设定规则下定期终结。冲突是被“终结”,临时中止,而不是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由选举产生政府,立法机关设定规则,官僚机构作出决策,社团达成妥协,法院裁决冲突。这些结果除非按规则变更,否则就一直有约束力。同时,这些结果是暂时性的,因为输家并没有被剥夺再次参与选举竞争、谈判、对立法机关

注意:存在赢得选举的政党并不表示制度就是民主的。如阿尔巴尼亚人民党总是压倒多数地赢得选举。只有当政党会遭受失败,而且失败既不是一种社会耻辱也不是一种罪过(Kishlansky,1986)时,民主才会兴旺发达。

民主的多数定义,包括达尔自己的定义在内,都把参与和竞争看得同样重要。事实上,存在着参与民主和竞争民主两种观点。要想理解西欧民主的发展,就必须把重点放在参与上面。因为在西欧,围绕普选权展开的斗争引发的冲突远甚于政府责任问题。而且,从规范角度看,这样一种强调也很有吸引力。然而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由利益冲突引起竞争的可能性足以解释民主的动力。一旦政治权利足够广泛到承认各种利益冲突,即使有效参与远未普及,其余的一切都会随之而来。在当前,除南非外,由于政治权利的广泛限制是不可想像的,因此重点讨论竞争足以研究现在向民主的过渡。

和官僚机构施加影响与压力或诉诸法院的权利。即使是宪法条款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规则可以按规则变化。

在民主政治里,多重政治力量在制度框架内竞争。民主竞争的参与方在经济、组织与意识形态资源上不等。总是会有一些团体比其他的团体有更多的钱用于政治,有更广泛的组织技巧与人才,有更有效的说服性意识形态方式。如果民主制度无论参与者的身份如何而对之一视同仁,那么,享有较多资源的团体更可能以民主的方式赢得冲突。我认为,民主的结果由资源与制度共同决定。也就是说,在公民社会中所处地位不同的团体,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通常各不相同。

民主博弈中的主要参与方都是集体性组织起来的,即他们能形成集体利益并以相应的策略去推进之(Pizzorno, 1978)。而且,它们是在其行动的制度框架内以一种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要说,政党总是区分为领导者与追随者的。按定义,代议制选出的是个人,而不是大众。民主制度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中代理关系的存在(Luxemburg, 1970: 202)。个人不是直接行动而是委派代表捍卫自己利益的。在民主制度下,大众由领袖来代表,这是集体组织的模式。而且,施密特(Schmitter, 1974)、斯图潘(Stepan, 1978)、欧菲(Offe, 1985)等人一再强调,大多数利益都是以一种强制与垄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能够强制其成员,尤其是能够制裁以集体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特定目标的个人与次级集团,从而获得了代表成员行事的能力。要想获得市场权力,工会就必须能够惩罚那些急欲填补参与罢工的同事们工作岗位的工人。雇主集团要获得一种策略能力,就必须控制住特定产业与部门内企业间的竞争。民主社会不是由自由行动的个人,而是由集体组织构成的。这种集体组织能够强制其所代表的个人。

民主是一种处理冲突的制度,其结果由参与方的所作所为决定,但是任何单一的力量绝对控制不了。任何竞争中的政治力量事先都无法知道冲突的结果,因为他们的行动影响也取决于其他方的行动,它们充满变数,不可预期。因此,从参与各方来看,结果都是不确定的:民主似乎是这样一种制度,在此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做他认为最佳的事情,然后投出骰子看最终结果。因为民主是一种分散的决策行为体制,而知识的作用范围肯定是有

这并不是说制度就是公正的。制度也有分配性后果,后文将有详述。

注意:在民主政治下社会运动总是模糊的,存在短暂。工会瞄准的目标有产业关系机构与国家,政党的目标有议会,院外集团的目标有各种官僚机构。但是社会运动没有任何机构指向。

限的,所以结果总是不确定的。

民主内生着不确定性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也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可预测。同各种保守者的津津乐道相反,民主既不是无秩序的,也不是无政府的。要注意,“不确定性”只是指行为者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有可能发生,但就是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我是从后一种意义上说民主是不确定的。行为者知道什么是可能的,因为可能性的结果是由制度框架决定的。他们知道什么有可能发生,因为特定结果的可能性,是由制度框架与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竞争中运用的资源共同决定的。他们只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特定结果。他们知道输赢对自己意味着什么,知道自己胜败的几率,但是就是不知道自己最终是输还是赢。因此,民主是一种有规则性的开放体系,或者说民主意味着有组织的不确定性。

12

民主固有的不确定性容许行为各方采取辅助性方式。因为行为者能够估算出其行为的后果,他们必然有所期待,并计算好怎样做对自己最有利。他们可以在民主制度框架内积极参与,去推进自己的利益、计划与价值。反过来说,在同样的限制下,最终的结局只是由参与竞争的各派政治力量之行为决定的。这样,民主就为所有的政治力量提供了追求各自利益的机会。如果结局事先就预定好了,或者完全不受人们作为的影响,人们就不会组成集团参与政治。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把人们吸引到民主博弈中来。

民主进程的结果,是由构成制度框架的具体规则与分散行动的效应相结合构成的。尽管现代代议民主以多数决定为基础,但是它的产生主要是政治力量领袖协商的产物,而不是普遍审慎过程的产物。投票的作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对这些结果加以认可,或正式确认赢得该结果的那些人。在所有的现代民主政治下,对政府的日常监督和审慎的民主进程,大众是影响

这种区别出自 Littlechild, 1986。

我是从逻辑的意义上说“知道”。他们有相关的信息,从中可以推导出各个结局。他们能推断出种种结局,是因为可能性的结局已由规则设定好了。而规则只能按规则改变。“制度框架”可以理解为整个规则体系,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冲突的结果导致它经常变化。但是,这些冲突总是在规则体系内发生,规则体系则限定了可能的结局。显然,在心理学意义上,上述并不意味着,政治行为者总是知道什么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因为逻辑关系经常是“模糊的”,他们也会犯错,会感到意外。

Bobbio(1989: 116)指出,“集体决策是代表一定社会力量(协会)与政治力量(政党)的团体之间协商的产物,而不是进行投票操作大会的产物。这些投票事实上也是依据现代代议国家宪政原则——认为是个人而不是团体与政治相关——举行的,但它纯粹只具有形式价值,是对在其他地方谈判达成的结果加以确认。”

不到的。事实上,就具体的政策问题求助于选民经常被称为公民投票主义,这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术语。因此,投票——多数统治——在民主政治里只起最终的裁判作用。

民主进程的结果由各种指令组成,每一种政治力量必得遵循一定的行为方式。输赢双方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若遵循这些指令,输者所得少于赢者所得。遵循这些指令就是接受现状。

由于在民主政治下,结果无法准确地预知,那么一旦结果知晓,忠于准
13
则就不足以使各派遵从现状。因为如果结果是确定的,即参与方能准确地预测结果,那么他们必然知道承诺遵守规则就是接受特定的结果。这样,承诺遵守规则就保证了遵从结局。然而,在民主政治下,承诺遵守规则充其量只是“愿意接受内容尚未确定的结局”(Lamounier, 1979: 13)。因此,对民主的程序评价不同于结果判断。一如科尔曼(Coleman, 1989: 197)所言,“承认过程与承认过程的结局是两回事”。既然结果对参与方是不确定的,他们事先与事后的评价肯定不一样。而且,如李普塞特和哈贝马斯所言,事前的评估修正事后的评估。因而遵从现状就成了一个问题。

总之,在一个民主国家,所有的力量必须为实现其利益不断地奋斗。任何一种力量都不会因其政治地位而受到保护。谁也不能等到事后去修正结果。人们必须将其利益付诸竞争与不确定性之中。在从权威统治转向民主统治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是要跨越一道门槛,对形式上的政治过程产生的结果,谁也不能干预和扭转。民主化就是把所有的利益付诸竞争的行动,就是使不确定性制度化的行动。迈向民主的关键就是从一群人到一套制度的权力转移。
14

李普塞特(1960)在“合法性”——事先的承诺——与“有效性”——事后结果的评估间作了区分。哈贝马斯(1975)把“合法”——事先接受规则与“合法性”——对他来说,事后的评估作了区分。两者都认为事后的评估修正了事先的承诺。但是两人都没有注意到,遵从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事先因规则产生的结果本身不确定。

明显的是,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某些利益,会因其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而受到保护。如果人们的福利取决于资本家对雇佣与投资的决策,那么政府就都不愿意采取政策减少雇佣与投资。这就是国家对资本的结构依赖性理论。问题的争议在于,这种依赖是否对所有的民选政府产生相关的约束力,以致民主进程对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没有任何影响。我认为,所有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资本,但这种依赖并不足以使民主成为虚设。民主过程对结果还是会产生影响的。关于这个理论的正式分析见普沃斯基与华勒斯坦(Wallerstein, 1988)。

第二节 民主政治的结果何以形成？

一、问题：民主、理性与服从

有了以上铺垫,现在我们可以直指使民主持久的中心问题:在竞争中失败的政治力量何以接受失败的结局,并愿意继续参与竞争而不是去颠覆民主制度?设想政府试图确立对军队的控制。军队为什么会服从?设想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律,赋予企业内工人广泛的权利,为什么资产阶级不以反民主的方式来捍卫他们的财产权呢?假若政府的某项政策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与普遍的贫困,为什么穷人不走上街头去推翻那个政府?为什么他们还是沿着那损害其利益的民主制度前行呢?为什么他们要遵从结局呢?

要说明这些问题为什么很重要,我们首先得做一些清理工作。如果说18世纪民主理论所言的民主是理性的,那么服从将不成为问题,或至少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如果社会上的各种利益是和谐的——18世纪民主理论的核心假设,那么冲突不过是确认共同的善时的歧义。他们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加以克服。政治过程的角色只是认知性的,是在追求真正的公意。伍德(Wood, 1969: 57—58)注意到,就1776年至1789年间的美国政治思想而言,政治“被认为在追寻惟一的共同的善时不是调解而是超越社会各种利益的”。如果代表不为特殊利益所蛊惑,如果制度安排适当,如果民主过程足够审慎而不匆忙,那么达成一致将成为社会的主流——政治过程将趋近于真正的公意。即使是今天,某些理论家还是把诉诸投票看作惟一的省时方式。投票只会使审慎民主过程固有的交易成本最小化。这样看来,就像科尔曼(Coleman, 1989: 205)所概括的,“少数并非输者,多数也并非赢者。15相反的是,少数派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公意,而多数派则认识到了”。

在任何意义上民主都是合乎理性的吗? 18世纪的民主理论认为在下

Brnnan与Lomasky(1989: 3)支持并概括了布坎南与塔洛克(1962)的观点,论证如下:“如果全体一致同意的规则也用于后宪法层次,每一个个体对集体决策都拥有有效的否决权,那么过度的交易成本将不可避免。以回避多数主义为基础的无记名投票将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工具。”

根据经济学家所作的区分,我们首先可以把技术理性与集体理性分开。如果说民主能有效地服务于一些其他有价值的目标,如促进经济增长,或(我坚持认为的)最大限度地减少武断的暴力,那么民主可以说是技术上合理的。但是在目前的讨论中,集体理性而非技术理性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列意义上,民主体现了集体理性。(1)如果对一个政治共同体存在着惟一的福利最大化:共同的善、普遍利益、公共利益等等(存在);(2)如果民主过程趋近于这种福利最大化(趋近);而且,若(3)民主过程是这种趋近的惟一机制,民主将优于所有其他可能的选择,没有一个仁慈的独裁者会知道什么是普遍的利益(惟一性)。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否是理性的,这一问题有五种不同的反应,这又取决于是否(1)(a)这种福利最大化被认为先于且独立于个人的偏好而存在,(b)无论发生什么,这种福利最大化被认为仅作为个人偏好的函数存在,(c)它被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有阶级或社会其他不可调和的划分;或取决于是否(2)民主过程被认为是趋近于福利最大化的。卢梭相信,普遍利益将会受到人们的优先考虑,透过民主过程人们就会趋近于这种普遍利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法保守主义者,以及当代形形色色的权威主义者都认为,存在着这种福利最大化,但是民主过程并不能指引人们达到这一点。民主的经济学理论家,尤其是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一直主张,公共利益要由民主过程裁决,民主过程是能确认这种公共利益的。但是阿罗(1951)在某些假设的基础上解释说,即使这种福利最大化确实存在,个人偏好的任何积聚过程也不能揭示这一点。最后,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追随者认为,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什么普遍利益。注意,当施密特(schmitt, 1988: 13, 6)驳斥卢梭的假设“真正的国家只有在民众同质性很高,以至于本质上就产生了一致同意的地方才存在”时是支持马克思的。当他观察到“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已经使得原本有争辩性的公共讨论徒有虚名”时,就强烈反对所谓的“趋近”。

最近的讨论集中于趋近问题上。根据社会选择理论,尤其是像里克尔(Riker, 1982)所论证的,即使社会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存在,民主过程也不会趋近于这一点。阿罗(Arrow, 1951)给出了理由:不存在一种保证产生特定结果的偏好累积程序。投票结果并不表明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偏好。另外,麦克维(McKelvey, 1976)也证实,投票结果可能并非集体的最佳选择。这种民主过程观依赖于一个隐含的假设——个人的偏好是固定的,并且外在于民主过程。经济学家也把个人偏好看作固定的,并认为达到平衡的调节是瞬间即逝的。因此,许多经济学者把民主过程视为“寻租”,即资源的浪费(如参见 Tollison, 1982)。

然而,偏好外在于民主过程的假设显然是不合理的。熊彼特(Schumpeter, 1950: 263)指出,“人民的意志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非其动力”。如果

偏好随人们的交流而不断变化,民主还有可能发现或确定福利最大化。源于交流,审慎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偏好的内在变化。因而,问题在于,审慎的过程是否使福利趋近于最大化。

哈贝马斯和科恩(Habermas & Joshua Cohen, 1989)二人认为,审慎过程会导致这种趋近。然而,他们的假设过于苛刻而很不现实。他们断言:(1)交流中的信息要么为真,要么为假;(2)人们面对真理时就会接受;(3)信息以中性的方式发布。最后一个假设最可疑:如果人们追求其利益时其行为讲究策略,那么他们也就在以同样的方式发布信息。姑且认为这些假设都成立,但是也不可能只有一条真理。前两个假设不足以使审慎民主过程趋近于那个惟一的福利最大化。 17

另一方面,马丁(Manin, 1987)提出了对审慎过程运作方式较现实的描述。他的结论是,审慎也不足以趋近于惟一的福利最大化。他认为,审慎更有助于人们形成其偏好,使之更具有普遍性,在特定时段内导致最广泛的一致认同。但是审慎也就此为止了,不能解决冲突。事实上,马丁的审慎过程是否可降低冲突的强度未为可知。若两个团体,经过训练,相信他们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就比解决零碎的,用赫希曼(Hirschman, 1985)的术语来说,“放纵的”欲望间冲突,要困难得多。准确地说,这些看法毕竟是社会主义者对审慎过程的理解。在他们看来,这个过程会导致人们的阶级认同及该过程无法解决的阶级冲突(Przeworski & Sprague, 1986)。

实际上,早在1923年,施密特(Schmitt, 1988)就对作为理性的、审慎过程的民主理论予以致命的打击。他指出,讨论并不能调解所有的政治冲

为了使这个问题不那么抽象,设想有三个年轻女子想买冰淇淋,但是她们所带的钱只够买一种口味的冰淇淋。她们最初的偏好顺序分别是, $C > V > S > N$, $V > S > C > N$, $S > C > V > N$ 。这里C、V、S分别代表巧克力口味、香草口味和草莓口味,N代表不定的口味,>代表“优于”。现在假设最爱吃巧克力口味的女士被告知,这种口味的冰淇淋会在她裙子上留下洗不掉的污渍。得到这个信息后,她会改变其偏好,把巧克力口味放在第二位,由原来的 $C > V > S > N$ 变为 $V > C > S > N$ 。这就是审慎过程。

回到冰淇淋的例子。假设受关于巧克力信息的影响,草莓口味迷告诉其他女士,香草口味的冰淇淋使人发胖;反过来,香草口味的爱好者提醒人们注意,草莓口味中含有致癌的五号红色色素。进一步假设,这些信息使理性思考疲于应付。那么,源于理性的审慎过程形成的偏好还会循环。民主会给参与者以训练,但不会导致一个惟一的解决方案。

突。在某一点上,理性与事实都无能为力,冲突却依然如故。在这个意义上,施密特观察到,把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之上的投票决定了问题所在。根据这一观察,他得出结论,冲突只有诉诸暴力才能解决。政治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暴力是双方的最终裁判。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大家和我一样,承认并非所有的冲突都可由审慎过程解决,然而民主必然会产生输赢,那么,人们能期盼输者会遵守以民主方式处理冲突的裁决结果吗?为什么由于民主博弈而吃尽苦头的那些人,不试图去颠覆产生这种结果的制度呢? 18

利益常常是冲突的。因而总是会有输赢,输者遵从现状就成为问题。然而由于施密特不能理解制度的作用,他得出的结论未免太过分了。民主制度给政治冲突以间歇性的特征。它们为政治行为者提供了较长的时间余地,让他们为未来作考虑,而不是仅仅关注眼下的结局。下面我的观点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制度会为相关的政治力量提供一种远景,使之服从目前不利的结局,以促进未来的利益。政治力量相信,组织民主竞争的制度框架会允许他们在将来继续推进其利益,因此而接受眼前的失利。

二、关于服从民主结果的诸种竞争性观点

在阐述我以上观点之前,不妨先来看看几种关于服从的见解。

我们是按以下方式考虑民主的。要推进自己的利益,各方任何作为必然把他们带入某一个十字路口。某些人可能总是来自东边,另一些人可能总是来自南边。一旦他们来到了这个路口,就有一个随机的红绿灯控制装置,绿灯表示允许通过,红灯表示停止,原地等待。获得通过与停止信号的几率取决于人们来自的方向与讯号灯的设置方式。如果东西向亮绿灯的几 19

施密特(1988:4—5)论证道,“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公共讨论严肃认真地进行与贯彻时,议会才是真正的议会。这里的‘讨论’具有特定的意义,并非仅仅意指谈判……讨论意味着观点的交流,一方通过某种真理与正义的论证说服另一方。同时也要允许自己同样地被说服。”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反驳施密特,指出他“从来就没有证明,欧洲面临着不是独裁就是议会制的困境。除议会制外,民主还可能有多种组织形式。”

我所提的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就制度与环境而言,在什么条件下,它们会使政治力量遵循民主过程的结果,从而使民主得以存续?就民主,尤其是用暴力来强制服从的道德根基而言,其哲学文献浩如烟海。由于哲学家常常把其规范性观点同现实相混淆,如果人们受某个作者道德观的指引,他们就会把民主理解为“是”这样或那样的,而不是把民主理解为可能是这样或那样的。尽管这类文献中会作出某种区别以澄清这个问题,但我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它与我手头的这个经验性问题无甚关联。

这个比喻来自 Moulin(1986: ch .8)。

率为 80%，那么来自东边的人通行的机会就好一些。他们若是从南边来，就很有可能原地等待。但是如果南北向开绿灯的几率为 80%，情形就正好相反。因此，可能的结果就取决于人们从哪儿来，以及灯是怎样设置的：参与者在民主竞争中所能运用的资源与他们所在的制度框架。

就上面提到的而言，在任何特定时刻什么事会发生是不确定的。行为者知道可能的结果是通过与等待的四种组合，知道这讯号灯不是红的就是绿的（取决于从哪儿来），也知道这两种对等结果的几率。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自己会顺利通过呢，还是等着别人通过。

假设参与者服从讯号灯的指示轮流通过而不会撞车。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不管红绿灯如何，大卡车为什么就不能强行通过呢？

对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供选择。第一就是，服从是自发的——分散而自愿的；第二是，在十字路口有一个警察，他会把试图抢道的人拦到最后面；第三个就是，人们出于对社会秩序的道德承诺，即使不合其利益也无人惩罚，他们同样会遵守秩序。

博弈论的基本术语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这些可能性。让我们仔细区别一下这三种不同策略情形下的结果。

(1) 自动自发形成的结果，或者说均衡。考虑到其他人也一样，每一个人都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一辆小汽车从南边开到十字路口，司机环顾四周，认为应该等待。因为她想到，从东面来的司机期待着通过。她的心理信号是红灯，而对红灯的适当反应就是等待（否则就会撞车），所以她停下来了。来自东面的司机把讯号理解为绿灯，因为他期盼着来自南边的人会等待。他的适当反应就是通过（否则就错过了时机，也许后面的人会撞上他），所以他就通过。结果是{等待，通过}，它是均衡的。每一个人对他人的行为都有所预期，他们的行为都是一致的，于是期盼彼此得到满足。 20

假设左派和右派政党的领袖都可决定，在他们的竞选运动中该运用何等程度的卑鄙手段。如果右派行为规矩，而左派举止卑鄙，那左派就最有利。反之亦然。若它们各自同时采取某种策略，就形成{卑鄙，卑鄙}的策略集合。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策略集合是自发的，任何一方在考虑对方这样

如果每一个人都遵守信号标志，就有可能出现二种结果。交通灯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出现集体性非最优的结果：期待他人认真行事的{通过，通过}与期待自己认真行事的{等待，等待}。在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人人试图违背秩序的自然状态而言，民主制度是一种帕雷托改进。但是，这一论证对于民主理性显得非常脆弱，因为自然状态完全是为了证实现在秩序的合理而杜撰出来的伪事实。正因如此，从规范意义上说，财产权形式对效率而言是没有说服力的。

做时,没有其他的选项。他们的期盼将相互得到满足:假设右派非常卑鄙,左派就考虑用某种程度的卑鄙手段应付它;右派也假设左派会选择某种卑鄙手段,事实上左派确实这样做了,于是,右派也选择同样的卑鄙手段。图 1.1 描述了这种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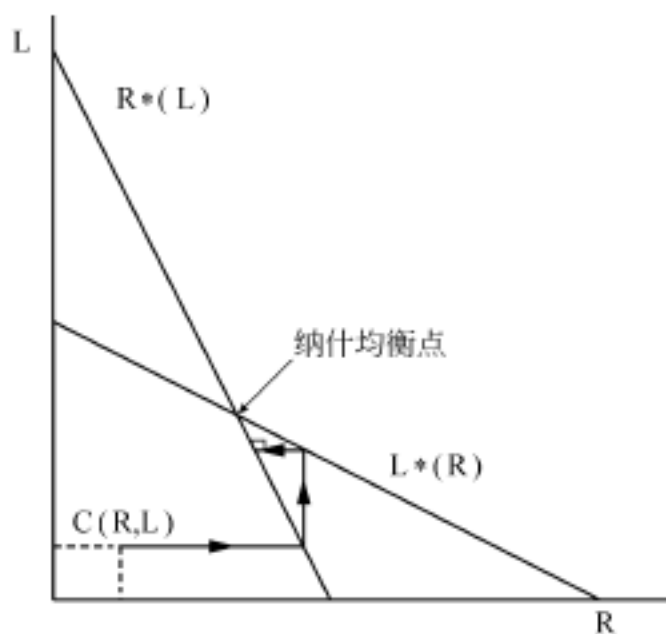


图 1-1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设想一个平民政府预见到(正确地),如果它整顿 21 军队将有可能导致军事政变,若它对之不闻不问,它们将呆在军营里。政府把自己的偏好理解为: {不整顿,呆在军营里(不整顿)} 比 {整顿,有可能政变} 要好一些。于是它决定不整顿军队。这也是一种均衡。政府在预期到军队有可能的反应后,它不想做其他任何事,只有听之任之;而考虑政府的实际不整顿作为,军队也就不会有其他的举措。这样,双方的预期就都得以实现。政府期盼军队呆在军营里,军队也确实呆在军营里。

这种结果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构成了均衡。考虑到另一方的反应作为,任何一方都不想另类行事。这种结果实际上是自我实现的,它们通过独立自发的反应得以实现。

注意,这里所说的均衡同过去我们用以解决政党间博弈所说的均衡稍有不同。政党同时选择它们的策略,而在平民与军队间的博弈里,是政府预期军队的反应首先行动的。前一种均衡概念不大可信,而什么样的均衡概念合理则未为可知。但现在我们不必深究这种细微差别。纳什均衡是博弈论中最简明最经典的均衡概念。

(2) 交易或契约。这种结果就是,在考虑到其他方的反应后,至少一方为自己获利仍置之不顾而另外行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是因为它是由外力强制实施的。会有第三方来惩罚“背叛”这种结果的行为。

设想有两个政党都同意不从事卑鄙的竞选运动,尽管在任何一方不以卑鄙手段竞选的情况下,相对一方以卑鄙手段行事对自己最有好处。如果两个政党都想赢得选举,没有外部强力,这种结果是不可能形成的。设想双方都同意不超出图 1.1 点 C(R, L) 表示的卑鄙程度。现在,右翼政党领袖看看左派已经许诺要做的一切,开始问自己,该如何反应才最有利。他们将在自己的最佳反应线, $R^*(L)$ 上找到认为左派会采取卑鄙手段程度的那一点。但是左翼政党会发现,若右派开始谈论他们领导人的生活作风问题,他们最好也指出对方财富来源问题。于是,双方原先的协议就失效了,直至重新达到一个均衡结果。要坚持原先的协议,一个公平选举委员会必须能劝阻性地惩罚违背协议的任何一人。交易或契约,就是这样一类协议,至少一方有可能违背它,但是它还得以成立,因为第三方能有效地制裁违约者。 22

但是,在民主制度下,谁来担当惩罚者呢?

这个问题最终有两个答案。强制力要么是分散的——有许多行为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来制裁不服从以维护合作性的结果;要么是集中的——存在一个特殊机关,它有惩罚违规的权力与意愿,即使它不能惩罚违规行为,或相反它制裁了遵从行为时,它本身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所谓“最终”有两种答案,是因为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韦伯意义上的国家对制裁违规是必要的。在所有的民主制度下,国家机关就是专门做这件事的。这涉及到,相对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而言,国家的自主性问题。若国家的制裁行为不受制于社会的任何制约,国家就是自主的。社会秩序的代价就是利维坦。但是利维坦——一个外在的强制性合作协议——并不是民主的。和平的代价就是国家不受控于公民。反之,若国家本身是为确保服从而形成的(尽管是并不完美的)联合力量——统治的协议,那么民主就是一种均衡,而不是一项契约。这样的国家要强制服从,因为它若不这样做或使

若当一辆小汽车不按顺序通过路口,从另一个方向也有人想不按顺序通过,因而存在撞车的危险,而此时的制裁实施是分散的。因为眼前他(她)所作的冒险增加了其预计的通过可能性。结果还是一种均衡,用博弈论的话说,一种“次优博弈均衡”。

Kavaka(1986:181)指出,在霍布斯看来,“君主,由于其为君主而不是订立契约的一方,因而不受契约限制的。”Kavaka 最后以与我相似的方式论证说(p.229),如果政府是“分裂而有限的”,对于引发人们的服从来说,霍布斯的解决方案也是不必要的。

用暴力妨碍参与,它本身就要受到惩罚。考虑到相关政治力量的利益,国家肯定会受到惩罚。

因此,民主是一项社会契约的概念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契约得以遵守仅仅因为有外部力量的强制;按定义,民主是一项制度,没有谁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订立契约方的意志之上。哈丁(Hardin, 1987:2)指出:“宪法并不是契约。实际上,它创造了订立契约的制度,它的功能在于解决订立契约之前的问题。”

(3) 规范。根据博弈论,这个尘世惟一可行的状态就是均衡或交易。该理论认为,这两种结果得以成立,只是因为各方出于自利考虑或由第三方 23 从外部强制而使之产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理论描述的结果不是追求利益的策略行为所支撑的。然而,关于民主的文献中充斥着种种价值与道德承诺。尤其是那些有关向民主过渡的文献,经常提及规范性的、雄心勃勃的民主承诺。这些承诺常常被称作公约。制度性的公约就是一系列确立民主的协议,即使某一种具体的制度体系对一些政治力量并不最有利。政治性公约就是各方共同谋划的一系列协议,以排除威胁民主的主要策略。社会的——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公约就是工会与企业达成的限制当前消费的保证。军事性公约就是在平民政治家与军人之间,常常是秘密达成的“相安勿扰”的交易。这些结果据说是受以下价值观支持的:它们对集体而言最优,对个人而言不合理,不会从外部得到强制。博弈理论称事实上不存在这类结果。

下面我采用博弈理论的视角。但是,这并不是说,对民主的规范性承诺是少见的或与民主无关;而是说,它们对于理解民主的运作并不是必要的。我坚信,人们的行为是出于价值观还是出于利益的策略追求而支持民主,这一问题的争论无法验证。这两种取向在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时不得不相互竞争,同时也确实是在相互竞争。我试图证实的就是,建立在自利的策略性

在这个方面,最近出版的一本巴西著作:A cidadania que no temos(我们缺乏的公民风貌)较好地阐述了民主的脆弱性。

我并不是说在所有关于向民主过渡的文献资料中能找到的“公约”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公约。有的公约就是协议,有的也许是一种均衡。尽管本书有具体的分析趋向,但它并不是以概念分析为主的文献。

该论断并不意味着文化不起作用。文化告知人们所思所想,让他们知道必须做什么,必须在他人面前隐藏些什么。在我看来,不言自明的是,人们是在一个相互沟通的道德背景下活动的。例如,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里,贿选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尽管它可能是有效的集体行为。若政治家拿关于未来种种好处的许诺交换选票,那他们为什么不先行兑现呢?

服从基础上的民主理论,对于解释现实的民主运作是合理而充分的。

博弈理论的最新发展使这种解释成为可能。虽然博弈理论现在仍流派 24
众多且不断发展,但它们却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在具有分散的出于自利的
惩罚体系下,合作能自发实现。

在下列情形中,该论点是正确的:行为者常常为未来作考虑,博弈在任
何一个轮回里终结的可能性相当低;人们常常希望博弈无限期持续下去,行
为者不是过分地漠视未来;博弈中出现非理性行为者的可能性相当低。有
许多惩罚策略来支持服从:二犯一罚、一犯二罚、二犯三罚等。

这样,无论是规范性承诺还是“社会契约”,就产生对民主结果的服从而
言,都是不必要的。重复一下,在所有的民主政治下面,很明显地,国家都是
强制人们服从的特殊机关。而且,既然国家垄断了有组织的暴力工具,那么
它就总是有可能独立于人民的控制,以自己的利益行事,相关的政治力量无
法有效地监督它。因此,国家自主性的威胁永远存在,控制国家自主的制度
性框架在任何民主政治下都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形式下的政治权力,其基
本的难题在于,它按比例产生收益(Lane, 1979)。一方面,政治权力的职责
可以直接用以防止其他人竞争政权,另一方面,经济权力可以转化为政治权
力,而政治权力又可以用来提升经济权力,等等。但是,若不是把国家作为
第三方而是作为政治力量联盟的代理方进行制度设计,服从就有可能自我
实现。那么,谁来做监督者?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公民社会中的力量。这些 25
力量出于自利会成为监督者。民主可能是一种均衡的“自治”的制度。统治
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区分消失了,就像孟德斯鸠所言:“人民在某种场合下是
君主,在另一些场合下则是臣民。”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1965)认为这个世界处处充满囚徒式集体行动的困境。我
们似乎过于仓促地接受了这个观点。现在我们知道,在许多反复出现的状态下,出于自利的行为可
能自发地支持合作性均衡。请参看 Fudenberg & Maskin (1986) 相关的几个定理。注意,尤其是定理
2,它表明,在相当微弱的状况下(回报的形式足够多),该结论对于 N 个人间的博弈也是成立的。其
解释(p. 544)是,“如果一方背离[合作],其他方将使之从背离中获得的利益最小化。要导致其他方
使背离一方获利最小化,他们必须最终得到某种‘报酬’。”还要注意,诱使合作的惩罚策略不必依赖
于过去背离的历史,因此,博弈方不必相互认识,不认识同样可以对不合作行为施加有效的惩罚
(Abreu, 1988)。

在这里,犯指不服从,罚指惩罚、制裁。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评论,参见普沃斯基,1990,第二章。

我引用的是 Camille julia 编评的 1905 年版的 L'esprit des lois(《法的精神》),她引用亚里士
多德的一段话并注释说,“人人应当彼此指令,每一个人也应当轮流地指令所有人”。

三、作为均衡的民主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民主才会得到巩固: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某种特殊的制度体系成为人们间惟一的博弈规则;谁也不能想像游离于民主制度之外;失败方想做的一切就是在他们刚刚失败过的民主制度下,重新努力。只有当民主变得自我执行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所有的相关政治力量发现,继续将它们的利益与价值付诸于不确定的制度博弈对自己最为有利时,它才是巩固的。即使是失败了,也遵从当前的结果,并以此指导其在制度框架内的行为,这对相关的政治力量来说,要好于去颠覆民主。讲得更专业化一点,当服从——在制度框架内行为——构成了所有相关政治力量分散策略的均衡时,民主才是巩固的。

这一假说是以三种假设为基础的。第一,制度是管用的。它们以两种方式起作用:作为竞争的规则和作为对不服从加以惩罚的规则。毋庸置疑的是,规则影响结果。不妨看看如下例子。由苏亚雷斯(Adolfo Suárez)领导的西班牙民主中心联盟和韩国的卢泰愚在他们各自国家的首次民主选举中都获得了35%的选票。但是苏亚雷斯在议会制下获得了胜利,因此,他要组织政府,就必须建立一个政党联盟,而且只有在这个联盟获得足够支持时才可能执政。而卢泰愚则当选为任期五年的总统,在这期间,他可以通过行使法定权力实行统治,而置短期的政治支持变动于不顾。

26

制度作为惩罚规则这一点稍复杂些。注意,我在前面说过,行为者有可能发现,即使在不引入制度的情况下,服从某些(合作性的)结果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合理的。当一定的条件得到满足时,对于各个自利的理性的行为者来说,由其他人来对不合作行为加以惩罚是最好的策略。而博弈论解释隐含的假设基础是,某些行为者有能力施加惩罚。要执行制裁,行为者必须能采取使他人利益受损的行为。制度使这种惩罚成为可能,并使之可预测。制度形成了一套先定规则,使惩罚有据可循。制度还规定了执行惩罚的物质手段,并刺激特定机构执行惩罚。仅以征税为例。要使人们纳税,就必须有惩罚的规则,要有一套官僚机构来稽查不纳税的行径,并有一套刺激性激励使官僚机构切切实实地去查办并适用惩罚规则。若税务官员缺乏稽查的

我这里所言的“政治力量”指在特定制度框架下已经组织为集体性的或有可能组织起来的团体,以及作为选民的个人。我认为政治力量不可以先于且独立于特定的制度框架。制度塑造政治组织。

这个例子源于 Juan Linz。

手段,若官僚们很容易地被贿赂,惩罚就失效了。制度用可预期的某种威胁来代替实际使用暴力。

第二,民主有不同的组织方式。有些民主国家实行的是,民众直选总统,总统领导政府,无需得到立法机关的支持。而在另一些民主国家,政府必须得到议会的支持。只有议会支持政府时,政府才能存续。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利益组织的方式和某些经济政策的决策方式。民主政治下,政党的支配地位有可能受到官方认可的工会联盟与雇主协会地位的制约。后二者代表着某种实际利益,相互交涉,并同政府就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交涉。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有的民主体制给当前的多数近乎无限的权力,有的民主体制则通过对宗教团体、讲某种语言的团体及区域性团体提供特殊保障给多数统治施加苛刻的限制。这不过是些例子。诸如此类的重要区别可以继续列举下去,如选举制的差异、是否存在司法审查、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模式差异、是否存在一支职业性文官队伍等。

第三,与当前主流相反,制度不仅对效率产生影响,而且,如奈特(Knight, 1990)警醒我们的那样,制度还会引起深远的分配效应。例如,众所周知,简单多数式选举制常常产生“不应该的多数”:议会席位的多数出自少数派。集体协商的框架会影响薪金谈判的结果。财产法会影响意外损失的责任承担。有关学生入学的规则会影响学生的构成。 27

因为制度具有不同的分配效应——因为它们给不同的团体以不同的机会,有的制度框架在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就会得到巩固,而有的则不能。那么,问题就是,哪一种民主制度会唤起相关政治力量的服从呢?

然而。不服从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不作仔细的梳理。我们只是区分一下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在任何一个体制下面,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服从制度对他们所要求或期盼的一切。既然强制执行的边际成本会显著地增加,所有的国家都会容忍某些个体的不服从,甚至有时是较大规模地容忍。不服从,在某种不直观的意义上说,也可意味着个体退出参与:他们对民主制度的结果漠不关心。不参与有时可达相当高的比例,研究表明,至少35%的美国公民总是置身于民主制度之外的。

当这些形式的个体不服从达到一定规模时,就有可能通过突发性的街

博弈理论家认为博弈方当然可以使用惩罚性策略。然而,Kavka(1986,第四章,第二节)表明,此乃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自然状态下,惩罚只能通过暴力强制实施。制度把这种强制组织起来,通过威胁使之可预期。

头暴动或短暂的反民主运动对民主构成威胁。但是单个的个人不可能动摇整个社会秩序。因此,个体所理解的“合法性”,即使考虑到伊斯顿所作出的全部区别,同体制的稳定性问题也无甚关联。只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才有能力削弱民主体制的基石。

这样,对自我执行的民主政治休戚相关的不服从形式有以下策略:(1)试图事后改变民主过程的结果;(2)极大地降低其他行为者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因而,不服从就是为了否定民主过程的结果去颠覆民主体制。

28

现在我以公式的方式来解释,自发的、分散的、出于自利的服从如何实现。

我们从某个特殊的行为者——如军队或资产阶级与军队的联盟——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在任何时候,民主过程的结果就是这些行为者或胜或败,而且获胜的价值高于失利的价值($W > L$)。他们赋予在未来任何一轮竞争中获胜的几率为 p 。这些行为者可行的行动路径是服从或颠覆。如果他们选择颠覆,他们得到的是 S , S 包括失败与受惩罚的风险。只有在 $W > S > L$ 为真的情况下,他们的服从才可能成为问题。假设他们刚刚失败,令 $t = 0$ 。若他们服从,他们将得到 $L(0)$;若他们选择颠覆,他们将得到 $S(0)$ 。若他们为眼前的利益驱使,他们就选择颠覆。但是制度为行为者提供了长远的空间。尽管他们刚刚失败了,他们也知道若在这一轮中服从结局,那么在下一轮中就有望得到 $C(1) = pW + (1 - p)L$, 尽管 $L < S$, 但 $L(0) + C(1) > S(0) + S(1)$ 有可能为真。这导致他们在 $t = 0$ 时服从。

我们把这个观点推而广之。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行为者在 $0 < r < 1$ 的情况下置未来如何于不顾。这样,他们给予在下一轮中服从的值为 rC , 再下一轮的值为 $r^2 C$, 等等。服从的累积值为 C^* 。若他们选择颠覆,他们有可能扭转本轮的失利,并预期现在和未来可能得到 S 。颠覆的累积值为 S^* 。若 $C^* > S^*$, 失败的一方在 $t = 0$ 时会选择服从。

注意,成功颠覆的可能性和与失败相关的损失取决于其他政治力量捍

若任何一方能够在事后推翻结果的话,其他方就必须向后调整他们根据规则赢得博弈的期望值。

这是他们当前所估计的几率。随着逐渐了解到或赢或输,他们会及时修正这一几率。

S 依赖于颠覆结果的企图成功的可能性,依赖于颠覆成功或失败的效用。若几率为 q , D 和 F 分别为颠覆成功与失败的值,那么 $S = qD + (1 - q)F$ 。

有这样一些行为者,对他们来说, $S > W > L$, 他们总是试图去颠覆结果。相反另外一些则由于 $W > L > S$ 而决不会去颠覆。

卫民主制度的决心。一方有可能设想一种“倾斜的均衡”——每个行为者对民主的支持取决于有多少其他行为者也支持民主。然而，民主博弈中的行为者并非都是一样的，民主也不是一个数量关系。显然，平民对军队的制度性控制框架构成了民主得以巩固的中枢神经。

人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让这个理论复杂化，使之更接近现实，如引入更多不同的策略，考虑知识的不完备性与学习的作用，考虑使用更合理的胜败概念。但是从这个简化的模型中已经可以得出一个根本性的结论，而且即使把这个模型复杂化以更趋近现实，该结论仍然成立。即，服从取决于在民主制度下获胜的概率。若某个行为者 i 赋予他在民主竞争中胜出的概率为 $p(i)$ ，它大于某个最小值，记作 $p^*(i)$ ；则他会选择服从。这个最小概率取决于一个集体性行为者赋予民主过程结果的值和颠覆民主结果的值，取决于它理解的未来风险。行为者对民主制度下政治力量的关系不会发生逆转的信心越强，他们越有可能服从。颠覆的风险越小，潜在的反民主力量就越有可能不服从。

以上所说一切并不意在对历史事件作一描述。“模型”——我常常感到有必要引用泰勒 (Theil, 1976: 3) 的话——“是加以使用的，而不是要让人确信的”。这里的模型给我们提示的就是，在分析任何具体情形时，人们应该考虑各个特定政治力量赋予其在民主之内或之外推进利益的价值与机率。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下，当所有相关的政治力量都有某种明确的成功的最小可能时，民主就会唤起普遍的服从，它就是自我实现的。

这个最低的概率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在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这取决于特定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参与方在民主竞争中所能动用的资源。我们

注意，这里的胜负概念大大简化了。各个群体是在广泛的结果范围内确立其利益的，并给每种利益实现的程度与特殊方式赋予价值。这样，胜负就在多向度的偏好曲线上不断地得到确定。但是如果在简单的模型中蕴含着同样的逻辑含义，我们就没有必要进行烦琐的数学推导。

这里有一个模型提供给那些不仅对结论而且对推理有兴趣的人。如果行为者在 t 时刻刚刚失败，为方便记作 $t=0$ 。他从服从中获得的回报是 $C^* = L + r - tC(t) = L + [r/(1-r)]C$ 。他从颠覆中获得的回报是 S ，它取决于行为者设定颠覆成功的概率，取决于行为者对非民主未来的漠视程度。因此，若 $C^* > S$ ，或者说 $p > (1/r)[(1-r)S^* - L]/(W - L) = p^*$ ，则行为者会服从。注意， $dp^*/dr < 0$ ：某个行为者对他民主下的未来越有信心，那么唤起他服从眼下民主结果所必需的最小概率就越低。反之，设 q 为颠覆成功的概率，若 $dS^*/dr > 0$ ，则 $dp^*/dr > 0$ 。某个特定团体搞颠覆的风险越小，要使他们服从民主结果，所要求的成功概率就越高。最后，注意当行为者刚刚失利时，若 p^* 足以唤起服从，那么若他刚刚获胜， p^* 也足以唤起他的服从。因此， $p > p^*$ 是最低要求。

相关的政治力量就是对他们来说 $S > L$ 的那些。那些 $L > S$ 的政治力量别无选择，无需保障。

现在又了解到,它还取决于特定的行为者颠覆民主的能量。军方在民主政治下追逐利益的前景黯淡,但它们能以暴力颠覆民主。它们的 W 很低,但是 S 很高。因此,它们的 p^* 也可能性相当高。资产阶级在民主体制内能很好地追求利益。在民主体制之外,他们也能很好地追求利益,但是他们需要军队来成功地颠覆民主。工会及其他的工薪组织在民主竞争中也能很好地追求其利益,但是一旦民主失败了,他们就会受到血腥镇压。他们很可能就是 $L > S$ 的群体,因此他们总是趋向服从。而且,一个特定群体所要求的保障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 1976 年以后的西班牙,军方几乎不在乎 S 与 L 的区别。他们在佛朗哥(Franco)的统治下挨饥受饿,以至于民主下非政治生活也让他们心满意足。相反,在 1983 年以后的阿根廷,军方就认为 L 远远低于 S 。他们知道,若在民主中失利,许多人就要长期监禁。这些都是信手拈来的例子。我要说明的就是,即使简化的模型也可以把具体的行为者与不同的历史情形分别开来。

因此,使博弈方呆在民主制度框架内的最小概率,取决于他们在民主的利益竞争中失败的价值。拥有广泛选择——颠覆民主或怂恿其他人去颠覆民主——的政治力量,若他们相信在民主体制下一再失败,也比处于另一种制度下的未来情形好得多,那么,他们就可能选择继续进行民主博弈。毕竟,民主为所有的群体提供了一条基本的价值,足以使他们更偏爱民主而不是其他的选择。这条价值就是——免受专断暴力之危害。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Santiago Carillo)1974 年说,“人们应当有勇气向工人阶级说明,向资本阶层交付剩余价值,也比建立一种压迫工人的情形要好得多”(Carillo, 1974:187)。

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对民主效率的信心,在那些民主制度下赢得利益分配冲突前景渺茫的人中,也是一种保证服从的资源。若人们相信,民主从长远来看有助于经济发展,那么,各种群体即使赢得有关分配性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他们也会选择支持这个体制。在民主政治下对失败的预期价值越高,获胜的机会要求就越低。

这最后一个假设对民主的社会条件这一永久性问题的意义深远。从反面来说,这个模型意味着,如果某些重要的政治力量根本没有机会赢得分配冲

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工会极有可能是个例外。

若在分配性冲突中获胜机会很低的政治力量相信,民主会使馅饼越做越大,那么这就是正确的判断。回到 p^* 的表达方式。计算后 $dp^*/dL = -(1/r)[W - (1-r)S^*]/(W-L)^2$, 这是个负值。

突,如果民主不能改善失利一方的物质福利,那么那些预期要不断忍受民主制度之结果的人就会反对这些制度。要唤起民众的服从与参与,民主必须产生实质性结果:它必须为所有相关的政治力量提供机遇以改善它们的物质福利。实际上,稍微计算一下 1946 年至 1988 年间南美任何政权,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的,结果表明,凡是经济正增长达到了一年的政权,在下一年中就有 91.6% 的机会生存下来;凡是经济负增长达到了一年的政权,在下一年中还有 81.8% 的机会生存下来;而若一个政权连续两年经历经济收入下降,那么它在下一年就只有 67% 的存活率。

然而,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白这个假设中没有隐示在内的意义。第一,它并不意味着,若民主制度要唤起人们的服从,民主就必须有社会内容。如果民主是一种导致最终结果不确定的制度,那么,“社会内容”就不可能意味着事先承诺的平等、正义、福利,等等。这类承诺是行不通的。在民主政治下,其结果由竞争的政治力量的利益追求策略决定,事先肯定是不确定的。誓言要发展大众福利、促进国家统一、传承民族文化、为每一个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条件的宪法,对于抒发国民感情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它们不可能就此而得到服从。只有在它们以法律而不是以誓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32 后,才能得到遵守。尽管不同的力量在民主竞争中运用的资源不等,但若制度框架有利于社会正义,民主最终还是会有某种社会内容的。但这多少是个制度问题,而不是实质性承诺问题。

第二,民主若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经济绩效就不能存续的断言,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客观规律。在新近成立的民主国家人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民主必须兑现诺言,否则……”省略的话从来就没有说出来,因为它被认为是不用言明的。当阿根廷的将军们一个个地宣称,“经济状况使民主危在旦夕”时,他们似乎正在断言一条客观规律,但是他们恰恰就是这条规律的催化剂。他们期望经济危机使某些平民起而反对民主,这将增加颠覆民主的可能性。面对经济危机,这些将军从其偏好出发,作出推翻民主的反

这一直是我同 Francisco Weffort 反复争辩的主题。关于最新的保留条款,参见他的“*Incertezas da transição na América latina*”。

有些条款要求,每个企业至少要雇用 10 名以上工人去招聘新员工,在新员工中 45 岁以上至少要占到 10%。这类条款就更不用提了。

把这二者放在一起讨论是出自当前波兰宪法的争论。参见 *Trybuna Ludu*, 1989 年 9 月 17 日。

《纽约时报》,1990 年 1 月 3 日。

应。但是民主能否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生存下来是条件与制度相作用的共同后果。如大萧条时欧洲经验表明,某些制度框架比其他的一些因素更能抵制经济危机的影响。

总之,从静态的观点看,民主制度必须是“公平的”。它们必须不时地给相关政治力量在利益与价值竞争中以获胜的机会。从动态的角度看,民主必须是有效的。它们必须使即使民主体制下的失败也比其他非民主体制下的未来前景更有吸引力。这两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明,若政治力量期望在继续遵守民主博弈规则的情况下,其未来将会好转,那么,他们就要服从民主的结果。要么他们必须获得胜出的公平机会,要么他们必须相信失败并不那么糟糕。于是,为了唤起服从,要巩固民主,民主制度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的,在总体上是有效的。

可是,在某些条件下,这两个要求可能会相互矛盾,尤其是考虑到经济问题时。公平要求所有的主要利益应得到起码的保护,而有效性在这些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会显得非常必要。要在经济上卓有成效,政府就不得不侵犯某种财产权利。例如,进行土地改革,为有效配置资源而导致大规模失业。有利于重大经济变革的制度不能保护所有的利益,保护所有利益的制度框架不适合于重大的经济变革。 33

实际上,左派面临的传统困境就是,即使民主在程序上完美无瑕,但仍有可能是一种寡头政治:富人统治穷人。历史经验证明,民主社会下也有贫困与不平等,在工厂、学校、监狱和家庭中,也有压迫。右派的传统困境就是,民主有可能转化为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的统治。民主程序有可能威胁到财产权,以普选形式体现出来的政治权力和以结社权利体现出来的政治权力,可以用来限制财产权利。因此,民主要成为自主的政治力量之分散策略的均衡,就必须要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民主形式在历史上对于有组织的政治冲突显得很脆弱,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四、制度设计

以上抽象的讨论对于具体的政治制度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有可能持续下去并切实发挥作用?宪法是应仅仅包括关于政治竞争与保护少数的规则呢,还是也应包括实质性的承诺?议会制是否比总统制更

有利于调节冲突？在危急时刻，同行的法团式组织对于去动员达到经济政策的一致，是否有必要？

宪法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除了联合王国和以色列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成文的、形式上得以适用的宪法。然而，这些宪法在各自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千差万别。在美国，同一部宪法已经沿用了二百年，在这期间，它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主要的政治冲突，除了一次例外，都是在它的制度框架内解决的。在阿根廷，自 1853 年就开始适用的宪法至少书面上一直保留着，除了从 1949 年到 1957 年这一短暂时期之外，还一直是有效的。但是过去的 50 年间，阿根廷的政治冲突只有一半时候是根据宪法条款来处理的。在法国，宪法自 1789 年以来屡次变迁。事实上，每一次政治大动荡都产生一部新的宪法。然而在生效期间，每一部宪法确实是在规制着权力的运行与政府更迭方式。最后一个例子是韩国，自 1948 年开始它每隔三年九个月就有一次重大的立宪改革，但是没有一次政权更迭是按宪法规则进行的。因此，我们看到了四类宪法：长期延续并得到遵守的宪法，长期延续但遭忽视的宪法，经常变化但均受尊重的宪法，经常修正但又形同虚设的宪法。历史经验并没有给我们多少帮助。

实际上，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来回答关于制度设计的问题。我们对总统主义与议会主义的影响有些直觉，我们知道各种可能的选举制的效果，我们倾向于相信独立的司法在解决冲突时是一种重要裁决力量；但是我们现有的知识经验还不足以就关于制度设计展开争辩。波兰的民主要得到巩固，是实行强总统制还是弱总统制？是实行多数选举制还是比例选举制？宪法要确认对共同价值的承诺吗？还是宪法对此不作具体的规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所知还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们无法确切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原因在于民主的巩固可能是条件与 35

林兹 (Linz, 1984) 提出了一系列论证支持议会制反对总统制。我尤其相信他观察到的总统制会产生零和博弈，而议会制则增加总收益的论断。理由如下。在总统制下，胜者得全票，他（她）能组成政府，而不必与失利方联盟。事实就是，被击败的候选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但在议会制下，他（她）就成了反对派的领袖。因此，根据以上模型，在 *ceteris paribus* 条件下（即在两个体制都存在 $W + L = T$ ），总统制相比于议会制，各方胜出的值 W 较大，而失利的值 L 较小。现在假设行为者每年以 r 的比率给将来打折扣。在总统制下，胜方任期是固定的（记 $t = \text{PRES}$ ），下一轮期盼的值是 $r^{\text{PRES}} [pW + (1 - p)L]$ 。在议会制下，胜方只有在议会中获得足够支持时才能在位，我们把这个时期记为 $t = \text{PARL}$ ，其下一轮的期盼值是 $r^{\text{PARL}} [pW + (1 - p)L]$ 。初等代数表明，除非议会制下的任期明显比总统制下任期长，在民主博弈中，失利方更愿意呆在议会制下。

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或许必须符合条件。卢梭(1986:1)在为波兰设计宪法的过程中写道:“我们必须彻底了解正建设着的国家,否则制度建设一旦完成,不管就制度自身而言是多么完美,当它投入运行就会被证明有很多缺陷。如果国家已经形成,其嗜好、风俗、偏见、弱点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通过新的设计清除时,那么其缺陷就更加确定了。”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经验研究以获得这种共同作用的可靠知识。

因此,我只能作一些初步的猜想。那些得到遵守并长时间持续的宪法能减少政治斗争的风险。觊觎官职者期望得到一官半职,失败方期望能东山再起。据说拿破仑曾说,这样的宪法应“言简意赅”。它们只规定政府的范围和竞争的规则,而把实质性结果留给政治角逐决定。被用以强化短暂政治优势的宪法,只是作为新近胜出一方进行统治的法令的宪法,都只能在产生最后政治胜利的条件存在时才会延续下去。反过来说,允许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实质性要求塞进去的宪法,把实质性承诺(魏玛共和国宪法中有关社会权利一章是这一方面的典型)视为圭臬而认可妥协的宪法,常常是不能执行的。

把这个论点再向前推进一步,我想提出三点仍然是非常抽象的评论。第一,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成功后的历史中,选举产生的多数是很罕见的。在战后的十五次选举中只有一次,多数选民把票投给同一个政党。因此,大多数民主国家要么是由明确的政党联盟执政——这些政党独立都不能执政,要么是由得到隐含的支持保证为基础的少数派政府执政。第二,在成功的民主下,制度难以强化暂时的政治优势。如果对权力的收益渐渐增长,得不到制度上的约束,那么失败一方必然首先就为其所失去的殊死搏斗,等待只会让他们更难以成功。第三,政府必须有治理能力。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有能力阻止某些要求进入公共领域,他们肯定不能容忍所有重要的集团都对公共政策投反对票。 36

这些评论导出了两条否定性规则。第一,民主制度要稳定有效,政府就万万不可对政治力量间关系变化无任何反应,不能在制定政策时不与各种力量商议,当政府执行规则时就不能不受服从规则的限制。第二,民主制度不能使决策及其执行瘫痪。决策中必须体现各方利益,但是任何一方都不应有能力单方阻碍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这个结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即是,

Lula 在一次选举前的采访中指出:“如果我们把新宪法中社会权利一章付诸实施,那就是在制造一场革命。”(Luis Inacio Lula da Silva, interviewed in *Veja*, 1990年11月29日, p.4)

稳定的民主要求政府应当足够强大以便有效地治理,而不是虚弱到一碰到重大利益的阻碍就不能治理。

如果这些评论是有效的,那么民主制度只有夹在这二者之间去走向成功。在某些历史条件下,这两种限制之间可能没有太多空间。民主并不是总是可以得到巩固的。

第三节 向民主过渡

当专制土崩瓦解,众多政治力量纵横捭阖时,自我执行的民主并不是这过渡期惟一可能的结果。已倾覆的权威体制可能会卷土重来,或者会出现新的独裁。即使民主已经建立,它也不一定就能持续下去。民主制度可能系统性地产生某种结果,导致一些重要的政治力量起来颠覆这些制度。所以说,巩固的民主只是权威体制崩溃后众多可能性结果之一。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制度条件下,自主的社会力量总是努力把一种体制强加于其他力量之上,以强化自身的政治优势。那么,有没有一些制度会自动形成,使得一旦生效,它们就会产生分散的服从呢?在什么时候,相互冲突的利益团体通过把自身的部分权力移交给制度,自动地限制其未来的能力以开发自己的政治优势?他们在什么时候缔结产生服从、使民主自我执行的“民主协议”呢? 37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古典问题。自从17世纪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就一直在探寻着从满是冲突的野蛮无序到祥和的精诚合作这一转型的秘密。从利维坦开始,人们提出的方案不胜枚举,且最近的方案显示出人们越来越乐观。我们被告知,社会秩序问题可以通过惯例(Lewis, 1969; Sugden, 1986)、合作的自然演进(Taylor, 1976; Axelrod, 1984)、规范(Ullman-Margalit, 1977; Axelrod, 1986)、道德(Gauthier, 1986)及仁爱的制度(Schotter, 1981)来解决。

这类问题还可以表述如下:在各种冲突与合作的混合方式下,人们的各种利益形成了某种策略结构。对利益的不合作解决从规范上说有些不可欲的特征。在此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方式(国家、计划、惯例、道德、规范、制度、奖券)得以自愿地适用,且一旦适用,就将唤起自发的(自由分散的)服从

对于这种局面来说,“过渡”一词并不十分妥帖,因为它暗含结果已经被预先决定了的意思。然而,我决定遵从众多关于向民主过渡的文献中最通用的用法,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即人们的行为正是规范上所需求的,如符合集体(帕累托)理性、其他的福利标准、正义、公平、公正或平等?注意,哲学家追求的是会引致自发服从的方式,而不是强制服从的制度,即使制度也可导致规范上可欲的行为。

这种陈述是以某些假设为基础的,这些假设则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假设在自然状态下“个人”会遇到合作问题,对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分析真正行为者面临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相关的行为者并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政治力量:先前就已构造好的集体组织、某些一经刺激就可能集体性组织起来的人群、作为选民的个人。他们总是在既存的惯例、规范与制度下陷入冲突。 38

由于这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民主条约的作用也就是去影响如此重大的转型。条约是(一次完成的非合作性的)策略均衡,这种种策略则由变化着的现实条件组成,且其组成方式是要使分散的自愿服从让个人能乐观地接受。民主条约就是对不赞成的赞成协议。要通过协议改变这些条件的惟一方式就是建立新的制度。

因而,民主化问题的解决方案由制度组成。政治力量的资源是既定的,它们的偏好及各不相同的条件也是既定的。如果导致自发服从的制度体系是过渡的均衡,那么,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这样,建立民主的问题就是,政治行为者赞成会唤起他们服从的民主制度框架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子问题:第一,在既定的条件下,是否存在某些民主制度体系,它们一经适用就会唤起自发的分散的服从?在

霍布斯的论述在我们的背景下用处不大。原因在于,对霍布斯来说,个人要建立国家第一是因为它能保护他们免受外来的入侵,第二才是保护他们免受彼此相害之苦(利维坦,第17章)。尽管有关的领域冲突时不时就爆发,但是人们这里分析的问题不是成立一个国家,而是在已定领域范围内组织一个国家。因此,拥有安全边界这一帕累托优势在关于民主转型的制度冲突中并不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我仅意指非外在强加的。

各种社会契约理论就没有注意到这两个问题。这些理论追随的问题是:在自然状态下,假设的个人会认为哪一种政治秩序是值得他们遵守的?由于对个人的假设不同,这些理论也就结论不一了。如果个人被置于一道无知之幕后,他们不知道有关他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下福利待遇的任何信息,那么问题就是,一旦他们身处其中、知道自身的福利怎样时,他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个秩序(braybrooke, 1976),相反,如果个人知道他们在新秩序下的机会如何,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赞成这个新秩序——他们知道,这个新秩序将导致他们必须遵守使自身极为不利的结果?比如说,军队知道民主体制将使文人来控制它,而他们最好服从这种控制,否则,他们宁愿自己独裁。因此,一旦制度体系确立,政治力量是否将服从这种既定的制度体系这一问题同他们是否会赞成确立这种制度体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某些利益结构下,也许没有任何一种民主制度,能阻止重要的政治力量一旦大权在握就试图来颠覆它。第二,自我执行的民主制度体系是否会作为关于制度选择的冲突结果而确立?因为即使人们可能会发现,制度一经确立就会自我执行,当个别政治力量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其机遇大不一样时,这些制度就不必构成过渡形势的均衡了。设想一群人进入一个赌场,这个赌场里有轮盘、扑克、21点牌、掷骰子等游戏。那么,存在一种游戏,使得玩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连输好几把还会继续玩下去吗?若有,潜在的玩家可以赞成哪一种呢? 39

这些都是在向民主过渡中必然会遇到的同类问题。

附录：为什么结果不确定？

民主的一大标志性特征即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具体的结果总是不确定的。这就好像是所有的人都做他们认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事,然后由某种随机的方式来选择结果;好像结果是由掷骰子决定的。这是事实吗?若不是,为什么它们又好像是事实呢?本附录的目的即是要去澄清民主引起的不确定之根源与本质。

首先,我们认真地审视一下民主的运作方式。不妨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竞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政党面对着选民,盘算着在什么问题上应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才能获得最大的支持,然后选择那些同自己政纲不相矛盾的立场以求获得最大可能的胜数。在选举日,结果揭晓,各个政党得到某种信号,该信号在每种民主下多少是惟一确定的。各政党由此而去组织政府或形成反对党阵营。

对私立学校的公共援助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宪法法院里就此争辩不休。如果法律有利于他们,他们就引用宪法;若法律不利于他们,他们就引用事实。法庭仔细考虑后作出判决,判决结果就成了合法的现状。

各银行对立法机关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鼎力相助,以帮助自己摆脱过去不良行为的影响。众所周知,普遍性的利益要求能说服他人,特殊利益要求则难以打动人心。所以,银行提请人们注意,若银行倒闭,寡妇可能会失去一生积蓄;政治家则声称自己代表纳税人,要人们注意到财政赤字的危险。立法机关投票决定帮助银行,而官僚机构则进行核实。

注意,在这些例子中并不存在着不确定性。在参与方所能动用的资源与制度框架确定的情况下,结果也就被决定了。每个行为者都会去检视资源的分布状况,了解规则,然后决定若他们实践自己的动议,即履行自己的 40

策略,谁会赢得或输掉什么。然而行为者显得好像他们并不确定结果如何。

行为者的行为是双面的,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若输赢是二者必得其一的话,那么,那些预期会失败的人将什么也不做,因为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可做:由于对方论证充分,法庭必将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裁决。因此,若他们参与竞争,那必然是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行为之结果。若补偿是动态持续的话,那最终的输家就被迫去参加竞争,去实践自己的意愿,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的结局会更糟糕。而政治家则为了不失去选票,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最终是要帮助银行脱困的,但他们还是抱怨政府花钱大手大脚。但是,我认为,许多初步证据表明,政治行为者常常对结果不太确定。民主政治下的每一个人都至少经历过一次戏剧般的选举之夜。我最喜欢提到一个承认这种令人惊讶之状的例子就是,智利的右翼日报 El Mercurio 在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赢得 1970 年总统选举多数后的第二天所发的社论:“没有人会料到秘密的普遍的资产阶级的选举,竟然导致一个马克思主义候选人获得胜利。”

那么,民主天生就有的不确定之根源何在?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扑克牌游戏。第一种玩法叫做 LEN。所有玩牌的人都坐到桌边,为黑桃 A 打赌。出价最高的人将不仅收回自己的钱,而且还收取桌子上的所有赌金及不玩的人所必须支付的一美元。规则完全是普遍性的,人人都可参赌。但是总有一个玩家会比其他玩家更有钱,这样,财富唯一地决定了结果如何。因而,这里就没有不确定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把他所理解的民主叫做资产阶级专政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了确定要赢的玩家外,任何掏出一美元以上去玩的人都是大傻蛋。

41

现在我们来玩 JON 这种新游戏法。所有玩家都出价要牌。这些牌是向下盖着的,你看不见。有所有的牌被买光后,他们再看自己手中的牌。获得黑桃 A 的算赢。他同前一种方法一样收取赌金。在这种游戏中,如果每

关于补偿二分的观点,参见 Riker, 1962。这个观点受到了 Stigler(1972)的辩驳。

想想(美式)足球。这种游戏中有场地、球、规则。规则对所有的队都一样。主裁和边裁公正地判决行为是否合乎规则,并执行惩罚。但是若一个队队员体重都是 300 磅,而另一个队队员体重则为 150 磅,鹿死谁手是不言自明的。

“资产阶级议会,即使是在维持着私有产权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所谓最民主的共和国内的最民主的议会,也不过是一小撮剥削者用以压迫成千上万吃苦受难民众的机器……只要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存在,普选就不过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工具。”(《致欧美工人的一封信》[1919],列宁,1959:482)列宁对此最系统的论述是《向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提交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文》。1919年3月4日。

一个人尽可能玩好的话,最有钱的人将买的最多,最有机会赢得黑桃 A。若 N 个玩家是同等富裕的,那么他们赢牌的概率为 $\{1/N, 1/N, 1/N \dots\}$ 。事实上,这种概率的分配可能是极不平等的:获胜的概率可能被扭曲到 $\{(N-1)/N, 1/N, 0 \dots, 0\}$ 。但是在这种游戏中,钱所能买到的只是一种好机会而已,因为这里纯粹是机会起作用。一个只买得起一张牌的玩家仍有五十二分之一的获胜机会。民主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这种类比的一个明显辩驳就是,民主——至少是现代民主——并没有一种作为随机方式的制度安排。议会、官僚机构、法院都是应该谨慎行事、公正决策的,而不是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做事。

然而要注意社会选择理论提出的对不确定性的解释:集体偏好是在不断地循环,在任何一个时候来解读这种偏好都不合情理。结果是不可能以个人偏好来理解的。但是社会选择理论的这种解释太激进了,它没有给人的理性行动留下空间。社会选择理论把民主描述为它像是洛托(一种赌博游戏):行为者决定是否买奖券,然后等候着获胜的数字在屏幕上出现。结果是公平的,但这只是它惟一的合乎情理之处。要参与到这种游戏中来,行为者必须明了他们的行为同可预期的结果间的某种关系。如果每一个人都相信不可能定理,那就没有人参与。诚然,爱尔斯特(Elster, 1989)曾证明,在某些环境下集体理性也会要求随机决策:只要是当决策成本过高,决策作用甚微时——如当监护权之争给孩子带来的伤害远甚于把监护权给予不太合条件的双亲一方所带来的伤害时。但总的说来,一种人们相信结果是随机确定的民主是不堪一击的。

因此,我并不认为民主就是这样运作的。纯粹的机遇确实在民主博弈中存在,但是它也仅仅是外生的:一个领导人的突然死亡可能使局势急剧动荡。但机会的作用范围也只是如此罢了。

42

结果不确定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行为者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有的评论者从我早期关于民主天生就是不确定的主张中得出结论说,这种断言就意

在选举历史上也有一些偶然胜出的例子,并有一些严肃的论证支持说民主下存在一种随机的机制。见 Elster, 1989。

味着个人必然对要做什么不确定。事实上,巴西人在出版我的一篇文章(“Ama a incerteza e seras democrático”)时所加的标题是“如果你喜欢不确定性,那你将是一个民主党人”。这有可能是真的,如马丁(1987)所言,民主要求公民愿意改变其偏好。但是,他们无需喜欢不确定性,也无需不知道该做什么。

现在假定 NOR 是一种游戏,行为者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策略会导致最好的结果,因为结果同时取决于其他人的行为。并不存在一种支配性的策略。这种游戏的玩法如下:人们得要牌,牌面是向下的,大家都不知道。一旦所有的牌被买下,玩家(为简单起见,假设只有名为行和列的二人)就轮流出一张牌,这一张牌也是牌面向下的,同时翻转开所有其他牌。每次的赢牌结果是{前面为行,后面为列}。

行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若列不打出红桃 K,打出黑桃 A 比出任何其他牌来说是最好的了。否则,就是最糟糕的了。同样的,列也是如此。(表 1.1)

有的博弈理论家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合理的做法就是用随机的方式来选择个人的行为。若一个政党不知道是偏左还是偏右才能获得更多选票,因为结果取决于其他党派的意向,这时它就应抛一枚适量重的硬币来决定。如果银行不知道其关于寡妇会失去储蓄的观点是否比自身雇员会失业的观点更能说服人,它们就听凭运气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源自有可能被选择的策略:在其他人会做什么确定的情况下,策略的组合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会以另一种方式来组合策略。但是结果仍是一种可能性的认识。 43

尤其是 Lechner(1986) & Hirschman(1986)。事实上,关于行为者可能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两个不同的原因。本书中所探讨的就是他们不知道哪一种行动路线对自己最为有利。但我的印象是, Hirschman & Manin(1987)有别的论述,即行为者并不确定他们应该以自己的偏好行事,还是屈服于其他人的偏好。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者是对自己的偏好不确定,而不是对自己的行动路线不确定。

Novos Estudos, 1985。

为了限制资源不平等对结果的影响,公平准入法保证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黑桃 A 和红桃 K。

这个观点看来风光不再了。参见 Aumann, 1987 & Rubinstein, 1988: 9。后者说,“把混合策略解释为是在玩游戏前根据玩家抽签结果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多么天真,真让人好笑”。相反,物理上的混合策略——把一些策略按一定比例混合——则不会导致不稳定。

表 1-1

		列			
		红桃 K		其他任何牌	
行	黑桃 A	全输，	全赢	全赢，	全输
	其他任何牌	赢一些，	赢一些	赢一些，	赢一些

李奇纳(Lechner)说, NOR 用来解释民主是行不通的, 因为民主下的行为者珍重秩序, 这秩序会指导他们去做什么。这是正确的。李奇纳认为, 在智利, 受到乌尼达民选政府执政时的混乱创伤影响的无序使民主不稳定。我赞成他的这个观点, 但是我同时认为, 关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并不必然伴有制度层面的混乱, 也不必然伴有对自己行为的不确定性。

关于民主的不确定性, 我所能找到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奥曼(Aumann, 1987)提供的。他证明, 若行为者有所不知, 若他们在认知上是理性的, 即会随得到的信息不同而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若他们以自己的信念行事, 那么, 他们各自选择的策略将会概率性地分布, 好像他们使用一种随机方式做出的选择一样。

行为者不知道什么呢? 奥曼模型有许多硬性要件, 其中之一就是行为者可能一无所知, 不仅不知道传统博弈论假设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而且不知道其他行为者的策略。事实上, 在奥曼的解释中, 这正是行为者不知道的。各个行为者可能知道每种策略组合的惟一结果, 也知道在他(她)做什么确定的情况下什么是对其他人最有利的。要产生不确定性, 最弱的假设是: 我不了解其他人怎么看我。政党的领袖们可能知道, 若他们不揭露对手的丑闻, 对方最好也不揭露他们。但是若他们不确定对方是否会信任他们不揭露丑闻, 不确定性就产生了。在这里, 产生不确定性的较弱假设是: 我不确定对方是否知道我的偏好与性格。若我以为, 他们可能把我看成一个道德主义者或鲁莽行事的人, 而不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那我就不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了。 44

奥曼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即是所谓的豪尔绍尼(Harsanyi)学说。它断定, 知识只能源自观察。具体说来, 这个假设就是, 所有的行为者都有同样的优先性, 那么在什么时候若赋予他们穿过十字路口的不同概率, 那只是因为他们的观察到的东西不一样。

因此,民主过程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他们可能对参与的每一方都显得不确定。但是,不应当把这“显得”理解为“修正的无知”或“假意识”。在没有办法知道别人怎么看我的决策体制下,不确定的出现是必然的。一个全面的旁观者可能会决定每一种形势下惟一的结果,但是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旁观者,因为他(她)的理论未必为其他参与方所共识。如果他(她)的理论不能为人接受,那么他(她)就不确定别人怎么看他(她),不确定他人会做什么。注意,策略是各方独自决定选择的。每一个行为者都独自决定去做什么,在任何时候,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然而,同这种策略组合紧密相连的结果是或然性分布的。

为了解释民主天生不确定性的特征,我们来看一个程式化了的权威体制模型(我把它等同于独裁,忽略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

45

权威政体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是,某人具有防止任何结果产生的影响力。就像人们谈到佛朗哥那样,“所有的牌都在他手上,他不是在做政治,他本人就是政治”(引自 Carr & Fusi, 1979: 1)。这“某人”,形式众多,有可能是统治者、一个组织,如军队、政党或官僚机构;也有可能是不太容易区分的一个集团与个人。下面我要谈到的是权威主义政权的国家机器,只有在有助于阐释问题时,我才引入这众多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权力机构事先事后都能运作。也就是说,它不仅能事先确立规则,以阻止导致不满意结果的行为,倘若这不中意的行为是由自身规则所致,它还可以推翻它们。阿根廷有一个例子,说由军政府任命的教育部长要一批专家编写小学数学教材,教材编好

这里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不是偶然的。奥曼模型为崇尚知识的马克思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被崇尚的知识只是局部知识:只是从各个代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体制。在资本主义下各个代理人相互交换,从中渔利或受损。如果我卖的多于我所买的,那我就受益,而买者则损失劳动价值(但在效用上并不是必然的)。这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有效的局部理论。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每一个人都必然按这个理论行事。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宣传,或许人人都知道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所有进入交换中的价值,其和为零。无论我在交换中获得什么,总意味着有其他人失去了它。但是在制度下面,这种知识并不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行为。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并不足以改变个人行为。

这是有区别的。想想前苏联,它被称为全能政权、权威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独裁政体(samoderzhavie)、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权贵(nomenklatura)、官僚体制以及许多我们未知的等等。我的目的只是要刻画出民主的本质特征,而不是要对政府形式进行分类。最重要的是,我的讨论没有把孟德斯鸠所谓的暴政——这时暴君的意志即是法律——与用法律来统治的独裁(君主制:用法律来统治而非法律统治)区分开来。对历史上政治体制的各种分类探讨,参见 Bobbio, 1989: 100—125。

关于确定权威体制下权力中心的困难,参见 Przeworski, 1982。Cardoso 在 1972 年提供了更系统的论述。

了,得到了教育部长的批准,然后出版发行。但它落入了一个地方军区司令手中,他禁止学校使用该教材。注意,在这里教材并不是什么地下出版物,它是权威制度本身的产物。与民主相反,权威体制下,可能的种种结果并不能从规则中推导出来。专制之下,法律与政策毫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就是武断的。在民主之下,民主过程的结果只有在它明显地背离了事先确立且广为人知的规则时才可能事后被推翻。在专制之下,任何一套规则都不伴有什么可能的结果。

这个观点意味着民主就会比专制产生较小的不确定性吗?我想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这取决于各人的立场。

争执在于假设之中。为了推导出结果,人们必须作出假设。在专制下,结果只能从单个行为者的偏好中加以推导;而在民主之下,结果则可以从相互冲突的偏好与规则中加以推导。如果一个领袖反复无常,如果政权内部分崩离析,权威体制就会因其朝令夕改而使人惶惶不知所措。事实上,在专制之下,结果就不可能事先预测:只有在知道了独裁者的意志或冲突派系间力量的均衡状况后,人们才可能预测结果。相反,民主体制甚至在执政党与反对党易位时也会产生高度可预测性的结果。因此,从事后来看,权威体制相比于民主体制,政策变化是多种多样。但是事先又怎么样呢?在专制之下,总是有人确知结果的,总是有人知道政权机器需要些什么,知道什么

注意这个例子的另一面。缺乏对权威的清晰界定。没有任何规章给予军区司令就小学教材发布命令的权力。但他有一系列的权力,什么都能做。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波兰政府决定重建华沙市中心。它宣布建筑设计方案要竞争,由政府来挑选并批准优胜方案。但党的一位书记认为,建筑方案中的建筑物会同另外俯瞰全城的斯大林式庞大建筑群相竞争,遂命令该设计方案中所有的建筑物都要降低高度。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

这并不是说,在民主制度下追溯既往的行为是不可能的:总统可以任命一名医务主管,他负责一群专家来准备关于艾滋病的报告。报告可以出版,但总统可以否决这报告,甚至于可能解除他原来的任命。但是我们事先就知道了总统有权这样做,他对议会法案有否决权,他可以解雇政府职员。然而,我们也知道,总统不能否决最高法院的裁决,不能解雇法官。我所要论证的就是,在专制之下,我们不知道权力机构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可能的结果是不受规则约束的。

孟德斯鸠认为这个特征即是暴君制的致命弱点。

关于博弈理论主观方式的精彩陈述,参见 Rubinstein, 1988。他认为,若博弈论要解释得通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应把博弈解释为一种现实描述,而应理解为是行为者感知与推理的程序假设。因此,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东西,从各个行为者自己最佳角度来看就成为不确定的东西了。

在前苏联有这样的一幕:三个人在古拉格集中营相遇。一个问另一个:“你为什么到这里?”“我反对拉德克。”他说,“你为什么也来这里呢?”“因为我支持拉德克。”然后他们去问一直沉默着的第三个人,但他说:“我就是拉德克。”

将会发生。在民主政治下,就没有这样的行为者。专制与民主下不确定性之差异在如下意义上是有条件的:专制之下毫无疑问的是,政治结果不会包括那些对权力机构意志不利的东西;而民主之下,则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从自己的偏好与资源出发很确定地预测结果。资本家并不总会赢得以民主方式处理的冲突。即使一个人在政治体系中占有有利地位,这也不能保证他未来就会获胜。在位执政可能有一种优势,但执政者也确实会失败。 47

因此,在权威主义之下,有益的行为只限于:其行为者擅耍花招,知道权力机构对某些结果很淡然。如,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党的书记们为获得国家计划中的投资而相互竞争。各个部门的生产者协会为了保护自己利益而反对降低同其产品竞争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有益的行为,只有在他们知道国家权力机构能容忍他们所追求的结果,且不会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施加惩罚时,对他们来说才有意义。在现存的制度框架下,一个人若以为结果就是由其行为决定的,并这般行事,那他一定是疯了。每一个人都要小心翼翼地努力揣测权力机构的反应。

我们可以考虑下面这个例子以检验民主与专制之下不确定性之差异。在1954年以后,波兰共产党政权经常变化其农业政策。当农民停止为城市生产粮食时,党就告诉他们,“让自己富起来”。可是每当农民富起来,其消费稍微铺张点时,党就没收他们所有的财产。这样,党的农业政策呈现出可以预测的循环:低生产率导致政府进行财政刺激,而当明显的不平等出现时则会招致惩罚性的税收,等等。这里,我们不难想像在民主之下同样的动力机制。强调生产力的政党在竞选运动中将主张实行财政刺激,而强调平等的政党则会鼓吹对富农征税。当粮食稀缺时,强调生产力的政党将赢得选举,直至农民变得富裕起来,从而使强调平等的政党获得选举胜利。因 48

显然,我们假定这些人本性上是不会靠运气的。

这里引述的并不是马克思。在他写的关于1948—1951间法国一系列著作中,他认为普选对资本构成了永久的威胁。相反,这里引用的是列宁,他的观点前面已经作了概括。

然而要注意到,权威体制会系统性地隐藏其真实偏好。主要是为了不让公众知道权力机构内部的分裂。即使是机构内部讨论中为达成一项决策而产生的被认为是合法的反对意见也不能公布于众。公开传播的只是“路线方针”:被描述为是一致和无争议的决策。然而,对于受过教育的观察者来说,路线并不反映统治者的真实偏好。这种评论源于我同邹谠的谈话。权力机构的秘密有时会很滑稽。当契尔年科死的时候,苏联电台在一天半的时间内没有对外宣布此事,而只是播放低沉的音乐让人们去猜测。同时,Le Monde宣布了另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死讯,并报道了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受驱逐的传言。苏联人并不知道专制者现在的死活。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父权制之秋》在地球的另一面的现实生活中上演了。

最终,农民学会了不投资。工人挨饿了,他们把官僚打倒在地。但这花了四十年。

而,从事后来看,在民主与专制两种体制下,政策的循环和稍后税率为 $T\%$ 的概率二者是一样的。

然而,从事前来看,这两种体制下的不确定性有三个方面的区别。第一,专制政权可以事后改变规则。其政策的主要工具是溯及既往地加税。当税率为 40% 时,农民挣得一定收入,他们这样挣收入,并把这挣得的收入用于消费或投资很久以后,这收入仍被纳入附加税的范围。这在民主之下也可能会发生,但必然根据事先确立的允许追及既往税收的规则进行。在专制之下,无论规则如何,这都有可能发生。第二,在专制之下,惩罚性再分配的时间与数量在上面所说的意义上都是武断的。它们没有任何规则。在民主之下,农民可能会预计到,当不平等突显时,税率会增加。但他们也期盼规则将只根据规则而变化。第三,在民主之下,新税率要由农民和其他政治力量的行为联合确定。农民可以参与新税率的决策,他们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根据自身对公共舆论和相关规则的了解,农民就可以估计出税率增加的幅度。因此,他们也就能够计算出预计值,并在决定投资时按这预计值行事。在专制之下,农民所能做的就是,猜测党能容忍些什么;倘若他们连猜测也不能时,他们就根本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受到打击、受到什么程度的打击了。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农民在民主之下境遇就会好转。如果权力机构想发展农业生产,如果它愿意容忍富裕,农民就会富起来。即使别人还在挨饿,所有其他人都想要降低农产品价格,他们还是会富起来的。他们的利益受到了独裁意志的保护,但他们所有的利益也全系于此。他们自己是没有什么的作为的。

由此可见,民主是一种产生不确定性的体制,是一种策略行为分散化的体制,知识只能是局部的。专制者就是旁观者,因为他们不必考虑其他人怎么看自己。若其他人猜错了这专制者的所思所想,他们就只能够事后校正 49
最终出现的结果。相反,知道了专制者所思所想的人才能预测到什么会发生。在民主之下,没有一个专制者,所以才有了不确定性。 50

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明显例子。列宁告诉苏联农民去致富,但在他死后,在布哈林被击败后,等候他们的是斯大林的屠杀。

第一节 导 论

向民主过渡的策略问题是指,民主不能因人用武力而夭折,民主之下的民众也不能因某些人控制了生产资料而挨饥受饿。这意味着,民主之道,且长且艰。过渡的最终结局取决于过渡的方式。在大多数已经建立了民主的国家里,民主都很脆弱。在某些国家,民主过渡是半途而废。

民主过渡的核心问题就是,这种过渡是否会导致一种巩固的民主体系,在这样的体系内,相关的政治力量把其利益与价值托付于不确定的民主制度博弈,并服从民主过程的结果。只有在——大多数冲突通过民主制度加以解决,没有人能事后支配民主的结果,也无人能事先就决定后果,结果是出现在人们可预测的限度之内,并能唤起相关政治力量的服从——之时,民主才是巩固的。

要注意,权威政权垮台后有可能卷土重来,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74年的巴西,1981年的波兰;它也有可能导致新的专制,就像在伊朗和罗马尼亚一样。即使结局不是种种或新或旧的专制,过渡也有可能导致一种限制竞争的体制,或遭受军事威胁,半途而废。最后,即使民主确立了,它也不是巩固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可能会体制性地产生某种结果——它引起某些政治力量支持权威主义。因而,巩固的民主只是权威体制垮台后种种可能结局之一。

要说明以下将分析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在专制体制崩溃、民主提上政治日程的过渡时期内,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数。在单个政治力量的目标与资源及他们面对的冲突结构既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以下五种结果: 51

1. 冲突结构使得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持续,各政治力量为建立新专制而搏斗。

围绕着宗教、种族或语言之政治作用的冲突是最不可能通过政治制度来加以解决的。伊朗也许就是一个范例。

2. 冲突结构使得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持续,但是各政治力量赞成过渡

后建立民主。

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是奥唐纳(O'Donnell, 1978b)分析的1953年到1976年间的阿根廷。就阿根廷的经济结构来说,其主要的出口是各种加工品。其民主源自城市资产阶级与城市大众的联盟:城市—城市联盟。由这个联盟形成的政府为刺激国内市场的消费而过高地确定了本国货币的价值。不久,这个政策导致收支平衡危机,促使城市资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从而形成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盟。这个联盟趋向于缩减民众消费,从而需要一个权威主义政权来付诸实施。但是不久之后,城市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失去了市场,于是再次转移联盟,这次是回到了民主。

让我们在专制刚刚崩溃时来考虑这个循环。这其中的中心角色——城市资产阶级——面临着如下三种选择:(a)立即选择专制;(b)现在同意实行民主,当收支平衡危机出现时就另外结盟;(c)现在赞成民主,将来也支持它。考虑到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冲突的结构,第二种选择是最佳的。注意,这里并不缺乏任何远见。城市资产阶级知道它将来会改变立场的。民主仅仅是最佳的过渡性方案。

3. 冲突结构使得某些民主制度若被采纳就能持续下来。但是冲突着的政治力量却拼力去建立专制。

52

当各派政治力量对具体的制度框架偏好不同时,这种结果就可能发生。例如,对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分歧。国家的一部分强烈地偏好单一制,而另一部分强烈地偏好联邦制。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会发生是不透明的。下面我将会多次回到这个问题上。任何制度框架即使是临时被采用,它也会获得惯性力(Hardin, 1987),从而持续下来。但是,可以设想,公开的冲突也会导致内战与独裁。

4. 冲突结构致使某些民主制度若被采纳就能持续下来,但是冲突着的政治力量同意建立一个不能持续的制度框架。

这个结果似乎有悖情理,但确实存在使这种结果可能出现的情形。假想一个军事政权正在就它放弃权力一事进行谈判,那么可能会出现什么呢?代表政权的力量更愿意实行保障其利益的民主,而不是永远实行专制。但是他们对没有保障的民主之担忧甚过了对现状的担忧。如果主张民主的反对派不愿意采纳包含这类保证的制度,那军方是有能力维持专制现状的。因而,反对派也知道。若他们不赞成这种制度,那军方会再次施行高压政策。结果就是有保证的民主。但是,一旦确立,民主制度就会蚕食军方的压制性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制度就不能持续下去了。当然,这里确实含有政治上短视及

知识匮乏的因素。波兰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堪称这方面的典型。

5. 最后,人们最希望见到的是,冲突结构使得一些民主制度若被采用就能够持续下来,而且它们真的被采用并持续下来了。

这样的结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达到这样的结果有哪些方式,本章就要研究这些问题。权威体制的自由化是拉开这出好戏的序幕,我将首先对此进行分析。然后讨论两种背景下有关制度选择冲突出现的方式。一是当老政权通过谈判让出权力时;二是当老政权自行崩溃,以至于建立新民主制度的问题完全处在新生民主力量的手中时。最后,我将分析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互动问题。

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引出了一些可同现实相比证的假设。这些假设使得在不以自身意志为转移的条件下,利益与价值各不相同的行为者间冲突结果明朗化。这些假设应当通过可比性证据来加以验证。由于东欧事件,我们现在第一次能拥有足够的个案对这些假设加以系统性,甚或统计性的验证。但是在这里,我只是提出这些假说,而不验证它们。 53

第二节 权威体制的自由化

无论专制政府是怎样地交叉使用利诱与压制,其共同的特征就是,不能也不会容忍独立组织的存在。因为,个人只要没有其他的集体选择,他的态度对现政权的稳定就是无足轻重的。甚至韦伯(Weber, 1968:I, 214)也

显然,并非所有的专制都是一样的。有些不会容忍任何类型的自治组织。即使是保护动物协会也是从上面组织起来的,是社团协会的一部分。而社团协会则又是由内务部控制的全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其他一些专制可能更有选择性,他们查禁工会与政党,但容忍集邮者协会、教会及生产者协会的存在。但是所有的专制都不会容忍自治的政治力量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用合法性来解释体制的崩溃,要么是同义反复,要么是错误的原因所在。若我们以合法性的丧失来理解集体组织性选择的出现,那么这就是同义反复了。因为这些选择是集体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体制已经崩溃了。若我们以个人的态度来理解合法性,用 Lamounier(1979: 13)的话来说,是“源自对既定规范与价值主观认同的默许”,那么,这样的解释就是错误的。某些权威体制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合法性,但却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

要测量出自由化之前和由于自由化的作用,人们的态度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很难的。在西班牙,调查显示,1966年,35%的人支持民主代议制,反对一人专制;1974年则为60%;到1976年5月,则高达78%。1971年,12%的人认为政党是有益的;1973年,37%的人认为它们应当存在;到1975年4月,这一比例高达56%;1976年1月则跌至41%,到了5月又升到67%(López-Pintor, 1980)。在匈牙利,1985年,88%的调查者表示信任国家领导人(其中57.3%的人表示完全信任),81%的人表示信任议会,66%的人信任政党,62%的人相信工会(Brustz, 1988)。在波兰,有组织的反对派自1976年来就公开活动,并于1981年受到压制。其对共产党的信任,从1985年6月的66.2%慢慢降至1987年7月的53.1%,1988年8月罢工期间突降至26.6%,1988年11月又回升到38.6%,1989年1月Magdalena谈判前夕再次降至26.0%。同一时期,对反对派的信任则从1985年的20.5%升到1988年8月的26.2%,到1989年1月则达到45.9%(Ostrowski, 1989)。

注意到，“由于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选择，个人的软弱无助使他们不得不屈服”。对权威主义政权产生威胁的不是合法性的崩溃，而是反对支配与控制的组织：为了另一个未来而展开的集体行动。只有当另一个集体选择存在时，孤立的个人才有了政治选择的可能。因而，权威主义政权憎恨独立的组织，它们要么把独立的组织整合到集权控制之下，要么对之实行暴力镇压。因而，它们也特别害怕种种言论，哪怕这些言论传递的只不过是人们心知肚明的事。因为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发表言论本身，有动员潜在力量的作用。

那么，在某个时候，权威体制内当权派中某些人决定容忍公民社会的一个自治组织，这是怎么回事呢？从某个时刻起，西班牙政权停止压制共产党人的工会（Commissions Obreras）了，皮诺切特将军允许政党再活动了。1986年7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通过了一道不包括累犯的赦免法，对政治行为进行赦免，标志着反对派事实上的合法化。克伦兹（Egon Krenz）也接受了初生的新论坛的存在。当这些出现时，就标志着权威体制内权力集团的分裂，对公民社会来说，就意味着至少某些形式的自治组织不会受到镇压。这也就标志着自由化的开始。

这些假说显然源于葛兰西的灵感。但是，葛兰西暴力与同意的二元理论框架，并不能帮助我们充分地、具体地从体制上解决这手中的问题。具体地说，葛兰西没能区别清楚，控制政治体系的人所作出的妥协，与通过哪怕为数不多的但又无限开放的竞争所取得的利益之实现，这二者之间的差异。

示范效应在向民主过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有一个自专制即将完结时就开始流传的巴西笑话。在里约热内卢的公共汽车上，一个人扇了站在他旁边的军官一个耳光。另一个人也扇了这军官一个耳光。一个 Mulatinho 也挤到军官面前扇了他第三个耳光。汽车到站后被警察围住了。他们问第一个人，“你为什么打他脸？”他说，“他欺侮我女儿，我忍无可忍。”第二人被问时也说：“他欺侮我侄女，我忍无可忍。”最后，警察问那个 Mulatinho，他说：“当我看到他们揍这军官时，我以为专制已经完蛋了。”

人们注意到，权力垄断的崩溃，在波兰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欧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只花了十天。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向东欧人表明了这种崩溃的可能，而推翻柏林墙的壮观场面则向每一个捷克人昭示了改朝换代的可能。

一家苏联地下出版物——编年快讯（Chronicle-Express）（16号，1987年11月17日）发表了共青团（Komsomol）的一个文件——《加强自治青年团的工作》。该文件指出：“近来民主不断扩大，出现了大量自治的社会政治性青年组织……其兴趣范围极为广泛，从国际信息、生态、历史古迹的保护到至今尚不知困难何在的有关重建的种种胡乱推测。”文件接着把各种团体分为好的与坏的二种。对好的团体，共青团组织应该扩大其协作范围，应派“积极分子去扮演政治委员的作用”。对次好的团体，其领导人应当被招安，或“应当私下向他们提供能发挥其能力的具体方式”。最后，文件谈到，若这些策略行不通，共青团应当准备“建立自身的另外一些团体，以备不测”。

这里我用的是 O'Donnell（1978：8）的术语。在他看来，“自由化由一系列举措组成，这些举措尽管使先前的官僚权威体制明显开放（如对某些个人权利的有效司法保证，或在没有自由的选举竞争基础上引入议会形式），但仍然不能说是政治民主化的措施”。

对这样一种决定的解释可分为两类：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反映了现实的差异。例如，匈牙利通常被认为纯粹是因为权威政权内权力集团的分裂而走向自由化的例子。用格罗兹(Karoly Grosz)的话说，“不是反对派，相反，恰恰是党的领导层摧毁了党”。东德代表了另一类例子：直到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了莱比锡大街，权力集团内部还没有任何分裂迹象。然而案例研究文献显示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同一事件的解释常常有不同的原因。例如，就巴西而言，卡多索(Cardoso, 1979)认为解禁是军队内部分裂的结果；拉蒙尼尔(Larmounier, 1979)则认为是民众动员的结果。事实上，自上而下模式与自下而上模式在解释自由化时是相互竞争的。

分析中出现了这些困难，原因在于仅仅区分为两种方向的解释模式是粗糙的。在没有真正革命——摧毁镇压机器的群众起义——的情况下，决定去实现自由包含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即使早在民众动员之前，权威主义政权内部的分裂清晰可见，我们仍然要明白，这个政权为什么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崩溃的。总有人回答说，政权体制中推动自由化的人士看到了同有待于组织起来的某些力量联盟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公民社会里确实存在某些可与结盟的力量。相反，政权内部的分裂尚不明显时就出现了民众的动员参与，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是这个政权为什么决定不用暴力加以镇压。部分回答再次强调说，政权内部已经分裂为自由派与强硬派。自由化是权威体制内部的分裂与公民社会中的自治组织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民众动员向潜在的自由派昭示了一种结盟以改变权力集团内部关系使自由派更加有利的机会。权力集团内部明显的分裂则向公民社会暗示着，自治组织可以开拓其政治生存空间。因此，民众动员与政权内部的分裂是相互促进的。 56

政权内明显的分裂与民众动员，不管二者谁先出现，自由化的逻辑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自由化的速度。民众动员决定了变革的节奏，因为它

对原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 Karoly Grosz 的采访，见 *Przegląd Tygodniowy* . no 51(403), Warsaw, 1989 年 12 月 22 日。

即使是关于匈牙利和波兰，也有多种解释。Szelenyi(1989)强调的是匈牙利过渡中自下而上的一面；Comisso(1989)则批评他忽略了自上而下的一面。Walicki(1990)反对关于波兰过渡的标准性解释，即团结工会作用关键；他认为这是两个精英人物间协议的结果。Wiatr(1989)更具有挑战性地认为，这过渡是军队同教会间的一种协商结果。

即使是罗马尼亚也不能算作真正革命的例子。关于这些悲剧性事件的背景，我们至今仍不太清楚。不过，要注意，罗马尼亚军队在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后幸存下来了，其指挥结构完好无缺。

迫使政权决定是镇压、引诱还是交出权力。然而,无论自由化是持续数年、数月还是数日,政权与它的反对派面临的选择是相同的。

由权威政权内部力量发起的自由化运动,无一例外地倾向于有控制性地开放政治空间。这些运动典型地是由权威集团内部的分裂引起的,而这分裂又是由各种预示着包括大众动荡等紧迫危机的迹象点燃的。自由派发起的自由化运动就是要去缓解社会紧张感,并通过拓宽政权的社会基础来巩固自己在权力集团中的地位:允许公民社会中自治组织的存在,并把新的团体整合到权威制度之中。就运动本身而言,自由化应该总是同权威主义集团的价值与利益相容。所以,自由化意指“开放”(apertura)、“解禁”(dissentao)、“再生”(odnowa)、“重建”(perestroika“重新建造”如一栋房子)。57 这些术语含有限制改革的强烈意味。

然而,自由化本身是不稳定的。通常发生的只是爱森伯格(Ilya Ehrenburg)1954年所说的“解冻”(ottepel):公民社会之冰融化,权威主义政权不能再限制它了。一旦压制由于某种原因减轻,最先的反应就是公民社会中自治组织的出现。学生社团、工会、萌芽中的政党几乎一夜间涌现。在巴西,律师、新闻记者和学生首先组织起来,然后是社会基层也组织起来。在波兰,一千万人在1980年9月的数周内就加入了团结工会。甚至是由当局成立并控制的组织也宣布自己的独立。不仅职业性的团体如此,而且如旅游观光协会和集邮者协会也这样做。根据卡罗尔(K.S.Karol, le Nouvel Observateur, 1987年11月6日,巴黎,第1200号)的说法,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最先成立的自治团体有可能是“斯巴达克人”,显然,它意指莫斯科足球俱乐部斯巴达克的崇拜者。到1987年,已经有三万个独立的团体,它们还举办了一次全国大会。到1989年末,已经有六万个独立团体、协会、俱乐部学会和联合会,它们都在探究着政治空间的限度(Pravda, 1989年11月10日)。

根据 Carr & Fusi (1979: 179) 的观点,在西班牙,“aperturistas——通常被称为‘参与派’的一些人,认为政权要生存下来,必须通过开放赢得广泛的支持——与 immobilistas 之间的斗争决定了政治阶层的分化。”波兰统一工人党(共产党)前第一书记 Edward Gierak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Rolicki 1990: 146)中透露,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就想使在 Seym[会]的天主教议员达到总体的25%。这将使他们拓宽政权当局的政治基础。

Maravall, 1981年以工会为重点详尽地研究了西班牙的民众动员。人们无法知道这些估计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相信的。但是这里有关于保加利亚的一些数字:1989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第2条报道是“保加利亚人麻木不仁”。在11月28日,《纽约时报》说独立工会 Podkrepa 拥有5,000成员。1990年1月16日,巴黎的 Liberation 报道说,Podkrepa 拥有100,000成员。

在不同的政权下,公民社会动员起来的步伐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权威主义的统治均衡是否主要依赖于谎言、恫吓与经济的繁荣。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统治均衡是最不稳固的。在言论仪式化的政权下,人人逢场作戏,尽说些自己不相信也不指望别人相信的鬼话,而新鲜的言论则具有颠覆性。一旦有人指出,国王什么也没有穿时,均衡立即就被打破了。在罗马尼亚,少数几个人在欢迎齐奥塞斯库访问伊朗归来的集会上喊出反对他的口号,他的政权几天后就倒台了。在以恫吓进行统治的政权下,人们的种种言论只能私下流传而不得进入公共领域——后斯大林主义的波兰与1982年后的墨西哥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人们则长时期地压抑着种种不满,直至最终爆发。当教皇于1979年7月访问波兰时,200万人走上街头,展示反对派的力量。1989年11月17日,保加利亚第一次自主游行,是从穆拉德诺夫(Mladenov)新政府组织的支持他本人的一次游行演化而来的。在罗马尼亚,当齐奥塞斯库从伊朗归来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了。从捷克斯洛伐克出发,前往西德的满载难民的火车正要穿过东德时,东德的民众运动就不可收拾了。最后,建立在以物质繁荣交换沉默这一策略基础上的政权——如匈牙利卡达尔(Kadar)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波兰的盖莱克(Gierek)时代、墨西哥1982年之前的革命制度党政权——很难承受得住经济危机的打击。因此,在开放与民众动员间的时间长短随各个政权的不同而不同。

在公民社会动员起来的时候,新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它们宣布自己独立于政权,并且公布自己的目标、利益和纲领。但是政权体现的是集权性的、非竞争性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只会整合那些接受政权命令的组织,并在事后控制政治过程的结果。于是,一方面,自治组织在公民社会中出现;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制度能使这些自治组织表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的利益而交涉。由于这种公民社会中自治组织同国家制度的闭锁性间的断裂,最终,这些新近组织起来的各种群体为自己价值与利益而斗争的地方就只能是在街头了。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再现出民众参与的特征。

巴西的经验同这个一般性观点相悖。诚然,巴西的民主斗争直至1984年Direitas, ja!运动前从未走上街头。但是,我想原因在于,1974年的解禁立即转化为选举竞争。巴西存在着疏导反对派的制度框架。不过,由于MDB出人意外地获得了选举胜利,自由化运动还是陷入了困境。

同样地,苏联的自由化运动也没有导致在俄罗斯引发民众游行示威。我想,原因有二:第一,民众动员事实上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他试图发挥沙皇同人民结盟的俄罗斯传统以对抗官僚阶层(他关于改革的明确表述中就有这个意思)。第二,最高苏维埃一夜之间就变为一个有相当竞争性的机关,它同时冲突剧烈,仅以微弱多数通过法律。因此,苏维埃制度框架事实上变得符合其法律地位了。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自由化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弥漫于街头的催泪瓦斯也刺伤了自由派的眼睛;大众运动的爆发、社会的动荡与失序表明自由化政策已经失败。由于自由化总是被认为是一个由上面加以控制的进程,所以自治运动的出现证明,自由化不是,或至少不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了。街头的游行示威已经侵犯到了最神圣的权威主义价值——秩序。民众运动的爆发,削弱了自由派在权威集团内的地位。

在这样的问题上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选择:要么整合那些能整合的团体,并压制其他人,回复到权威主义的一潭死水,要么把制度问题,即民主提上政治日程。自由化有可能逆转,进入一个婉转地称为规范化的沉闷期,也有可能走向民主化。

让人迷惑的是,太多的权威主义政治家们相信,他们将在别人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但是等待他们的依然是失败。巴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斯密(Smith, 1987:207)认为,“戈尔伯利(Golbery)很清楚自由化与民主化之区别:如果自由化实施适当,那它就能取代真正的民主化,从而把下层军官集团排除在政治之外,并率先提出有意义的经济模式改革主张。”在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政权尽其所能地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策略就是建立民主制度,如行政法院、宪法法庭、自治议会、独立工会、政府咨议会、巡查局等等,同时继续掌控权力。即使是在民众游行示威的紧张压力下催生出自由化这一情况出现时(如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派领导人第一要做的还是把持不同政见者纳入权威体制中。克伦兹(Krenz)鼓励“人民”向党诉说他们的苦衷,并保证“当局”会倾听他们的苦衷。阿达麦克(Vladyslav Adamec)精心挑选了一些非共产党人士加入他的第一届内阁。双方都希望这

1955年到1957年的波兰事件是自由化最终以规范化告终的典型例子。自治的组织一度活跃,但后来,工人议事会被整合到政权之中,而学生运动则被镇压了。在巴西,1974年自由化努力失败后的1975到1977年间,福利措施与高压二是软硬兼施。参见Andrade, 1980。由于某种原因,好几个巴西研究者惊奇地发现,自由化运动计划并未如想像中的那样运作。他们继续区分“计划”与“过程”(Diniz, 1986)。他们肯定不知道Preze的解压第三律,“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的”。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一个人吐在Wenceslaus广场上了。另一个行人路过。他说:‘别怕,我能理解你。’”(我不记得这出自哪篇小说了。)

Golbery do Couto e Silva将军1980发表了关于自由化激动人心的规划纲要的演讲(Golbery, 1981)。Károly Grosz对他早期的立场概括如下:“我的立场如下:让我们勇敢而又谨慎地前行,而后全国人民将理解我们并追随我们……我想一个党,若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它就能克服种种困难。”(见注[7])

关于这一策略的精彩论述是Leszek Gontarski的文章:《我们为什么害怕民主》(“Czy boimy si demokracji?”) Zycie Warszawy, no 291. Warsaw, 1987年12月12—13日, p. 3。

些措施会使民众动员得到化解。然而,他们的期望都落空了,最后都被迫接受了民主。为什么?

让我们从自由派初生时的眼光来考虑开放体制的决策即将出现时的情景。初生的自由派可以维持他们在权力集团内的现存地位,结果就是保持现状,如图 2.1 中 SDIS(专制现状)所示。或者,他们可以决定发出愿意容忍权力集团外某些自治组织的信号,即开放。如果公民社会中有组织的力量决定加入到政权为之创造的新组织形式中去,如典型的就是全国统一战线,并且没有进一步的自主动员发生,那结果就是 BDIC(统治基础拓宽的专制)。自由化的策略也就成功了。如果公民社会继续自治性地组织起来,自由派就面临着是走回头路去压制民众,还是继续走向民主过渡之路的二重选择。然而,压制有可能是无效的。如果压制成功,那结果就是 NDIC(统治基础更为狭窄的专制)。自由派会发现自己处于成功实施镇压之人的控制。如果压制失败,结果就是动乱。姑且认为自由派赋予压制成功的概率为 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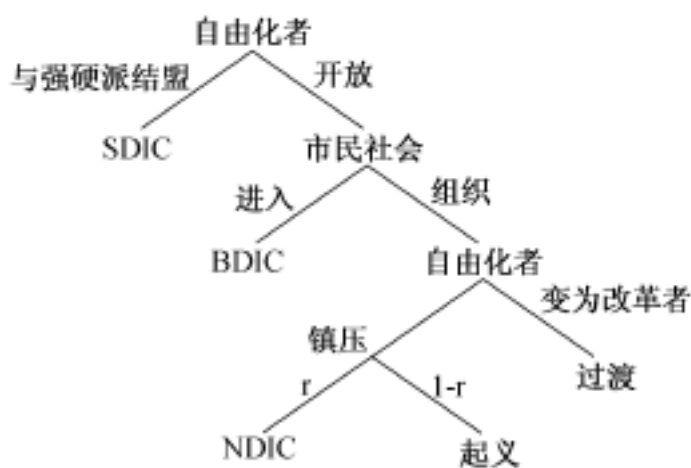


图 2.1

人们立即就会注意到,只有在权威体制内的某些集团更情愿统治基础扩大的专制而不是维持现状时,自由化过程才可能启动。自由派更爱 BDIC 而不是 SDIC, 因为拓宽社会基础将从总体上巩固这个政权, 因为进入政权 61 之中的集团是自由派同强硬派对峙中的天然盟友。动乱是政权中所有人都最不愿意看到的。

现在,假定每一个人无所不知,且他们所知的都一样,那么这种博弈惟一可能的结果要么就是维持现状,要么是基础拓宽了的专制。自由化只有

在即将成功时才会发生。假设自由派的偏好是 $BDIC > SDIC > 过渡 > NDIC > INSURRECTION$ 起义。若公民社会组织起来,自由派知道自己就不得不成为改革者。公民社会也知道这一点。因此,若自由派施行开放,社会就会组织起来。但是若自由派偏好 $SDIC$ 更甚于 $TRANSITION$ 过渡,那他们就决不会实行开放。反过来,假设自由派的偏好是 $BDIC > SDIC > NDIC > TRANSITION > 起义$,并且自由派认为压制成功的可能性很高。那么,自由派知道,若社会组织起来,他们将选择实行压制。公民社会也知道这一点。既然对社会而言 $BDIC > NDIC$,那公民社会就知道若组织起来,自由派会支持压制,从而加入到现政权中来。既然对自由派, $BDIC > SDIC$,他们将实行开放。这样,结果就是 $BDIC$ 。

那么,怎样才能到达过渡这一结果呢?我看有两个可行方式,这都取决于某一方的假设错误。

(1) 假定自由派事实上就是最初的民主派,即他们的偏好是 $BDIC > 过渡 > SDIC > NDIC > 起义$ 。然而考虑到政权中的强硬派若知道自由派是要走向民主的,将决不会同意实行自由化,自由派就必须策略性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因而,自由派宣称他们的偏好为 $BDIC > SDIC > NDIC > 过渡$,强硬派相信了他们。

现在,假定开放的决策取决于强硬派是否同意。若自由派建议实行开放,强硬派要么表示同意,这样博弈的游戏就开始了;要么不允许实行开放,这样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现在假设(a)强硬派偏好 $NDIC$ 甚于 $SDIC$; (b)强硬派以为社会错误地认为自由派事实上是潜在的民主派。于是,强硬派如下来分析局势:如果他们赞成实行开放,那么社会以为自由派将不支持压制,从而组织起来。但自由派是把压制的结果作为他们期盼的偏好的。于是,强硬派认为,开放的结果是 $NDIC$,他们决定实行开放。但是考虑到自由派的真实偏好,结果就是过渡。

这个解释假设自由派总是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向社会发出正确信号时又审慎地误导着强硬派。很难评估这一设想的可行度,因为在这一设想下,自由派被迫策略性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当自由派宣称他们只想通过拓宽统治基础,为政权注入活力时,我们必须判断他们是否是诚心诚意的。

也许自由派是披着羊皮的民主派,其偏好是 $过渡 > BDIC > SDIC > NDIC > 起义$ 。

O'Donnell(1979: 13)注意到,就 Lanusse(1971—3)在阿根廷、Geisel(1975—9)在巴西发动的自由化而言,在这二个例子中,自由派威胁说,若事态太过分,那他们就“被迫”中断自由化进程。但是他们太投入了而没有中断这个进程。自由化的逆转,将是强硬派对“blandos”的胜利。

按他们公开的声明来判断,他们要么是擅长撒谎的行家里手,要么这样的解释是不可行的。

(2) 假设自由派的偏好是 $BDIC > SDIC > NDIC > 过渡 > 起义$, 并且他们认为压制成功的可能性很高, 这就意味着结局将会是 $BDIC$ 。强硬派在这里并没有什么作用。也许政权还没有分裂, 也许自由派控制着军队。自由派开放政权, 期盼社会加入进来。但是社会低估了压制成功的可能性, 并以为自由派同样这样认为。这样, 社会组织起来了。一旦自由派注意到社会将继续组织起来, 也就转而认为成功压制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并更倾向于选择过渡而不是压制下自己期望得到的结果。这样, 公民社会也就组织起来了。自由派注视着街头的场面, 不断地调整着对压制有效性的评估。

这样的假设似乎行得通。据说, 82 岁的东德安全部门首脑米尔克 (Erich Mielke) 对昂纳克 (Honesker) 说: “艾里希, 我们无法摆平数十万人!”——我以为, 这话是技术上的而不是道德上的提醒。(《纽约时报》1989 年 11 月 19 日, 15 版) 若殴打与监禁仍不能阻止民众动员, 政权就得重新审视武力的效用。而且, 风险在某一个时候会变得非常大。不参加镇压就是叛变行为, 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当权的最后, 一位将军被迫“自杀”。然而一位加入这场失败了的镇压的布拉格党书记在政变后几周就被送入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 要么开枪镇压, 要么脚底抹油开溜, 这都是有可能使自己免受处罚的好办法。

这两种解释假定偏好是固定不变的, 即使行为者获得信息不全面, 他们仍是理性行事的。但是还存在另外两种可行的解释。

第一种是社会学解释。随着公民社会的定型成熟, 它的领导层渐为人知, 自由派同他们的交往也建立起来了。自由派了解到, 反对派并非像

迄今为止, 根据我们的了解, 似乎是国防部长、内务部长与秘密警察头头不服从齐奥塞斯库最开始要他们调动武力的命令。在政治局最后一次会议上, 后二人受到齐奥塞斯库的鼓动, 作出令人信服的服从表示从而幸存下来, 但是几天以后, 他们就试图改变立场。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 参见 Jean-Paul mari, “La dernière colère de Ceausescu”, *Le Nouvel Observateur*, 1990 年 1 月 11 日, pp. 42—45.

关于这些情形更正式的讨论, 参见 Przeworski 1986c。这里有必要对集体行动理论作一个评论。奥尔森 (Olson, 1965) 相关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前策略”状态的假设。在他的理论中, 个人是在什么也不做与做产生公共善的事情间抉择。但是, Sartre (1960) 观察到, 在有些情况下, 抉择是在支持与反对间选取其一。当国王的军队沿通往巴士底狱的街道两边房子搜查武器时, 藏匿武器的居民只有在被抓进巴士底狱与摧毁巴士底狱二者间选取其一。在这些情况下, 集体行动问题并不是一个囚徒困境。

他们原先想像的那样有威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成为一位民选总统后,于1989——1981年镇压的八周年之际接受米赫尼克(Adam Michnik)——后来他成为支持团结工会的日报的主编——的采访时说:“我们的世界观在渐渐地改变。今天我们看问题就大不同于从前了。但是我们必须这样过来,我们肯定会碰壁。所有的人都会这样的。总之,我们为什么现在就要看得那么远呢?多年以来,你在我眼里,也在许多人眼里,就一直是个恶魔。”谈判表明,反对派愿意倾听,愿意作出让步。人际交往使个人间建立了友谊。慢慢地,过渡看上去不再是一种巨大的分歧;镇压也被认为是极其野蛮的。自由派在与反对派的谈判中,内在地改变了其偏好。 64

第二种是心理学解释。自由派有可能是非理性的。理性的行为者根据他们获得的信息形成自己的信念,并按自己的欲望来行动。事实上,若他们真是理性的,就要用信念来约束种种欲望。非理性的行为者则放纵自己的欲望来影响信念,并关闭掉他们不喜欢的信息。假定政权除了开放外别无选择。来自外国的压力、本国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可能使得只存在自由化这一条出路。尼加拉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众动员有可能是无法约束的,就像在波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派会说服自己,开放将会成功,甚至会认为,若他们继续推进民主,他们将赢得竞选。

若这些假设中有些是真的,那么,自由派冒险发起一场不可行的运动,并在中途变节,这就是明智之举。自由派要么事实上就准备去推动民主,但又不得不隐藏其真实偏好;要么他们中途发现压制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要么他们发现将失去的并不像一开始设想的那样多;要么别无选择,并对最终结果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

自由化并不总是导致过渡。什么时候压制与自由派受到整肃的狭隘专制会成为自由化的结局呢?我们已经知道,若每一个人都明了一切,且所知相同,那么这种结局就不可能产生。假设:(1)自由派仅想拓宽政权的基础; 65
(2)自由派以为社会知道他们偏好 BIDC 甚于过渡,知道若需要,自由派会准备镇压的;(3)社会错误地以为,自由派事实上就是民主派,他们不会支持镇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无效的。然后自由派开放政权,希望社会力量加入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进紧急状态”, *Gazeta*, Warsaw, 1989年12月18日, pp. 5—6。同样, Kiszczak 将军也认为:“MSW(内务部,即警察部门)的人渐渐地习惯于同反对派共处,习惯于妥协的不可避免。如果他们尚未准备好这样做,那可能今天还有顽抗与紧张。”(*Przewrt niewykonywalny* 与 Czeslaw Kiszczak 将军的访谈, *Gazeta*, Warsaw, 1989年9月11日, p. 4)

进来。社会以为,若它继续组织起来,自由派将支持过渡。但是,自由派是支持镇压的。

因此,自由化——实行开放以便拓宽政权的社会基础而不改变政权结构——是不可行的,除非每一个人对其他人的偏好与成功镇压的概率二者认识全面、准确。有些误解会把自由化引向过渡;有些误解又把它引向镇压。马克思早在1851年就描述出了自由派的永恒悲剧:他们想要民主以保住权力,但当民主与自由派反目成仇时,他们又被惹恼了。他们试图尽其所能地控制住权力,但在某个时候,他们必须决定,是后退以恢复权威体制,还是前行以走向民主解放。

第三节 民主化

一、导 论

一旦专制崩溃,政治日程上的中心问题就是,相关的政治力量是否会接受一种制度——它允许虽为数不多但却没有任何限制的竞争。如果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了,问题就是它们是否会唤起自发的服从。即这些政治力量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利益交付于竞争的不确定性之下,并服从其结果,他们是否愿意吸收相关的其他政治力量作为参与者。

要进行后面的分析,我们先要注意到,向民主过渡中天生的冲突经常在两个战线发生:一是在权威主义政权的捍卫者与反对派间围绕民主而展开;二是在众多潜在的民主行为者间为未来民主下更好的机遇而展开。有些人设想民主运动是社会与国家间的斗争,这在过渡的初期是有用的。这种设想可以作为各派政治力量反对当前权威政权的统一口号。但是社会在许多方面是分裂的,民主的本质是利益相互冲突的各派政治力量间的竞争。这种状况造成了一种二难困境:要实现民主,反权威主义的力量必须团结起来;而要在民主之下获胜,它们不得不相互竞争。因此,为争民主的斗争总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为了民主而反对权威政权,为了民主之下一个美好未来而反对自己的盟友。

这样,我们有必要分别集中讨论民主化的两个不同方面:摆脱权威政权与建构民主政权,虽然说这两个方面有时会临时性地重合起来。这摆脱与建构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控制镇压机器的政治力量——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是军队——在权威主义政权下的地位。凡是军队团结一致捍卫政权的地方,过渡进程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摆脱现政权。智利与波兰就是摆脱的范例。当然,在西班牙、巴西、乌拉圭、韩国、保加利亚,摆脱也使过渡进程很不顺利。相反,凡是因对外冒险失败而使军队分裂的地方——如希腊、葡萄牙、阿根廷——以及在军队受到文人有效控制的地方——如所有的其他东欧国家,建构新政权的进程很少受到摆脱因素的影响。

二、摆脱旧政权

由于摆脱旧政权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这里我只是扼要地提一下。首先,我按照奥唐纳(O'Donnell, 1979)及他与施密特(Schmitter, 1986)的观点,把政治行为者区分为四类:权威集团内的强硬派与改革派(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自由派)、反对阵营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强硬派一般出自权威集团内的压制核心:警察、官僚、检察官、某些新闻记者等等。改革派一般是源于政权内的政治家或国家机关外的某些群体:资本主义下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下的某些经济管理者。温和派与激进派可能代表不同的利益,但是也不需要代表不同的利益。他们间的区别在于是否愿意冒险。温和派可能

67

这些力量未必是铁板一块的。注意,作为斯大林时代的遗产,东欧一直就有两种镇压力量:在国防部控制下的国防军与内务部控制下的内务部队。秘密警察的自主性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

资产阶级对权威政权的态度则难以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原因如下:资产阶级有三种方式捍卫其利益。(1)在民主制下,它自身能作为一个政党组织起来,参与竞争;(2)在任何政权下,它能把自己组织成利益集团,并有接近国家政权的特殊渠道;(3)在任何政权下,分散的利益追求构成了对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冲突的国家行为的一种限制(“国家对资本的结构性依赖”——见 Przeworski & Wallerstein, 1988)。现在,同马克思的观点相反,最后一种制约对于保护资产阶级免受国家干预不太充分,拉丁美洲的好几个军政权对某些资产阶级部门打击巨大。Martínez de Hoz 破坏了阿根廷一半的公司,巴西军人建立了国营部门同私营公司相竞争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到 1978 年,Paulista 资产阶级主要部门还把军政权机关看作一种威胁。这样,至少在巴西,从经济自由主义中产生了反权威主义的思潮(关于这一思潮的详细解释,参见 Bresser Pereira, 1978 & Cardoso, 1983)。反之,在民众动员很脆弱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在民主条件下能很好地竞争着。厄瓜多尔似乎就属于这类例子。在这个国家,技术官僚的自治——根据 Conaghan(1983),这意指经济决策的方式而非实质内容——促使资产阶级反对军政府,而资产阶级也并不害怕选举竞争。

同样地,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工厂的管理人员较早地看到了把手中政治权力化为经济权力的可能性(Hankiss, 1989),从而支持民主化。

会惧怕强硬派,但是其目标不乏激进。

摆脱旧政权可能只是源于改革派与温和派间的相互理解。若(1)改革派与温和派能就建立某种制度达成一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民主体系下政治地位非常重要;(2)改革派无需得到强硬派的同意或使强硬派保持中立;(3)温和派能控制激进派。那么摆脱旧政权就有可能。

后两个条件从逻辑上是优先的,因为他们决定了改革派与温和派可能会采取哪些解决方案。无论两者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这协议都必须诱使强硬派随改革派而行,同时能劝阻激进派为更剧烈的变革而进行动员。可是,这些条件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满足呢?

如果摆脱的进程是由军队控制着的,那他们必然是支持改革,或被改革派诱骗去合作,或至少保持中立。温和派必须付出代价。但是对于温和派来说,改革派只有在他们能控制住军队或调动军队时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对话者。而温和派除非能约束得住激进派,否则在政治上是没有重要性可言的。温文尔雅的绅士尽可以在政府大厅里进行文质彬彬的谈判,但是若街上挤满了民众,工厂由工人占据,他们狂热地提出要谈判者的命时,这温和派的温和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温和派必须提出能为激进派接受的条款。若他们不能从改革派那里得到这样的条款,那镇压机关手中必然保有足够的权力以恫吓激进派。一方面,温和派也需要激进派去对改革派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温和派又担心激进派不同意他们同改革派辛辛苦苦所作的交易。难怪常常找不到可行的方案了。

什么时候可以达成满足这所有限制条件的协议呢?改革派面临的策略选择是,要么同强硬派结成权威同盟,要么同温和派结成民主同盟。而温和派则可以选择同激进派结盟,以求彻底摧毁权威政权下组织下来的种种政治力量;或者同改革派谈判以求妥协。假设局势如表 2.1 所示。

事实上,在 1981 年的波兰,是温和派认为苏联的干预迫在眼前,而激进派则认为这不大可能。

每一组中的第一个数字代表对这个结果对改革派的值,第二个数字代表对温和派的值(4 比 3 好,如此类推)。这些数字在不同的对象间不可比较。他们只是排列出一种选择而已。因而,温和派可能在并非最差的情况下过得很惨,而改革派在非最差的情况下则过得不赖。

表 2.1

		温和派结盟的对象	
		激进派	改革派
改革派的 结盟对象	强硬派	权威政权原封不动地存续下来: 2,1	权威政权作出让步后保持下来: 4,2
	温和派	无保证的民主: 1,4	有保证的民主: 3,3

如果改革派同强硬派结盟,而温和派同激进派结盟,从而形成两个对立的联盟,那双方势必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改革派同温和派结盟,而温和派也与改革派结盟,那结果就是有保证的民主。不对称的结盟有可能是这样的:当温和派同激进派结盟,而改革派又同温和派结盟时,由于激进—温和联盟,改革派只能接受无保证的民主。当改革派与强硬派结盟,温和派又与改革派结盟时,温和派只有接受自由化。前面已经提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加入政权。 69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有一项优势策略,即总是同强硬派结盟。如果温和派同激进派结盟,反对派就会被击败。权威集团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这样的结果对改革派来说,要好于同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导致的无保证的民主。如果要想强硬派吃点苦头,温和派选择同改革派结盟,那就要向改革派作出一些让步。这种妥协对改革派来说,也胜于有保证的民主。因此,潜在的改革派同强硬派结盟以捍卫权威政权,他们的境遇总是会更好些。

这种状况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改革派本身没有什么政治力量,在民主之下政治成功的前景萧条。没有特别的担保,他们在民主之下就很惨;即使有担保,在他们的权威主义同盟的保护下,他们的境遇还是更好些。1980—1981年间的波兰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当时任何一种解决方案都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1)反对派坚持公开的选举竞争;(2)党想获得它能赢得选举的保证。反对派希望党能赢得选举,他们所想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与竞争的

在 Polityka(Warsaw, 1981 年 9 月)中, Stefan Nowak 用博弈论的术语分析了波兰的情形。

机会。党并不反对选举,但它非常想获胜。可是在秘密的民意测验中,只有3%的人愿意投党的票。还没有办法来克服这个障碍。如果党能获得30%的支持,那么,它发明一种既有竞争性又能使党获胜的选举制度将是小菜一碟。但是在支持率为3%时,它无计可施了。现存的制度中,没有一种制度能满足冲突着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与外在机会所施加的种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不能冒险同温和派结成民主同盟。

假设改革派在获得了制度保证的条件下,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在民主之下参与竞争。这是否足以让他们支持民主呢?参见表2.2。这里,改革派有独立于强硬派的政治力量:他们在竞争条件下能获得某些支持;与其他选择方案相比,他们更偏好有保证的民主。然而,对于改革派来说,结果取决于温和派的行为。如果温和派同意给他们以担保,那改革派在民主之下会过得很好。但是若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想要一种无担保的民主,那改革派就会输得什么也没有了。现在,让我们从更广的范围内来探讨这种冲突结

表 2.2

		温和派结盟的对象	
		激进派	改革派
改革派的 结盟对象	强硬派	权威政权原封不动地存续下来: 2,1	权威政权作出让步后保持下来: 4,2
	温和派	无保证的民主: 1,4	有保证的民主: 4,3

斯大林时代波兰的二号人物 Jakub Berman, 在 1981 年的一次采访中相当明了地指出了这一总的姿态。就战后选举问题,他说:“我们应把权力交给谁呢?也许是 Mikołajczyk(农民党领袖)?或者是比他更右的人?鬼才知道应给谁!你会马上告诉我,这样做是尊重民主。那又怎么样呢?谁需要这种民主!顺便说一下,现在我们要自由选举,甚至比十年或二十年前更不需要,因为我们会输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选举还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我们想把自己打扮成超级民主者,表现为这样一种绅士。那时,我们会摘下头上的大礼帽,鞠躬说道:‘欢迎您!我们就要退休了,请把权力拿好!’”(采访见 Tora ska, 1985: 290)

这一策略局面在 1989 年 3 月通过一项天才般的举措得到解决。当时有人建议设立一个上院,进行自由选举竞争,而保证在下院共产党及其联盟占多数,并有权组织政府。

在这一博弈中,没有纯粹策略上的平衡。

构,即先假设改革派预计着温和派的反应而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见图 2.2)。改革派这样来分析形势:如果他们同强硬派结盟,结果将是维持现状,这对于自己来说,是次优结果。在有担保的民主下,他们的境遇会更好些。但是若改革派决定同温和派谈判时,温和派又支持同激进派结盟,这会导致改革派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于是,改革派决定还是呆在现政权中比较好。 71

然而,这种情况的反复出现难道就不会导致民主吗?设想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策略必然会反复出现。温和派懂得,面对改革派开放政权,自己却拥护激进派的主张,那下一轮中改革派将同强硬派结盟。这样,从第一轮背离中温和派所得的回报是{4, 1, 1, ...}或4与1的其他组合。这取决于改革派选择的惩罚策略。但若温和派在第一轮中就决定给改革派以担保,改革派则作出友好的姿态,那么,温和派的回报将是{3, 3, 3,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改革派有许多惩罚策略,足以劝使温和派合作。因而,若原初状态反复出现,民主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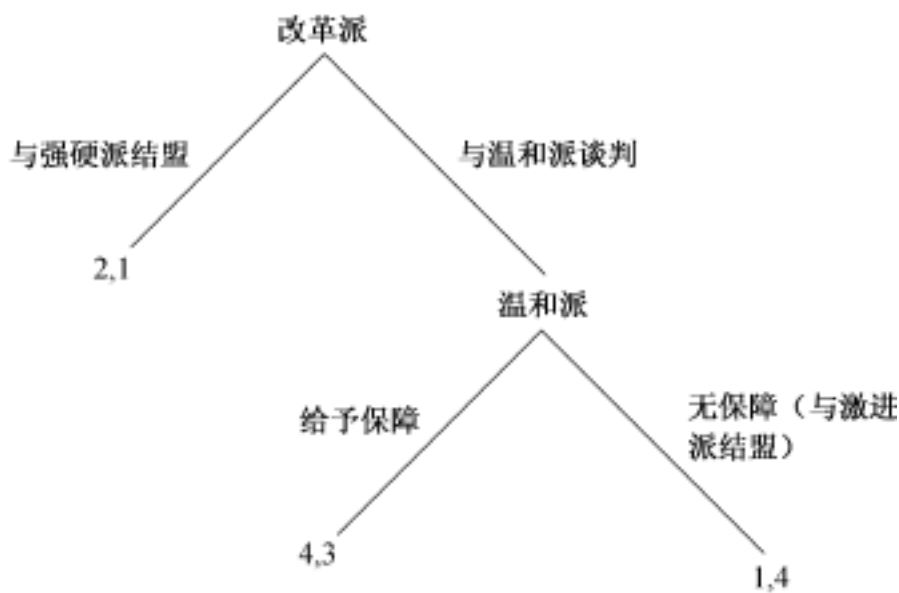


图 2.2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情形并不会反复出现,因为此下的政权变迁伴有风险。有些情形是惟一的,不会反复出现。如权威政权机器内部分裂了;某个

以下的段落源于我同 Jon Elster 激烈的探讨,他总是迫使我弄清楚我到底在想什么。

以牙还牙,在实验条件下,人们倾向于选择的策略是要使超时回报最大化。但这并不是最优均衡的策略。另外,也有很多策略支持合作性的结果。关于这一点,以及许多相关的技术问题,请参见 rasmusen(1989)编写的优秀教材。

团体开始感到更想在他人同意下行使权力而不是以武力垄断之,并决定再前行一步,在政权之外寻求最终的伙伴,以保证在民主之下能继续发挥其作用。一旦改革派决定迈出这一步,他们就无法回头了。现在选择的行为就决定了未来的回报。走回头路就是承认民主开放的策略挫败了,迎接他们的将是强硬派冰冷的面孔。决定走回头路的改革派几乎没有一个在失败后能幸存下来,他们只有孤注一掷了。这并不意味着在将来就没有新的改革派再次去实行开放。韩国和波兰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了。但是这些都是新的力量了,面对的是新的环境。如果改革派的策略成功了,民主得以制度化,那么回报将是丰厚的。即使民主可能会被颠覆,但是把权力交与民主制度却是不可逆转的。 72

这种观点是否就意味着,民主绝不可能作为一种均衡,而只可能作为人们对民主规范性承诺的产物建立起来呢?不,我们只需要稍微修正一下回报就可以看到,存在一种惟一情形,此下的均衡结果就是民主。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激进派接受有担保的民主;二是温和派继续因自治军队的存在而受到保护。

第一种可能性——激进派不再激进——并非像其刚刚出现时那样远不可及。在民主确立之前,追求经济政治深远变迁的各派力量别无选择,只有占据街道与工厂来进行斗争。在现行的制度条件下,他们的行为必然会招致暴力镇压。然而一旦由于温和派与改革派达成一致,竞争性的民主制度框架得到确立,激进派会发现自己也能参与博弈了。当然,他们还是倾向于对民主制度怀有戒心,不相信他们所获得的机会,怀疑自己获胜后是否会得到他人的容忍。然而,无限开放的民主博弈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激进派会发现,拒绝参与到民主制度中来就是舍弃民众的支持。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表明,各派政治力量面临着参与或消亡的二重选择。除无政府主 73

我说“几乎”是因为巴西是个例外。1974年失败的“解禁”的策划者后来又成功地东山再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制度演化理论(Schotter, 1981, 1986)不能解释向民主过渡的缘故。这里涉及到某些技术问题。就在反复博弈中出现的合作而言,结果仅仅局限于那些确实是反复出现的情形。具体地说,就是有同样回报的情形。就我所知而言,我们对子博弈每轮都会发生些变化的博弈知之甚少。Benhabib & Radner(1988)分析了回报经常变化的劳资博弈,发现,若回报从一轮子博弈到下一轮发生重大变化,那么均衡就是非协作性的。若它们变化不大,那么均衡肯定是会走向协作的。当博弈稳定下来后,结果就是协作式的均衡。这种结果在直观上是有意义的。所以,现在相关的问题是,回报从一种情形到下一种情形变化了多少。我认为,至少就改革派而言,他们的回报变化是很剧烈的。

义者固执地拒绝了“选举的诱惑”外，其他所有政治力量都加入到民主制度中来了（见 Przeworski, 1985, 第一章）。

若激进派拒绝参与由温和派与改革派打造的制度，温和派的利益所系使它倾向于选择这样一种民主，即在该民主下，公民社会中代表改革派的力量占据主要地位，而不是代表激进派的力量占据主要地位。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上面博弈树上的回报将相互变化。温和派倾向于一种对改革派有担保的民主，而不是同激进派结盟。这常常意味着，与权威政权密切相关的某些部门还会继续得到军方的保护。如果改革派有自身的政治力量，如果温和派倾向于一种满足军方自治地位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满足激进派的要求，那么改革派对民主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均衡的结果就是民主，但是军方仍然不受文官控制，并监视着民主过程。

但是温和派为什么容忍军队的自治呢？军方的监管会限制民主结果的可能性范围，有时会侮辱平民政治家，并导致民主制度的不稳定，温和派为什么能容忍这些呢？

除波兰外，东欧都是平民政权。军队及大多数维持秩序的力量都受到严密的政治控制。这种控制甚至具体到了它们该如何操作的地步。因而，人们不应感到奇怪，在角逐领导角色的冲突中，所有东欧国家的军方都完全站在要求废除垄断权力的这一边。“军队想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党服务”——将军们一直这样声明。从拉美经验来看，这样高尚的表示呈现出某种不祥之兆：这并不是忠于民主价值，而是要独立的表现。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军方都一直维持着其自治，并继续监护着民主制度。不仅在通过谈判实现向民主过渡的国家是这样，即使在阿根廷，军方遭受了令人屈辱的对外战争失败，也还是这样。军方干预的幽灵始终约束着民主政治过程，在新生的民主之下，军方的最终反应始终是日常政治生活中

在图 2.2 里，假设在有保证的民主下温和派的回报都是 4，而没有 3。

我认识到，现实中的博弈远比我分析中提及的博弈要复杂得多，因为我把强硬派的行为当作一个参数了。然而，强硬派可能，比如说，为了削弱温和派与改革派的一致而挑衅激进派。在许多过渡情形下，出现过看似激进分子，但有可能是挑衅者的模糊群体：如西班牙的 GRAPO，阿根廷的 Tablada 事件。

在 1987 年 10 月，巴西政府突然提高军人工资一倍以上，这是对驻扎在省会城市的一支小部队占领市政厅作出的反应。而在此之前，财政部长公开承诺过不做这样的事。

秘密警察则是另外一回事。在秘密警察与共产党间的冲突是共产党政权下政治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事。秘密警察是因共产主义解体而损失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好些国家是人们仇恨的头号靶子。

必须要考虑的因素。阿根廷的经验让人极为痛心,在那里,绑架、折磨、谋杀而不受惩罚,这从道德上大大地败坏了所有的政治生活。在最近向民主的过渡中,只有西班牙和希腊成功地确立了文人对军方有效控制的民主政府,使政府免受军方的监管。

一个明显的答案就是,温和派害怕对军方施加文人控制的努力,在事实上会引发本来想要消除的军事干预。这里涉及到的策略计算肯定是这样的:首先,在任何试图确立文官控制的努力后,立即引发军方政变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对军方听之任之情况下发生政变的概率。因而,即使确立了文官控制后,军方干预的可能性大大减轻了,但是在没有文官控制的情况下,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也是相当低的。参见表 2.3 如果军方继续监护政治体系,那么它现在与未来介入政治的概率为 68%。然而,若政府想对之施加文官控制时,他们发动政变的概率则为 80.2%。

表 2.3

	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立即发生	现在不会发生,但最终必然会发生
军方充当监护人时	0.20	0.60
文官政府试图控制局面时	0.80	0.01

问题并未以此结束,因为并非所有的政变都是一样的。有种观点支持对违背人权的状况进行惩罚,因为惩罚具有劝阻性。当军方想再度干政前必得三思而后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失去了权力就会遭受重罚。那有可能是真的。但若这种观点是正当的,那它也意味着,若军方并没有为干政会带来惩罚的威胁所阻吓,它们干政后将不大可能因为这种威胁而放弃权力。因而,文官控制的施加可能会降低政变的概率,但同时增加了条件概率,政变一旦发生,将带来极度的高压与恐怖。

于是,一个政府若不想招惹政变,不想冒镇压的风险,它就得忍气吞声,

设 p 为监护下马上发生军事政变的概率, t 为同样情况下最终发生政变的概率。设 q 为若政府对军方施加文官控制时立即发生政变的概率, c 为同样条件下最终发生政变的概率。那么,在监护下政变发生的总体概率为 $p + (1 - p)t$, 在试图施加文官控制下政变发生的概率为 $q + (1 - q)c$ 。

把其道义上的愤怒与民主理想搁置一边,接受军方监护的限制。但是我认为,这种推理不足以解释平民政治家对待军方的行为。即使民主政治家有能力消除这种威胁,但他们却不想消除这种威胁,为什么呢?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丰塔纳(Fontana,1984:121)注意到,1981年,阿根廷的各政党害怕,若来自军方的威胁得到清除,新一轮民众动员将迫使他们像1973年那样“左”倾,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害怕激进。套用贝文(Ernest Bevin)形容劳动党的一句话,他们“不想使自己必须听令于自己的人民”。若军方可能被指望去压制民众动员,军方的监护对现存的政党来说,就是一种保障。

第二,在许多军方干预传统已久的国家,问题在于,缺乏一种使军方能受文官控制的制度模型。通过军队的指挥链,军队应当是直接向总统负责的,而不是向监督军队具体行动方面的议会委员会和文职官僚机构负责。没有这样一种平民化的控制机制,民主政府所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容忍军方的自治,要么彻底摧毁军队。这里,我怀疑民族主义有某种作用。没有哪个总统敢于去削弱国家的防卫力量。当对军队的策略选择是或者听之任之,或者彻底摧毁它时,保持军方的优势地位对于民族主义政治家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文人来控制军队这一问题不仅在于这样做是否明智,还在于是谁想这样做。有些民间政治力量也许更倾向于军方的监护,使自己不致面临更多

Fontana在一篇于1987年发表的文章“La política military del gobierno constitucional argentino”中强调说,在1983年,政府对军方的情形了解不清楚;它错误地以为若军方得到机会就会自我整顿;它一而再地低估了军方内部各派军人间的团结程度。他所说的这些可能都没有错,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篇文章没有指出政府对军方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这个观点源于 José Murilo de Carvalho。

例如,Delich(1984:135)认为阿根廷民主政府有下列可行的选择。既然军方犯下的暴行是在书面命令与军方指挥控制之下,由得到作为一种机构的军队批准的行为构成,那民主政府要么谴责整个军方,要么对之不闻不问。

1987年10月, José Murilo de Carvalho(1987:18)这样来描绘制宪议会内巴西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很难见到为建立公民权利的支配性地位而努力的政治意愿。我们看到,共和国总统的实际政治行为中不存在这种意愿。在多数派 PMDB 中,这种意愿也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达。更不要说 PFL、PTB 等等会有这种意愿了。无论是谁,当他看到新共和国的政治是这样的时,肯定会认识到,军方的监护是正常的,应该持续下去。”所以,人们不应感到奇怪,1988年9月15日的《拉美每周报道》(WR-88-36)以“巴西军人不声不响地得到皮诺切特大声嚷嚷要得到的东西”为题,报道说:“有些巴西军人私下里很乐意承认,在世界上别的地方,是平民政府担心他们能给或应给军方多少自治权,而在巴西,是军方审慎地考虑该给平民政府多少自治权。”

的代表要求,从而挡开来自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那些人士的压力。

由此可见,摆脱旧政权必然在制度上留下印痕。让我们看看皮诺切特同意实行自由选举的条件:(1)向现在军队与警察中的主要指挥官提供永久职位;(2)“军队与警察的声誉不受侵犯”;(3)“全力以赴地进行反恐怖主义斗争”;(4)尊重由四名军方代表与四名文官代表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见;(5)维持对1973到1978间的政治犯实行的大赦;(6)政府不得干预国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限制军事法庭的权力,不改变军队指挥系统,不限制军事预算,不干预将军的晋升(通常这是总统的特权);(7)军队有确定参议院9名成员的权力;(8)中央银行独立,行长由军队任命;(9)接受军政权最后几个月实行的私有化,但不得调查它是如何进行的;(10)自动将从铜中获得收入的20%划归军队。当军队自身变成改革派,受到来自官僚们的抵制时,情形就相对简单多了,尽管有时也富有戏剧性。不过注意一下波兰,那儿改革的动力来自军队首领,原政权也成功地获得了若干担保:(1)确保共产党在较重要的下院(Sejm)中拥有35%的席位,其盟友获得30%的席位,从原则上获得足以保证对组织政府的充分支持;(2)双方达成谅解,反对派将不反对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当选为总统;(3)有关对外防御与国内秩序事务一概交由共产党控制。

因而摆脱旧政权的策略是灵活的。军方来推动民主事先必须谨慎,而一旦发动民主化进程就应变得果断起来。但是事先作出的决策创造了事后难以逆转的条件,因为他们保有同旧政权相连的军事权力。事后民主力量可能抱怨他们当初的谨慎小心,但是在事先他们只有谨慎行事。

可是,通过与原政权谈判达成的过渡所创造的种种条件,是不可逆转的。民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主权属于人

José Murilo de Carvalho(在私下交往中)对这种假设提出了批评。“以精英对民众动员的担忧为基础的解释并不是太好,原因有二。第一,面临着对军方进行文官控制问题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或本应认识到),军方提供的保护(从一方来看)也是一种威胁(从另一方来看)。换句话说,作为政治家,他们的工作也受到监管的威胁。他们本想维持军方这种监护以保护自己免受民众动员的压制……第二,对我来说,这种解释可以变相地理解为,它先就假定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天生就是保守的;他们宁愿冒军事政变的风险,也不愿意使政权有更广的代表性。”

在1989年1月党的中央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未能获得多数支持。这时,将军本人(他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部长、内务部长(二人也均为将军)三人提出辞职,并步出会议现场。直到这时,中央委员会才认为应当改变立场,同反对派谈判。

由于在一些国家里民主已经得到巩固,一些北美知识分子现在向我们建议说,当时反对权威主义斗争中的主角本应当更为激进地推动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关于这类奇思怪想,请参看 Cumings, 1989。

民,人民就能决定削弱政治家们在谈判桌边达成的种种保证。甚至大多数制度化的保证充其量也只是程度较高的保证,而绝不是确定的。确实,在智利、韩国、巴基斯坦,试图修正作为专制遗产的宪法努力都泡汤了,在乌拉圭,全民公决也未能扭转军方颁布的自行赦免令。但是,在波兰,1989年4月达成的原始协议在1989年6月的选举后开始失效,后来就慢慢地被破坏掉了。通过摆脱旧政权实行的过渡会产生许多诱因,诱使民主力量去清除作为权威主义遗产而留下的种种保证。所以,它天生就在制度上是不稳定的。

三、宪法

设想摆脱旧政权这个方面已不存在:武装力量早已解体,如希腊和东德;或他们支持向民主过渡,如许多东欧国家。当冲突着的各种政治力量一致同意建立一种允许尽管有限但却公开的竞争的制度框架时,并且这种制度框架会产生持续不断的服从时,自我执行的民主就会得到确立。于是,问题是双方面的:(1)应选择什么样的制度?(2)这些制度是否会自我执行? 79

首先,我们应注意到,向民主的过渡都是要谈判的。有些是同旧政权的代表谈判,有些是支持民主的力量为寻求一种新的体制而进行的谈判。摆脱权威政权下的社会并不总是要谈判的,但是对于构建新的民主制度谈判又是必需的。民主不可能是专制的,它只能源于讨价还价。

这样一种交易模型可以很容易地以我们分析“摆脱旧政权”的方式建立起来。它的基本结构是围绕制度的冲突展开。每一种政治力量都支持最能促进其价值、利益、纲领的制度框架。是某些民主制度的框架得以确立,还是为争取专制而进行的斗争得以延续,这取决于各派力量之间的关系及个

而且,这整个分析中所呈现的知识是民主斗争中的主角们通常达不到的,或不能达到的。在波兰,每一方在下列几点上都打错了算盘。党在1989年6月的第一轮选举中获得的支持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谈判交易的合法性被削弱。而共产主义者的忠实盟友也决定冒险走自己的路,整个精心策划的过渡计划被打乱了。反对派要使改革派继续参与游戏,就不得不在最后一刻作出额外的让步。我怀疑,党要是知道什么会发生,就不会同意去搞什么选举。如果反对派预计到了什么会发生,也就不会作出什么让步了。党的理论家们举出各种理由说明团结工会将在1989年6月的选举中败北。一位知名的改革者向我保证说,党的候选人会在参议院赢得选举的多数(事实上,他们只获得了15.8%的选票,参见Ostrowski,1989)。但是选举结果同样让反对派大吃一惊。当瓦文萨(Wal sa)被问到政治发展是否合乎其计划时,他回答说:“我的计划同已经发生的一切是不一样的。在政治上,我本希望能坐到谈判桌上就行了,暂时停下来,集中关注经济与社会事务。但是真不巧,我们赢得了选举。”(采访见Te Figaro,巴黎,1989年9月26日,p.4)。

别行为者施加非民主方案的能力。这个模型暗含的假设涉及到各派力量与制度结果的客观条件间的关系。具体说来,不同的制度框架可以按转型发生的条件来进行不同的解释。

在阐述这个模型之前,我首先要澄清制度选择中所要涉及到的诸问题。就民主制度选择而产生冲突的各个群体面临着以下三类问题:实质对程序、一致对竞争、多数主义对宪政主义。在什么程度上经济与社会结果应无限开放?在什么程度上其中的某些结果应得到担保与保护,使之不受竞争结果的影响?哪些决策应当通过一致达成?哪些决策应当通过竞争达成?某些机构,如宪法法庭、武装力量、国家元首,是应作为竞争过程的仲裁者吗?还是他们也应服从于定期的选举裁决?最后,社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80以什么方式来约束自己,以防止未来的某些变革?这些都是制度冲突中必然会产生出的核心问题。

冲突所要求的制度解决方案应是明确的,并具有弹性。瑞典 1905—1907 年间的改革是成功谈判的经典例子。当时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1)是否要扩大选举权,给哪些人扩大选举权;(2)选举改革是只限于下院还是也应包括上院;(3)议席是按单名制选区还是按基于比例代表制的多名制选区分配;(4)若单名制选区得以保留,那么胜者是最初获得简单多数的那个人还是复选获胜的那个人;(5)行政机关是否还应继续对国王负责而不是对国会负责。

各派政治力量难以达成一致的原因是,制度具有分配性影响。如果制度选择大不了是个效率问题,那也就不会引起争议。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害怕一种会使其他人过得很好的制度。但是考虑到经济、

关于宪法程序与实质方面的张力,见 Casper, 1989。在最近的例子中,西班牙的 1977 年宪法最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宪法,它只是规定了游戏的规则,几乎对结果只字未提(除私有财产权外)。而巴西 1988 年宪法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详细列举了种种经济与社会权利。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一系列论文,Elster & Slagstad, 1988。

请参见 Rustow, 1955, Verney, 1959。

200 年前美国与法国的制宪过程中所讨论的制度问题包括:(1)普遍的选举权还是有限的选举权;(2)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3)议员全部改选还是分期部分改选;(4)一院制还是二院制;(5)秘密投票还是公开投票;(6)议会制还是总统制;(7)选举日期是固定还是由政府审定;(8)行政长官可再当选还是不可再当选;(9)代表的豁免权;(10)行政否决权;(11)行政长官的责任及其罢免;(12)解散权;(13)创制与废除法律的立法权;(14)对财政权的立法垄断;(15)司法独立;(16)陪审团公开审判;(17)禁止追溯性法律;(18)绝对的言论自由;(19)宗教自由;(20)军队与警察间的制度性障碍;(21)决策权的地域分散。这是 Stephen Holmes 列出的,参见 Hardin, Holmes & Przeworski, 1988。

政治、意识形态资源的分布,制度确实会影响到不同利益与价值得以促进的程度与方式。因而,关于制度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不同的条件下,我们期盼什么样的结果发生呢?有两个条件是很显著的:当制度框架得到确立时,各派力量间的关系是否为参与者所知晓?如果是的话,这种关系是否平衡?这些条件决定了哪种制度可以得到采纳以及这些制度是否是稳定的。从这种推理中有三种假设:(1)若人们事先就知道各派力量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那么制度将认可这种关系,并且只有在原初条件不变时,这种制度才是稳定的;(2)若人们事先就知道各派力量间的关系是对等的,那么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无休止的内战,赞成无法运作的制度,赞成最后获得惯性动力的制度框架;(3)若人们事先不知道各派力量间的关系,那么制度将包含广泛的制衡,在各种条件下持续下来。下面来逐一讨论这些假说。 81

力量对比关系已知是不平衡的。当力量对比关系是已知不平衡时,制度就是为特定的个人、政党或联盟而制定的。盖德斯(Geddes, 1990)表明,在拉丁美洲,每当新的政党制度从权威时代形成时,就有一部新的宪法得到采用。她分析说,新制度的特征在于它被设计去巩固新形成的力量对比关系。

关于这种制度的起源与作用,海沃德(Hayward, 1983: 1)在分析法国时——这并不偶然,描述说:“因为法国人预计政权将是短命的——事实是,他们的宪法常常被打发为定期的文献——每一次宪法本身就没有被赋予多少权威。现行的宪法被认为是一个条约,它暂时按斗争中获胜者的意志来解决权力分配问题。在人们看来,它远远不是什么国家基础性的中立的文件,而是一个反映党派利益的程序装置。它设置了政府有权进行统治的正式条件。”

在波兰,1921年的宪法设计了一种弱总统制,因为毕苏兹基(Pilsudski)元帅的政敌们知道他会当选为总统。在这种条件下,毕苏兹基拒绝执政,并于1926年5月通过政变夺取政权。9年以后,一部新的宪法被制定出来认可他的有效统治。1年后他死去了,但事实表明,没有人能接替他。在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宪法是特别为戴高乐将军制定的,但是它经受住了一次由左派社会主义总统和右派在议会中占多数的“左右共治”的考验。

人们认为,那认可力量对比关系的宪法只会随这些关系的存续而存续。这是有道理的。智利1925年的宪法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以下论述是根据Stanton, 1990)。这部宪法直到1932年才被普遍接受,当时通过了一项补 82

充规定,允许地主控制农民的选票,并无限期地维持农村地区代表过多的状况。实际上,1932年形成的宪法是城市部门与农村地主同盟的产物,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允许地主压低农工的工资,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在20世纪60年代,当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执政支持农民时,这个协议造成的参与障碍受到了侵蚀。到1968年,原体系崩溃了,而在1973年,民主又被颠覆。注意,这个有问题的制度足足延续了41年。但是,从一开始,若一个具体条件——农村民众有效的行使选举权——发生了变化,它就可能生存不下来。当时就是这样来设计它们的。

力量对比关系已知是平衡的。这是最复杂的一类情形。设想不同的政治力量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各种选择方式有强烈不同的偏好。国家中的一部分强烈偏好单一制的政府形式,而另一部分则强烈地偏好联邦制。某些群体会认为,其利益在议会制下最能得到保障,而其他人则坚持总统制。一种力量联盟坚持政教分离,而另一种力量联盟则主张一种国教。概括地说,假设一方力量联盟为行,它发现民主在制度体系A下是更有利的,而另一种叫做列的,感到在这种体系下受到了威胁,从而更偏好制度体系B。他们之间没有达成一致。(表2.4)

表 2.4

		列			
		A		B	
行	A	最好	一般	糟糕	糟糕
	B	糟糕	糟糕	一般	最好

这种情形下,没有纯粹的策略平衡。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内战。阿根廷1810到1862年间就是这样的。制定宪法的双重努力都失败了,只有在战争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被击败后,才出现了稳定局面(Saguir, 1990)。不妨看一下前苏联的局势,民族主义者、联邦主义者及主张统一的力量相互冲突着而没有达成什么明显的解决方案。

在最近对巴西418名精英人物的调查中,71%的人希望采用议会制。政治家与新闻记者的80%,工会领袖的60%,军方的45%是支持议会制的。(《拉美每周报道》90—26, 1990年6月12日, p 5)。

然而,无休无止的冲突,持续几代人的内战,是谁也承受不了的。因而各派政治力量可能会采用某种制度框架。而所采用的任何制度框架也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解决方案。 罗斯托(Rustow, 1970)指出,当任何政党都不能单方把自己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别人时,“长期的僵持导致相关各派去寻求一种次优妥协方案”。 83

事实上,这在好几个国家都出现了。围绕着制度的冲突很快中止了。在巴西,新宪法得到采用,但是人们都知道,它不可能得到完全遵守。它显然只是通过许诺满足未来的种种要求来减少冲突的强度。在阿根廷,1853年的宪法得到恢复,虽然说它以前从未发挥过作用,人们也不想现在它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为什么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具有吸引力?一个原因在于,政治行为者相信,制度不会起什么作用,不值得为它去冒继续同别人冲突的风险。事实上,相信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似乎就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都相信,制度让人们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他们把美国政治的稳定归功于国父们的天才创造。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以外,制度似乎没有多大效果。一位著名的巴西学者兼政治家曾评论说:“人们不能靠宪法条款来阻止军事政变。”在匈牙利,一次为决定总统选举方式的全民公决只吸引到14%的选民来投票。因此,尽管人们需要某些制度框架来协调各派政治力量间的策略,但是它是什么样的并不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是没有约束力的。 84

而且,即使政治家们怀疑这样的制度是否会起作用,他们也知道自己无法准确地预测备选制度框架的后果。欧洲保守主义者呼吁强制性投票,他们认为那些弃权的人也是支持自己的选民。同时,他们反对给女性以选举权,认为如果让妇女投票只会对其政敌有利。然而,他们在这两件事上都判

Kavka(1986:185)把宪法选择描述为“不纯粹的协调”。对双方来说,不存在一种灾难性的协议,但是各方的偏好不一。他认为在这种状况下,各方首先同意去协商,然后才决定其内容。可是,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样做到的。

在1854年到1983年间,阿根廷历任总统实际任期同宪法规定任期的平均比率为52%,至1930年,此比率为72%,最近一些年为37%(参见 de Pablo, 1990: 113)。1853年的宪法在当选与就职间提供了9个月的时间差。因为当选者需要时间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这9个月就是所要花的时间。当宪法后来重新启用时,这一条也没有修改。因而在Raúl Alfonsín与Carlos Menem间的第一次民主转移已经是违宪了。他们同意,国家不能容忍跛鸭政府存在如此长的时间,所以很早就转让权力了。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采访于Veja, 1987年9月9日。

断错了。

人们对制度重要性的怀疑和对制度效果的无知,这两方面也不应被夸大。对此,政治家们是有所了解的。他们也知道,选举制度怎样影响议席的分配,知道谁监管情报机构事关重大。他们对涉及政党财政资助的规章很敏感。历史上,围绕制度的冲突证据比比皆是。介入冲突的主角们都相信,微弱的制度安排也是很重要的,他们正是据此而行动的。因而准确地阐明以上观点中暗含的假设很重要。在我看来,这些冲突的主要方向同意暂停关于制度的冲突,是因为他们害怕持续的冲突会导致内战,这对个人和集体都是一种威胁。稳定局势的压力是巨大的,不管怎样,政府总得继续存在下去。骚乱对各方来说都是最坏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形下,各派政治力量会打起自己的小盘算——在更有利的制度框架下自己所获得的福利差异同冒继续冲突的风险来说,太不值得了。

但是,他们怎样才能中止冲突呢?他们必须确立某种制度框架,但是若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构成均衡的解决方案,那他们又能采用什么框架呢?惟一的出路在于寻找谢林(Schelling)所说的焦点:解决方案要是现成的,它不能被视为是自助的。对这焦点的寻求自然导向了国家的传统,若传统还得以保留的话;或导向国外的样板,若传统没有的话。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求助于 1853 年的宪法,西班牙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德制度的原因所在了。实际上,在波兰,许多人建议,国家可以采用任何一部既存的西欧国家 85 宪法,并以之来治理国家。既然有秩序总比无秩序好,总要有一种秩序才行。

这样,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制度解决方案是否有可能持续。根据博弈理论,当冲突卷入时,合作性的解决方案是不稳定的。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哈丁(Hardin, 1987)认为,一旦合作得到采用,它就获得了某种动力。一些制度至今存在,因为它们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变迁是要付出代价的。

Herrero de Mi on(1979)认为,西班牙宪法不是一个或几个外国模型的“卑微的翻版”。他也提出了证据,然而,那些外国例子,尤其是西德宪法,在西班牙宪法的许多关键条款中都隐约体现出来了。

这样的建议由来已久。早在 18 世纪末,波兰人就要求卢梭为他们起草一部宪法。

用 Hardin(1987: 17)的话来说,“一旦我们解决了立宪安排问题,那么试图去违背这种安排是不符合我们中间某些人的利益的”。“1987 年的宪法至今还在沿用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人在足够的时间内,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活动,这足以让人们在期待中相信,不在宪法限定的范围内活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Kavka(1986: 23)也做了类似的论述。

达尔(Dahl, 1990)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哈丁的理论。达尔认为,除乌拉圭外,在民主已经生存了 20 年以上的国家,它从未因外部原因而被颠覆。然而,“习惯成自然”的理论也太过分了。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宪法历久弥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宪法最后失败了,为什么有的是短暂的或徒有虚名。

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不会持续 20 年,原因如下:假定在最初对抗发生时,对相关政治力量来说,任何一种解决性的制度安排都好于继续冲突。然而,作为一种临时权宜之计的体制给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机会。这时就有两种机制开始产生作用。第一,失利同盟知道,在这种体制下他们获胜的机会比在任何其他一种体制下还要低。这个预测随着它们一连几次的失利而成为现实。于是,事后同事前就大不一样了。如果它们本有可能会赢,即使机会渺茫,它们的盘算也是不一样的。第二,行为者观察现今结局而了解其未来的机遇。失利方不断地调低它们对制度体系的期望值,并有可能会发现,重开为制度而冲突的风险,不是像以前那样让人生畏的。

86

如果这种解释行得通,那么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可能真是那样短暂。它们得以采用是因为持续的争斗被认为太危险了。可是,若这些制度安排产生的结果对某些方有损害,那么受影响的政治力量自然而然地就试图避免民主规则之下竞争所涉及的高成本,或至少努力去提升这种竞争之下未来的机遇。那些有能力追求其他选择方案的政治力量将会这样做。

力量对比关系事先不为人知。设想一个国家刚从长期的权威统治下解放出来,现在谁也不知道各派力量对比关系是怎样的。那么,制定宪法的时机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如果宪法的制定被拖延到选举或其他使这种力量对比关系明朗化的事件之后,我们就要回到上面已经讨论过的情形了:力量对比不平衡成为关注的中心,制度是用以认可当前占优势地位的势力的;或者力量对比关系是平衡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在波兰,总统选举、议会选举与宪法制定的时间顺序曾是一个激烈冲突的问题;最后,决定在宪法制定之

民主在这里被定义为一种体制——自由选举,政府要向民选议会或总统负责,及民众的多数有投票权。这最后一个条件极大地限制了民主体制的数量。

我与 Hardin(1987)和 Kavka(1986)观点的分歧可能出自我们对民主之下回报的不同理解。他们认为,一旦某套制度得到采用,回报就是确定的。而我认为回报是不确定的,但是概率是知道的。即使在前一章推导出的简单模型中,一方输掉一次后仍继续参加博弈的概率 $p^*(1)$,也要高于事前支持民主所需要的概率 $p^*(0)$ 。事实上, $P^*(1) = P^*(0)/r$, 且 $r < 1$ 。此外,若行为者根据他观察到的结果更新其信念,那么就对 $P^*/L > P^*(0)$ 有另一番解释。因而,有可能一个行为者事前接受民主,在输掉一二轮后又想去颠覆民主等等。

前进行总统选举。设想如希腊那样,宪法制定在前,或者如西班牙那样,举行了选举但是不管用,那又会是什么情形?

如果每一个人都处于罗尔斯说的无知之幕后面,即如果他们对最终民主制度之下的政治力量不太了解的话,所有人都会支持一种最小最大化方案:制度具有制衡能力,使少数派的政治影响最大化,或者同样地说,使政策尽可能不随公共舆论的波动而变化。冲突着的政治力量之每一方都会选择这样一种制度,它能为自己提供担保,免受一时的政治厄运,免受不利的舆论潮流,免受盟友的背叛等等之害。在瑞典,自由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都愿意向保守派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保证。保守派的发言人比林(Gottfrid Billing)主教曾说,他宁愿要“一种强保障与更广泛的选举权,也不要一种弱保障与较窄的选举权”(引自 Rustow, 1955: 59)。 87

因而,在各派政治力量关系不明朗时制定的宪法,更有可能钳制权力的持续回报,为最终的失利方提供某种担保,并减少政治竞争的风险。它们更有可能诱使失利方服从最后的结果,并诱使他们继续参与。而且,这样的宪法在广泛的历史条件下也更可能是稳定的。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尚需系统验证的暂时性结论:在各派力量对比关系未知或不明朗时适用的制度,在许多条件下更有可能持续下来。当各派力量对比关系已知是平衡的,且不同的群体对备选方案的偏好强烈不一时适用的制度,若它们凑巧生存了足够长时间,就会获得惯性力,但是它们终究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最后,认可暂时优势的制度有可能随产生优势的条件而持续。

第四节 竞 争

另外有一个方面需要考虑。按奥唐纳(O'Donnell)与施密特(Schmitter)的观点,国家与政权的民主化是有区别的。前者涉及的是制度,后者涉

在 1789 年的立宪大会上可以发现好几个无知之幕的例子。根据麦迪逊的笔记, George Mason 做出了以下论证:“我们应该考虑各个阶层民众的权利。让他困惑不解的是,社会的上层对这个人权指令——即人权与政策漠不关心。因为不管现在他们是多么富有,他们的地位是如何优越,多年以后,不仅是有可能,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后代将分布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因而出于自私的动机,出于对家庭的忠诚,都应当让人们推荐这样一种体制——它对社会底层福祉与权利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对社会上层福祉与权利的关注。”(Farrand, 1966: I, 49)感谢 Jon Elster 向我指出了这段引文。

及的是国家制度与公民社会间的关系。

反权威主义的各派力量必须考虑其在民主之下的未来地位。他们肯定一致地反对专制,但是他们也势必不能抱成一团。如果他们分裂得太早, 88 结果就可能重演韩国情形:在两个反权威主义的总统候选人间的对峙——这不仅是个人之间的,也是地区与经济方面的对峙——导致了同专制政权密切相关的候选人胜出。如果他们不分裂,那么新政权只不过是旧政权的翻版罢了,既没有代表性,也没有竞争。这就是好几个东欧国家面临的危险。革命以反共产主义而不是以民主宣告终结。

在民主制度得以确立后,此矛盾也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民主之下,反对派的经典问题就是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反对。若反对派不反对——不代表一种备选方案,不全力以赴地为之而斗争,那么,政治制度的代表力——即政治制度的代表与整合能力——就是很虚弱的。民主就缺少活力。但是若反对派的反对过于激烈,民主有可能受到威胁。尤其

在 O'Donnell & Schmitter (1986: IV, 73) 看来,政权是“一系列或明或暗的方式组成的集合体。这些方式决定了接近主要政府职位的形式与渠道,决定了进入这一过程或被排除在外的行为者的特征。也决定了他们为获得这种接近而运用的资源与策略”。

因此,关于谈判桌形状的谈判也不是无谓的争论。现在政权有正当理由害怕面对面地坐法,因为这种安排会促使反对派团结起来。波兰用的是圆桌,匈牙利用的是三角形桌子,而八边形桌子也被考虑过。

注意,西班牙支持民主的反对派只有在弗朗哥死后才能团结起来。主要的问题是共产党人的参与(参见 Carr & Fusi, 1979)。智利的反对派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一情形在好几个东欧国家都显得十分复杂,因为任何一个新的左翼政党都不得不包括一些前共产党人,但是同这些人联盟无异于自寻死路。在波兰,反共产主义联盟中的某些群体小心翼翼地试图挑起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分裂,因为他们知道,被打为左派的群体会面临什么样的选举结果(参见 1989 年 12 月 22 日 Tygodnik Solidarność, Warsaw 的社论)。而那些被视为左派的人被迫作出反应,宣称在联盟内没有真正的分裂,也没有必要分裂形成多个政治派别。

注意,在巴西,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花了 5 年时间才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分裂。MDB 最初是作为装饰权威政权的窗口而成立起来的,是唯一合法的反对派活动场所,从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的保护神。人们都确信,一旦政党能合法存在,那这个人人为的工具将自然而然地破裂。MDB 的确在右翼以社会主义人民党(the Partido Popular)的名义脱离时分裂过。但是这种分裂没有持续多久。作为 MDB 的化身再次出现,PMDB 变为国家的第一大党,发展了自己的地方机构,直到 1989 年还继续赢得选举。

由于后面的论述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代表观上的,所以我得先回顾一下我是怎样看待代议政体的。代议政体是这样的:(1)存在自治的组织;(2)这些组织的内部又分为领导者与追随者;(3)领导者有能力去(a)唤起人们的集体认同感;(b)控制追随者的策略行为;(c)制裁背叛行为;(4)领导者是代表,即他参与代议机构的活动;(5)代理对追随者的福利有影响。如果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相信,为这些制度所容纳的行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福利时,他们才会参与到民主制度中来。

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顽固的反对有可能导致无法治理的局面。如果一个党每次选举中总是输,或者每当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不得人心时,反对派总要发动一场罢工运动,民主制度就可能是非常脆弱的,从而为军方干预创造了条件。 89

也许在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运动中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革新派”想通过选举来参与政治斗争,于是调整策略,在选举与议会斗争中限制自己的斗争形式。然而,正统的一派要继续实施运动,要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为“社会正义”而斗争。因此,乌巴尔迪尼(Ubal dini)认为,选举失利也不会让CGT不再发动罢工。而国会中庇隆主义的代表只要觉得自己可能会输就缺席,尽可能地使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

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政治协商。政党(或准政党)领导人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1)不以选举结果来分配政府职位;(2)调整基本的决策取向;(3)若有必要,排除并压制局外人。这种协商在意大利、西班牙、乌拉圭有久远的传统,它们习惯称之为“交易”。1958年,委内瑞拉的菲霍(Punto Fijo)协议就是这种协商的模型。根据这个协议,三个政党瓜分政府职位,致力于私有财产权下的经济发展,并把共产党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这个协议非常成功地组织了权力的民主交接。

这类协议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减少各方关于政策与人事的冲突来保护初生的民主制度。制度性的协议就是设立游戏规则,而其余一切就由竞争决定了。不过,这类制度性的协议还是具有实质性的,它在竞争过程之外就设定了基本的政策问题。这类协议对于保护民主制度免受它不能承担的种种压力来说,也是很必要的。但是要注意,只有参与方能从民主中获取私利时,这类协议才是切实可行的,也只有把局外人排除在外时才能获利。这类实质性协议天生的危险在于,通过它们可能会变成在位者反对竞争者的同盟。这个同盟限制了竞争,阻碍外人接近政治,在内部分配政治权力的收益。这样,民主就变成了某些政党与合作社团领袖们的私人产物,成为一种寡头政治——某些组织的领导人合计着不让外人加入进来。 90

Wiatr(1983,1989)以契约民主的名义,向波兰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方案。

用前一章的话来说,这种协议不是交易,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这些协议的第三者。如果协议要稳定,那就必须是均衡的。但是限制竞争的协议只有在有效地劝阻局外人加入时才是一种均衡。租金的来源是垄断。

商业利润可能不可避免地成为参与民主事业人士的个人报酬。而且，民主制度可能不能处理让社会分裂的所有冲突。看看美国人，他们很谨慎地把宗教问题排除在宪法过程之外。所有的民主体制都设立了某种加入的障碍——也许在美国，选举政治是最受保护的一个领域。然而，民主要得到巩固，就应通过竞争以分散这种利润，而不是把政治权力的收益变为永久的“租金”。人们不应忘记，在委内瑞拉，菲霍协议成功的代价是本国出现了拉美最大规模的游击运动。把局外人排除在外，这需要暴力，并使民主制度不稳定。

我们是用经济学家的“租”话语，从共谋中引出对政治协议的这种分析的。但是害怕分裂不仅仅是由权威主义复辟的幽灵和政治家们自利行为驱使所至的。民主之中，天然地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源自民主理论的理性主义传统。18世纪发展起来的民主理论把民主过程视为理性审慎的过程。这种理性的审慎思考把人们引向一致，并接近于所假设的总体利益。如果所有的公民是同质性的，或者他们的利益是和谐的，那么就只存在一种普遍而理性的利益。按这种世界观，所有的分歧都只是观念上的分歧，不存在不能通过理性探讨加以调解的冲突。政治过程的作用是认知性的：它是对真理的追求。共识是合乎道德的：它是普遍利益的化身。民主的优越性在于它合乎理性。因此，卢梭与麦迪逊都91
很担心各种利益、激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派系”会对民主产生危害；二人都把民主看作是达成一致、发掘共同的善的机制。

由于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来源，经久不息的意见纷争，蛊惑人心的利益冲突，繁杂的程序纠纷，都被视为是理性的障碍。“如果我们一致同意”是那些震惊于政党政治的喧嚣的人士的久远梦想，尽管大多数政治家在呼吁理性探讨时，他们用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如果你同意我的话”。共识比靠规则或人数作出的决策具有更高的道德性。因此，每当政治冲突似乎要失控时，每当这些政治冲突似乎要威胁到民主制度时，人们就总是努力追求通过一

这个假设的困难主要来自美国。在美国，进入政治的障碍是可畏的，政党的代表权力微不足道，从比较的角度来看，经济上也是极不平等的。这可都是在相对较低层次的政治压制下出现的。人们可能不禁想起某些巴西人(Andrade, 1980; Moisés, 1986)用以解释本国状况时那样，将这种反常归为他们公民社会的脆弱。这样说，就是指公民社会不能组织起来进入到代议体制中。但是，至少若我们相信除了投票以外还有多种政治参与的方式，那么美国的公民社会就是极为强大的。我的直觉是，美国历史上压制的作用要比标准的解释所允许的作用大些，但是对此我尚不能给出系统的论证。

致、通过正式的协议来解决问题。

在那些由于受天主教教义启发而导致国家有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会有一种更强烈的要求去实现一致。如果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就不会滋生出分裂与冲突。国家的统一是有机的，是由现存的各种纽带决定的。国家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有着从其社会与历史根基中衍生出来的精神特质”（Dmowski, 1989:71）。不分享这种民族精神的人是无所归属的，他们为这个国家所不容。如果国家是有机的，它就不能容忍异己分子。个人主义与持不同政见都属于无所归属的表现。

奥唐纳（O'Donnell, 1989）已经指出，利益的有机统一这一观念，会导致各派政治力量为垄断“国家利益”的代表权而斗争。各派政治力量都不把自己看作是与其它利益与事业之代表者相抗衡的特殊利益与见解的代表者。因为国家是拥有惟一意愿的一个整体，各派政治力量都渴望成为国家的惟一代表，并披上民族运动的面纱。既然不存在通过有规则的竞争来加以解决的冲突，民主就只不过是各方提供一种垄断国家利益代表权的争夺机会。 92

天主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活跃在许多国家。事实上，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促使许多——虽绝不是全部的——东欧持不同政见者投身于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可是许多人又发现自己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民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而后者正是反共产主义惟一有效的政治力量。尽管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对真理的颠覆性力量歌颂有加，但是为反共产主义提供持续动力的不是对自由的渴望（这与从苏联中独立出来是有区别的），而是宗教与民族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这二者在特

后面的几段源于我同 Guillermo O'Donnell 关于阿根廷与波兰的几次谈话。

Roman Dmowski 在 1939 年前是波兰全国民主党的精神与政治领袖。他的论文“*Myklienowoczesnego polaka*”，最初写于 1903 年，第 8 版于 1989 年出版。

这种有机主义的言论在阿根廷是很兴盛的。可参见 O'Donnell 提供的诸例证。我记得在 Alfonsín 政权下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说过：“我们是保卫国家不受细菌侵扰的免疫系统。”（Pagina 12, Buenos Aires, 1988 年 9 月。）在波兰议会最近一次关于堕胎的辩论中，亲瓦文萨的某党领袖，参议员 Kaczyński 宣称，“波兰所有的好人都是反对堕胎的”，那些支持堕胎的人“是民族的败类”（Libération, 1990 年 10 月 1 日, p. 19）。

Jacek Kuro 的回忆录“*Wiara I Wina: Do I od komunizmu*”（1990）极为生动而辛辣地描述了这种困境的紧张状况。

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教会政治力量的复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种族冲突的兴盛，反犹太主义的勃起，都昭示了东欧有机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

因此，努力去达成共识并非仅仅出于自利的推动。民主要求人们中止一种信念，不再相信肯定有一种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好的、理性的。依规则与人数作出的决策，并没有什么初步的理性。民主政治的日常生活并不是什么能让人感到神圣而敬畏的场景；相反它就是为了一点小盘算而无休无止的争论，为了蒙骗与误导他人而编出溢美之词，在权力与金钱间拉拉扯扯，法律也并不标榜什么正义，政策反而有助于增进特权。在反对权威主义压迫的斗争中，把民主理想化了的人们，以及把民主看作是受禁的天堂的人们，当看到民主是这样时，痛苦万分。当这天堂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时，他们的幻想就破灭了。于是，人们企图一下子就把什么东西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停止一切无谓的争论，以行政代替政治，以纪律代替无政府状态，高扬理性。而这一切却正是权威主义的企图。

第五节 结 论

这个分析并不如人们希望地那样能得出些什么结论。我们只是总结一下主要的假说。

第一，若旧政权以谈判的方式让出权力，那么民主化的最佳策略就是灵活的。事前要妥协，事后要果敢。以摆脱旧政权为主的过渡会在制度上有所保留。最重要的是，军队拥有自治权。这些制度印痕可以擦去，但是在与旧政权协商一致达成过渡的国家里，这种过渡持续时间会更长，问题也更

在我看来，哈维尔把言论仪式化的政权下真理的颠覆性作用，同在反对这种政权的斗争中说真话的人们对自由言论的承诺混为一谈了。在共产主义下，说“我们是有自己文化的民族”就是在说反对苏联，而在民主之下这样说，则意味着拒绝这种文化的人没有权利发言。人们不应忘记，二战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都是在一战与二战间产生许多专制政权的民族主义——宗教与权威的混合物。这种文化被冻结了，没有机会像法国、意大利、芬兰一样向民主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1989年之秋被解冻的文化也就是这一种文化。

强调天主教在波兰的势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这也是一件让人困惑不解的事。虽然教会在政治上极有影响力，但是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却不太有效。在波兰实行的是节育，堕胎司空见惯，离婚率非常高，酗酒成风，犯罪率一路狂升——人们难以看到教会对平常生活中道德行为的作用。教会有政治权力而无道德权力这一情形自然而然地导致权威主义的姿态：不能用说服的，就用强制——离婚手续的办理要到更高级的法院去，这样就使离婚更困难；由教育部长发令，在暑假，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要实行宗教教育；堕胎要被判刑。

多。巴西的民主过渡就比阿根廷的要长，波兰的过渡要比捷克斯洛伐克的长。在武装力量独立于文官控制的地方，军方的问题就始终是民主制度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从最近过渡的例子来看，似乎制度选择过于轻率，可以理解的是，人们急于尽快地中止基本的冲突。我们也完全相信，作为临时性解决方案而采用的制度将被证明确实是暂时性的。因而，新生的民主有可能就基本的制度而展开持续的冲突。在这些制度博弈中遭受挫折的各派政治力量会反复地把制度框架问题提上政治日程。

第三，我们不应被某些力量在成功地加入反对某个权威政权时编造的华美之词诱惑。并非所有的反权威主义运动都是支持民主的。某些群体在民主的旗帜下加入反权威主义运动，但这只是他们消灭权威主义对手 与他们反权威主义中盟友的一步棋。寻求共识常常是企图建立新权威主义的幌子。在很多人眼中，民主就是无序、骚乱、无政府。马克思几乎在 150 年前就注意到，捍卫专制的党就是维护秩序的党。无名的恐惧并不仅仅局限于同旧政权相联系的力量。 94

民主是充满不确定的，未来是未知的。社会中价值与利益的冲突是天生的。正因为我们有分歧，所以才需要民主。民主就是不用暴力而能解决冲突的制度体系。这种体制中，有差异，有冲突，有赢者，也有输者。只有在权威体制下才没有冲突。凡是一党能连续两次获得 60% 选票的国家，都不可能是民主的。

人们一致认为，新生民主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经济上的成就。由于许多民主体制是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出现的，因此，经济因素不利于民主的生存。但是在分析经济与政治条件的相互作用之前，我们需要考察一下经济体制下天生的某些选择。

不经过独立的必要程序就剥夺原共产党官僚机构成员的政治权利，这是可行的吗？应该把他们从官僚队伍中通通清除掉吗？在所有的东欧国家，要求把他们从中通通清除的要求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然而这种清除符合法治的要求吗？最近 Adam Michnik 用近乎丹东式的口吻说，“当我们剥夺其他人的政治权利时，我们也就在剥夺自己的政治权利。”（关于东欧民主化的维也纳研讨会，1990 年 6 月）关于这个问题我所见到的最好论述是 Bence, 1990。

我们且来看看当代人的说法。强硬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Milos Jakes 给在布拉格组织民主示威的人安上的罪名是“企图制造混乱与无政府状态”（《纽约时报》，1989 年 11 月 21 日）。昂纳克也是这么说的。1990 年 2 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也是这么说的。

附录：过渡研究的模式

上面所使用的研究模式只是众多可能模式之一。由于方法肯定会影响到结论,所以把我用的研究方式同其他的选择性方式加以比照是有益的。我的目的不是评论一大堆涉及各种方法的文献资料,而是简单地说明其他选择性方法的中心逻辑。

向民主过渡研究的最终问题是最后表现出来的制度形态。过渡最后是以民主还是以或新或旧的专制而告终呢?新生的民主是稳定的吗?是哪一种制度构造了民主?新体制能有效地产生实质性结果吗?它是促进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吗?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在过渡研究中要努力回答的。

为简化分析起见,让我借用巴西语 *Nova República*, 即“新共和国”, 来指称过渡最后表现出来的制度形态。关于过渡的种种研究都试图去解释新共和国的特质。

分析的出发点就是此前存在着的权威主义现状, 旧政权, 也许还包括产生这种权威制度的社会条件, 旧社会。因而, 过渡就是从旧政权走向新共和国。

有一种方式是把出发点与终点的特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也许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这还是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宏观历史比较社会学而广为人知。这一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有摩尔 (Moore, 1965)、李普塞特与罗坎 (Lipset & Rokkan, 1967) 的著作。这一模式的方法特征是把归纳出来的结果, 如民主或法西斯主义, 同原初条件如土地等级结构相联系。在这种论证中, 结果是由条件单方决定的, 人们什么也不做, 历史还是会这样发展的。

当民主化的可能性浮现时——最初是在南欧, 然后是在拉美南部, 这种模式顿时就失去了大半吸引力。我认为原因主要是政治上的。这种观点过于绝对了, 不能引导政治行为者的行动。政治行为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民主化的成功可能取决于他们的策略及反对派的策略, 而不是由过去的条件永久决定的。让巴西人仅因为他们国家的土地等级结构就相信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 这不大合乎情理。对西班牙的民主人士来说, 他们国家的未来

Philippe Schmitter 让我注意到这些社会因素。

我还记得, 在 1979 年举行的关于 O'Donnell-Schmitter 民主化研究项目第一次会议期间, 人们提都没提 Barrington Moore 的著作, 这让我很吃惊。

已经由工业化与普遍的男性选举权先后时机决定了——这太可笑了。这种宏观历史研究法甚至对于那些拒斥微观知识假设的学者型活动家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因为它等于宣告了这些人在政治上是无能为力的。 96

局势在发展,学者们对局势的思考也随之发展。第一个问题是旧政权的各种特质对过渡模式的影响。学者们对过渡作出各种分类。尤其是,学者们要把权威政权的崩溃同通过谈判而达成的转折区别开来。在我看来,关于这个主题大量文献资料的审阅表明,这一研究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在不同的国家很难找到引发自由化的共同因素。某些权威政权在长期的经济繁荣后崩溃了。有些则是在经历了剧烈的经济危机后垮台的。有些权威主义政权承受不了外来压力;而有些则长于利用外来压力,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下把各阶层统合起来。这些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在事后解释为什么某个政权“不得不”垮台,却没有在事先这样预测——各种关于东欧的著作也说明了这一点。社会科学并不长于整理出深藏着的结构原因与促发条件。根据结构条件作出的解释在事后看是很让人满意的,在事前却是无用的。因为预测崩溃时间的一点小的失误也是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在垮台的前一年——1975年,还在杀戮人民。

奥唐纳—施密特(O'Donnell-Schmitter, 1986)模式集中于不同行为者的策略,并把最终的结局解释为这些策略的结果。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也许是,许多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就是民主斗争中的主角,他们需要知道不同的行动路线会带来什么不同的结果。虽然这种模式注重策略分析,但是它没有采用博弈这一抽象理论中固有的形式化、超历史的研究方法。考虑到像阶级、同盟、“统治协定”等宏大语言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词语,结果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种充满大话的微观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结论就是,过渡时的情态决定了新政权的特征。具体地说,只要军队没有崩溃,成功的过渡只有通过谈判与协议达成。该结论的政治含义就是,促进民主的力量必须谨慎,要准备以妥协换民主。自然而然地,通过谈判(*ruptura pactada*)而来的民主在经济与社会上是不可避免的保守了。 97

一旦民主在多个国家得到确立,这个结论就被谴责为过于保守了。这

我的直觉是,更加精妙的分析仍将揭示出经济因素是以一种一致的方式运作的。当经济在长时间的增长后出现危机时,自由化也就应运而生了。也许我们还缺乏足够的案例去证实这些推理出来的结论。

类回顾性的评论,尤其对于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北美学院内的评论家来说。是备受支持的。事实上,对于当时许多民主人士来说,中心的政治问题就是他们的斗争是同时针对政治与经济的还是只关注于政治问题。是应该同时争取民主与社会主义吗?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应努力为之而奋斗的目标吗?大多数政治力量作出的被证明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实践给出了回答,民主绝对是一个独立的价值,为之值得作出经济上与社会上的妥协,而实现民主的成功策略也要求作出这样的妥协。这是从阿根廷、智利与乌拉圭军政权的残暴行径中得出的一条简单教训。任何一种其他的选择都优于这些政权长期的谋杀与折磨。

实际上,现在回顾起来,相关的问题似乎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经济上的。过渡时的情态真的决定了最终的结局吗?我的分析表明,以摆脱旧政权为主的过渡会留下制度上的痕迹,尤其是民主处于自治军方的监护之下时。然而,这些痕迹可以慢慢地消退。在西班牙,好几届民主政府都有效地逐步清除了佛朗哥政权的残余,并把军队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在波兰,各派力量间关系的慢慢演进也逐步地清除了马格达伦卡(Magdalenka)协议的残余。第二,我很惊奇地发现,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新共和国”的特征不是针对旧政权的特性就是针对过渡情态作出的反应。这也许是我分析的一个不足之处——我们现在有了足够的案例来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不过我想,尽管产生民主的条件不太一样,但是最后的民主却更有可能是相像的。原因有二:

第一,时间在起作用。最近向民主的过渡呈现为一种浪潮,这意味着过渡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时,是处于同样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条件下的。而且,过渡在相互之间也有传染性。同时性带来了同质性:新的民主向已经确立的民主学习,新生民主也相互学习。 98

第二,我们关于政治制度的文化储存是有限的。尽管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民主的制度模式其实没有几种。民主体制有总统制、议会制或这二者的混合制,都诉诸定期的选举来认可政治家间的协议。民主需要直线型的利益组织,几乎没有什么制度机制使公民直接控制官僚机构。当然,在各种民主类型间确实存在些重要区别,但是过渡得以发生的条件多种多样,民主的类型却只有那么几种。

于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二者是同等重要的。我们分析的过渡源于权威主义,旧政权的特征确实是影响到了过渡的情态与方向。但是,过渡也是向民主的过渡,是民主让大家走到一块来的。 99

第一节 导 论

“我们能够养活每一个人。”我的女儿在餐桌上充满信心地说。但是，我们真的能吗？

她的意思是，“我们”，即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将具备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生产足够的产品满足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但是，我们不仅不能如此，而且还投资发展工业使农民无地可耕，使酿酒者化酒为毒液，使牧羊人不再饲养母羊。尽管全球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饥民，我们却仍将大量的农产品堆积如山。

显然，我们的这种做法是荒谬的，但我们已经学会在荒谬中生存。事实上，我们为那些将世界置于理性约束下的人颁奖。在这些理性条件的约束下，我们理性地决策我们的行为。但是，难道这些约束条件就不是人为的吗？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应追溯到工业革命(Elster, 1975)。1848年到1891年人们为欧洲绘制的社会主义蓝图：“理性地管理所有事务来满足人类的需要”。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能相信这个蓝图并为之献身的人了。今天，市场化改革席卷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将不再被人相信。

一个好的经济系统应利用极少的自然资源和人力成本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同时要向每一个人提供最起码的物质福利。正像我们所了解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组成我们经济体系的社会机构是我们未能充分开发利用生产潜力的原因吗？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说明了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的批评失效吗？这两种体制能够通过改革满足每一个人物质福利的需要吗？

我假定人们知道或能够想到他们需要什么。因此，我把需要视为主观规定的，并等同于人们对各种产品、闲暇及成就的偏好。

研究这些问题,要从基本概念和理清这些问题的逻辑结构出发。然后我重新分析了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批评。这些批评包括:(1)蓝图,(2)这些蓝图的可行性,(3)真实性,(4)改革能力的可能性。最后结论再回到中心问题。

第二节 方法论的说明

我所指的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1)社会劳动的分工非常发达,大多数人都在生产其他人所需要的产品;(2)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属私人所有;(3)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供求市场化。而社会主义则是这样一种制度:(1)社会劳动的分工同样发达;(2)生产工具公有;(3)大多数生产资源,至少是除了劳动力资源以外的生产资源由中央集权指令性分配。其他方式的有组织经济系统,包括市场社会主义,有时也予以讨论,但是除非有特别说明外,我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中央集权指令性分配资源的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主题前,我们还需要确立一些准则来保证论证的有效性。不管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还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都经常是通过论证一种制度的缺陷性来说明另一种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社会到处可见的贫困和压迫曾经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理由,而中央计划的错误被用来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论据。然而,这些结论只有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Dunn 1984:第1章)。至少是所有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都能在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如果是两种制度下都存在的问题,因其存在于所有可想像的社会制度之下,那就不具备什么论证意义。因此,本书将不去罗列这类例子。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是如此的困难。

一、内生的偏好

各种经济体制下的偏好可能是内生的。如表 3.1 所示,偏好 IJ 表示“生活在 I 下的个人偏好 J”。我们称 CC 和 SS 为“保守的”偏好,称 SC 和 CS 101 为“革命的”偏好。这两种偏好都是内生的偏好。

该图表类似于 Elster, 1986 的图表。

表 3.1 对经济体制的偏好

	偏 好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	CC	CS
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	SC	SS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拥护者都常常把保守的偏好认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理由如下：(1)生活在 I 下的人们之所以更偏好 I，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J 更好；(2)如果他们生活在 J 下，他们就会更偏好 J；(3)因此，生活在 I 下的人们偏好 I(或生活在 J 下的人们偏好 J)，这种偏好不是“真实的”、“有效的”或“独立的”。一项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心理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那些偏好社会主义的人们是被洗过脑的。而共产主义者认为，由于人民需要接受“再教育”，因此过渡时期的专政是合理的。然而这一论证的对称性恰恰表明了这种论证是不攻自破的。

对于革命的偏好，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悖论。近几年中，尽管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认知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提高，但仍有许多知识分子和贫苦的人们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除了官僚们和非熟练工人，其他群体都选择支持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在莫瑞克(Slawomir Mrozek)的戏剧中所见，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可以带着这些偏好在两种制度之间跳探戈。

因此，内生的偏好不能作为超越制度进行判断的基础。

102

二、蓝图与现实

对于受苦的人来说，选择总是意味着希望。他们倾向于拿他们所处的制度现实与待选择的制度蓝图——或者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目的而进行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文献，充满了关于“虚假需要”的讨论。根据他们的观点，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之所以偏好资本主义的原因仅在于资本主义创造并满足了人为的消费需要。如果允许人们有真正的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所引导的需要，人们将偏好社会主义。

见 Weffort(1989)关于巴西的调查报告、Moatti(1989)关于法国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态度比较、Kalyvas(1989)关于英国人对国有化态度的数据资料。

John Elster 曾对我指出，如果我们愿意对人与人之间的效用区别进行比较，或接受关于生活于不同的制度下的同一个人的虚拟判断，那么这种比较就是有效的。当然，这是一个夸大性的假设。

合理计划的经济体制,或者是机会开放和保障效率的市场机制——进行比较。我们都很了解我们所处的经济制度的生活现实,而对于另一种经济制度,绝大多数人则是通过第二手材料来了解的。我认为,那些“革命的偏好”往往是由于我们倾向于拿我们所处的制度的现实,与其他制度的蓝图相比较而导致的。

我所说的“蓝图”是指一种制度模型,其拥护者有关它的所有假设都被认为是真的。针对这种蓝图,人们可能会指责它是不可行的。例如,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可以承认社会主义蓝图比资本主义蓝图更为优越,但是他们会辩解说那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模型的有些假设是无法实现的。由于对可行性的辩论涉及到虚拟的东西,所以这种争论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既然我们确实要对可行性作出判断,因此,我将定义一种“可行的蓝图”:即理性的反对者也认为其依据的假定为真的制度模型。

显然,如果蓝图优于现实,那么人们对蓝图和现实的比较结果总会导向内生的偏好。但是,如果蓝图和现实都被置于待选的集合之中,偏好可能被扭曲了。我不知道将有多少左翼知识分子按下列顺序排列自己的偏好:社会主义蓝图、资本主义蓝图、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主义现实。然而,要求人们只将蓝图与蓝图或只将现实与现实进行比较,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天生是政治动物,我们对蓝图的判断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评价。

10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制度的评价总是以每一种制度的最佳实践为标准的。如我们所知,现实包含了无限多的变化和层级,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别,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同样。在讨论经济制度时,瑞典之所以十分重要,是由于许多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制度最佳实践的活生生例证。一个秘鲁人可能会如此合理地进行评价说:社

从可操作的角度来说,该定义可能与诺维(Alec Nove, 1983: 11)的定义没有什么不同,诺维的“可行的社会主义”即“在一代的生活过程中,不需要作极端的乌托邦式的或牵强的假设就可以思量”的制度。

布坎南(1985: 44—5)提出了一种以评价蓝图为基础对福利进行现实比较的论述,并把该论述归因于 David Friedman,称之为一种“有理论总比没有理论好”的论述。该论述内容如下:“你曾经学过一门关于初等物理的课程,其中讲到了理想的抛物线理论,即一个质点在标准引力条件下穿越真空的飞行路线理论。现在假定你要用一门加农炮来射击一个遥远的目标,虽然加农炮的炮弹不是一个质点(它有外延),而且它所穿越的也不是真空……但是,你根据这种理想条件下的理论所作出的加农炮射击角度的计算,总比随便选个角度要合理!与此类同,我们在说明效率的时候,最好是选择一种具有效率产生理论的制度,这比选择一种没有这种理论的制度要好。”但我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称之为 William Tell 论证,它是否还有同等的可信性呢?问题在于,次优的选择可能是很糟糕的,即我们不能从最优选择的排列序列推出次优选择的排列序列。

会主义蓝图优于资本主义蓝图,瑞典要优于表现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古巴又优于秘鲁。

三、偏好的阶级基础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生活在……下的人”的范畴下检视了抽象的个人的偏好。然而个人的偏好可以是循着自身利益之道而行,进而也可以是循着阶级利益之道而行。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少量的但却是确切的证据显示,生活在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穷人和知识分子,以及生活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穷人和官僚们更喜欢选择社会主义,而其他阶层偏好资本主义。因此,真实的情形可能是,偏好是循着人们的自身利益而行,同时它与人们所置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之间,存有一种基于阶级基础上的外在联系。

即使每个人都同意,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可以以最高的效率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这个标准还不足以确定我们对分配制度的选择。效率可以与多种福利分配机制相配合。因此,我们还必须有一些附加标准,如同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关于经济制度的合理性的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标准能否与各种各样的第二标准相容。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标准的不同组合,确实给每个不同天赋的个人福利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如果他们是自私的,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很少有机会赚取高额收入的人们就会偏好社会主义,而那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其获取高收入的天赋潜力受到限制的人就会偏好资本主义。因此,人们对于经济制度的偏好具有阶级基础。

104

第三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使得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性的批评失效了吗?在本节我将从蓝图、可行性以及现实经验等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蓝 图

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往往是不连贯的、缺乏条理的,甚至有时

见 Kolarska-Bobinska(1988)对波兰的研究、Bruszt(1988)对匈牙利的研究、Zaslavskaya(1988)对苏联的分析。

Dobb(1996)的书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之作。

是稀奇古怪的。这些批评往往带有 19 世纪的印迹。许多批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仍然无法想像一个分权的社会能够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运作。他们是那样的无知,他们武断地否定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然而,我仍然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的核心论点所折服,它是切中要害的,是有效的。

为了以现代的方式阐明这些批评,我们需要重构资本主义的蓝图,但请记住,这种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型,除可行性外,预设资本主义制度拥护者的所有假设为真。这种蓝图在马克思晚年就得到了发展,是由瓦尔拉(Walras, 1874)和埃杰沃斯(Edgeworth, 1881)提出的,后来帕累托(Pareto, 1927)和庇古(Pigou, 1932)等人又对它进行了重新阐述。这个模型非常简单: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需要,他们具有天赋的能力,能够随时按照他们的需要从事生产和进行交换。在平衡中,考虑到其他人已经做或将要做的事,没有人会作其他的选择。也就是说,每个人得以行动的期望都能得到满足。在这种均衡的条件下,所有的市场都是纯粹的。因此,个体之间的交换价格反映了他们的偏好和相对的稀缺,同时,这些价格也为个体提供了关于他们所放弃的机会的信息。其结果是,资源按照这样的方式配置,即人们的交易所得全部耗尽,没有人的处境能够在其他人的处境不变坏的情况下变得更好,在一致同意规则下由这种境况产生的福利分配不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对于集体理性(帕累托最优)的三个等效的定义。

105

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模式的批评都集中于一点,即资本主义造成浪费,并援引了一些不同的理由:(1)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解释中所指的“浪费”具有不同的含义:无政府状态浪费了人类既有的天赋能力,甚至造成已经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的浪费;而由后两种矛盾

Durkheim 回忆说,使他成为社会学家的动力起源于一个困惑:每天早晨 5 点 30 分,当他打开居室的后门,他都会发现有一瓶牛奶放在那里,而他却从未见过送牛奶的人。社会主义者曾经认为如果没有中央计划者的计划和安排,牛奶瓶是不会放在那里的,而且到现在也还有很多人这样认为。但是,与此相反,在中央计划者的计划下,牛奶和瓶子却出现短缺。

布坎南(1985: ch. 2)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关于这个蓝图的非技术性概括。Campbell(1987)是一本技术性的教材。

另外的批评还有:(1)竞争基于嫉妒;(2)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并不关心适用性和可享受性。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仅涉及对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批评,而不涉及对资本主义不公正性的批评。

所引起的浪费则是机会的浪费。我认为,第一种批评是有效的,但它是针对其可行性而不是针对资本主义蓝图的批评;第二种批评则无法界定一些重要的区别,这种观点一旦形成就具有误导性;第三种批评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的蓝图作出的批评,它是有效的,是很重要的一种批评。

关于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状态的这种批评,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竞争性均衡的效率问题;二是无代价地调整到每个作出决定的人的期望都能够完全实现的状态的可行性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很复杂。

首先,根据新古典理论的发展,由于雇主、放贷人和消费者必须支付租金以确保被雇佣者、借款人和销售人按照合同规定的质量提供物品和服务,所以劳动力和资本都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最终的商品市场也不是均衡条件下的纯粹市场。其原因在于我们不可能构建一个“完备的市场”(complete market),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构建一个能够满足人们在任何自然状态下可能发生的任何要求的市场(Arrow, 1964)。正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曾经指出的,如果被雇佣者、借款人和销售人完全按照最大获利原则来行事,而且在没有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某些人还能够有所得,那么在这种条件下的均衡配置将是无效率的。因此,即使是在竞争性的均衡条件下,资本主义也是无效率的。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该问题:如果被雇佣者尽心竭力地工作,那么不需要成本高昂的监督他们也能付出同样的努力。 106

其次,如资本主义蓝图所主张的,即使竞争性均衡是有效率的,这种为了达到均衡的调整也不可能是无代价的,这或者是由于分散的经济是非均

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这是静态的无效率与动态的无效率之间的区别。

对这种批评,O'Neil(1989:209)作了清楚的说明:“使经济活动主体间保持协调一致的经济活动的信息不能得到沟通,又缺乏互动模式的计划调节机制。市场天然的竞争性阻断了信息交流,并使得协调经济活动的计划失效。”

这里,我要感谢崔之元的帮助。

应该注意到,经济学家对“均衡”一词的使用相当混乱。到现在,他们一直认为市场总是纯粹的,他们用“均衡”这一术语来表示直观意义上的平衡。当市场是非纯粹的时候,它们称之为“非均衡”。但是,在数学意义上,非均衡也是一种均衡,即一种只有在外界条件改变的情况下才发生变化的状态。因此,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非均衡”正是非纯粹市场条件下的一种“均衡”。

“在市场集合不完全的情况下,不同自然状态下的不同个体的边际置换率不同。农民(或普通生产者)在选择生产技术时,只关心价格的分布以及自身的边际置换率,他们的边际置换率可能显著地区别于其他农民或消费者的边际置换率。当所有人都这样作选择时,所得到的均衡可能不是帕累托的有效均衡,事实上,我们有其他的技术选择和收入再分配,使所有人的处境得到改善。(Newbery and Stiglitz 1981:209)”

Bowles(1985)对这层含义作了特别的强调,我在下面还会再提到这点。

衡的,或者是由于这种达到均衡的调整总是渐进的。对于第一个观点,马克思本人似乎有点摇摆不定,但他坚定地支持第二个观点。关于第一个观点,他认为在某些时候资本主义市场确实是纯粹的市场,但这仅仅是偶然的现象。并且他提出了一种由于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引起“危机”的经典理论,这一理论成了他的继承者经济理论的主要基础。在这一危机理论中,资本和劳动力被闲置,最终的商品市场不是纯粹市场,因此,这种浪费是对已经可以使用的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浪费。

新古典理论永远不可能成功地阐述调整是如何发生的。正如费西尔(Fischer, 1989:36)在一篇概括当前学术界状态的权威概述中所指出的:“均衡分析理论的力量和精致性,常常使得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建立在很不牢靠的基础上的。对于打破均衡时会发生什么结果,人们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如何行动,我们并没有一个同样精致的理论。因此,我们缺乏相应的证据来相信,如果均衡被打破之后它还能够重新确立。”为了证明收敛性(convergence),这种制度模型要么必须依赖一个中央集权的“拍卖者”(auctioneer)的推动,要么必须依赖那些显然不合理或互相矛盾的假设。然而,正如哈恩(Hahn, 1989:64)所说,引入一个拍卖者则违反了信息分散的假设。因此,新古典理论的模型在导向帕累托的最优的过程中忽略了调整的问题。而假定能打破均衡贸易的奥地利学派模型,也不能证明帕累托的结论。 107

因此,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对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批评。然而,这种批评是否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应取决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特征能否在其他经济体制下得以矫正。由于我对这种矫正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不认为这种批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针对资本主义造成浪费的第二点解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的理性行为将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解释混淆了两种情况,第一种解释错误地利用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情形,而第二种解释又偏离了目标。马克思

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下,由于货币的中介作用,销售行为与购买行为是不同的。因此,供给与需求不需要达到一致,这不仅局限于某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是所有的商品。马克思有时似乎相信,自发的分散交换可以使经济达到纯粹市场的均衡(1967: I, 355—6),但是,在其他段落他又提出,“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性,达到这种平衡只是偶然的”(1967: II, 494—5)。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产生非纯粹的市场环境:比例失调危机、生产过剩危机和消费不足危机。这些分析使得社会主义者经常这样说: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状态表现为各种危机。

Heiner Ganssman 使我注意到这一点。

认为,竞争将迫使个体企业降低投资平均利润率,这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利润率也将下降。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一般而言,如果消费是竞争的,而且不存在外部性现象,规模增大不能带来回报的增加,人们具备应有的远见,那么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就不存在冲突,而且个人之间自由交换所达成的福利分配也具有上述意义上的集体理性。只有当这些假定被违反的时候,才会出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

在现实中,这些假定经常被违反,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所有这些只能意味着任何合理的资本主义蓝图都要有一些方法来应付个人回报率与社会回报率相背离的情况。事实上,庇古以后的各种蓝图都在处理这种情况。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引入财政干预,另一种办法是产权再分配。因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市场也只应该做它擅长的事情,国家不得不介入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正如阿罗(Arrow, 1971: 137)指出的,“在市场失效的时候,社会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裂口的存在,非市场性的社会机构将出现,并试图架起跨越裂口的桥梁”。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观点的评价是,没有国家的干预,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但是,这一观点在事实上钝化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即在处理和应付社会收益率与个人收益率相背离的情况时,资本主义不比社会主义差,或者更胜一筹。 108

在理清上述理论的枝叶后,我们再来讨论资本主义导致不能充分利用生产潜力这一解释。由于论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学术文献非常多,而且大多数新近出版的文献都提及科恩(G. A. Cohen)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权威性重建,也由于我的立论观点比较狭隘,所以我将在此讨论中避开关于此矛盾的其他理论论述。

按照我的理解,这个论点可以表述如下: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不能实现技术上可行的福利分配机制。我们可能拥有能够养活地球上每一个人的技术和组织手段,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能够养活每一个人,然而,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仍不能做到这一点。对此,我的论述如下:

由于某种原因,马克思认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是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所以任何分权行为条件下产生的资源配置结果一定是集体非理性的。而且,竞争机制是使得社会无法达到集体最优的原因,竞争在经济活动背后以任何个人都不明白的方式产生作用。因此竞争的结果是不可知的,并由此跳跃性地得出结论,即竞争的结果也不是集体所希望得到的。这是跳跃性的思考,而不是推理。在这个论述过程中没有推理框架。

这个命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以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情况或得出相同的分配结果。

假设一种经济模型中只有两个代理人 P 和 W。如果产量不依赖于这两个代理人所控制的生产回报率,那么在既定的技术状态下,对与产量水平相当的福利总量的任何分配都可以实现。如图 3.1 所示,我们可以将这种分配表示为一条斜率为 -1 的直线(这条直线也是既定福利总量下所有分配方式集合的外边界)。理想的平均主义分配,就是这条直线与从原点出发以 45 度角划出的直线的交叉点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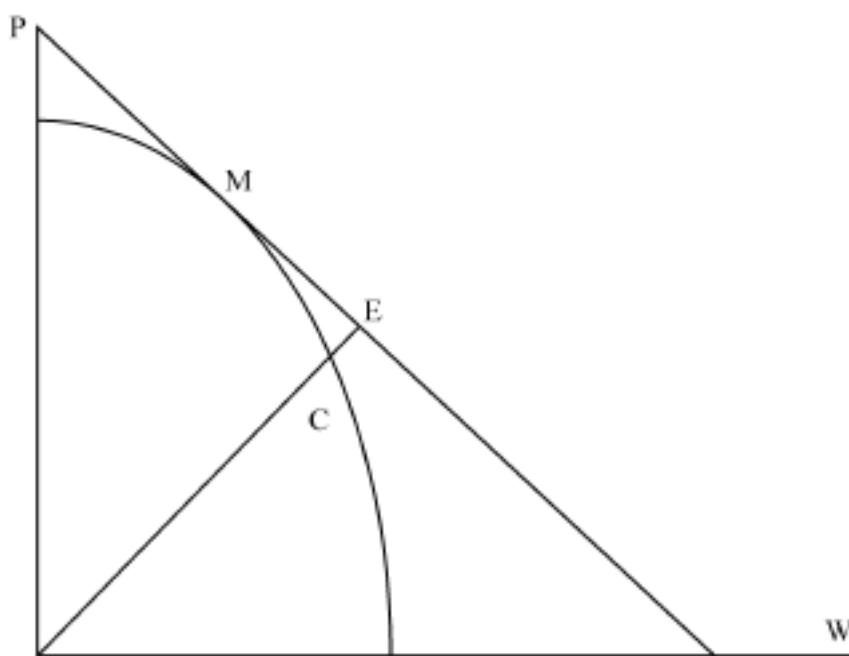


图 3.1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量依赖于对生产投资的回报率。如果资本家得到他对资本投入的全部回报,并且工人们也得到了他们劳动力投入的全部回报,那么资源就得到了有效的配置,收入分配也反映了这两种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即 M 点。但是,如果资本家或工人们得到的回报低于他们的全部投入,也就是说,如果收入分配与竞争的市场发生背离,他们将撤回资本或劳动力投入,导致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投入(endowment),即资本和劳动力,属私人所有, 109 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决定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这些资源。财产私有即意味着,如果生产资源的拥有者预期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他们有权从生产过程中撤回自己的投入。正如奥曼(Aunann)和科尔茨(Kurz, 1977: 1139)指出的:“如果他们愿意,每个人都能够部分或全部摧毁他们投入的生产资源。”假定工薪阶层有权力将工资提高到竞争的水平之上,或者政府为了达到平

均福利的目的而通过对利润征税等手段将收入转移给工薪阶层(即将分配定位于45度线上),这时获取利润的人就会减少自己的生产投入供给,其导致的结果将处于图3.1中的C点(45度线与资本主义福利总量可能的内边界的交叉点)。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达到E点的。事实上,在其外边界上,只有M点是可以达到的。

因此,在最终的福利分配与自由竞争的市场所产生的配置相背离时,可能的边界的下降速度将比斜率为-1的斜线的下降速率更快。获取利润的人只有在他们能够得到的回报高于挣工资人员边际产量时,才会充分利用他们的资源。否则,他们将减少他们的投入,即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将导致无效率的——即集体非理性的——配置。 110

假定我们不将已生产出来的食品浪费掉,而是将它们分给穷人。这时食品的价格将会下降,农民们的收益率将降低,因此他们将减少生产。而那些为自己生产食品的人,也会去领取免费食物,同时转去做其他利润较高的事。再假定我们支付给农民生产补贴,并利用税收政策来维持农产品的价格,将食品分发给穷人。但这时,将导致整个经济领域回报率的下降,其他商品的产量也会减少。事实上,我们出于同情或者是其他的动机,上述两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做了一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这么做是以把产量降低到潜在的生产水平之下为代价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我们不给生产资源的控制者足够的报酬,就无法充分地发挥生产潜力。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即使我们假定关于资本主义蓝图所有的预设都是正确的,我们也会发现,在资本主义下,技术上可行的福利分配却无法实现。正如伊尔森(Elson, 1988: 18)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下,“小范围的选择不提供大范围的选择”,即个人可以选择,但作为整体的社会却无法选择。

这并不是支持平均主义的论证。在E点,收入被平等地分配给两个代理人,这仅仅是一个图解。这种论证是一般性的。

两个经济学家对世界粮食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现在越来越明显,我们对最优增长战略的选择是失败的,这导致了通过增长来减少粮食短缺的悲观主义预测,并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直接关心福利的方法,其实这些方法似乎将对努力争取高速且具有广泛基础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Mellor and Johnston, 1984: 533)

还有另一种方法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来保证长期合同的执行,对共同利益的开发使用会导致无效率的后果。特别地,当资本家和工人们都能够影响消费品的分配时,投资率就会低于只有一个阶级得到所有(超出次优机会或基本生存的)利润的情况。这方面最早的论述见Lancaster(1973),也可参见Levhari and Mirman(1980)、Przeworski and Wallerstein(1982)。

为什么要把个人与社会相提并论呢？难道社会的选择与竞争中的个人的选择不是一样的吗？认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观点的根源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个人既是市场代理人又是公民。他们作为公民所偏好的资源配置方式，与他们通过市场所获得的资源配置方式通常是不一致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稀缺资源为私人所有的体制。然而，在资本主义下，财产权从制度上区别于权力。其导致的结果是，资源分配存在两种机制，而且这两种机制被用于在家庭间分配福利，其中一个机制是市场，另一个是国家。在市场机制下个人以自己拥有的资源投票参与分配，这种分配总是不平等的；国家则是另一种制度，它分配不属于自己的，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分配方式不同于市场结果。只有在很幸运的情况下，这两种机制才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111

政治领域的民主，使人们影响资源配置的权力平等化，从而加剧了这种分歧。事实上，由市场形成的消费品分配，和按公民们集体偏好而定的分配一定是不同的，因为民主为穷人、被压迫者，以及其他由于生产资源的初始分配而陷于不幸的人们提供了通过国家来寻求补救的机会。

因此，如果 19 世纪单数意义上的“人民”是最高统治者，他宁愿选择不同于市场结果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分配方式。但是，这种偏好在生产资源私有以及分权方式下都是无法实现的。即使个人作为公民表达了他们对某种资源配置的集体偏好，而且具备实现这种偏好的所有物质条件，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民主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无法实现的。

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批评，是否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对资源进行的理性配置就能够达到图 3.1 中的外部可能边界呢？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达到一种既能充分发挥生产的潜力，

这种关于资本主义不合理性的观点受到两方面的批评：第一，Alessandro Pizzorno(在个人通讯中)指出，根据这种定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不合理，而是资本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结合不合理。第二，这种观点在社会选择问题的攻击面前是无力的。根据 Joshua Cohen 对我的定义的重述，如果一个经济制度“阻止人们进行一种资源配置，而这种配置方式又属于可能赢得平等的公民赞同的配置方案集合”，那它就是不合理的(个人通讯)。然而，后者这类配置方案可能并不存在，也可能不是集体最优的(根据 McKelvey 定理)。换句话说，如果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被定义为生产潜力的全面发挥和利用，那它就不一定是主权公民的集体偏好；如果它被定义为集体的偏好并得到执行，那它就不一定包括对生产潜力的充分利用。

对此，我的回答有如下两条：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宪法上人们要求国家的自我约束，但国家无权配置私人拥有的资源，即使是间接地(通过税收和法令等手段)影响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国家的法令，也就无法组织竞争，因此，资本主义的蓝图包含了国家采取不同于竞争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可能性。第二，即使人们可能不选择充分发挥生产潜力，人们毕竟可以作出这样的选择，而如果人们作了这样的选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将无法实现这种偏好。

又能实现福利的平均分配吗？即我们能够达到 E 点吗？我认为，所有社会主义批评家们都不会否认这种可能性。如果人们真实地展示自己的需要和生产潜力，如果他们竭尽全力地工作而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如果计划者们都能像完美的代理人那样行动，并且能解决最优配置的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就能实现它的拥护者所说的各种完美的结果。但这也就是说，对社会主义的合理批评，并不是针对它的蓝图，而是针对这种蓝图的可行性及其在现实中的体现。 112

二、可行性

关于可行性的辩论更加热烈，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设定各种预设是正确的，关于蓝图的讨论只是逻辑上的推理。而对于可行性的评判则需要判断。因此，这种问题的讨论空间更为广阔。

社会主义者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蓝图可行性的攻击有以下三点：(1) 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资本主义；(2) 资本主义无法达到它的支持者所宣扬的符合各种优点的均衡，即使能够达到，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3) 由于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垄断，所以它将自我消亡。对于第一点，前面讨论过，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又如何呢？”；第二点似乎是成立的，市场永久地存在于竞争性平衡的观点是难以理解的，而调整则导致浪费的观点很有道理；最后，对竞争性的市场将导致自我消亡的观点，显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具体的程度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我对这些意见的回答是在敷衍，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由于它们与我们的中心问题之间的关系不大。如果资本主义的蓝图是不可行的，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兑现它的承诺。但是，我认为，社会主义者对资 113

或者，如果我们设计出这样一种制度，它能够通过非集权的方式来实现 Roemer(1989a 和 b)提出的公有制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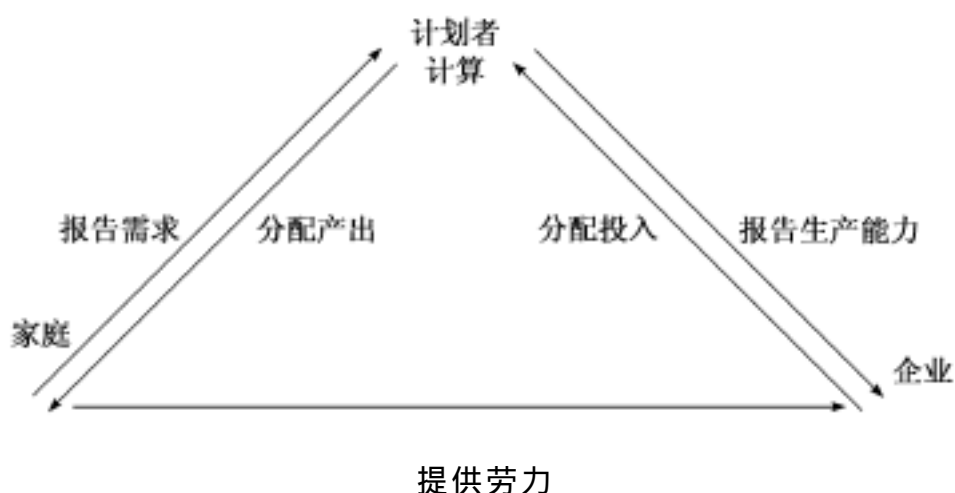
对此，恩格斯有另外一种论述：现在，资本主义下的大多数决定是在企业内部决策的，而不是由市场决策的，而且，这种企业内部的决策过程与社会主义的计划配置过程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在规模上不完全而已。因此，资本主义在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化”，剩下的就是要完成这个过程。曼德(Ernest Mandel)关于社会主义的中心论证如下：资本主义自身的不可行性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几期《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Mandel, 1986、Nove, 1987、Mandel, 1988、Auerbach, Desai and Shamsavari, 1988、Elson, 1988。

我的观点是，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决策不同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其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内部组织的不同。诚然，20 世纪 70 年代，波兰的经济规模与通用汽车相当，但通用汽车采用市场价格进行决策，并且根据需要解雇工人，而波兰并非如此。

本主义的批评是直指资本主义蓝图,即它最理想的实现。即使资本主义完全发挥它所有的潜力,社会主义者也将拒绝接受资本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中,认为永久的竞争性均衡不可行的观点只居于次要的地位。

关于可行性的争论反过来对社会主义也具有杀伤力。首先我要重述一遍社会主义蓝图。

家庭有各种需要。企业有能力生产满足需要的产品。计划者了解家庭的各种需要以及企业的生产能力。为了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尽可能地满足各种需要,计划者计算着如何在企业间配置资源以及如何的家庭间分配产品(图 3.2)。其结果是通过物品的合理管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批评分为两类:(1)即使计划者掌握了完全真实的信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计划者也无从下手去处理;(2)如果人是自私的,那么计划者就不能了解家庭真实的需要以及企业真实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计划者的行为也不仅是为了促进集体的福利。

关于社会主义计算(calculation)的争论由来已久,这里不予概述。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认为计划者们将被这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所击败,但

假设资本主义按照希尔弗丁(Hilferding)的方式成为“组织化的(organized)”并成功地避免了周期性的危机,那么就不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即没有静态的无效率。但是,动态的效率只有当福利分配每次都与资源的最初分配保持一致时才能够实现,即任何改变消费品和闲暇分配的尝试都会导致失败。因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所预设的任何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还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在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中,静态的浪费并不是很重要,但我对这一点没有确切的把握。

这个观点在他们各自的架构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即使计划者这一问题原则上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几年前苏联的经济学家们曾经设想,在改革的价格体系下,1500~2000种基本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确定,另外20000~30000种产品的价格由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其他产品的价格由供应商和用户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来决定(Petrakov和Yassine,1988)。即使是利用朗日(Lange)的市场上短暂的供需平衡公式和计算机来计算,我们也很难想像如何正确确定如此多的价格。

即使是计划者能够解决计算问题,社会主义可行性的关键还要依赖于如下假设,即假设所有的个体——家庭、企业和计划者——成为生产财富的共同拥有者,他们都将自觉地采取行动来增进整体的福利。具体地说,即家庭如实地向计划者报告他们的需要,企业如实地报告生产能力,计划者是公众利益全心全意的代理人。 115

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这些假设没有一条得到实现。这样的论述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中制定经济政策

在泰勒—兰格—伦纳(Taylor-Lange-Lerner)的模型中,计划者可以从任意随机的价格体系开始,观察哪些市场是非纯粹的,修正价格体系,并达到均衡。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按照新古典学派的观点,存在一种纯粹市场的价格体系,而且市场渐近于这种价格体系。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只有在不合理或非常特殊的假定下,暂时供需平衡才能导致均衡。奥地利学派认为,价格运动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交换实际上已经完成。因此,计划者永远不可能将使价格发生变化的所有知识都集中起来。至少哈耶克(Hayek)的追随者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声称朗日误解了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关于奥地利学派的这些观点,参见Lavoie,1985、Kirzner,1988、Shapiro,1989。

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我并不确定如何才能解决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可行性问题的争议。例如,诺维(Nove,1983:105)认为:“把当前通行的生产—供给计划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数学化’并由此保证中央计划体制运作具有更高的效率,这是不可思议的。”他强调,无论在技术上多么先进的计划体制,都无法应付多样性。然而,我有这样一个疑问,难道苏联的经济比全球航空订票系统还要复杂吗?

这里我故意用不可知论的语言来阐述这个假设。用标准的表达方式来阐述,即是说个人都成为爱他主义者,他们以团结的精神指导行动,或者是相互合作。然而,如果我们在“利他主义”中看到一种功利功能,这种利他主义以其他人的消费或福利作为自己的论证,那么就会产生各种策略问题。见Collard(1978)。事实上,利他主义者是否会真实全面地袒露自己的偏好呢,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团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中,个人如何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有助于团结呢?如果我提供原材料的工厂的管理者要求我从其他工厂的原材料中挪用一些给他,否则他就无法完成计划,那么我应该这样做吗?“合作”是一个混乱的术语。在博弈理论中,合作有时意味着交流,有时意味着外力强制执行,有时意味着联合,有时又意味着共同选择战略,在“囚徒困境”中,合作意味着任何支持帕累托最优结果的策略。在日常用语中,合作的意思就是“帮个忙”,即互相帮助。

的非民主性抵消了社会所有制的概念。但是,社会所有制的概念显然忽略了“搭便车”(free rider)的问题。在苏联所谓的“全体人民的财产(国家财产),社会财产的主要所有形式”,其实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布滕库(Butenko, 1988: ch. 5)在他开创性的分析中指出,个人直接生产者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而仅凭他作为公共财产管理组织的成员资格成为公共所有者。根据这个事实,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对个人而言,自己偷自己的东西(公有财产)是合理的,因为个人占有的部分(否则就不成为个人的东西)大于集体损失中个人所占的那一份;第二,我们回顾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的一段分析,布滕库指出,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并不是生产工具社会化的充分条件,因为个人作为共同生产者的角色与其作为共同所有者的角色关系,涉及到整个经济和政治制度领域。

首先,当个人成为生产工具和财富的公共拥有者后,如果他们仍然是自私的,家庭就会夸大地报告他们的需要。诚然,计划者就不需要依赖公众的偏好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分配。在贫困的国家,任何人都清楚他们急需什么,计划者可以根据需要的理论来决策他们首先要保证每个人至少多少热量的消费品,然后是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需要。当然,计划者也可以组织对一些家庭的不记名调查,然后再根据调查结果来制订计划。这是原始的、直观的制订物质生产计划的方法。然而,一旦需要变得复杂多样时,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如果计划者根据公众报告的偏好进行决策,家庭就会出现假报的动机。 116

其次,企业也有强烈的动机隐瞒它们的生产能力。如果对企业的奖惩依赖于它们对计划者下达计划的完成情况,因为外在的偶然事件可能会影响企业生产能力的完全发挥,因此企业就需要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外在因素

当布哈林(Bukharin)1928年9月30日在《真理报》(Pravda)发表文章批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作出决定:“类似这样问题首先应该在党的领导的小范围内讨论。”(Wilk 1988: 78—79)

我们不知道,如果计划过程是民主的,个人是否如实地公开了他们的偏好和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波兰,中央计划委员会起草的一份计划曾经拿给社会各阶层讨论,一直到工厂的小组,有几百万人参加了讨论。这次大规模讨论得出的总产出高于原来的计划,但消费品在国家总产出所占有的份额也高于原来的计划。大部分修正意见是合理的,诸如:工人们表示,如果他们所需要的供给能够得到保证,他们可以生产出比原计划要求更多的产品。党却决定将这些修正计划的参数搁置,因为党认为投资份额不足。据我所知,类似的试验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参见 Ostrowski and Przeworski, 1965。

Roemer(1989b)对此作了非常清楚的阐述。

的影响。如果企业了解计划者将依据它们过去的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来分派任务,那么它们就会故意不努力工作。

再次,个人将逃避生产。最后,如果计划者是自私的,而且没有竞争,他们的行为就会官僚化。就像诺维(Nove)最喜欢引用的那句托洛茨基(Trotsky)的话:“他们在分配东西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自己。”

在赫尔维茨(Huiwicz, 1973)那篇带有创见性的文章之后,曾有一些人试图创造一种即使在人们自私且知识私有的条件下,也能为计划者提供真实信息的机制。然而所有这些机制要么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实践,要么就是违反了预设的前提。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主义可行性的争论都依赖于下面的假设:即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使个人接受社会主义者的偏好。这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由于集体所有制确实会产生“搭便车”(free-rider)问题,所以改变人们的偏好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惟一可用于实践的使人们能够互相交流关于他们的需要、生产能力信息的机制是价格机制,而这种机制只有在个人以物质利益的形式,体验到自己所作决定的结果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 117

当然,有人可以说,从关于“最优的”(first-best)社会主义制度的判断中

我认为,这是反对社会主义最无力的一个论证。第一,我们拥有的不多的证据显示,在社会主义下,工人们如果不是比资本主义下的工人们更努力地工作的话,至少也是一样的努力。第二,对于在资本主义下工人们为什么会努力工作,我们还远未得出一致的意见。

人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制度,各政党提出相互竞争的计划并按照民主的过程决定计划(Castoriadis, 1979)。例如,在竞选中提出自己的时间偏好率(或投资率),那种符合中间偏好的纲领将胜出,然后再由获胜的政党将这个计划具体化。这种方案遇到的困难与所有竞选纲领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即只有最初级的计划才能被公众理解,社会选择的各种问题将无法避免。诺维(Nove, 1983: 179)讨论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他指出:“计划过程的‘民主化’是无法设计的,除非我们真的愿意就如何分配100吨钢、1000米布或者是电子邮件等问题进行投票。”Beck(1978)的研究表明,如果允许次优计划列入日程,关于时间偏好的社会选择将发生循环。

我们可以借助博弈理论来定义机制这个概念。假设中央计划者寻求效用福利函数最大化。如果计划者了解所有家庭的效用函数和所有企业的生产函数,那么计划者问题的解答将是最终消费品和闲暇的向量 $y^*(x)$,其中 x 是投入的向量。如果当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信息都是私人性质的时候,经济机制构成一个分散的博弈游戏,其解是配置 $y^*(x)$,则这个机制就是实现计划者目标的解。

John Roemer认为,这种实施理论的假定和悲观主义的结论都太过分了,因为这种理论假设计划者对什么都一无所知。事实上,计划者们不需要知道个人的特点,他们只要知道个人特点的统计分布可能就足够了。然而,至今他还没有找到这样一种分权的机制,即一种在制度上具有可行性,同时又不违反他视为公有制的分权实施应有的理想特征的原则的机制。见他近期的几篇论文,尤其是《分权,两重性和最低限度的平等》(Decentralization, Duplicity, and Minimal Equity)(Roemer, 1989b)。

推断社会主义不可行是不合理的。假设家庭夸大自身的需要,企业隐瞒它们的生产能力,工人们时常逃避劳动,而且计划总是将自己的需要置于别人的需要之前,即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与蓝图存在很大的差距,但这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吗?

问题在于“次优的”(second-best)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计划者安排投入和发布指令以保证实现各项目标。但是,如果计划本身就有欠缺(某些企业得到的投入不足以完成他们的任务),或者发生了意外,又或者是某些企业偏离了计划,又或者某些企业发现没有得到必要的投入,这样,全部的计划就流产了。因此,用一定的物理量来表述的计划总是会被破坏的。而根据一定的指标来制订的计划也要求有计量标准,即价格。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事实上并不是计划经济的原因。他们能够运转,仅仅是因为最初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企业寻求必要的资金投入以及计划者试图重新控制资源配置过程的努力,使最初计划不断地被修正。计划过程成为

118

了一个计划者和企业间持续的博弈游戏。即使没有意外事件的发生和技术上的变化,这种博弈游戏也不能达到一种稳定的配置。计划者如果发现企业找到了逃避计划的途径,就会发出指令堵塞漏洞。而企业为了获得必要的投入,就会设法逃避计划者的控制。计划者发布更多的指令,企业又寻求新的途径,如此周而复始。因此,即使经济仍维持在原有的水平,计划体系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当达到特定点时,企业将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即使他们愿意也无法按照计划——指令及配置系统——行事的环境。

在计划者得到的信息不正确,而自身又是自私自利的,生产者们在逃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产出可能比资本主义任何福利分配形式下的产出更低。即社会主义的产出会低于资本主义可能的产出:我们不能生产足够的产品来养活每一个人。

三、现实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到底谁在实践中更为成功,我们不可

Asselain(1984:35)的评论:“苏联模式经济活动的主要失败都要归因于违反了集中计划模式的基本原则,即中央计划目标绝对优先的原则。”

见 Zaleski(1984)的大量经验证据。他的结论(p.615)是“一个前后一致的、完美无缺的、可以被划分成若干部分后在各个层次上予以实施的中央计划的存在,在现实意义上是一个神话。我们发现,在所有的指令性经济中,都存在无数的计划,而且这些计划都在不断地变化,它们都是在事后,即一切都准备就绪后才达到协调一致”。

见 Roland(1989)关于这种事后产生均衡作用的机制的论述。

能说清楚。在产量的统计过程中,不同国家的会计惯例和统计权数有差异,在资金利用方面的区别更是惊人的,它们各自的起点和比较优势大不相同,这就使得判断变得毫无意义。对各自的经济运行状况和物质福利的具体方面进行比较,产生的结论依赖于某一因素下的尺度和时间条件。我们甚至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有较高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制度在提供工作保障、平等和物质保障方面更加优越。一方面,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累积增长速度与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相上下。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苏联和东欧国家人们的收入也不平等,社会福利服务也不尽如人意。

考虑到这些证据并不能支持任何结论,哪怕是最不确定的结论,人们何以认定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着实使人费解。而且这种一致的范围十分广泛。在东欧国家的中央计划名声扫地的同时,生产资料国有化不再激励西方或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人们的被剥夺感十分严重,但这种痛苦的经验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专有的。令人惊讶的是,巴西人将贫穷视为不公正的结果,而波兰的被调查者们则将其归咎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

对这一困惑有人这样解释,他们认为现有的数字可能高估了社会主义的成就。社会主义国家的投入—产出结构是低效率的,他们每生产一个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1.8倍,所消耗的钢材则是后者的2倍多。类似不合理性的实例比比皆是,据说苏联农产品在运到消费市场之前有一半就已经被损失掉了;冬天孩子们在火车站堆积如山的等待运往农场的化肥堆上滑雪玩;捷克的商店里存放着价值等于两年多经济增长的、不要钱都没人要的商品;匈牙利工厂的产品库存量与投资的比例比西方国家高出5倍,如此等等。福利指标也同样地使人困惑:社会主义国家人均有更多的医生,较高的中学入学率和更多的房屋建筑,但与此同时,人们的平均

关于这种研究最新的观点和综合统计,见 Bideleux(1985)。

在苏联和匈牙利,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低一些,但可能与瑞典和日本的情况差不多。关于苏联的资料见 Bergson(1984),关于匈牙利的资料见 Kornai(1986),关于波兰的资料见 Wnuk-Lipinski(1989)。

一位苏联经济学家近期披露,苏联的劳动所得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该指标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与墨西哥、委内瑞拉相同。根据 Zaslavsky(1987—1988:35)引证的数据,苏联大约一半的银行存款来自仅占3%的账户。根据 *Le Nouvel Observateur*(15—21, 1989年6月, p.99)的一篇访谈,高级干部医院里每个病人每天的花费是111卢布,而普通医院的花费只有24卢布。值得注意的是,波兰和苏联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最近几年平均寿命下降的国家。

参见 Polacy, 88 提供的几张图表: *Dynamika konfliktu a szanse reform.*

寿命较低,死亡率较高,劳动生产率较低,住宅标准也较低。

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成就进行比较,最棘手的问题是比较标准。应该以哪些国家为参照来衡量苏联、波兰或中国的进步呢?赫鲁晓夫将英国作为赶超目标,但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又使多项比较将苏联与美国联在一起。今天,许多苏联和西方的观察家开始将苏联视为第三世界国家,然而东欧毕竟是欧洲,媒体每天都在展示发达的西方生活水准,去西方旅游的人们也经常提到他们的见闻。因此,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比较参照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比较是痛苦的和带有破坏性的。东德为什么不能像西德一样呢?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经济制度”。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落空的预期。斯大林主义完全是一种发展主义。我是在波兰长大的,当时,每一面墙上都画着图表,表中红色的箭头一直向上,象征着季诺维耶夫(Zinoviev)所说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将征服自然,并创造任何东西,诸如大坝、钢厂、摩天大楼等等,而且规模比资本主义还要宏大,它将带领社会进入理性与秩序的世界。但是,人们遭到了自然界的反击,如今欧洲最恶劣的生态灾难地区在捷克、东德、波兰交界地区。社会主义什么都要比资本主义大,其结果是犯了更大的错误:在乌克兰修建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后,由于土壤的盐碱化,导致每公顷的产量下降。众所周知,外界对军费开支情况的估计是很不可靠的,但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据从高估计,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超过美国8个百分点。按照资本产出率为1比4来计算,即相当于增长率相差2个百分点。不合理的事情如此普遍,人们被迫每天花大量的时间来处理它。

当然,有很多理由解释人们的主观感受与统计数字的背离。但最重要的问题是,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成功地消灭贫穷。另外,他们也都不能实现自身的持续增长。

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与南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经验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克服低增长和建立独立经济体系的尝试。东欧模式是一种模式,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由中央集权统一配置,物质生产行业部门采取一种自给自足的发展战略。资本主义常被称为“相互依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associated dependent capitalist development),实行财产私有,国家发挥积极主动的角色,并倾向用进口替代策略的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工业化。

这两种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成功的,而且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重

关于这个巨大的灌溉系统的资料,见 Zalyguine(1987)。

要的工业基础。从 1960 年到 1980 年,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以 5.2% 的速度增长,东欧国家的增长速度超过 6%。有些国家还出现过两位数的工业产出增长。

但是,目前令人困惑的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南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增长都发生了变化。在 1980 年到 1985 年间,拉丁美洲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0.0。根据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这三个国家提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此期间,这三个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1.0%。人均消费额在许多国家都下降了。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实现自身的持续增长。事实上,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面临的经济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现实并没有什么启发意义。在真实的世界中,人民在挨饿,而我们的生产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发展。

第四节 我们能够改革什么？

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行的,在现实世界中,人民在忍饥挨饿,我们得到的结论实在令人失望。即使我们所生活的经济制度还达不到 19 世纪乌托邦的水准,即使一些不合理和不公正的东西永远存在,也许人们的基本需要是能够得到普遍满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通过局部而又充分的改革后能够养活每一个人吗？

122

根据 Weffort(1989)提供的 CEPAL 数据,在 1977 年到 1983 年间,乌拉圭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16%,阿根廷下降 12%,智利下降 11%,巴西下降 9%。在 1978 年到 1985 年间,波兰的平均收入水平下降了 8%。在苏联,1985 年的房屋建筑总规模与 20 世纪 60 年代基本相同,而农业的平均产量自 1978 年以来一直没有增长。人口总死亡率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6.7%上升到 1985 年的 10.6%,同期的人口平均寿命从 70 岁下降到 68 岁,儿童死亡率也出现了上升(Agabengyan, 1988)。在 1973 年到 1984 年间,总体要素生产能力的年平均复合率,阿根廷下降了 1.58,巴西下降了 1.97,智利下降了 0.92,墨西哥下降了 0.64,苏联下降了 1.40(Maddison, 1989: 91)。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前后差不多的时间范围内,南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债务问题,但这一点好像并不充分。正如 Comisso(1989)在引证了一系列的经济错误时所指出的,“即使金融资本提供了绞索,还需要有人提供刽子手”。此外,我还没有看到过将债务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材料。Comisso 认为其症结在于对竞争的障碍,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由于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是由于国有企业占据了垄断地位。然而,这种类似的衰退同时发生,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共同的原因。

一、改革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已经是非常流行的现象。由于以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经济缺乏自动的自我修正机制,所以每当这种经济发生重大不良影响时,都要进行改革。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改革、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对计划的改革、对激励机制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常有的事。然而,现在我们普遍感觉到,局部的改革并不是有效的,其原因在于整个经济体制出了问题。

所有国家的改革目标大体相同:即让投资过程合理化,平衡消费市场。目标虽然相同,但各国的改革方法却有很大的差别。有些改革采取的是“完善”(perfect)现存的中央指令体制;而另一些改革则是引进市场机制。东德1963—1970年间的改革是前者的代表,而匈牙利1968年底的改革方向则是后者。

社会主义能够被改革吗?我们可以讨论最近苏联为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作的努力,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引进企业财务自负盈亏的制度,但不是市场机制。在一份纲领性的文件中,改革的设计者阿巴尔金(Leonid Abalkin, 1988:44, 47)拒绝所有“与公有制不相容的,即一切会引起危机、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以及失业和社会阶级分化的”的经济机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中,价格机制的作用不同于与资本主义,“它变成了经济管理中计划机制的一种工具”。有两个对此改革方案作详细论证的经济学家,论述了如何才能把“整合价格政策纳入计划过程”,并将管理价格的责任分解到中央计划部门、中层官僚机构和供销者与消费者协会(Petrakov and Yassine, 1988:64)。

总之,这些改革将增强经济激励的作用,增加对投资的行政控制,重新调整部门的目标。这种混合性的改革在过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两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了它的失败:(1)当利润只不过是坐在一个房间里的官僚所决定的投入物品的价格与另一个房间里的官僚所决定的产出物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时,作为资源分配标准的利润率是毫无用处的;(2)要求恢复集中资源分配权的压力来自于下面,这是由于经理们只有通过上级的命

对这个观点的全面论述见 Staniszki (1984)。同样的推理见 Wiatr (1989)和 Abalkin (1989)。

Asselain(1984)对这种改革及其注定要失败的原因作了精彩的分析。也可参见 Nove (1983: ch 4)和 Kornai(1986)。

令才能获得必要的投入。因此,排斥市场机制的改革,不能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化,并且即使没有官僚的抵制,这种改革自然难免失败的命运。而那种部分地引入市场机制,将市场价格作为计划工具的观念,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恰如诺维在谈到兰格模型时指出的,如果没有一种使生产要素配置足以反映市场变化的机制,就不可能有最终产品的市场。这种机制或者是生产要素的市场,或者是一种由计划者猜测市场将要做什么的中央计划办公室。

所以,我认为,通过中央指令来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主义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二、市场社会主义

到目前为止,我的全部分析都是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为基础。这是因为我怀疑我们是否知道以下两点:(1)产权形式对企业的经营结果有绝对性影响;(2)我们所观察到的产权形式的分配状况,特别是少数雇员所有的合作体,因产权形式的不同,给企业带来了不同的经营结果。尽管市场社会主义的观念目前已经相当流行,但我们还没有一种企业理论来验证这种偏好。

首先是关于定义的问题。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在法律意义上仅禁止少数几种产权形式,并且依靠市场配置大部分资源的制度,那么,它与资本主义就是相同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保留着国家对一些企业的产权,不仅包括监狱和税收机构,而且通常还包括一些自然垄断的工业(那些具有增长的利润或在消费时会出现外部性因素的产业),有时还包括盐矿、火柴制造和酒的销售。事实上,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混合型”(mixed)经济:瑞典的公有成分占6%,而奥地利占50%以上。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非国家经营的部门中,合作制企业也是合法的。实际情况是,当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任何形式的企业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企业,都以资

124

一个波兰经理说:“我知道我们是独立的,但是由谁来告诉我们应该生产些什么产品呢?”(Roger Thurow,《波兰发现经济“改革”不一定产生结果》,载《华尔街日报》1986年2月27日)。

我不认为,计划者除了使生产工具的配置满足平衡消费市场的要求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目标。如果社会主义的公民通过民主机制投票选择的消费品配置不同于他们通过市场行为所要求的消费品配置,那么计划者就有理由为实现民主选择的目标而努力。但是,除非消费者的市场配置自身可以通过国家的间接干预发生改变,否则,当由市场分配消费品,而由计划者分配生产工具时,整个经济是不会平衡的。

关于近期的构建一种内在的企业理论的尝试,参见 Hansmann (1988)。

本的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出现。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所知甚少。

因此,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它必须在法律意义上倾向于工人所有制的合作社制度,正如诺维在的社会主义蓝图中所说明的那样。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由中央集中管理的国营公司处理邮政业务,国营企业制造汽车,小型私人企业经营餐馆,个体水管工人维修管道泄漏。资本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大型的私营企业经营邮电和汽车制造部门,而诺维的蓝图(Nove, 1983: 200; 也见 Putterman, 1986: 328)则禁止私营企业涉足这些领域,这些领域专属于合作制。

但是,应当由谁来确定哪些领域采取合作制产权形式,哪些领域采取资本主义产权形式呢? 埃尔斯特(Elster)指出,生产者分散选择的结果可能而且也往往产生不同于投票产生的结果。当有外部性因素存在时,人们可能投票选择愿意生活在合作制占 70% 的经济体制中,但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可能合作制只占 30%。依我看,这种情况表现出一种重要的两难困境:民主选择的可能是次优的,而过去自由分散决定的结果都是资本主义。 125

暂且不谈这些疑虑,人们经常以如下两个论证来说明合作制比资本主义企业更为优越:一是效率,即前者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前者有较好的分配制度。鉴于埃尔斯特不久前对第一点作了评述(1989; 也见 Elster and Moene, 1989; Putterman, 1986),我在此仅作一些简单评论。

首先,埃尔斯特正确地强调了外部条件的重要性:合作制企业的经营成效可能依赖于它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中,这

Leijonhufvud(1986)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由于机器比技术更专业化,因此联合资本与雇用劳动力的企业比联合劳动力与租用机器的企业更加有效率。“工人们不能像资本家联合资本那样地联合他们的劳动力。”他说(P. 219),“为了要租用机器,他们让由劳工管理的企业中的工人共同支付租金,劳动力将没有所有者,专门化的机器也不是供雇佣的。生产者合作社是一种可能的妥协形式,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那些开始由工人合伙开创的成功企业,最终也要拥有资本而雇佣劳动力,即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会化是工人们最好结局。

然而,Leijonhufvud 的观点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富人们是企业的所有者。对于为什么资本家应雇佣劳动力的大部分解释依赖于一种道义风险,即那些有钱的人之所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是因为如果他们仅仅把资本借给了直接生产者,这些生产者就会从事极为冒险的活动。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献很多,无法在这里讨论,据我所知,这方面最好的概括是崔之元(1990)。

感谢崔之元的评论和他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信息。

他的担心被最近对波兰的调查所证实。在波兰,有 72.2% 的被调查者支持国营企业的私有化,但 52.3% 的人更愿意在国营企业工作(Zycie Warszawy, 1990 年 6 月 25 日, P. 4)。

一点都是对的。在波兰和苏联,由于以中央指令配置资源制度的无效率,使合作制企业获得了惊人的和令人嫉妒的利润,利润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似的落到那些被允许追逐它的人的口袋里。如果合作制企业的经营成效依赖于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和私人公司的存在,那么最优的经济制度可能是一种混合型的。

其次,埃尔斯特和茅伊内(Elster and Moene, 1989: 27)认为,虽然经验研究一再表明,资本主义国家里为数很少的合作制企业,享有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理论讨论的结果往往认为合作制企业的影响是消极的”。在我看来,理论分析的结果依赖于以下两点:一是他们归之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过程的模式,二是他们希望作出关于相互监督的假定。如果人们假定,像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最近发表的论文中所做的一样,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竭尽全力工作的原因,是由于企业的监督(和失去工作的压力);再假定在工人合作制的企业中,人们的相互监督是平衡策略,从而会得出如下结论,即合作制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为在合作制企业中,工人们至少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一样努力工作,而企业节省了监督的开支。这曾经是关于生产工具社会化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微观理论。但是这两个假定几乎都被布拉韦(Burawoy, 1979)破坏了。根据下面观点:(1)在资本主义下工人事实上也互相监督。(2)如何组织生产过程主要是一个企业规模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布拉韦似乎认为,实际上资本主义企业根据与工人小组的谈判结果来确定人们集体工作的任务指标,并把工作转包给工人小组,然后由工人小组决定如何完成这些任务指标并实施监督。他对美国和匈牙利的比较似乎显示,企业规模的大小是组织生产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工人合作制的争论,除涉及到劳动生产率外,还涉及到对就业、投

然而,Bauer(1989)指出,由于担心在政治上引起反应,在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系统中,私人企业家们在决定价格和能得到的收入时也不敢唯利是图。他们的担心是对的,波兰前经济部部长以及“第二阶段”经济改革的设计者 Wladyslaw Baka(1986: 130)警告说:“利用制度(即国家)的无效率而大发横财的行为将是不能容忍的。”

这个论断并不意味着它的反命题成立。一些混合型的体制可能会很复杂。

这里,我不能确定上下文中的“生产率”和“效率”是不是相同的含义。判断效率必须考虑到工人们从一些劳动(包括劳动监督)中得到的是负效应的事实。Bowles 和 Gintis 假设工人之间的互相监督是无代价的。

崔之元曾对我指出, Holmstrom(1982)的模型为 Burawoy 的观点提供了微观基础。在该模型中,报酬制度使得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共同承担旷工的全部代价。因此,就杜绝了旷工现象。

资、采纳技术革新的冲动以及风险意识等方面的影响。其中关于对就业影响的争论最大。早期曾经得出的结论认为,合作制导致不完全就业(它使平均利润而不是总利润最大化——Ward, 1957),但这种观点已经不能得到其他人的认同了。最近,茅伊内(Moene, 1989:87, 93)的一篇文章非常具有启发性,因为他不是将合作制企业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比较,而是正确地将合作制企业与具有强大的工会组织的企业进行比较。他比较的结论如下:(1)“资本主义企业倾向于拥有固定的工资和变动的就业,而合作制企业倾向于固定的就业和变动的收入”;(2)“在劳动力工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主要问题是投资不足”。一般而言,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得出的结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即有关合作企业成员和金融管理的原则。

考虑到合作制企业的种种不确定性,埃尔斯特(1989:110)根据效率原则得出下述的结论:“我们没有理由试验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有许多改革即使导致小企业中运转不良,但在大企业中却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社会不能仅仅根据可能性就去试验它们。”可是,他紧接着又信口开河,宣称他主张试验,因为“主张合作制度的其本论证也就是在主张经济正义”。

我刻意回避了正义这个题目,这是因为我认为,同意养活每一个人比同意为什么好要容易。一些人根据的是康德的正义原则(“我可能是穷人中的一员”)希望根除贫穷;而另一些人则仅仅是出于同情。可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不合理而且也不公正,与此相反,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体现每个人对他(她)们全部劳动成果的权利,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关于分配的思考曾经是将人们推向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直到现在,在许多国家里也还是这样。对资本主义分配形式下工薪阶级所付出的成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这样一种方法,即要看资本家的消费在净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净产值都可以被分成以下几个部分:工薪阶级的消费、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其中最后一部分是工薪阶层永远失掉的,这就是工薪阶层为生产工具私人所有制所付出的成本。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种成本的区别是巨大的。1985年,在制造业每一美元的附加价值中,资本家的消费所占的比例在奥地利和挪威是10美分,而英国和美国是接近40美分,巴西大约是60美分,阿根廷则高达70

美分。因此, 仅从分配的观点来看, 奥地利和挪威的工薪阶级几乎没有从国有化或社会化中得到什么利益。由于国有化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对他们来说, 依靠他们的市场力量和选举的影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在英国和美国, 工人们通过迫使投资方缩减利润或者是直接占有生产工具的手段得到了较多的利益, 但其结果是他们罢工的次数较多。而巴西和阿根廷, 国有化对分配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如果巴西实行社会主义, 如果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差距被限制在五位数以内, 那么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就可以增加 10 倍。由此可见, 在阿根廷和巴西, 仅从分配的原因来分析, 国有化对工薪阶层就很有吸引力。

然而, 矛盾在于那些在政治上有力量通过立法来实现社会主义某些形式的工人阶级运动对此没有兴趣; 而那些通过把生产财富转移到整个公共领域而获得动力的运动, 却又没有力量实现这一目标。所以, 以把生产财富的公有化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 只是那些无力实现它的政治运动的纲领。

最后, 从分配的角度来看, 市场社会主义的确有吸引力。即使我们不能准确地预见它对就业、投资以及劳动生产力的影响, 从均衡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 合作制与市场的结合比资本主义要优越。如果我们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作是一种存在劳动力加资本 (labor-cum-capital) 市场的制度, 即如果合作制企业的股份持有者自动地具有该企业中工作的权利和义务, 而同时这种权利和义务又是可以进行交易和交换的话, 那么, 在均衡条件下, 整个经济中总体生产能力的回报率是一致的。对与这种均衡条件相联系的收入分配将比起资本主义就要更加平均, 因为雇员们从企业中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净收益。

现在再来看一下将市场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工业民主制度, 即生产过程

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仅仅是制造行业的。这些数据是近似值, 它们是通过从 100% 中减去劳动力所得的份额和投资部分后得出的, 其中, 投资部分所占的比重是由专家估计的, 专家估计, 在挪威和瑞典, 该比重为 50%, 阿根廷和巴西则为零。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来自财产和自主经营企业的收入, 并不是那些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在美国, 大约占 17.3%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35.9%), 在加拿大是 16.3%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33.2%), 在英国是 7.5%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31.9%), 在瑞典是 4.8%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27.1%), 在挪威 (大部分来自自主经营企业) 是 22.4% (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30.3%)。数据来自 Rainwater, Torrey and Smeeding, 1989。

然而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 可能会得出反对这种制度的结论。如 Camisso (1989) 指出: “多种形式的财产所有制, 对于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合理管理都是关键性的。”她还指出, 将获得剩余收入的权力与雇工联系在一起, 会排斥把资金投资到海外。

将民主地进行的观点,它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工人所有的企业相互竞争,如果有一种组织生产的方法能使得利润最大化,那他们将被迫选择这种组织方法。如果能使利润最大化的组织方法不只有这一个,那么资本家们选择哪一种方法都无所谓,工人们偏好哪一种资本家就会采纳哪一种。因此,工人所有的合作制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将没有什么不同。

此外,在市场社会主义下,由于资源的利用依赖于回报率,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也不能实现技术上可行的福利分配,而这正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不合理性。即使生产工具为工人们共同所有,最终收入在合作制企业之间的分配,仍将依赖于各自的初始生产能力,企图重新分配收入的努力将引起产量的下降。

因此,市场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还是有矛盾的。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经济权的原则,并不足以保证生产民主或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也不是民主在经济领域的彻底贯彻。

三、社会民主

资本主义能够被改革吗?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功地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尽管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仍然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但是,在一个仍有几十亿人口承受着物质财富匮乏之苦的世界上,根除贫穷是成功的充分标准。即使在美国和苏联,也分别有3000万和4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更不用说中国、印度或巴西了。与这些国家相比,瑞典、挪威和法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确实令人羡慕。

资本主义经济是极为多样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收入分配和国家提供的物质福利保障等多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别。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比最贫穷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要高出20倍。出生在孟加拉或扎伊尔的人可能比西欧国家的人少活30年。在大部分南美国家,制造业工人拿回家的工资不足他所创造价值的20%,而荷兰

此外,O'Neill(1989:209—210)指出,“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者们并没有回答合作的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协作问题并不能通过将私有企业转变为工人合作制企业的方式得到解决。企业内部的合作并不蕴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会产生企业间的合作”。

持反对观点的有Dahl(1985)、Bowles和Gintis(1986)。

对这种观点的批评见Przeworski,1985。

这里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常规方法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数字要高出75倍。

和奥地利的工人们则可以拿回差不多 60%。在巴西和秘鲁,最富有的 20% 130 家庭中的个人收入水平是最贫穷的 20% 家庭中个人收入的 30 倍;但在一些西欧国家和日本,这种差距不超过 5 倍。最后,在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中央政府在房屋消费、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方面的开支占不到 2%,而西班牙、瑞士、瑞典和西德则占到一半以上。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资本主义意味着绝对的贫穷,而对于另一些人,资本主义则创造了富裕。

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些已经根除了贫穷的国家,它们都是富裕国家,它们都有比较平等的工薪收入分配制度和发达的福利制度。人们可以见到几种强有力的方式以及众多的未为可知的好的制度。(1)仅有的几个没有穷人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2)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分析一再显示,较好的经济成就、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以及有较广泛的福利服务等现象,都是出现在强大的工会组织同政府社会民主控制相结合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见 Bruno and Sachs, 1985; Lange and Garrett, 1985; Hicks, 1988)。(3)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能够解释经济的发展。(4)政治领域的民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不清楚。(5)那种认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仅仅是因为他们剥削了其他国家才获得发展的观点,看来是缺乏经验根据的。

显然,即便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富裕不是剥削南美贫穷国家的结果,资 131 本主义在瑞典已经被成功改革这个事实也并不意味着秘鲁的资本主义就能够被成功地改革。但是,在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被改革了,而且养活了每一个人。这又是如何可能办到的呢?

社会民主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工具的国有化并不必然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也就是说,国有化并不是避免因生产工具私有制而必定产生的福

这些资料来自世界银行 1987 年的《发展报告》(磁盘版)。除家庭收入分配外,其余都是 1985 年的数据。

在我们能够得到数据的国家中,纳税和转让之前的绝对贫困率(按照美国的定义,并按一定的购买力平价交换率折算为当地货币),瑞典是 5.6%,瑞士是 5.8%,加拿大是 7.4%,西德是 8.3%,英国是 11.8%,美国是 12.7%,澳大利亚是 13.2%(Rainwater et al, 1989)。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还缺乏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率的数据。Matthews(1986)提供的证据表明,匈牙利、波兰、苏联的贫困现象并不少见,但我们很难找到东德的数据。

根据我的理解,提出一种既能合理地假设技术和工艺的进步,又能解释国家之间固有的差别的理论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至少有一个因素变动的时候,常数系数法可以导出一个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的结论;凹面法可以导出这些国家间的差距将消失的结论;特殊资源回报率的增长与证据不一致。因此,Lucas(1988)最终相信,增长的回报率来自人力资本中外在的因素。例如,一些人在与其他受过较好教育的合作者一起工作时,会变得更有生产效率;或者是某些程序由于与其他有效的程序一起被采用而变得更加有效率。

利损失的必要条件。这个前提既与我们在前面重述过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相矛盾,也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相矛盾。根据这些观点,任何企图重新分配收入的做法都会引起“两败俱伤”的损失,即从生产使用过程中撤回投入的资源。对工薪收入的征税将引起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而对利润征税又会导致积蓄和投资的下降。另一方面,财产转让将引起闲暇时间的贬值,并导致穷人较少地去工作,从而加剧了征税的恶果。然而,这种观点听起来虽有道理,但它们却经不起实际经验分析的推敲。至少在现在规定的税率范围内,成年男人的劳动力供给、积蓄与投资的比率,对于税收变动并不十分敏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而大多数人要么必须全时间工作,要么完全没有工作可做。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不同的税收和财产转让形式,可能给人们在决定如何使用其生产资源时带来不同的影响。至少从理论的角度,对潜在收入和源于利润的消费征税,不影响劳动力供给与投资。而且,即使完全中性的税收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税收和财产转让政策的不同组合,确实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引起两败俱伤的损失(Becker, 1976)。有强大的工会组织而且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不仅在处理劳动者分享社会成果的份额与投资的矛盾上有较出色的表现,而且在处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矛盾上也表现出了较好的平衡能力。

所以,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既想要根除贫穷又想要使效率损失最小的政府,并非是束手无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在理论上是成立的。132 政府可以鼓励技术革新;能够缓和经济的波动;能够引导投资;能够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便利条件;也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并维持人们的收入。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程度并不是既定不变的。选举出来的政府既有责任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物质福利保障,也有办法完成这个使命。

Przeworski(1990: ch .1)对下述观点进行了展开的阐述。

在近期关于证据的评论中,Saunders and Klau(1985)未能找到关于税收影响税基的明确证据。他们指出,“从现有的这些证据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估计,劳动力供给对税收的反应既不猛烈也不坚定”(p .166);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税收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p .174);“关于税收负担较重的国家一般具有较弱的储蓄倾向的观点得不到数据的支持”(p .177);最后,税收对投资的影响无法从总体上估计(p .185)。

关于政府能够采取适当的手段控制收入分配而在同时又不减少投资的观点,参见 Przeworski and Wallerstein(1988)。

第五节 我们能养活每一个人吗？

我们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效的，但社会主义者的替代方案却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两者都为人们提供了合理的次优选择。在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任何形式的私人产权都是被允许的，国家在管理市场和重新分配收入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大型企业的产权为工人所有或者是公共所有，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也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两种制度都能保证市场有效地运作，都能产生出合乎人道的福利分配。

我认为，在这两种制度中不好选择。如果将所有制理解为具有分享剩余收益的权力和决定如何配置资源的权力，那么，所有制对于效率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国家适当地组织和管理市场，保证企业的经理们——无论他们是私人企业，合作制企业，还是公有企业的经理——可以使利润最大化。如果国家选择适当的征税政策、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并维持收入，国家就能够保证每个人享有最低的福利保障。

诚然，保留市场会使社会主义者认为有害的特征也被保留下来。这些特征在下述的意义上仍然是不合理的，即社会为了保障每个人的生存必须付出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能力的代价。而且，它们还将带来相当大的不平等；事实上，保证效率的条件就是拥有较多生产要素的人得到较高的回报。由于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甚至是次优的选择，所以目前对中央计划幻想的破灭可能不妨碍我们继续寻求更好的替代方案，即一种在不损害效率的同时，又能使经济按照公民们通过民主程序表达的集体偏好运行的制度。 133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养活每一个人呢？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第一，使养活每一个人成为可能，需要假定哪些条件？第二，这些条件能够实现吗？为了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蓝图、它们的可行性以及它们历史上的具体体现。通过这些寻求，我们发现，对于上述两个问题，我们的答案要么没有提供充分条件，要么所提供的条件又是不可行的，它们均被排除在外。于是，还有研究余地的问题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下，尽管市场存在不合理性，我们是否能养活每一个人呢？

养活每一个人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极大的富裕”(strong abundance)，也就是说，生产力达到了充分发展的水平，即使在为满足全体需要而重新分配

收入时引起产出下降的情况下,也有能力保证普遍的生存。我假定,在一个世界市场经济中,关于使用生产资源的大部分决策是由私人作出并由收益率来决定的,这就意味着这些生产资源的所有者,无论是个人、合作制的、还是公共的组织,当由于过高的工资代价或是由于税收造成收益减少时,他们有权力从生产过程中撤出自己投入的资源。因此,与我们论题相关的生产力概念,并不能通过没有任何收入再分配时所达到的产量得到解释。这个产量可能足够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但是如果这些需要应该被满足,那么生产就达不到这个产量,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为了生产足够保证普遍生存的物资,我们可能需要更高的生产力。

然而,这种极大的富裕已经出现了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根据以下三条:第一,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的代价;第二,目前具有的生产技术和组织能力;第三,如果收益因收入再分配而减少,那么,生产力的不完全利用会到达什么程度?这已经涉及到了太多的技术问题,老实说,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们距离这个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时代已经不太远了。

由此可见,即使是市场经济仍然保留了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在极大富裕的条件下,受公众委托的政府仍然有能力根除贫穷,让每一个人的基本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同时也能够选择适当的政策使两败俱伤的损失达到最小。因此,人们所需要的只是国家组织有效率的市场,向那些交得起税的人征税,并利用这些税收来保证每个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然而,不知为什么,世界上几乎还没有哪个国家成功地完成这个简单的任务。

这个回答与 Van der Veen and Van Parijs(1986)的观点相近。事实上,下面的观点是建立在我早些时候对他们提出的观点的批评基础上的 Przeworski(1986),尽管那时我认为养活每一个人所必要的富裕水平勿需太高。事实上,如果所有的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我们所需要的就会超过满足每个人基本需要的发展水平,即超过低水平的富裕,从而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

第一节 导 论

近年来在全球诸多国家兴起的经济改革,其目标就是要组织一种能够合理地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同时也使得国家拥有财政支付能力。为了使资源配置合理化,作为市场化取向的这些改革,都需要组织新的市场、开放价格、减少垄断、降低贸易保护。为了使国家具有财政支付能力,必然要减少政府开支,增加税收,有时甚至还得卖掉一些公共财产。

这些经济改革必然会引起社会消费总量的暂时下降,注定要付出社会代价和承担政治风险。所以从长期的观点看,经济改革的任务也许能够完成像波兰前经济部长所宣称的那样:激发和创造一个真正的市场,满足社会公正的要求(Baka, 1986:46)。然而,这些改革同时也会伤害一些较大的社会群体,激起一些重要政治势力的反对。如果真的如此,要么民主政治就可能遭致破坏,要么这些改革就可能被放弃,甚至会两者同时出现。

虽然发动经济改革的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些现实,暂时的经济恶化也是难以避免的。开放价格后必然爆发通货膨胀,竞争加剧必然会增加失业、导致资本闲置。在整个经济结构转型期间,资源配置效率必然会暂时下降。经济体制的结构转型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这种转变就能够完成吗? 民主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涉及到转型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即使改革后的经济体制呈现一种更有效率的新稳定状态,即使它比起现状而言是帕累托最优,即在新体制下没有

136

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实际上是不能完成这种转变的。Remmer(1986)提出的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Standby Agreements)的成功率虽然不够高,但在1954到1984年间的拉美,它在民主国家比在专制国家稍高一些。Haggard(1986)观察了30个长期贷款项目后发现,由于民主国家(除了印度的特殊情况外)的违约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断过或取消了贷款,不过在他观察的温和专制国家中,成功率也没有什么两样。Stallings and Kaufman(1989)在他们对九个拉美国家的分析中发现,确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与那些专制国家在稳定经济方面的成绩旗鼓相当,但只有后者在稳定经济之外,还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个人过得比以前更坏,而同时有一些人过得比以前好,但只要转型过程中物质生活条件出现暂时恶化,就足以破坏民主政治或经济改革过程。

让我们看一下图 4.1,纵轴表示一个人预期享受的福利(消费量),横轴表示时间,在当前消费状况 S 左右两边的时间度量值是相等的。过 S 点的下降曲线表示在不久的将来出现的福利变化,而两个峰值代表经济体制稳定时的福利水平。假定右方的峰值比左方的峰值高,但是现状位于左侧的斜坡上。这时,向右移动引起生活暂时的恶化,这种恶化贯穿整个过渡时期。我们在爬上较高的峰值之前必须穿过“转型之谷”(valley of trans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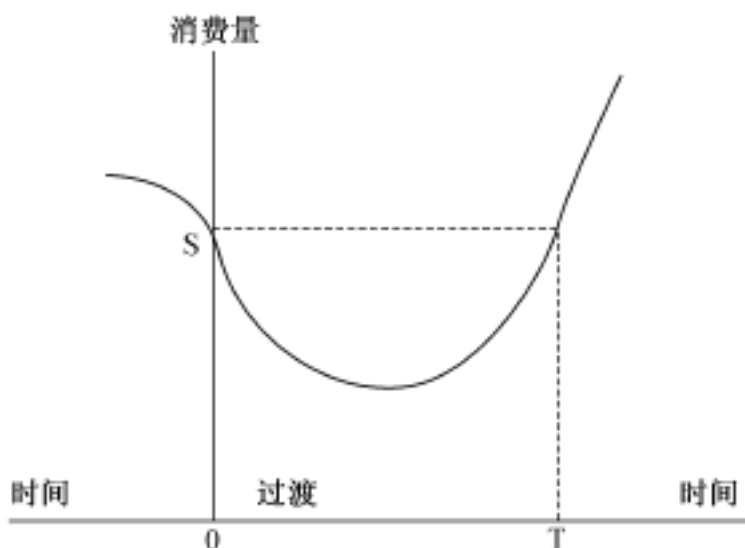


图 4.1

南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都在新生的民主政治制度下进行着经济结构性转型。在此种情况下可能有四种结局:

- (1) 经济改革可能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推进;
- (2) 经济改革可能由一个专制政府强制推进;
- (3) 经济改革被放弃但民主幸存下来;
- (4) 经济改革和民主政治都遭到了破坏。

在智利和墨西哥,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由权威主义政府发起的,而在苏联,一些经济学家制定了一个“从极权主义起,经由权威主义”向市场经济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改革是对长期经济危机的反应。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拉美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出现了下降。因此,现状左方的消费曲线可能是下降的;停留在当前的体制下,就意味着消费还要继续恶化下去,也没有在将来发生变化的希望。但是要避免继续恶化就必须忍受过渡时期的痛苦。

过渡的纲领(Migranyan, 1988)。这样,在各种不满能够通过投票得到政治表达的民主条件下,甚至是最有希望的经济改革策略也可能被放弃。政治家关心选民对自己的支持,就要改变那种会使他们在选举中败北的政策,否则就会输给那些与结构性转变的政治性后果更协调的竞选者。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带有浓厚的平民主义(populist)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色彩的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能被动员起来反对民主和改革。

那么,在民主政治条件下,经济结构的转变是能够持续下去还是两者必须有一个被牺牲掉呢?这是一个具有三重含义的问题:

- (1) 这种结构性转变的经济代价是什么?
- (2) 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人民最可能忍受这种代价?
- (3) 这种结构性转变对于民主制度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几个问题分别地构成了下面三节讨论的问题。

我们将以拉丁美洲的经济为根据,来分析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于我们一方面只能依靠经济理论提供给我们知识,另一方面只能利用我们目前所具有的贫乏的历史经验来作自己的分析,而这两方面的资料又都不是很有用的:我们没有关于结构性转变的理论,而经验的资料又很少,所以这种分析充其量只是推测性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投身于未知世界、具有风险性的历史性试验。它源自于绝望,受希望而不是受合理的利益所驱动。 138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过渡性代价

这一节的目的是依靠拉丁美洲的经验,分析东欧国家改革的经济代价。首先我们比较这两大洲新型民主政府所面临的各种条件,随后在余下的两节分别地研究改革的累积代价和分配代价。

条件和策略

研究指令性经济的专家们一般认为,东欧国家改革中出现的困难比起那些不发达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的困难要更为沉重。布鲁斯特(Bruszt, 1989: 716)详细阐述过这种代表性观点:“人们常常把东欧现在的变化与在南美和南欧曾经发生的民主化过程相比较。尽管说两者有着明显的相似点,但是东欧变化中有一个根本不同于后二者的地方……那就是,在这些国家,向政治民主的转变过程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政治转

变和经济变革的问题是不能相互分离的。经济上不断增加的压力将对政治转变的过程形成越来越直接的威胁。”

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我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变革是激进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无疑是激进的。在拉丁美洲,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努力,经济上的压力同样形成了对民主政治的威胁。波兰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写着“梅内姆(Menem)喜欢巴赛罗维茨(Balcerowicz)”,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

只要看一下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指数,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拉美国家的形势一点也不比东欧国家轻松。即使在拉美加上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在东欧则加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么这幅图景也不会改变。除了智利,拉美各国的民主政府都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上任的。在东欧,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其余国家也大抵如此。但是,至少如宏观经济指数所显示的,拉丁美洲的形势要更加严峻一些(表 4.1)。

也许有人会持相反的看法,说这些指标不能说明各自经济的真实状况。东欧的经济状况实际上也许要更糟一些,但他们的危机还没有显现出来。或者,是由于在出现新增长之前他们有更长的路要走。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现在的危机没有拉丁美洲国家那么严重,但他们的经济结构更加难以转变,所以他们的状况更为糟糕。在拉丁美洲,增长的危机是与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同时发生,并可归因于后者;而在东欧,危机则是经济制度引起的结构性现象。可见,拉丁美洲的改革顶多只是一种“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而在东欧,他们需要从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转型,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让我们来看一看表 4.1 的背后,我们究竟能够看到什么。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都有下述现象:

- (1) 国家受到来自大企业的压力;
- (2) 高度的垄断和保护主义;

见华沙 1989 年 12 月 13 日的 Gazeta, p.6。梅内姆(Carlos Menem)是在 1989 年大选中上台的阿根廷总统。巴赛维茨(Leszek Balcerowicz)是波兰(Mazowiecki)政府的经济沙皇。

东欧人总能找到可怕的事物支持他们的看法。但是不妨看看这一段:“关于下述的这些国家,每个人都有可怕的故事:在这些国家,经补贴的汽油比饮用水还便宜,经补贴的面包价格低得被用来喂猪,打电话仅花一分钱左右,因为某个人忘了(或是不敢)提价以与通货膨胀保持一致,政府向有势力的地主发放有补贴的‘农业贷款’,以求得他们的支持,但这些地主一得到贷款马上就用来购买政府债券。”(Williamson, 1990: 11)在上述例子中,只有最后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发生在拉美。

表 4-1 民主化期间的经济条件

经济指数	乌拉圭	智利	巴西	阿根廷	波兰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1984	1989	1983	1983	1989	1989	1989
平均 GNP ^a	2,710	2,370	1,590	1,650	1,520	2,210	—
△GDP(%)	-3.9	10.5	-1.3	2.6	0.5	0.8	3.0
△3GDP(%)	-24.8	26.4	-9.1	-13.3	11.1	4.8	8.0
通货膨胀(%)	66.1	21.1	179.2	433.7	180	17	0.2
平均债务(\$) ^b	1,128	1,539	750	1,556	1,112	1,656	—
债务/支出(%)	520	—	—	485	540	293	87
劳务/支出(%)	65	27.2	28.8	24.5	76	32	16
政府支出/GNP(%)	18.8	33.4	23.2	26.8	40.4	58.3	—
公共支出/GNP(%)	-5.6	0	-4.3	-1.4	-1.8	-3.6	—
经常性账目结算/GNP	-2.7	1.3	-3.3	-3.8	-0.2	-1.4	-0.0
外汇储备 ^c	—	5.2	—	—	1.5	2.3	—
劳动力所占比重(%)	21.0	15.4	19	19.2	23.4	34.9	—
△W/时期(%)	-50/10	-28/5	—	-23/10	-10/7	—	—
失业率 ^d (%)	14.3	11.0	6.7	4.0	0.0	—	—
无期押款(%)	28.2	20.0	69.4	34.4	17.5	17.5	—
中学入学率(%)	70.0	74.0	35.0	65.0	80.0	70.0	—

注：大部分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统计表》(世界银行,1989)。△3GDP表示连续3年人均GNP的累积变化;△W/时期表示从最近高峰值下降后的平均工资值,时期则是指从高峰以来的年数。

^a按1980年美元汇价计算(按世界银行方式计算)。

^b以当前的美元汇价计算。

^c进口期间所有的外汇储备。

^d拉丁美洲所指的是城市区,而对波兰则是指对农业以外的所有部门。

- (3) 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
- (4) 软弱无力的征税体制;
- (5) 零散而不健全的收入维持和福利分配制度。

但是,在这两组国家之间,也有一些系统的不同方面:

(1) 在中央集权配置物质资源和管理价格的体制方面,东欧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为盛行;

(2) 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上,拉丁美洲国家是东欧国家不可比拟的。

在我看来,在东欧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家作为一种组织而言都是软弱的:它们抵抗不住来自大企业的补贴要求和寻求保护的双重压力,同时又不能从这些企业(或它们的私人企业主)征收税金,不能使它们服从条例和法规。 140

那种只要国家一声令下各个企业都得服从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国家形象,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遗迹。尽管在细节上有些分歧,人们普遍认为,中央指令的经济制度实际上并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经济:中央政府与它的分支机构之间,它们与企业之间,以及那些企图逃避政府控制的企业相互之间,都在进行着讨价还价。由于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贯彻政策两方面,都易受到大企业的压力。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匈牙利或波兰与阿根廷或巴西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制定和贯彻经济政策方面,都要照顾大企业——公有的和私有的大企业——的要求。其结果则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补贴和保护大企业,而且这些大企业常常是那些具有高度垄断性的大企业。

说到垄断的程度,可能东欧要比拉丁美洲国家高得多,因为在东欧国家,工厂倾向于大规模的形式,商品零售网络为国家或名义上的合作社所垄断。虽然保护的难度较难评估,但是我推断二者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拉

巴赛维茨在他的最近一篇文章(1989:46)中指出:“企业是财政分配的主要受益者这一点,把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区别开来。”他不知道,在美国,对企业的补贴,包括税款的开支,其数量大于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在波兰,中央政府开支的30%被用于补贴,但是这些补贴的大部分都用在消费品的价格上。我不知道用于企业的补贴是多少。拉美国家也补贴国有企业,为之提供资金和减少出口税,同时补贴也用于支持农产品价格。

Korrmnai(1986:1699)报告说,1975年在匈牙利,3个最大的生产企业提供了全部637种工业产品中的508种产品产量的三分之二。销售网也被高度垄断:华沙的所有食品都由两个企业来分配。我还获悉,如果美国的反垄断法在巴西实施的话,它的30家最大的企业团体将会受到影响。

丁美洲国家,民主政府刚刚上台时,名义上的关税是很高的,但是,由于他们主要靠特许来限制进口,那些得到特别允许进口的物品,实际上只收取很低的关税(见 Cardoso 和 Dantas 1990 对巴西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东欧的情况也差不多。

庞大的公共官僚机构与软弱无力的征税体制相结合,引起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在一些拉美国家,当国家财政破产时,政府维持其存在的惟一办法就是向那些未来的纳税人借钱。在这种条件下,除了在边境能收到一点税之外,在其他地方则几乎完全收不到税;多年来,玻利维亚所能征到的税赋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在秘鲁是 2%。除了智利,所有拉美国家的民主政府都不仅继承了巨大的内债和外债,而且继承了一种产生巨大且不断增加的赤字的收支体制。东欧的情况就没有这么严重,虽然在 1988 年波兰也出现了 4% 的财政赤字。因此,在引进有效的税收体制之前,这种情况恐怕还要恶化。 142

最后还需要评论一下社会服务状况。在这一方面东欧的形势似乎要好得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重要的是要看到,即使东欧 20 世纪 60 年代的福利服务水平相对地高一些,可是在这种命令性经济中并没有一个社会福利制度。福利服务是以与其他东西一样的方法来分配的:计划者分配钢铁、设备、肉类、医护、学区以及退休金。随着中央计划的终止,这套制度也瓦解了。东欧社会还未达到大量人口完全处在社会服务网络之外的地步,但他们必须从零开始重建这种社会服务网络。

东欧与拉美之间的一个核心区别,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价格管理的方式——后者并不太明显。注意这不是一个国营部门规模大小的问题:1987 年波兰的国营成分占 55.2%,可能并不比巴西或墨西哥高多少。价格管理在东欧更加盛行,只有匈牙利是个例外,因为匈牙利 1968 年后的改革使得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从中央控制变成了自由定价。确实,在共产主义体制下,价格开放 143

1985 年阿根廷的政府收入中,所得税只占 3.1%,关税占 13.3% (世界银行报告);在纳税人——包括实际的纳税人和名义纳税人——名册中,据说有 30,000 个纳税人的名字;比较一下 100 家最大企业的名单,和 100 个最大纳税人的名单,会发现这两组 100 之中,没有一个是相同的(Lopez, 1990)。

在波兰,由于大部分土地归私人所有,所以公有成分小于其他东欧国家。在拉美,工业中国有企业的产量占工业总产量的 40%,在东欧则达到 80~90%。1980 年左右,巴西有 530 家国有企业,墨西哥有 1,155 家国有企业(Schneider, 1990),波兰则有大约 8,000 家国有企业。

是阻碍改革进行的绊脚石。但是,价格管理——包括食品和粮食、日用品、许多其他商品,特别是汽油——在拉美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

另一个核心的区别是收入的不平等。如表4.2所显示的,以东欧和远

表 4-2 若干国家的收入分配

国家	收入最富裕的五分之一对最贫穷的五分之一的比率			制造业中净值的劳动者所得比重		
	时期	来源	比率	时期	来源	比重
阿根廷	1970	WB	11.4	1985	WB	19
巴西	1983	WB	26.1	1985	WB	19
墨西哥	1977	WB	19.9	1985	WB	25
秘鲁	1972	WB	32.1	1985	WB	15
匈牙利	1987	WB	3.0	1985	WB	32
波兰	1987	WB	3.6	1984	WB	24
苏联	1972	B	4.4 ^a	1988	A	37 ^b
南斯拉夫	1978	WB	5.9	1985	WB	29
韩国	1976	WB	7.9	1985	WB	27
日本	1979	WB	4.3	1985	WB	35
土耳其	1973	WB	16.1	1985	WB	23
葡萄牙	1973	WB	9.4	1985	WB	44
西班牙	1980	WB	5.8	1985	WB	41
比利时	1978	WB	4.6	1985	WB	50
法国	1975	WB	7.7			
意大利	1977	WB	7.1	1984	WB	38
瑞典	1981	WB	5.6	1985	WB	35
西德	1978	WB	5.0	1985	WB	47
美国	1980	WB	7.5	1985	WB	40

注: ^a 按城市家庭的税后收入计。

^b 毛值中劳动者所得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 WB,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87); B, Bergson(1984); A, 按 Nicolai Schmelyev, 转引自《纽约时报》, 1989年10月17日。

尽管经过了一次分两个阶级的改革,在波兰,生产工具由政府确定价格的份额从1982年的20%(占总销售量)增加到1987年的29%;生活消费资料中这种管制价格的份额,从1982年的35%增加到1987年的45%;而且那些不为政府直接确定的价格也受到了更多的管理(Balcerowicz, 1989: 45)。

在1985年,对于9种生活基本必需品,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政府全部实行价格控制,墨西哥政府控制6种,智利政府是一种也不控制。对于5种基本工业产品,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政府全部实行价格控制,委内瑞拉控制3种,智利全不控制。除了委内瑞拉之外,所有这些国家都对最高利率进行了限制(根据 Balassa 等人, 1986:图4.3)。

东为一端,拉丁美洲和土耳其为另一端,它们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

这就是在向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拉美和东欧经济的潜在结构。为使经济具有竞争力,为使国家有财政实力,为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一些物质福利保障,东欧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吗?东欧面临的转型比拉美面临的转型更为激烈吗?如果上述简短调查是准确的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要走的路可能不相同,但这条路对两个洲的国家而言都是漫长的。

研究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方法,这就是看看应该做什么。现在,让我们讨论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各种改革。

审视改革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国际金融体制传统的方法,以稳定性、结构性调整和私有化方式来判定。稳定由旨在降低通货膨胀、减少贸易逆差、缩减政府赤字等短期措施构成。结构调整是一系列经过精心设计的措施,目标是提高经济所具有的竞争性。这个概念的内涵最复杂,包括了贸易自由化、开放价格和税制改革等一系列的措施。私有化不言自明,所以毋庸赘述。按照这种分类法,拉丁美洲国家除了智利外,均与波兰一样,在转型过程中都迫切需要稳定经济,因为其他的东欧国家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如果有买方的话,东欧国家有更多的东西可供私有化。而无论是拉美还是东欧,留下来的国营部门都必须重新组织。 144

审视改革的另一种方法是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90)提出的,他依据九项措施的实施情况说明几个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过程:

- (1) 整顿财政纪律;
- (2) 转变政府开支的重心;
- (3) 税制改革;
- (4) 金融自由化;
- (5) 具有竞争性的汇率;
- (6) 贸易自由化;
- (7) 外国直接投资;
- (8) 私有化;
- (9) 开放价格。

我这里之所以说“传统的”,是因为近来世界银行开始更加注意收入的分配、税收和贫困。见世界银行 1989 年《发展报告》(Development Report)。

拉美各国的新民主政府都面临这些改革的任务,而且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改革。东欧国家也面临这些改革。但是,东欧国家是否还必须采取其他使它们的改革更加激进的措施呢?

一些东欧国家已经在实施,或已经宣布要进行的,或是预期要进行的改革是这样进行的:

1. 通过(a)使企业自负盈亏,(b)为资本生产确定适当的价格,使投资过程合理化,这在实际上是降低保护。

2. 通过(a)开放大部分商品的价格,(b)取消或减少价格补贴,平衡消费品市场。

3. 通过(a)允许破产和失业,(b)组建金融市场,(c)组建劳动力市场和人力培训计划,(d)采取反垄断措施,包括反对国家垄断的措施,建立起淘汰效率不高的企业和效率不高的程序的机制。

4. 通过(a)减少开支,(b)增加税收,(c)卖掉国营企业,减少预算赤字。

5. 重建社会福利和维持收入的网络,包括失业保险制度。

把这个清单与威廉姆森列举的拉美国家改革措施相比较,可以提出四个问题:(1)在指令性经济中,由于开放价格而导致的通货膨胀,究竟是这种体制独有的一种过渡性现象,还是如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一样,具有惯性的特征?(2)随着金融和劳动力的建立,资本和劳动被重新配置,失业是否将成为一种可得以解决的过渡性现象?(3)经过简短的学习阶段之后,私人企业家的影响能够取代国家的作用吗?(4)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过渡性的,还是将会导致不平等的永久性持续增加?下面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总体性影响

在审视改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影响分为两类。有一些影响是持久性的,它是转型过程完成之后的体制处于稳定状态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另一些影响则是过渡性的,它仅仅存在于转型过程之中。有些影响,尤其是与效率有关,是总体性的,而另一些则属于分配性的。把这些不同的情况组合起来,可产生出四类可能的后果:(1)持久的、总体性的、被认为是积极的后果。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是因为现行的经济结构是无效率的,或者有其他令人不满意的缺陷,而通过经济体制转型,可以消除这些缺陷。(2)有些持久性的后果是分配性的。那些在旧体制下利益受到保

护的团体,在改革后的体制境况下,可能其利益或绝对地或相对地受到损害。(3)改革过程导致暂时的通货膨胀、失业和资源配置无效率。由此产生了暂时性的总体性代价。最后,(4)改革过程可能会产生暂时性的分配后果:相对收入变动甚大。

过渡性的总体性代价,可能包括通货膨胀、失业、资本闲置、暂时性的资源配置失误。我将在讨论“猛药”(a bitter pill)策略时分析这种代价。在实施猛药策略时,各种措施一步到位。这种策略以承认过渡性代价十分重大为基础,它的核心假定是,改革越深入,它的过渡性后果越短暂。如果痛苦的治疗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人们愿意接受这种治疗。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个极复杂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有无可能经历过渡性通货膨胀后不产生相应的惯性?

我们先来观察伴随价格开放——一步到位地从管制价格转向市场价格——必然出现的通货膨胀现象。虽然我用波兰的资料作为例证,但其中的逻辑对于任何开放价格的情况都是适用的。

让我们设想这么一种经济,各种价格都由官方统一确定,在这种价格水平上的需求大于供给。这是现状。假定在波兰,1989年12月31日,相对于居民手中每1000兹罗提的货币,商店里只有价值333兹罗提的商品和可提供的服务。在这种制度下,钱并不是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充分条件,还得要去排队或者是私下交易。注意,在这里,排长队是重要的福利代价:一公斤橘子要花222兹罗提和一小时的排队时间,一公斤的肉要花111兹罗提和两小时的排队时间。

现在假定,元月一日所有的价格都开放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存款,货币供应也没有发生变化;居民名义上的收入保持不变;产量也没变。147一段短暂的时期以后,所有的价格都调整到了能反映偏好和缺乏程度的状况,出现了纯粹市场。现在的橘子是333兹罗提一公斤,肉是667兹罗提一公斤;没有过剩的需求。到了下一个月,商品的供给和货币的供给都保持原

为什么在管制价格和集中控制工资的体制下,还会出现这种不均衡,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

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商店还有东西可卖,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商店里几乎没什么商品但不是完全没有。我想可能有这几个原因:(1)一些产品完全没有用处——即使不要钱也没人要;(2)预算约束——在现在有的收入分配状况下,人们所以把钱留着等待,是为了想要的商品有供应时有钱可用(用一般的话说,等着“进货”);(3)排队等待的交易代价;(4)由于害怕风险而存些钱。

而有的东西(比如说,生活设施)被用行政手段调整,使其价格反映它们真实的机会成本。

来的规模,市场也还是纯粹市场,价格保持在它们的新水平上。至此,开放价格的工作就完成了。

价格上涨三倍;以前值 333 兹罗提的东西现在要 1000 兹罗提才能买到。因此在一个月出现了 300% 的通货膨胀,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结果。一旦完成了开放价格的工作,价格就保持稳定了。此外,从总量上来看,居民的福利增长了。多余的 666 兹罗提货币供应是无用的;改革之前,每个人用三张彩票兑一份奖,而现在每个人肯定有一份奖。但是由于人们节省了在排队上所花费的时间——每个家庭每天累计要花去几个小时——因此,交易成本降低了。另外,新价格也很合理,橘子和肉的价格比率反映了人们的口味差别和物品相对的稀缺。不过,为了后面的讨论,请注意其分配性影响;那些收入较低而时间相对不值钱的人,特别是退休的人,实际上可能减少了消费,而那些收入较多、时间较少的人则增加了消费。

此外,还应注意价格补贴的作用。在旧体制下,许多价格是得到补贴的;国家付给生产者的价格比零售给消费者的价格要高。假定现在完全取消补贴。那么名义上的收入下降,需求也下降了;最初多出的一部分收入花光之后,价格也就下降了。

可见,通货膨胀仅仅是过渡性质的;它出现之后过一段时间就会停止。然而,在这个阶段,通过把这种通货膨胀与拉丁美洲国家盛行的那种通货膨胀相提并论,称这种现象为需求性通货膨胀,容易使人误入歧途。需求性通货膨胀这个概念意味着它所指的现象有持久的原因,而事实是否如此,尚有待确定。

什么因素可能使这种价格转轨过程归于失败呢?如果不产生惯性,如果不产生继续推动价格上涨的机制,价格改革就是成功的。对价格改革能够产生影响的有四种因素: 148

- (1) 工资的压力;
- (2) 垄断;
- (3) 政府财政赤字;
- (4) 竞争对供给的影响。

工资压力的问题也许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取决

把开放管制后出现的市场价格与以前流行的管制价格进行比较将是极其有趣的。我很想知道这种相对价格是多么不合理。

1989 年波兰的补贴占国家预算的 31%,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 15%,在苏联,仅是对肉类的补贴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总额。

于一定的政治条件,我把这个问题留待下一节去讨论。

垄断对改革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在拉丁美洲,垄断是推动通货膨胀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在拉美国家,保护和集中的程度都是非常高的;而我们已经看到,东欧经济的垄断性更强。因此,价格改革必须有激进的反垄断措施的配合。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拉美国家,反垄断的措施都很软弱无力,而且都不成功。众所周知,拉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反对扩大外国竞争,可是,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垄断企业恰恰都是多国公司,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上所作的脆弱尝试,往往使经济的垄断结构永久化。以减少保护的方式来反对垄断有引起大量失业的危险,而通过立法手段与垄断作斗争又常常是无效的,因为垄断能在不与法律发生明显冲突的情况下永久存在。因此,这种从改革前的体制继承来的垄断型经济结构,很可能继续推动价格上涨。

在我看来,政府赤字是更大的威胁。在拉美,政府赤字在推动通货膨胀中也发挥决定性作用。阿根廷的例子非常极端,但正因为如此,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值得引起人们警惕的例证。在阿根廷,几年来国家一直在濒临破产的边缘上徘徊。它只有靠继续借钱来勉强度日,而能找到债主的惟一办法就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它每过几个月就宣布要采取激烈措施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但它始终未能采取治本的行动。国家破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能力收税;相反,它向那些本来该纳税的人借债。于是,如罗伯茨(Lopez, 1990)所指出的,在阿根廷,借钱给国家是最赚钱的经济行为。

那些尚未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国家,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吗?我觉得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政府在采取猛药策略时能做的财务预测,充其量也只是猜测。政府既不能预测它的法定收入,也无法预见它的法定开支。政府的收入——税收、非税收的一些收费、政府活动的收入——依赖于需求的水平和征税机构的效能。但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至少需求水平是无法预知的。开支——主要是维持人们收入的开支——依赖于改革对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的影响。在通货膨胀高达百分之几百,企业承受不住竞争的压力而纷纷倒闭的时候,开支同样是无法预知的。试看这个例子:波兰政府会允许给失业者发给相当于原工资 70% 的补贴,但是,关于改革开始

引进这些措施并不简单。在波兰,最有力的维护自己利益的压力团体是零售贸易“合作社”联盟。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使得这种合作社联盟成为非法,但是他们很快地变成了私人公司,并继续他们以前的功能。另一方面,竞争确实吞食掉一些垄断租金;生产者直接向消费者出售产品,并且经常是在商品门前的大街上出售产品。

几个月后的失业人数,有各种估计方式,其变化幅度是 30 万到 40 万,上下相差 13 倍。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将会有多少的政府开支。这也意味着没有人知道政府能收到多少税款。于是,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发现,为了履行它的法定义务,它必须让赤字超过原定指标,其结果是它必须提高利率和印发钞票。

于是,外国援助变得至关重要了。稳定基金可以抵消赤字的惯性影响。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它的数量是否充足。如果出现赤字而稳定基金数量又不足,阻挡通货膨胀惯性的惟一方法就是减少开支。至于这个方法是否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我们放到后面去讨论。

现在假定为了引起竞争实行开放价格、降低保护。这时许多企业会破产,一些经营活动停止。供给和需求都出现暂时的下降。这又会对价格产生什么影响呢?一般说来,这是不能加以确定的,因为它取决于这种经济的特殊结构和它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供给的下降速度比需求的下降速度快,就可能出现惯性机制。

总之,在实施这种一步到位的开放价格策略时,关键的问题是能否避免通货膨胀的惯性机制。这种惯性机制可能由工资压力、垄断价格、政府赤字和供给迟滞所构成。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反通货膨胀的措施有政治上的困难——政府受到大企业的压力。这些措施也有社会代价——它们可能要求减少保护,引起失业。而政府赤字则难以避免,因为缩减开支常常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一般来说,如赫希曼(Hirschman)早就指出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政治现象。国家能否使通货膨胀保持在一个适当的稳定水平上,主要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是否愿意自始至终地忍耐为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 150

如果惯性机制发挥作用,政府可能回过头来采取反通货膨胀的“休克疗法”(shocks):冻结物价、工资或利润。实行这种措施的过程是复杂的:无论是奥地利学派的计划还是它的后继者克鲁列多计划(Plano Cruzado)的方案,抑或是后来的 pacotes,其实施过程都没有超过几个月的时间,那被抑制住的压力每次都以报复性的形式爆发出来。这种措施被认为是为体制改革购买时间,但是在阿根廷和巴西,实施这种措施时并没有进行体制改革。可是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包括在以色列,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反通货膨胀

确实,波兰的 Mazowiecki 政府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它决心平衡预算,但实施该纲领 6 个月后,在政治压力面前,该政府决定以容忍赤字的存在为代价,增加社会开支。

的休克疗法就很有效。在采取猛药策略的情况下,休克疗法可能是必要的,但它的政治代价高昂:由于猛药策略是尽快地从管制价格的体制转变为市场价格体制,冻结标志着改革的搁置。另外,把价格和工资冻结在它们当时碰巧达到的水平上,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并重新引发政治交易。因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冻结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缓解办法。从政治上来看,它可能符合民众降低改革速度的要求,但也削弱了人们忍受调整期的痛苦决心。

所以,从政治上来看,通货膨胀很可能走上恶性的道路。最初的通货膨胀并没有降低而是增加了福利。然而,如果出现了惯性,通货膨胀就会持续下去。如果政府以冻结工资和物价来应对,就可能破坏人们对改革的政治信心。

失业和资本闲置 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从行政管制的、垄断的、保护主义的经济体制,转变为能反映国内的偏好和国内及国际的机会成本的经济体制。如果这两种经济体制不同——它们确实不同,否

151

则就不需要改革了——那么向市场机制的转变就会造成一些损失,一些经营活动只能以萎缩的规模进行,一些并未完全贬值的积存资本实质上被废弃,一些劳动服务从当时的就业中被撤出。除非这些调整能于瞬间完成,否则暂时的失业和资本闲置必然会出现,产量的水平就会下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失业和资本闲置呢?第一,在保护和垄断的经济体制中,使生产成品配置合理化的惟一办法,是利用国际市场来确定相对价格。可是,用国际市场价格作为确定国内价格的标准是不够的,这些国际价格可能反映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机会成本,但如果这些机会未能得到开发利用,基于这种价格而作出的资源配置仍然是不合理的。在国际市场上,钢材的价格可能比铝便宜,但是对于从来不买钢材或从来不买铝的国家来说,如此定价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必须建立真正的资本货物市场。这就意味着必须降低关税障碍,废除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否则,那些涉及到这些障碍的经营活动和企业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是无效率的,这些经营活动将被停止,这些企业将会倒闭。

第二,国内竞争的后果与相对价格的突然变化的后果是一样的。在指令性经济中,之所以进行一些活动,是因为它们是被要求的,并能得到补贴,企业并不消化这些代价。随着补贴的取消,这些企业将倒闭。

还应注意到,一些企业将关闭,它们的积存资本被废弃了;这资本因机会成本的缘故价格为零。另一些企业则为了从事新的活动必须进行精简和

重组。

农业是一个值得予以单独考虑的部门。波兰是一个极端,波兰在实施猛药策略时,冒着毁坏农业的危险。由于各种原因,在世界任何地方农业活动的回报率都低于工业和服务行业。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都是予以精心管理并给予很高的补贴。因而,取消对农业产品的补贴,而又在农业投入方面引进竞争的市场,会严重危及整个农业。此外,外国的食品援助也可能加剧这种危险。在转型期间可能需要这种援助以保护城市居民,这种援助对于抵消惯性通货膨胀也是有用的,但它会把竞争强加在国内农业部门上,这种竞争使得后者难以生存下去。

第三,工资压力也可以导致失业和资本闲置。不过这不是独有的结果。152 另外,即使在稳定发展的资本主义下,工资压力是否引起失业也仍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第四,暂时性失业的一个原因是指令性经济所特有的。众所周知,指令性经济中存在着过度就业现象。因为企业惟一关心的是完成任务,而劳动力供应又常常无节奏地接连而至,于是,企业就倾向于储存劳动力。如果企业不再储存劳力,它们就要裁员。

降低保护,引入竞争,屈服于工资的压力,取消劳动力储备,导致某些积存资本被废弃,有的经济活动只能以较低的水平进行,有些工人被解雇。这些影响与后果的大小,取决于被改革经济的特殊结构和改革进行时的国际经济条件。实际上,影响与后果的大小是无法预测的。有人估计,匈牙利和波兰在1990年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20%,不过这种估计充其量也就是一种猜测而已。惟一的出路就是先勇往直前地干一场,然后再看情形如何。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这种失业和资本闲置是不是过渡性的,不过现在的问题已不是惯性,而是是否有新的资本来源以取代旧来源,以及是否有新经济活动取代旧经济活动。在指令性经济中,特别是在东欧那种经济中,服务业严重发展不足,小企业几乎没有。国家垄断扩展到汽车修理,国家管理使得街头小贩无法存在。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必然有大量的人力和创新资源可资利用,这些资源可以通过改革被释放出来,取代被废弃的经济活动。但是光这些还不够。

实际上,巴赛维茨的计划实施6个月后,波兰的产量(至少是政府记录的产量)下降了35%。

假定存在金融市场,那些破产的企业会被人购买,那些还有一些价值的积存资本也得以重新运用。假定劳动力市场运作良好,使人力培训项目能很快地重新训练失业的工人。再假定失业的压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信贷的民主化激发小企业的成长。在这些条件下,经济结构会很快地得到调整,失业率将迅速下降。

很显然,市场在决定是不是能发生结构调整这个问题上,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没有金融市场,亏损的企业就只能倒闭,它们的积存资本也只有被废弃。没有信贷市场,就很难形成新的企业。没有劳动力市场和人力培训项目,结构性失业的人数将是巨大的。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问题,因为结构性改革的效果与产权形式的变化不能分割。在此必须提出两个问题:(1)结构性改革中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产权形式?(2)结构性改革会对就业、投资和劳动生产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里我得提请读者注意,对这两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其原因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作过讨论。尽管人们都觉得产权的形式对企业的成效有影响,我们仍缺乏一个内在的企业理论,这个理论能够根据企业的相对成效,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某种特殊类型的企业。 153

从几个不同国家进行改革的情况来看,惟一与改革相关系的产权转变是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包括一些公共设施的私有化。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推动下,私有化几乎已经成为当前改革中带着普遍性的一股潮流。我认为,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卖掉公有企业可能并不正确。不通过私有化,在国有企业之间引进竞争同样可以提高效率。私有化的动机是充实国库,因此,对于那些赤字严重的政府来说,私有化是很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但是,私有化意味着什么呢?假定国家卖掉了所有的或是大部分的生产工具,那会出现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呢?请注意,首先可能出现多种产权形式。一旦资源配置的决定权被分散,物质报酬与经营成效相关联,产权问题就具有了三重意义:谁作决定?谁生产?谁受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不再是仅仅区分两种或三种产权形式:国有制、合作制和私有制。我来列举一些可能性:

1. 根据统一规定的标准付给工人工资的国营企业。它没有权利从自 154

有几个作者在 Vernon(1988)中指出了这一点。

Hansmann(1988)出于理论上的考虑对所有制的形式作了分类,他把企业分为:(1)投资者所有的企业,(2)消费者所有的企业,(3)工人所有的企业,(4)没有所有者的企业(非营利的)。他论证说,在美国,这些形式企业的发生率在不同的部门中有很大的区别。他明显地忽略了国家所有制。

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或是从资本市场借钱来进行投资。这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1982年以前的波兰和今天的中国都存在这种企业。

2. 能自主作出决定的国营企业。这种企业为国家所有,国家在财政上为它负责(它可以关闭但不能破产)。它可能交税也可能不交税。

3. 能自主作出决定的公有企业,它归国家所有,但在财政上自负盈亏,它与私有企业一样向国家纳税,也可以破产。

4. “交叉所有”(cross-owned)的合作制企业。这是匈牙利人提出的计划,根据他们的设想,这种合作企业互相所有。

5. “公共实体”(public bodies)的合作制企业。这也是匈牙利人提出的计划,根据这种计划,到目前为止依靠国家预算支持的组织和协会都可以成为营利性企业的所有者。

6. “社会”(social)合作制企业。这种企业由董事会控制,董事会由工人代表、政府代表和公众代表构成。它必须分配所有的剩余收入。

7. 所有的员工,也只有这些员工才是成员的合作制企业。企业成员不能被开除和停职。

8. 可以雇用非企业成员的人来工作的合作制企业。他们只领取工资但不分享剩余价值。

9. 所有的员工都是企业的成员,但是有一些股份持有者不必为本企业工作的合作制企业。

10. 投资者所有但由公众管理的企业。

11. 投资者所有但为私人管理的企业。

……混合形式。

现在,改革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尽管改革是受高度理想化的市场竞争的蓝图所驱使的,但产权结构的转变却并不为任何计划所指导,而是自发地进行的。事实上,政府愿意把公有企业卖给任何能买下它们的人。

与此相应地,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迄今为止大量的腐败现象。智利的独裁政府在其当政的最后几个月,以令人怀疑的价格把一些企业卖给了它的军方成员和文人政治家。在波兰,随着工厂经理和官僚机构的其他成员想出侵吞国有财产的方法,干部“占有”(appropriation)过程已经全面展开。如塔科夫斯基(Tarkowski, 1989)所指出的,许多人从行政首长摇身一变而

注意,在每个国有企业中,经理都可能由国家任命,或者国家可以把财产权交给雇员。
关于合作性企业的难点,见 Elster and Moene, 1989

成了企业经理。

无论私有化导致什么样的产权结构,这结构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缺陷的。成批卖掉国有财产的计划根本就是不现实的。相对于对公有财产的任何合理估算的价值,居民的存款和国内私人企业的存款都是零头。在波兰,1989年底私人存款的数量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或是国家全部积存资本的8%,这个数目在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差很多。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国外的买主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民族主义的反响很快就会爆发。“你们把国家卖给了外国人”,这是任何政府都担当不了的责难。因此,由于没有买主,大部分的经济部分仍将留在国家的手里。

代替拍卖国家财产的一种选择方案是:以免费、给予补贴或提供贷款的方式,把这些财产分配给工人、厂长或公众。例如,匈牙利的建设蓝图,就是把国家企业所有权转给现在受国家预算补贴的所有实体:地方政府、大学、志愿组织等等。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通行的计划是向全体公民分配共同基金的份额,让他们享有私有化公司的股票。还有另外一种在波兰得到广泛支持的选择方案,它的内容是,以信贷的形式卖给员工一些企业股份。无论怎么说,看起来似乎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工人所有制的产业部门,特别是在工业中。

产权转变过程的自发性,可以从波兰格但斯克市列宁造船厂——这里是团结工会的摇篮——的经历得到说明。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发现这个企业不盈利,决定关闭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们开始为船厂寻找私人买主,并且找到一位波裔美国人、百万富翁作为候选人。但是她雇来的德国专家组对船厂作了价值评估后认为它几乎不值钱,买卖没做成。在这个阶段,工人们又向新政府——后共产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船厂转变为工人所有制的企业,并让政府扩大信贷以实现这种所有制的转变。这是我写作本书时的情况。 156

按照现在的计划,如果船厂转到了工人的手里,将要裁减60%的员工,船厂的一些部分也将被废弃,并且还得寻找新的客户。如果船厂仍为国家所有,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如果船厂卖给了美国百万富翁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作为私有化的结果而出现的体制可能是联合体形式,其中国有成分占一大部分,雇员所有的成分也占有相当比例,再就是私人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企业的混合成分。这种混合体在活动上是不是不同于为我们所知的混合经济呢?人人都可以猜测。所有制对经营的模式和成效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此我们所知道的还很不足。

由于产权结构还是尚未确定的,由于我们对不同产权的混合形式及其对企业运作的影响所知甚少,所以,一切关于投资动力、就业和技术改造的预测都是无力的及缺乏根据的。即使我们设定这种新的产权结构以一种与我们从经验中知道的混合经济相同的方式运作,关于创造市场的可行性仍有许多我们无法预测的东西。在没有存款的时候,金融市场很难建立起来;在缺乏房屋市场时,劳动力市场将无法运作;任何地方的信贷市场都歧视冒险的企业家,因为他们拿不出可作为担保的东西。

然而,如果真正贯彻了猛药策略,产量和就业的变化轨道很可能符合“快速下降又逐渐回升”这种在政治上较可承受的形式。如果降低保护,放开物价而产生的初始结果是严酷的,那么这种影响也是直接的。往后,除非政府诱导经济衰退以制止通货膨胀,否则经济会有所回升,尽管回升也许是缓慢的。

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即使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改革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在改革期间也会产生一些暂时性的无效资源配置。如考密苏(Comisso, 1988)在谈到匈牙利的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单在于对改革过程的计划不周,或未能适当地推进,还在于改革前就逐渐形成的那种工业结构。”她指出,在存在着垄断、缺乏金融市场和产权结构不明晰的条件下,改革的开始可能会增加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157

其中,一个原因是增加了不确定性:一切事情都在不停的变动,没有人知道将会产生什么。在这种条件下,企业会倾向于增加对流动性的偏好(见 Vickers, 1987),投资会下降。另一个原因是缺乏一些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

我在这里只评论一下那些指导当前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信条。应该注意的是,经济改革这个术语在近几年里已经变成了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义语。但是在20年前,这个词在拉美指的是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在东欧则意谓修补计划体制。而到了今天,它相当于市场产生支配性的作用。

市场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假定如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作出的决定承担代价并享受其利益,那么人们就会对价格

我的一个在波兰的表兄原先做的是养鸡业。在价格开放以后,饲料贵得出奇,且利率上升,喂养代价极为高昂。他在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时,主要考虑的是减少不确定性;他对我说:“今天我知道投入的价格,可谁知道在我要卖出东西时产品价格是多少呢?”他最后决定去种黄瓜,因为黄瓜的生产周期最短。

的刺激作出反应,这只是一个人为的信条。为使人们扮演市场行为者的角色,就必须打破强大的文化障碍,克服根深蒂固的习惯。我来引用一个证据:要说服农民改种别的作物,预期回报率得比原来高 20—30%,另外还得需要其他条件(Shapiro and Taylor, 1989:12)。在西欧花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使每个人变得适应市场关系的现代化过程。然而,如列宁所说,任何厨师都能学会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但市场经济是一个会计师的世界,是一个证券经纪人的世界,一个投资计划者的世界,一个生财有道者的世界。要使厨师成为工商管理硕士,是需要时间的。

波兰计划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瓶颈是食品加工业。每年 6 月草莓的供应几乎源源不断,但几周以后,那些没有吃掉或未能加工的草莓就烂掉了。草莓的价格在 6 月非常低,而到了冬天冻草莓或是罐头草莓的需求都很高。在合理的价格体系的指导下,个人企业家会对这个机会作出反应吗?如果他们能把草莓从农场运到工厂,如果他们有地方储存这些草莓,如果他们能联系潜在的买主,他们也许会有所反应。可是现在他们不能,因为道路少、158 卡车少、电话也打不通。既然每个人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原则,这些问题不就能解决吗?这是货币主义信条让我们相信的东西。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自发地产生大规模资源配置的力量,是国家使之发生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巴西、法国、墨西哥、韩国,私人企业没有多少力量,国家不仅主导着资本的累积,也造就了地方的资产阶级。东欧国家没有地方资产阶级,流行的情绪激进地反对着国家主义,所以,在短期内国家不会发挥相同的作用。人们期待的是,资本家会像雨后春笋般在市场中产生出来。

此外,同东欧相比,拉美国家还有一个优点,他们对市场关系有较长的接触,并存在着一些可作为模范的、有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而在东欧,这种经验很有限,也缺乏关于市场的知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波兰人试图把他们的耐久消费品销往西欧国家,但是不提供任何售后服务,因此他们的失败是预料之中的。今天,根据我与他们的非正式访谈,他们仍在准备重蹈覆辙;他们仍然相信,只要产品有竞争力就能卖得出去。

这并不是反对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但是我们应该预料到,一些无形的因素会导致转型性的资源配置无效率,这些因素包括缺乏市场、缺乏关于市场运作的知识、在产权转变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市场学习过程、没有地方资产阶级等。

分配性影响

如果所有人都预期在新的体制下能生活得更好,或者都对新体制怀抱一种强烈的价值信仰,那么人们就会一致投票,同意从旧体制向新的转型。如果人们仅仅关心他们自己的福利,那么,只需如下这两个条件就足以使人们同意转变体制:(1)新体制具有更高的生产率;(2)在新体制下的福利分配,仍保留旧体制下的相对差异。如果人们持有的公正观念,使他们偏爱一种不依赖于产出大小的分配机制,那么,他们或许会一致投票赞同这样的体制,这体制既有较高的生产率,又能满足平等、公平或公正这些被现行体制违背的价值规范。然而,即使革命公开喊出的口号是一视同仁的,它总会改变收入和福利的分配。如果一个群体预期在新体制下的生活会绝对地变坏,他们就可能反对这种转变。而且,规范性承诺是否总支持结构性转变,这一点并不明显。 159

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于,即使改革后体制的稳定状态是帕累托式的,优于旧体制甚至人们也不存在嫉妒心理,这种分配结果是否会破坏改革的过程呢?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暂时性的分配影响将是很明显的,人们绝对消费水平的变化将难以掌握,也许它还会危及生存。这些变化有些是容易预期的,有些则是难以预见的。

作为反对改革的社会基础,一些分配性影响容易预见到。许多高层官僚靠着干部任命制度——对最重要的行政位置的政治控制——保持其地位。如果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可用于赚钱的专业技术,如果他们不利用他们的行政地位为自己积存私人财富,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前途将是流浪在街头。当然,那些无技术的工人最可能首先尝到失业的苦楚。作为缩减政府开支和精简政府官僚机构的结果,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员工会丢掉自己的饭碗。要注意,在拉美,政府部门的工会站在反对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最前线。可见,反对改革的联盟很可能由那些没有专业技术或没有私人积蓄的官僚、无技术工人、政府雇员形成,这已被有关东欧的分析所证明

注意,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具有帕累托最优的运动,因为它是在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发生的,革命后的制度能够极大地解决生产潜力。熊彼特认为转向社会主义将具有帕累托最优性,因为当这个过渡发生时,已经说不上有什么资本家了,大家都是资本的雇员,在社会主义下同样需要这些经理。

例如,哈贝马斯(1975)曾论证说,相较于行政决定造成的不平等来说,人们对市场引起的不平等更能忍受,因为前者被看作是专断的。这一点也被波兰近来的调查资料所证明。

(Bruszt, 1988; Kolarska-Bobinska, 1988; Zaslavskaya, 1988)。

然而,由谁来吞下这剂药取决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取消补贴必然要伤害大企业。裁员必然会伤害无技术的工人和政府雇员,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削减政府赤字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条是压缩开支,另一条是通过税收增加收入。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有没有政治和行政能力,从那些交得起税的人手里收税,并为那些被市场伤害的人们提供福利服务或维持他们的收入。如果国家能够收到税,并能有效地提供福利服务和维持人们的收入,那么改革就不会有明显的倒退。 160

建立起提供福利和维持收入的制度建设必须从零开始。市场经济下设计福利制度的目的,是保护那些在市场上受到损害的人们。在这里,要估计市场收益,要对收入课税或用其他方法预扣税款,要提供福利服务,维持最低收入。可见,在东欧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那些习惯于用命令来指挥经济的官僚机构,必须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征收并转让收入的机构。国家犹如一艘巨大的油轮,必须被风暴一举调转船头。

在这个油轮大转向的时候,相当多的人可能会掉落水中;对于那些没有工资收入和私人财产,又得不到国家救济的人们来说,改革可能会危及其生存。这些人无法等待改革完成。说实在话,这些人在政治上可能没有什么力量,他们有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有的是居住在偏僻边远地区的农民,有的是缺乏教育的人。但他们是另一些遭受经济改革之分配性影响伤害的人们的潜在同盟力量。

结 论

无论经济改革的长远影响如何,从短期来看,经济改革很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失业、资源配置无效率,以及人们相对收入的变化无常。这些不管在哪里在政治上都是不受欢迎的。在这种条件下,政治上的民主不利于经济改革。用考密苏(Comisso, 1998)的话来说,由于市场未能产生有效的结果,层级制度可能重新出现。 161

注意,中国的工人既反对他们所谓的腐败(依靠官职谋取财富),也反对所谓的投机获利(通过市场致富)。

Corrtes and Rubalcava(1990)的仔细研究表明,与广泛流行的看法相反,墨西哥在1982年实施调整计划以后,虽然平均收入下降了,但不平等却没有增加。

第三节 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一个模型

对经济改革的政治反应以及经济改革的最终成败,不仅依赖于改革的经济效果,还取决于政治条件。1987年11月,在波兰共产党政府组织的一次公民投票中,一个经济改革纲领未能获得多数票的支持。然而,新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却得到了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前一后的两种纲领几乎没有区别,不同的只是主政的政府改变了。可见,问题不仅在于从旧体制转变到新体制之间的峡谷有多深多宽,还在于什么样的政治势力最有能力跨越它。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分析由三个多少经过编排的事实所构成。第一,经济改革的发动几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第二,经济改革最初常常得到人们广泛支持,但随着经济改革的社会代价出现,这种支持就开始消解。第三,经济改革大多都遵从着走走停停(stop-and-go)的模式。

策略的选择

为了了解人们如何选择经济改革的策略,首先需要比较一下图4.2中刻画的三条消费路径。在R路径即实施激进改革策略时,消费急剧下降且下降幅度很大,但回升得较早。激进策略是一剂“猛药”,人们是怀着良药苦口的信念来采纳这一策略的。在G路径即实施渐进的改革策略时,消费下降较慢,下降幅度也不像采取激进策略时那么大,但回复到最初水平的的时间延后。一旦回复到最初的水平,就标志着过渡的结束,这时经济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无论采取的是哪个策略。这些路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这

162

在波兰于1989年实施巴赛维茨计划之前,玻利维亚于1985年实行的改革是激进改革的最好的例子。这个改革纲领的一个设计者(Cariaga, 1990: 43ff)介绍,这个改革包括:对燃料征收间接税;货币贬值;把国有企业应纳的税增加到国际同类企业的水平上;广泛的税制改革;取消补贴,包括对食品和粮食的补贴,以及以国有公司的低廉定价和收费出现的变相补贴;取消所有非法的奖金和实物奖励,冻结公有制部门员工的工资;严肃财政纪律;统一关税,不许任何人例外;1年之后,关闭一些采矿企业。

波兰Wladyslaw Baka的改革纲领是渐进性改革的例子。他的计划是在投资方面引进市场机制或别的分散决策的机制,但不开放最终商品市场。只有在投资合理化和产量增加之后才放开消费品市场。由于在控制名义收入的同时,供给会增加,所以最后开放消费品价格将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个策略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即使它最终是有效的,它需要时间。另外,这种策略很容易被逆转;在企图引进企业的自负盈亏机制后,经济被重新集中管理,这在东欧发生过多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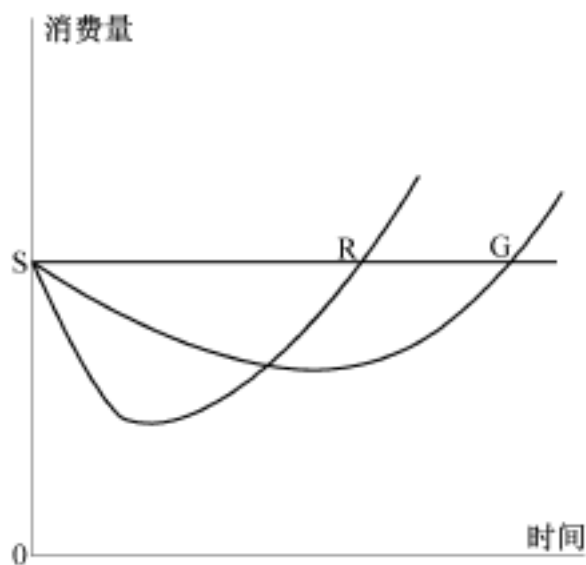


图 4.2

里,采取激进的策略时社会代价较高,而社会代价指的是过渡时期消费的总量下降。如果这两种策略都未被采纳,消费就保持现状,即 S 路径。

在这几种策略间进行选择,依赖于三部分人的态度:这就是技术官僚、当政的政治家和民众。我假定:人民要的是吃饭,技术官僚要的是成功,政治家们要的民众的支持。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这几种人各自对改革的偏好。首先,我们看民众的作为,人民愿意承担过渡的社会代价吗?如果某个政党提出要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他们还会投这个党的票吗?他们会赞同那种比渐进的策略付出更高代价的激进策略吗?

有一些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民会支持激进的改革策略。标准的假设足以使我们确定这些条件。假定个人都把未来消费的当

如果渐进的改革策略太缓慢,以至它累积的社会代价比激进改革还要大,那么人们就不会选择这种策略。这样人们就只是在激进策略和维持现状之间进行选择。

这里有一个用数字表示的例子。以最初的消费水平为 100,所以 $R(0) = G(0) = S(0) = 100$ 。在激进的策略下,消费沿着这个路径变化: 70, 50, 60, 70, 80, 90, 100(过渡期结束), 110, 120 每一个新时段增加 10。在渐进的策略下,消费变化路径是: 95, 90, 85, 80, 75, 70, 80, 90, 100(过渡期结束), 每一个新时段也增加 10。在现状下,任何时段,对 t 而言, $S(t) = 100$ 。在最初 10 个时段中总消费是 $C(R) = 850, C(G) = 865, C(S) = 1000$ 。社会代价为:激进的策略是 - 180, 渐进的策略是 - 145, 根据定义,维持现状的社会代价是 0。

很明显,技术官僚和政治家也要吃饭。但是,即使改革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他们也肯定有足够的东西可吃。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为了避免出现和类似唐斯(Downs)最大化支持模型样所固有的自相矛盾,在这个模型中,选民们关心政策的结果,而政治家们不关心这一点。

前价值最大化,并依据风险大小决定给未来打多少折扣。 选民们观察他们在各种策略——维持现状、渐进的和激进的策略之下所面临的消费走向。如果他们对于某种策略的成功抱有信心,那么,他们赋予很多段时间以后他们所能享受到的消费的价值与他们赋予目前消费的价值几乎一样。如果他们对这种策略信心不大,他们就赋予将来的结果以较小的价值,转而集中注意当前的价值。他们选择他们赋予最高价值的策略,而一个策略的价值高低,又取决于他们对在该策略下将来消费的前景的估计,和他们对这种策略之未来的信心。

如果上述的假设成立,那么,只要人们相信改革后他们的未来将比他们目前的现状要好得多,足以补偿暂时的生活恶化,他们就会把选票投给表示要横越过渡之谷的政党。如果选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就会选择激进的改革策略,虽然激进策略所带来的社会代价大于渐进策略。如果产生决定性作用的选民坚信改革将获得成功,三种策略排列顺序将是 $R > G > S$ 。如果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选民对于未来的信心不是很足,那么排列次序将是 $G > R > S$ 。要是信心更低,偏好顺序就可能就越过 $G > S > R$ 而到 $S > G > R$ 。如果选民对改革根本没有什么信心,他们就将选择维持现状。

164

可见,虽然激进的改革会带来很高的社会代价,但并非总是技术官僚们和政治家们强加给民众的。如果人民相信政府,选民们就会赞同如波兰人对巴尔赛洛维奇(Balcerowicz)的改革计划所称呼的那样的“大剂量疗法”(horse therapy)。事实上,包括波兰“巴尔赛洛维奇计划”、巴西“卡勒尔计划(Plano Collor)”、梅内姆统治下的阿根廷、藤森(Fujimori)统治下的秘鲁在内的好多国家的证据表明,一连串的改革计划在其实实施的初始阶段,均获

这并没有把纯粹的时间偏好排除在外。我忽略它们是因为它们对比较结果没有什么影响,除非我们有一个关于它们形成方式的理论。

为什么人们宁愿要短期的强烈痛苦,也不要长期的持续折磨,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我在这里依赖的假定是,使未来消费的价值最大化,这是个古典理论的(von Neumann-Morgenstern)基础。其他的假定在下面还要讨论。

符号 $X(t) > Y(t)$ 读作“在时间 t 对 X 的偏好优于对 Y 的偏好”。我们现在处在初始时点, $t = 0$ 。在我们图示的路径下——人们也可以想像别的路径——如果对未来的折扣率每个时段不大于 12%,选民们就优先选取激进的策略,其次是渐进的策略,最后才是维持现状。如果这种折扣率大于 12% 但不大于 16%,他们的偏好顺序是 $G > R > S$ 。只有在对未来的折扣率每个时段大于 18% 时,他们会抵制改革。

得民众的支持,尽管它会引起生活水平的降低。

然而,假定选民在改革和维持现状的选择之间,他们愿意选择赞成改革;又假定对于渐进和激进两种改革的策略,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渐进的改革计划会被选中吗?

在经济专家小组(这是现在流行的术语)看来,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实现转变经济体制的蓝图,实现稳定、收支平衡和效率。他们要的是结果,而对达到这结果所需付出的社会代价他们并不太关心。所以,他们的偏好顺序是:首先是激进策略,其次是渐进策略,最后是维持现状。即使他们关心政治反应,他们仍然想在出现这种反作用之前,尽可能地推进改革。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在题为《从指令性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Transition from the Command to a Market Economy, 1990:9)的报告中的话说:“虽然渐进主义的方法可能不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张力,但是长期温和的改革却要承担这么一种危险,即:无论是改革者还是民众都会‘对改革厌倦’,因为这种改革未能带来明显的变化。另外,在长期的改革期间,各种反改革的势力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游说团体能够把它们的力量动员起来,可能会渐渐地扼杀改革的过程。”或者如尼尔森(Nelso, 1984: 108)所指出的那样:“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的鼓吹者确信,公众对痛苦的耐受性是短暂的,政治家们的勇气也是有限的。如果改革的过程过于缓慢和渐进,反对力量就会积聚起来,改革就会被颠覆。”

165

执政的政治家们处于一种更加矛盾的状态。他们也感到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预料到这会引来民众的反对。这些政治家们对于改革的计划只有有限的理解,因为这是高度专业性的问题。政治家们承受到国际债权人的压力,他们也害怕自己的国家被排除到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之外,他们

在波兰,尽管新的改革纲领实施后的头几个月里,人们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但90%左右的居民仍支持 Mazowiecki 政府。另外,60%到70%的应答者声称他们有承受改革代价的准备(Gazeta Wyborcza,好几期)。在巴西,在政府宣布改革计划的时候有68%的人表示对 Collor 总统有信心(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WR—90—37, 1990年9月27日, p.11)。在秘鲁,当藤森总统背叛了他的支持者而采取了猛药策略后,他的支持率立即下降,但是指导调整纲领的经济部长得到58%的应答者的信任(同上, WR—90—36, 1990年9月2日, p.2)。西班牙的调查资料显示,工人们明确地愿意为巩固民主制度而牺牲工资要求。此外,尽管工人们不愿意降低工资要求,以换取就业或投资保证这类直接的经济条件,可是为了政治民主,他们愿意这样做。

尼尔森(1984: 104)根据她对五个国家的研究报告说:“只有很少的经济官员具备必要的训练,能够理解复杂而抽象的经济关系,理解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能后果。而且,人们通常采用的稳定、调整经济计划的许多方面,与人们的直观恰恰是相反的。”也见 Conaghan, 1983。

担心国内的贫困会不断增加。因此,这些政治家们觉得必然采取某种激烈的措施。然而,政治家们也关心社会稳定和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们作出的决策,一方面取决于他们对经济专家小组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又决定于他们关于公众反应的理解。我猜想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他们知道某些措施肯定会激起强烈的反对,他们会努力避免采取这些措施。另外,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下次选举到来之时经济应呈现出上升的曲线。他们相信,一旦形势有了好转,选民们就会变得乐观起来,忘记过去所受的痛苦。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政治家们相信技术官僚的保证——在下次选举日之前经济将会好转,他们就会采取激进的改革策略。

如果政治家们在选举之前能被说服,并相信有必要进行改革,他们就会力图操纵议事日程,尽管他们起初只在维持现状与某种改革纲领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在当选前经济计划问题上含糊其辞。然而对那些在竞选时反对改革,批评它会引起很大社会代价的政治家们来说,一旦他们竞选得胜入主政府,他们就会令人惊奇地采纳激进的改革策略。即使各种考虑都不足以推动他们走上改革之路,有一点考虑却是无法阻挡的:如果政府面临破产——如果它已是赤字营运而且又借不到钱,那么,所有的政治家,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竞选纲领和社会基础如何,都将采取恢复政府信誉的措施。

1985年,在玻利维亚,埃斯腾索罗(Victor Paz Estenssoro)被看作是反对班泽尔(Hugo Banzer)的人民党候选人。选举在7月15日进行,两个候选人都未能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8月6日议会选举,伊斯腾索罗获得了胜利。两周以后,在题为“玻利维亚面临死亡”(Bolivia is Dying)的演讲中,他 166
宣布了拉美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连串计划。在阿根廷1989年的总统竞选中,梅内姆自始至终在经济政策上含糊其辞,这导致人们认为他会像一个庇隆主义者那样行事。实际上,他衷心拥护的是传统的反庇隆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全盘非国有化。在巴西,所有的国会议员,包括多数党领袖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都是在总统命令已见诸媒体后才得知克鲁列多计划改革纲领(Sola, 1990:21)。在波兰,作为马格达伦卡(Magdalenka)4月协议和6月大选的结果,马佐维茨基(Mazowiecki)政府在1989年8月上台执政。新政府的经济计划9月29日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纲领的证据(Haggard, 1986; Remmer, 1986)显示,减少政府开支——实际上就是减少政府部门的雇员——是个完成情况最差的任务。

透露给公众,并由巴尔赛洛维奇在10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公布。这种纲领与4月协议有着根本的不同(关于这些文件,可见 Porozumienia Okraglego Stolu, 1989)。确实,正如团结工会领导人基尔赖米可(Bronislaw Gieremek)在国民议会上所抱怨的那样,“国会议员们只能从报纸上得知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纲领,这种方式是无法令人接受的”(Domaranczyk, 1990:193)。在匈牙利,拥护激进改革的政党 SZDSZ,在大选中败给了代表传统中央集权式经济计划的 MDF。可是现在看起来,MDF 也主张进行转向市场的改革。

由此可见,一定的政党或政府选择某种改革纲领与它在大选中是否支持这种纲领毫无关系。竞选中候选人的立场,远远不足以使人们预测到他执政后将如何行动。

民众支持的动力学

即使人民在开始时支持激进的改革措施,我们的现有资料显示,随着社会代价的出现,这种支持常常会迅速消失。反对改革的意见会通过民意调查、选举、罢工,有时甚至会通过暴动表现出来。

167

为什么人们在开始时支持某种改革的计划,而后却又反过来反对它呢?如果假定人们是根据冯纽曼—摩根斯特恩(von Neumann-Morgenstern)的理论来支持这种改革纲领,亦即,人们是由于预期某种改革纲领能带来最大的效用,才选择这种改革纲领,那么,就只能用“改革成功的信心下降”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支持会消失。

在公众反应的形成过程中,信心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人们对他们的未来消费走向的评价,依赖于他们对目前的牺牲能在将来使他们的消费增加的确信程度。如果他们相信这种长远预期的结果一定会发生,那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忍受短期的痛苦。这种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性的。因为人们并不知道短期的代价有多大,时间有多长。转变经济结构就像投入一潭不透明的水:人们不知道哪是底,不知道他们得屏息多久。他们只知道别人

在波兰,巴赛维茨计划于1989年12月底被采纳的时候,50.2%的应答支持着这个计划,反对的有14.2%。到了1990年6月,支持它的人数占32%,反对的占25%(Gazeta Wyborcza, 数期)。在巴西,Collor计划在5月份刚宣布时,对之有信心的人数占68%,到了9月份就下降到了60%(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WR-90-37, 1990年9月27日, p.11)。同时,对它的肯定看法一直稳居40%左右,否定的看法则是27%(Folha de S. Paulo)。秘鲁人对Alan García的支持,阿根廷人对Raúl Alfonsín的支持,巴西人对Plano Cruzado的支持的下降幅度更大。

告诉他们的事,什么将会发生和什么正在发生,以及他们是还在下沉或是已经上升,情况是不是已经好转等等。

信心就像是股票:它能够储存也能被花光用尽。有两种办法可能销蚀它:一是错误的预报,一是反复摇摆。

如果政治家许诺人们的生活很快就会得到改善,但实际上消费却一直在下降,人们就会怀疑政府的能力,也许政府的信誉可能都成了问题。应该注意的是,技术官僚有许多理由相信乐观的预测:他们必须让政治家们相信过渡时期不会持续太久,代价也不会太大。而政治家们也发现,如果他们当选,收入呈现下降的情形,那么在竞选过程中他们将很难向人们许诺什么。可见,经济萧条在任何国家都是可怕的诅咒。这样一来,政治家们倾向于对改革的近期效果作不切实际的承诺,然而人们用不了多久就会了解到政府或是没有能力或是不诚实。就我所知,除了1985年的玻利维亚政府之外,拉丁美洲任何国家的政府,在宣布其改革计划时,都没有让它的人民作好收入下降的准备。即使在波兰,虽然政府向来乐于为人民提供关于预期的困难讯息,但经济衰退仍比预测的情况要严峻得多。当人们学会不相信政府的时候,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就会下降,同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也就下降了。 168

反复摇摆的结果也许更加要命。如果政府放弃某种改革计划,转而发动新的改革项目,由于人民知道改革在过去失败过,所以他们更难相信现在的改革会成功。在巴西,人民经历了三个重大的和几个较小的改革计划的失败之后,在第四次改革的卡勒尔计划上台时,75%的应答者认为通货膨胀将继续增加或保持原状(Folha de S. Paulo, 1990年9月15日)。这个学习过程既影响个人经济活动,也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企业和消费者学会按照改革会失败的预期来行动,政治集团学会不公开他们对改革的支持。然而,政治家们除了摇摆不定之外别无选择。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如果他们真正关心改革的过程,最好的办法就是采取激进的策略,同时清楚地知道他们将在遇到公众压力时不得不使之缓和起来:最优策略是前后不一致的。诚然,1985年玻利维亚对总罢工的镇压使民众相信政府是坚决的。在1989年5月进行的选举中,支持继续进行改革的政党赢得了65.4%的选票(Carriaga, 1990)。但是,这种坚决是冒险的,不仅对于政治家来说有风险,对民主来说也有风险。关心民众支持的政治家,如果遇到太大的反对,必须放弃

Calvo(1989:228)认为,为了增加影响力,政策布告必须简明,但是简明的政策布告在许多问题上又缺乏可信性。他说“一些政策布告之所以不可信,原因是它们本来就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最初的决心。

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如果人们的信心消失了,那么就无法再实施激进的纲领。政府首先必须重建民众的信心。人们信心的减弱通常是在通货膨胀严重加剧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渐进的,确切地说是局部性的改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虽然违反常规的稳定计划往往宣布紧接着进行结构性改革,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试图增强人民的信心,同时又不让人民付出开放价格、减少公共就业或增加税收必然导致的代价。如果稳定措施获得成功,它将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打开门户;如果它们也失败了,人们忍受转型代价的意愿就会进一步下降。

如果假定人们重视的是将来消费的预期效用最大化,那么信心的下降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改革的支持逐渐会消失的政治现象。但是还有一些关于人们最初偏好激进策略的解释,按照这些解释,即使人们的信心没有下降,只是由于实际地承受了改革的代价,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也会消失。

169

其中的一个解释是,人们之所以赞同激进的策略是因为他们要寻求一种对自己的约束。假定现状是极其糟糕的,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或是由于短缺,人们对当前这种制度已经十分反感或厌倦。然而应当知道,一旦他们的消费水平下降到比现状还要低的程度,他们就会被引诱回到现状中来。人们之所以偏好激进的改革策略,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不可逆转性,它造成了与过去的一种决裂(Elster,在1984年曾分析过这种理性)。但是一旦改革出现挫折,人们还是想走回头路。

第二种解释是,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和对消费的超暂时性替代的态度是有区别的(Kreps and Porteus, 1978, 1979a 和 b)。假定人们知道他们的消费变化沿着 $C, C, C, \dots, C', C', C', \dots$ 的路径进行,这里 C' 表示一种期望价值与 C 价值相等的彩票。但没有人知道从 C 到 C' 的转变什么时候发生。有人已经证明:“如果中奖的几率是一样的话,那么,较早的抽奖,比迟迟开奖的抽奖风险要小。”(Weil, 1990: 32)可见,不愿冒风险的人宁愿早一点有结果。他们愿意尽可能早地看到改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所以他们赞同激进的策略。但是,假定一旦这种不确定性结束,至少一部分人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条件严重恶化了。这时,他们就宁愿再回到他们以前经历过

例如,可以设想你承受着一种持续的痛苦。你知道你将来在某一时刻不得不做手术,而手术结果可能是完全恢复健康,也可能不得不卧床一年:这些事件与你眼前的痛苦具有相等的预期价值。

的确定水平 C。

最后,第三种解释是由罗文斯坦(Loewenstein, 1987)提出的,他列举了一些实验证据,这些证据说明一些人不愿意等待定将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他论证说,人们可以抛开预期来评价消费。在事件自身“转瞬即逝,生动鲜明”(fleeting and vivid)的时候,预期在对消费路径的评价中占据支配地位,这时,一些人就宁愿这事件快点结束。人们之所以赞成激进的,是因为他们不想等待他们知道或迟或早都会承受的那种艰苦;但是当他们承受到这种困难时,他们实在不喜欢它们。

这些假设都导致这样一个结论:人们可能宁愿要 R 而不要 G,但是一旦 R 被投入实践,并且人们承受到代价,他们就会改变偏好,更喜欢 G 甚至 S; 170 因而,不论我们对民众支持做出什么假定,下面描述的动态变化都会发生。

经济改革的动力学

即使当初采取的策略享有广泛的支持,能否横越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的峡谷前途未卜,改革之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能够确定的是,即使选民们偏好渐进的策略胜过激进的策略,激进的改革也可能比渐进的改革前进得更远。我这里说“前进得更远”(advance farther),指的是更多的改革被完成;也即是说它宣称的目标达到了,并且政府继续推进改革。

现在假定政府按照自己的决定,发动渐进的或激进的改革。在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一季)可以用某种方式(包括记录罢工和暴乱)了解公众的意见,看他们是愿意继续进行当前的改革,还是要求更换一种不同的改革纲领。

我们观察第一阶段末($t = 1$)的情况。图 4.3 中路径 GS(读作“从渐进

我遵循尼尔森和她的合作者的研究方式(1990:336),他们试图解释“政策决定被贯彻的程度,而不是采取的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我对使用“成功”这个词感到犹豫不定的原因是,改革与一定经济成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Williamson(1990:406)指出,在 10 个进行全面或部分改革的拉美国家中,1988—1989 年有 4 个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6 个国家是停滞或下降;在没有进行改革或最近才进行改革的 11 个国家中,一个出现了增长,另外 10 个是停滞或下降。在改革与经济成效之间存在着某些关联,但这个关联性并不很强。Remmer(1986:7)在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的报告中说,“在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与取得希求的经济成果之间,只有中等的相关性”。Dornbusch(1990:312)担心,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成功的稳定经济计划,并不能恢复经济的增长。至于为什么改革可能并不明显地提高经济成效,至少可以想到三个原因,第一,存在一些外部的事件,比如 1986 年玻利维亚出口价格的下降。第二,经济的暂时恶化,在有的改革中属于其言明的目标结果的一部分。比如,通过取消补贴而淘汰一些无效率的企业会造成失业。第三,一些改革的措施设计的不合理并且可能导致意外的后果,如巴西的 Plano Cruzado。

改革回到先前状态”)表示放弃渐进性改革而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路径 GR 171 表示改革加速(从 G 转变到 R,即从渐进策略转变到激进策略),路径 RS 代表放弃激进改革而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路径 RG 描绘减慢改革的结果(从 R 转变到 G,即从激进策略变为渐进策略)。这里的重要假定是,向改革前状态的回归是逐渐的;回归的速度取决于旧体制已经被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如此,下述的几点就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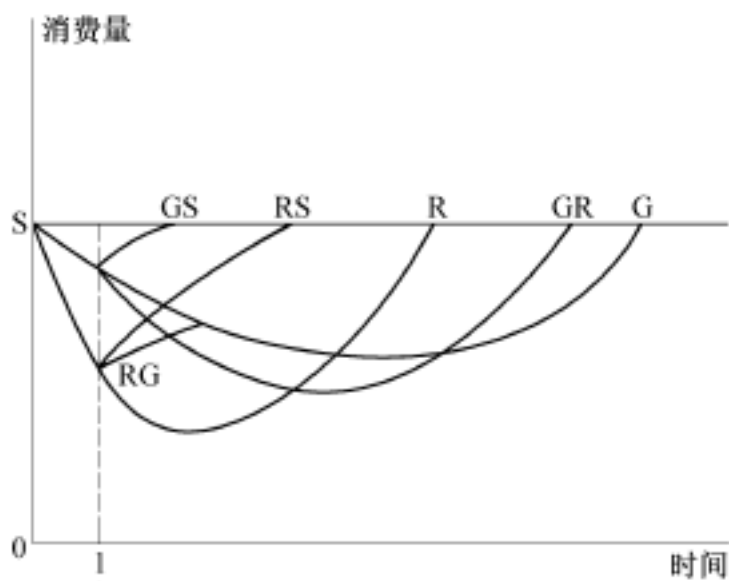


图 4.3

(1)如果在 $t = 0$ 时人们的投票基础是想把预期效果最大化,并且投票结果决定 G 或 R 优于 S,如果时间偏好率保持不变,那么在 $t = 1$ 时将不会选择回复到原状。但是,如果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由于在第一阶段发生的各种事情被破坏,或者,如果人们由于承受了改革的代价而改变偏好,选民们 172

一些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经济非中央集权化的改革被逆转了,因为经理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并且随后发生了混乱。尼尔森(1990)在列举改革失败的例子时提到以下纲领: Belaunde(秘鲁, 1983年1月至1984年3月), Kaunda(赞比亚, 1982年12月至1987年5月), Sarney(巴西, 1986年2月至1987年1月), Garcia(秘鲁, 1985年中至1987年中期)。

1990年5月瓦文萨以“加速改革”特别是私有化为旗帜,开始竞选波兰总统。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一种典型的情况是,在宣布的一揽子计划包括稳定经济和一些结构性改革措施,特别是减少公共就业的措施中,只有稳定经济的部分被贯彻实施。在波兰,破产的企业应该于1990年7月1日倒闭,但是政府没有勇气去执行纲领的这一部分。

这些结论是根据图 4.3 和符合假设的许多例证推论出来的。这些例证与合理的消费的时间路径,和广泛的时间偏好相吻合。但是我还没有构建出完整的模型。

就可能宁愿放弃改革而不是继续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在第一阶段激进的改革此时已使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回复到原状的代价比实施渐进改革要大。所以,在 $t=1$ 时,若在 GS 与继续 G 之间选择,选民们可能选择 GS。但若在 RS 与继续 R 之间选择,他们可能选择 R。桥梁已经被烧毁;要想走回头路就必须重新架桥。

(2)如果在 $t=0$ 时,选民们偏好 G 优先于偏好 R,但 R 被采纳。到了 $t=1$ 时,人们将希望减慢改革的速度: $RG(1) > R(1)$ 。但是即使 $S(0) > G(0) > R(0)$,他们可能仍然偏好 $RG(1)$ 优先于偏好 $RS(1)$ 。可见,如果政治家们听从公众的意见,在 $t=1$ 时,改革速度将放慢,但改革不必被放弃。此外,即使 $GS(1) > G(1)$, $RG(1) > R(1)$,也并不等于 $GS(2) > G(2)$:在 $t=2$ 时,过渡后的前景更加接近了,对增加消费的预期可能压倒维持过渡的代价。在 $t=2$ 时改革仍将被减慢速度,但改革不会被放弃,如此等等。

(3)如果改革在某个时候不被逆转,那么往后改革也不会被逆转。在一定时刻改革便穿过了不可逆转的时刻。在激进的策略下消费下降的谷底越早出现,或者说——这两种说法是等效的,在激进策略下消费水平越早地超过渐进策略下(仍在下降)的消费水平,不可逆转时刻就会出现得越早。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如果选民们高度相信,他们现在承受的改革代价,将换来未来的受益;如果这种信心在整个转型期都不会动摇,他们就会在改革时投票赞同采取激进策略,并在此后的每一时刻都认可激进策略。如果他们的信心下降,或者,如果最初的偏好不是在预期价值驱使下作出的,改革就将被减慢或者被暂时逆转。

(2)如果选民们对改革的前景只有中等的信心,他们就偏好渐进策略优先于激进策略。如果在这种条件下选择了渐进策略,一旦人们的信心下降,改革就可能被放弃,而要是选择了激进的改革策略,它可能只是被减慢速度。

(3)如果选民们偏好渐进的改革,但是政府提出并发动了激进的改革,改革在第一个选举机会到来时就可能被逆转。如果这时它未被逆转,以后 173 它就不再会被逆转。另外,在激进的改革下,只要消费急剧下降,选民们将倾向减慢改革的速度。

卡勒尔计划就是一个拆桥的有趣实例。由于冻结了几乎所有的财产,政府确保自己无法靠从国内市场借钱补贴财政赤字。

把这些发现加在一起,导致的是一个惊人的结论。最有可能成功的策略并不是社会代价最小的策略。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即使选民们在开始时偏好渐进的改革方案,激进纲领仍然更可能使改革前进得更远。因此,如果政治家们关心改革的过程,即使他们明明知道激进策略在公众压力下必须调整、缓和,他们仍有动力采取与公众的偏好相反的激进的改革纲领。他们的最优策略是前后不一致的。

收入分配的影响

然而应该注意,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选民的。假定改革是公平的,即在各种改革策略下,过渡的代价对于所有个人都一样:消费的时间路径仅仅由起始位置决定。图 4.4(a)描绘了 3 个人的时间路径。如果这些选民们有相同的时间偏好,那么在任何时间的选举结果都是全体一致的。但是,选民的偏好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个人可能具有不同的时间偏好,在每一种改革策略下,他们可能面临着不同的时间消费路径。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如果要继续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就必须时时得到多数票的支持。

关于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动力,一种分析方法是,假定在初始消费水平既定的情况下,选民面临的消费路径相同,但是他们的时间偏好不同。假定选民 W(富人)对任何改革都没有信心,他的偏好顺序是 $S > G > R$; 选民 M(中产阶级)对改革有些信心,他的偏好顺序是 $G > R > S$; 而选民 P(穷人)对等待已经厌倦,他的偏好顺序是 $R > G > S$ 。这样,在 $t = 0$ 时,在两择一的多数票选举中,G 或 R 均击败 S,而 G 击败 R。如果操纵议事日程的政党只让选民在 R 和 S 间进行选择,R 胜了 S,激进的改革被发动,并将按上文分析的情形动力支持去展开。

但是改革不仅有总体性影响,同时还会带来深刻的分配性影响:它们对不同阶层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假定选民们具有相同的时间偏好,但他们在每一种策略下面临的消费路径不同。我们看看图 4.4(b)中描述的情况。¹⁷⁴ 在这里,激进的改革增加不平等,而渐进的改革是公平的。此时,W 偏好激进的纲领优先于偏好渐进的纲领;P 由于受到激进改革的严重伤害,所以他偏好渐进的改革;结果,何种策略能获得多数支持依赖于选民 M,而 M 是中间性的选民。相反,如果激进的改革是公正的,而渐进改革增加不平等,如图 4.4(c)所示,那么 W 赞成渐进改革,P 赞成激进改革,M 还是发挥决定作用的因素。

由此可见,不以改革的总体代价为转移,改革的分配性影响对于改革的政治动力来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决不可对改革的分配影响等闲视之。不幸的是,一旦超出这种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猜测而已。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改革改变了阶级关系。根据各自在旧体制下的地位,一些人

有充分理由预期,在他们可以想像的未来,改革会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恶化;另一些将期待从改革中立刻得利;还有一些人预期他们的消费将沿着前面描述的模式中的某一种变化前进。所以,虽然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在不同的改革纲领下,人们所面临的消费前景,取决于他们在旧体制的结构中的地位,但是在旧经济体制下中等收入的阶层,并非必然对改革策略保持中立性的偏好。事实上,我已经引用的资料证明,至少在东欧,在旧体制下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人们比中等收入的人们更可能受到激进改革的伤害。这里我只提出两点猜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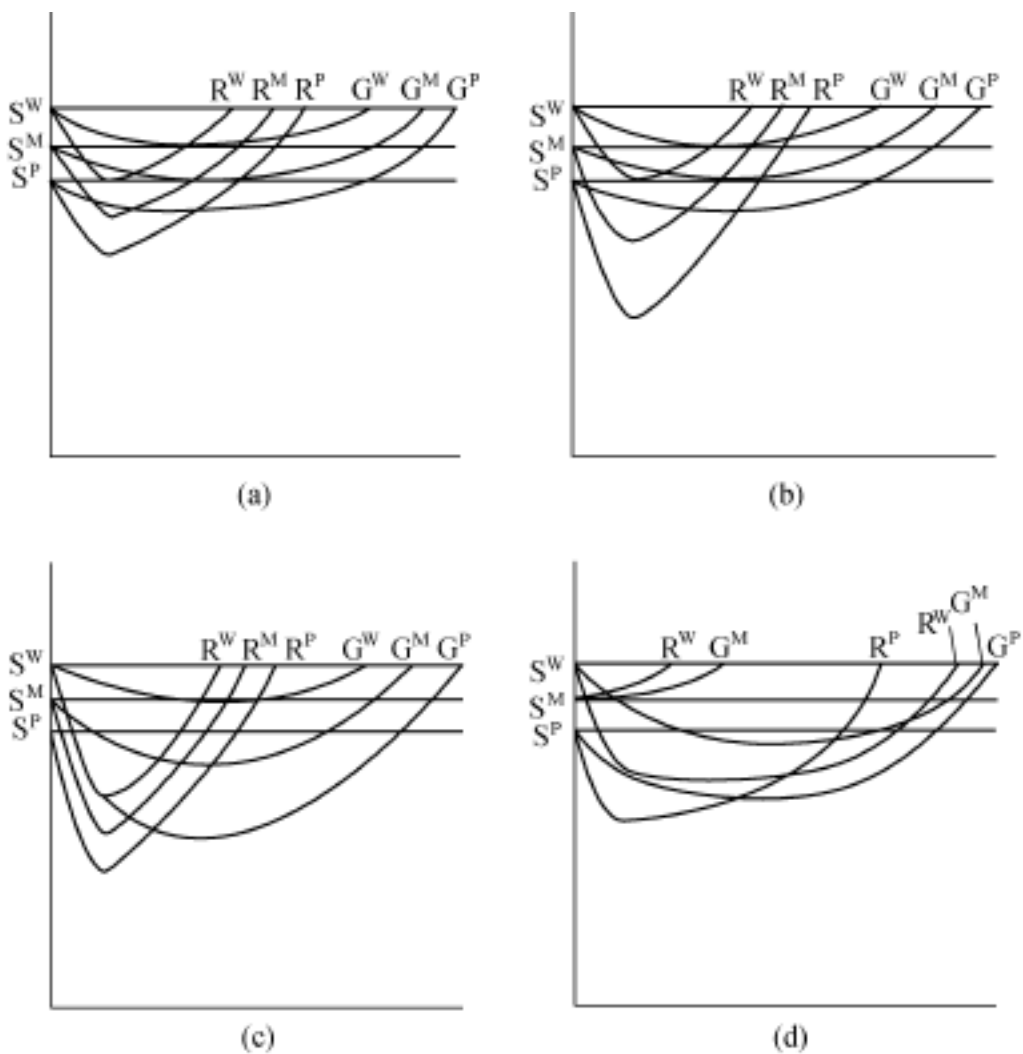


图 4.4

(1)如果收入最高的群体受到改革的伤害,而中等收入的群体会获益,如图 4.4(d)所示,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选票属于收入最低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对中间性选民偏好的分析——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用图 4.3 已含蓄地作过处理——涉及的是在改革之前现状下的贫困阶层。因为保持旧体制意味着保持他们的贫穷状态,所以他们支持改革。如果在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下他们的消费路径差别不太大,如果他们相信政府,那他们在开始时支持激进的改革;否则,他们将支持渐进的改革,其动力上面已经做过分析。

(2)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分析都假定人们考虑的是未来。但是,改革可能对一部分人造成生存威胁。如果改革使一些人的消费下降到某个最低水平线以下,他们就不能等待不同的改革策略把自己耗完。所以,政治上的反应可能取决于某些临界点:那些由于改革而下降到绝对贫困线以下的群体,即使假如他们挺过改革期,则将有光明的未来,但是他们仍然必定反对改革。

在收入比较平均的国家进行改革,从政治上看较为容易还是较为困难?我们先假定那些新近生活水平下降到贫困线以下的人们,因为无法再等待而立即反对改革。让我们通过根据巴西和苏联情况构造的模型之比较来分析一下改革的政治影响。巴西和苏联这两个国家改革前平均消费相当,但收入分配却差别很大。在巴西,收入的分配十分不平等。人们都习惯于使用“比利时—印度”(BelIndia)一词来刻画这种极不平等的消费模式:有一个由上流阶层构成的比利时,周围是一个其余人口构成的印度。在苏联,按照比较的标准来看,他们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是较小的,但是大部分人的收入只稍高于贫困线;据估计,他们的饮食构成只是所需最低热量的 105% (Matthews, 1986)。

我们先假定转向市场的改革只是降低消费总量,分配保持不变。如图 4.5 所示,两条曲线都向下移动。在巴西,贫穷家庭的数量增加一些。但是在苏联,每个人都跌到了贫困线以下!根据我们的假设,人们将普遍地反对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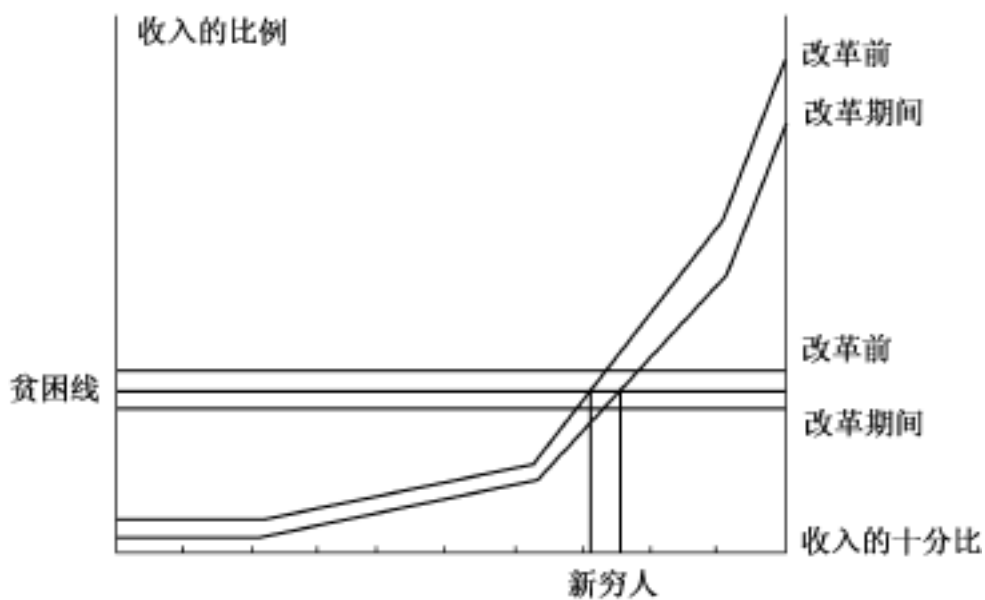


图 4.5

增加不平等的分配性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这个对比。在巴西,落到贫困线下面的人较多,在苏联则较少。但是,在先前收入比较平均的国家中,发现由于改革使自己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比仍然较高。

此外,在分配更不平等的国家,实施重新分配的措施会更加容易实施。在巴西,对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收入最高者征收 30% 的附加税,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 20%,能使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二的家庭的生活标准提高四倍。在苏联,对收入较高的人们征税,将会增加新穷人的比例。

可见,如果改革在两个国家的总体代价相同,在改革开始前收入更平均的国家里,由于改革而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数比例将要高一些。这种分析依据的是经过大量剪裁的事实,但它表明,至少在假设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拉丁美洲国家比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更容易接受改革。

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对人们如何看待改革具有重大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灌输的惟一一个价值观念就是平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这种价值观念可能会破坏市场导向的改革。当然,平均主义的遗产,正如卡拉斯卡-波宾斯卡(Kolarska-Bobinska, 1989)在她对波兰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她指出,波兰社会不能容忍不平

假定没有严重损失,国家收入中约 2% 就足以使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到贫困线之上。见 Cardozo and Dantas, 1990: 148。

等,但只是因为这些不平等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这位作者指出,事实上,1980年以来,波兰人对不平等和失业的容忍性已经大大地增强了。在1980年,70.6%的应答者“无保留地”(without reservations)接受限制最高收入的原则。在1981年,这个比例就下降到50.7%,1984年下降到29.6%,1988年则下降到27.5%。人们对平等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蓝领工人、受教育较少和低收入阶层,还有那些不在管理者位置上的人们,最不能容忍收入的不平等。群体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深刻:1981年有68.8%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有保留或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原则,而71.6%的有技术的工人接受这种原则;1988年,只有37%的专家支持限制最高收入的原则,但却有63%的技术工人和70%的无技术的工人接受这个原则。此外,人们这远未证明平均主义价值观念在东欧社会里,比在拉美国家更流行。在最近的一份调查中,78%的巴西人赞同这个命题:“社会生产的任何财富都应该尽可能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60%的人不赞成“只要国家富裕,存在许多社会不平等也没有关系”。

178

结 论

在弄清楚人们支持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之后,我们预期的经济改革能走多远呢?我们已经看到,经济改革的道路不会平坦。最可能的改革路径是这样的:先发动激进的改革,最终放慢速度或部分逆转,再发动较为缓和的激进改革,但这时公众信心已经下降,再减慢速度或逆转,直到一个新政府上台宣布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决裂,循环又重新开始。确实,拉美国家的经验显示,那些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反激改革的政治势力一旦上台执政,就会采取激进的改革纲领,反之亦然。所以,我们不应该期待改革要么“成功”(succeed)要么“失败”(fail),而应期待改革断断续续地进行:前进,跌倒,

Maravall(1981:33)在1977年向西班牙的工人们问过同样的问题,62%的应答者作了肯定的回答。

Folha de S. Paulo, 1989年9月24日, p. B-8。我感谢 Jose Alvaro Moises 让我注意到这个调查资料。

退却,再前进。关于拉美国家改革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不同于经济状况的报告),尽管存在各式各样的重大失误、崩溃和动摇,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是前进着的(报告见Williamson,1990)。

过去的失败对于新的尝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保戈丹诺维茨-宾德尔特(Bogdanowicz-Bindert,1983:65—70)认为过去的失败增加了新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然而,底亚茨-阿利简德罗(Diaz-Alejandro,1981:120)认为:“失败的稳定时间越长,新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与尼尔森的观点(1990:360)相反,我认为这些论点并非必然互相矛盾,它们涉及的可能是不同的角色。一方面,精英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会设计更好的纲领,另一方面,人们作为经济活动者和政治活动者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了教训,他们预期新的改革也将会失败。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预期在每次改革失败后,都将会有更全面更一贯的纲领提供给多疑的民众。但是,如果经济活动者不相信政府宣布的政策,这些政策本身就难以奏效:如卡尔弗(Calvo,1989:217)所指出的:“同样的政策,如果具有完全的可信性是最优的政策,但是如果只有不完全的可信性,就成了次优的政策。”所以,每次新的改革尝试都增加了反复无常性:精英们对自己的计划蓝图更加自信,更倾向于不管公众意见如何,都要实施这些计划。老百姓则变得更加倾向于对改革计划冷眼旁观直到它失败为止,或是抵制这些改革计划。

179

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制度能够得到巩固吗?海伽德(Haggard,1986:164)认为:“民主的僵局,使改革呈现出一种‘之’字形前进或停停走走的局面,但是不一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导致镇压或专制政权上台。”我的看法与此不同,我认为,尽管存在“之”字形的前进方式,在民主条件下改革能前进得相当远,但是改革会引起政治动荡。

第四节 经济改革的政治影响

如果经济改革是在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们围绕着分配而进行的冲

这个假设暗含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观点:对改革作横断面的评价非常容易引起误解。关于这一点可从对于智利的争论中看出。在1980年,人们的看法分歧严重;经济在增长,通货膨胀较低但是失业率很高,工资灾难性地下降,社会开支被忍痛削减。到了1982—1983年,国家处于一种十足的灾难之中,经济衰退到了1930年以来的最低点。到了1986年,经济出现了缓慢的增长,但是底层40%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仍低于1973年,每人平均收入稍微高于1971年,还存在财政赤字,私人投资也很消极,如此等等。而到了1989年,它的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舆论广泛地认为,包括那些继承了专制改革遗产的民主派的政治家们也都认为,经济处于罕见的良好状态。

突必须被纳入制度的轨道,所有群体都必须通过民主的制度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公开放弃其他策略。不管他们的要求是多么迫切,作为政治群体,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使自己的意愿服从民主制度的裁决。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和等待——相信这种制度将会在下一次投票中为自己提供机会。他们必须以民主制度的日程表作为采取行动时间的参照,思考时想的必须是即将到来的选举,谈判形成的协议,或至少是财政年度等时间段。他们必须采取这样的立场,即英国工党主席迈克古可(John McGurk)在1919年表达的立场:“我们要么拥护宪政,要么不拥护宪政。如果我们拥护宪政,如果我们相信政治武器的效用(我们的确是这样,不然我们为什么要组织工党呢?),那么,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在投票中获得多数票,就变卦,就要求采取产业工人的行动,那就是既不明智也不民主的。”(Miliband, 1975: 69)

因此必须在政治势力的组织处于两种极端的条件下,改革才能顺利推进:政治势力的组织必须非常强大而且支持改革纲领,或者这些政治势力的组织必须非常弱小所以不能有效的反对改革。在政治势力——特别是反对党和工会——强大到能够破坏改革,但却未强大到承担取消改革的全部代价时,改革最不可能获得推进。像海伽德和考夫曼(1989:269)指出的那样: 180
“最大的困难来自中间性的情况,此时,劳动阶级能够动员起来以防卫自身的切身利益,但却不清楚自身在政治体系中究竟该处于何种长期地位。”说得再明白一点,倾向改革的政府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像西班牙政府所做的那样,与反对党和工会合作;或者是像玻利维亚的埃斯腾索罗政府对待工会那样,毁掉它们。

由于两个原因,工会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工会把一些人组织起来,这些人的要求是工资压力的潜在根源。如果工人们和其他工薪雇员们具有市场能力,他们就会利用这种力量以推动增加工资的要求。在改革期间,工资压力是惯性通货膨胀的根源;它延缓经济复苏,并造成了部门之间及职业之间差距的增大。对工资的约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工会联合会能够控制成员的行动。无论是利用国家赋予的强制力量,还是依赖他们的说服力量,工会的领导人能劝服它的普通成员等待改革

提出这个制度时间概念的是 Norbert Lechner。

工会组织既不太强也不太大的最好例子也来自阿根廷。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阿根廷的工会联合会要求对所有的基本消费品实行价格控制,要求进行外汇管制,结束政府的私有化计划,放弃精简政府管理人员的计划,大幅度地增加工资(拉美每周报道,WR—90—11,1990年3月22日)。

成果的出现。工会有一种如西班牙语 poder convocatorio 所精彩描述的东西：把其成员行为控制在合乎集体利益范围内的力量。

工会为了发挥作为政府合作者的作用，必须建立广泛的而又中央集权式的组织，而且必须维护政府的信誉。工会组织必须是广泛的：必须把大多数潜在成员联合起来。它们还必须是集权的：工会组织必须能够控制会员的行动。最后，它们还必须相信政府：相信政府能够公平地分配改革的代价和利益，并且也有能力指导改革。

这个论点不仅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大量证据所支持：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时，具有强大包容性而又中央集权的工会，愿意约束他们的工资要求；这个论点也为一些新的民主国家的经验所支持：在 1976 年后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党主政的政府在失业率很高的条件下提出了一个工业现代化纲领——直到最近工会还支持这个纲领。在波兰，团结工会作出暂停其活动的惊人决定，以协助后共产党政府发动改革。在巴西，“结果取向的工联主义” (results-oriented unionism) 运动也愿意这样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的总书记成了第一个出任政府劳动部部长的工会领导人。 181

政党则代表更多方面的利益，它们具有潜在的更广泛的影响力。就选择政府和决定是否采纳特定的结构转变方案上，它们在提出其他的选择和塑造人们的态度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然而，政党，至少是现代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在规范其党员的行动方面没有工会那么大的力量。它们可以拒绝处理一些他们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或不适当的要求，但是它们面临着其他政党的竞争，面临着民众采取超出议会允许范围的形式动员起来的威胁。

总而言之，为了推进经济改革，政府必须或者寻求反对党、工会和其他会员众多并且中央集权的组织的广泛支持，或者是想办法削弱这些组织，使它们无法有效地反对改革。很明显，后面这种策略涉及民主的问题。如果政府冲入围城内以反击反对改革的势力，那么，这个政府是否还是民主政府？再者，如果政府采取不顾公众反对，强行推行改革的策略，那么军方的立场就成为关键。对那些试图不顾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反对派的反对，而强行推进改革的人，和那些决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反对民主组织起来的拥护改革的多数派的人来说，非民主的方案是否可行，需看

Antonio Rogerio Magri 以电业工会主席的身份，发表诸如“我们工人所要求的是企业增加投资，以便经济能够增长。对于就业来说，没有比经济增长更好的保障” (Journal da Tarde, Sao Paulo, 1987 年 7 月 27 日, p. 12) 讲话的时候，他打破了巴西的工会主义传统。

军方对它所持的立场。当军方力量超然于平民控制,并以一种政治势力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群体就会从事亨廷顿(Huntington, 1968)所说的普力夺政治(praetorian politics),亦即人们采取这样的策略:“如果你不降低要求,那我们就请求军队来干预。”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制造混乱以引起军方的干预。”在军队是另一股独立的势力时,竞争的政治过程使得军方干预永远有可能发生。

182

与这种两极选择相呼应,新的民主政府能够采取两种相反的策略来控制经济冲突,这两种策略的对立在于它们分别侧重经济逻辑和政治参与。改革导向的政府可以把它们自身超然于民众的要求之外,自上而下地强行贯彻一种经济政策;或者,政府在致力于动员社会支持改革纲领时,能够通过与各政党、各工会以及其他种种组织之间的广泛协商,求同存异,形成共识。这时政府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使各种政府势力都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从而使这些改革方案在经济上的合理性打折扣;要么尽量破坏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面临着这一两难选择,面临着因改革必然带来的社会代价所造成的阻力,政府往往会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下所必然导致的专家治国性质的政治,和为求得共识而需要的参与性政治之间摇摆。

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是对技术经济蓝图的实际应用,而这种蓝图是以北美大学高墙大院里提出的理论为根据的;同时,这些蓝图往往是国际借贷机构强加给这些政府的。市场导向经济改革的蓝图建立在高度技术性的效率模式上。在勾画这些蓝图时,要作出难以对一般公众解释清楚的选择,还要作出并非总能被公众理解的决定。而且,这些改革蓝图要求实行的某些措施,惟有在出人意料地采用时才能获致最大的成功。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改革是一种从上面进行控制的策略。为了实现专家们的计划,需要贯彻一些特殊的措施,这些措施常常未经协商就被采纳,有时是出人意料地被宣布。改革的政策不是经由广泛的参与协商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由各种利益代表达成一致而产生的,更不是从妥协中产生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力图完成结构性改革的政党总倾向于操纵议事日程,以使选民们接受激进的改革方案。猛药策略的成功依赖于它一开始表现出的残酷性,依赖尽快地实施最激进的措施,依赖于忽视各种特殊利益和各种

如果人们都知道某种商品的价格要开放,在这个措施实施之前就会出现对这种商品的抢购;如果人们都知道在某一天要冻结工资和价格,工资和价格就会在冻结措施开始之前被尽可能地提高;如果人们都知道将冻结存款,就会赶紧把钱从银行中提出来。

即时的要求。尽管存在着要求使改革变温和,或是变慢的强烈呼声,坚决地进行改革的政府都必须不理睬这一切,而继续推进改革。因为改革者们渴望尽快地前进,一切政治冲突只是浪费时间。所以,转向市场的改革或是靠行政命令来推进,或是强行通过立法机构来实施。因此,瓦文萨由于担心国民议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规定的7天时间内不能通过11项重要的经济立法,便提出应给予政府使用政治命令进行统治的权力。由于最初的改革计划遭到失败,绝望的阿根廷总统梅内姆考虑不召开议会的例行会议,而依据政治命令进行统治。根据考纳汉(Conaghan)、马洛伊(Malloy)和阿布伽泰斯(Abugattas)(1990:20—21)等人的观点,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行政权力都会广泛用来推行改革的计划。在1980—1984年间秘鲁颁布的675项法律中,有463项是行政法令。改革的观念内在地存在着这种潜能。 183

与此同时,改革要求在投票中得到人们的支持,要求工会和其他行业协会发挥其功用,有时还要求反对党在议会中的支持。由于改革会造成暂时性的代价,所以它总会引起抵制。一些人会呼吁,改革的社会代价太大,应该适当软化。另一些人会强调他们的情况特殊,应该予以特别地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倾向于寻求一致,解释和论证它的改革纲领,倾听人们的呼声,寻求妥协。他们力图让反对党、工会和雇主协会参加经济决策,希望这可以减少政治冲突,促使各股经济力量在行动上至少与继续改革纲领的基本路线保持一致。

通过讨价还价而达成的社会协议,通常要求工会答应约束工资要求,作为回报,政府答应提供一些福利项目,并制定控制通货膨胀、鼓励投资和扩大就业的经济政策。在1958年后的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最初的社会协议确立了产业关系体系的雏形,随后的协议旨在调整具体的工资和就业指标, 184

波兰政府的一个北美顾问,近来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这个纲领能否成功,全在波兰人自己了。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个纲领是合理的。只有那些屈服于民众压力的人能够破坏它。”这里,我听到了布莱特的回应:“如此说来,那么对于政府来说,解散民众比另外一次选举不是更简单吗?”

Lechner(1985)和 Przeworski(1987b)讨论了这种社会协议的经济逻辑和政治先决条件。Cordova(1985),Pappalardo(1985)和 dos Santos(1987)等人对于不同国家的经验作过评论。

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在大部分新生的民主国家,这种协议看来难以成功,原因如下:

(1) 社会协议总带有排他性。施密特(1984:365)正确地指出,排他性这个特点正是社会协议定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拉美,作为工会成员的工人只是民众的一部分(Grossi and dos Santos, 1983:143)。李奇纳(Lechner, 1985:30)诘问道:“以从事生产的工人为基础的工会运动,能够代表从事各种再生产为基础的民众运动吗?”

(2) 工会只有在会员众多,中央集权,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时候,才会加入这种协议。否则,他们没有理由相信,以他们目前暂时无法使用其最大限度的力量,将换来未来的利益。另一方面,雇主们可能更愿意立刻作出一些让步,他们害怕强大的工会,并反对扩大工会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有可能会在将来被用来反对雇主们。政府对于工会也有矛盾的心理;政府一方面想要工会的合作以控制工资,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工会强大到足以左右经济政策。

(3) 即使私营企业的工会愿意参加这种协议,国营企业的工会却没这样做的动力。在私营企业中,工会利用约束工资为条件换取就业和投资,但在国营企业,无论是就业还是投资都不依赖于雇员的工资增长率。因此,国营企业的工会既不会面临失业的压力,也没有面临投资的窘境。而且,改革通常包括减少公共开支的措施,这对这些工会却是一种威胁。

这些障碍是如此的棘手,以至于大部分情况下社会协议难以达成。即使形式上签署了协议,它往往也很少被遵守。

由于任何改革过程都必然导致物质生活条件的暂时恶化,所以无论是法令,还是协商都不能使经济状况迅速获得改善。政府明白,法令可能引起反抗,协议又往往无法取得他们想依靠法令取得的结果。用阿根廷前经济副部长的话说,政府发现,“实现政治参与的条件,与建立强有力政府的条件是正相冲突的”。随着压力的增长,在寻求和平解决冲突时,政府开始在依

Cordova(1985)对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在社会协议方面的经验作了很有用的比较性描述。关于西班牙的情况,见 Garcia(1984), Gonzalez(1985), Perez-Diaz(1986)。我认为委内瑞拉由于从石油中得到了许多租金收入,所以它的情况应予以区别对待。Karl(1987)和 McCoy(1987)对委内瑞拉的社会协议作了截然不同的分析,但在我看来,前者过高地估计了石油的作用,而后者则对石油的作用评价不足。

Juan Carlos Torre, 1987年6月在圣保罗大学“政治过渡:协商的必要性和局限”(Necessidades e limites da negocia ao)研讨会上的发言。见 Guilhon Albuquerque and Durham, 1987。

靠法令还是依靠协商之间摇摆起来。由于通过达成协议来消除冲突的想法十分诱人,所以在反对派反对改革的呼声高涨的时候,政府总想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而在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协议使得改革处于危险之中时,政府又倾向于专家治国的主张。他们答应凡事经过协商,但又利用法令,让坚持到最后的合作者大吃一惊;他们制定法令却又希望赢得一致。其结果是,政府显得缺乏明确的改革思路和推进改革的决心。国家开始被视为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这就到了像魔术师另换一套把戏的时候了。一旦人们对改革的信心消失了,新上任的政府就企图以老百姓还未学会不信任的东西,来与过去划清界限。改革令人上瘾,每次都需要更大的剂量以减轻那累积的绝望。市场导向的改革可能具有合理的经济基础,但是从它之中却产生一种巫术政治。

这种政治作风的结果是破坏代议制度。当候选人在竞选期间隐瞒自己的经济纲领,或是政府采纳与他们在竞选中的允诺完全相反的政策时,他们是以有系统的方式昭告人民,选举在形成经济政策方面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当政府用法令宣布一些极其重要的政策,或是不经辩论就在立法机构强行通过它们的时候,政府是在让政党、工会和其他的代议机构明白,它们在制定政策方面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当政府只是为了得到对自己已经选择的政策的支持而恢复谈判时,它们只会培养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反感。

于是,民主就被削弱了。选举、行政法令和间歇性爆发的抗议,便成为政治过程的全部。政府靠法令进行统治,采用权威主义的方式,不过往往没有太大的压迫。国家的所有权力都被集中在行政者手中,而他们在管理经济方面又毫无绩效可言。人民只有定期进行投票的机会,但这种投票并不是选择。政治参与衰退了。政党、工会和其他代议组织面临着选择:要么消极同意,要么以超出议会允许的形式表示抗议。 186

也许这种后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确实,停停走走的改革模式之所以被采用,其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一开始就不完善。在宪法条款明确规定行政机构在实施一项政策之前,必须得到议会的正式同意,在存在着有效的代议机构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国家里,若政府得不到相应的支持,就不能发动改革。改革的纲领必须通过代议机构,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投

Pacote Bresser 在 Sarney 总统的私人授意下,在一个讨论社会协议可行性的会议前夕发表的。

关于对政府政策不稳定性的抱怨,见在圣保罗大学社会协议研讨会期间雇主协会的代表和工人领袖的表达 (Guilhon Albuquerque and Durham, 1987)。

票得到认可。西班牙的社会党政府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推进改革的,它在保持广泛支持的同时,成功地带领国家实现了痛苦的工业复兴(Maravall, 1990)。但是这在新兴的民主国家中似乎是一种例外。

一旦民主遭到削弱,追求改革就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在某一时刻,人们可能不得不在放弃改革与抛弃代议民主制度之间作出选择。实行专制的诱惑是不可避免的。七嘴八舌的议论,不得不遵循一定的程序而导致的延误,以及看来不合理的冲突,必然使改革的拥护者难以忍受并失去耐心。在他们看来,改革一目了然地既是合理的又是必然的,怀疑、反对和坚守程序是非理性的。结果,专家治国挺身而出,反对民主,滋生出一种不顾公众抵制而往前走下去的倾向:为了继续改革(perestroika)而压制开放(glasnost)。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持续存在的痛苦,人们的信心消失了,政府显得越来越无能。于是,人们就会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以牺牲民主作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187

注意,1976年意大利共产党决定支持政府的紧缩政策时,它通过夜校的经济课程,对100万工人解释为什么需要采取紧缩政策。

“要不是因为有‘那种体制’，我们早就像西方那样了”——这是东欧三段论的前提。但是许多国家从未经历过共产主义，却依然是南方的一部分；世界人口的一半生活在资本主义的、贫穷的、频发的而又有组织的暴力统治的国家里。正如巴西的一位商界领袖所评论的那样：“我们的商人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但是他们忘了资本主义也遭到了极大的失败。”贫穷、不平等、无效率、压迫和外国的控制，这是数十亿人天天经历的事实，对于他们来说，西方依然是北方。

那么，我们凭什么来完成上述的三段论推理呢？凭什么相信，一旦“那种体制”不复存在，东欧就将走向一条迈向“民主、市场和欧洲”的道路，一条迈向“西方”的道路呢？正是这个问题促动我写这本书。

结论部分不是作谨小慎微、条分缕析之论的地方。所以，我先来概括一下前面已确认的结论，然后由此出发，对东欧的前途作一点预测。

为了使民主制度得以巩固，这些制度必须同时保护所有的主要利益，并产生经济成效。然而，在最近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民主制度”似乎大都是匆促草就的杂乱无章之作，因为这些制度大都是在为了尽快地终止根本冲突这一种可以理解的压力下而采纳的。因此，新的民主制度可能会在基本制度方面继续经历着冲突。那些在民主制度的运作中受挫的政治势力，将会不断地质问这种制度架构的合理性。而不管在哪个国家，只要武装力量依然独立于平民的控制之外，“军队问题”就始终是民主制度不稳定的持久根源。 188

再者，并非所有的反专制主义运动都拥护民主。有些团体加入民主的旗帜下，仅仅是把此举作为吞噬其专制主义敌人，也吞噬反对旧专制政权斗争中的盟友的一个步骤。一旦民主制度确立起来，他们则利用这些制度来确立他们在代表“国家利益”上的垄断地位，来压制反对意见，来根除一切冲突。

圣保罗市雇主协会(FIESP)经济部副部长 Roberto Nicolau Jehu 接受采访时的谈话，见 Veja, 1989年10月25日，p. 5。

新的民主制度的生存,不仅依赖于其制度结构和主要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制度在经济上的表现。许多新生的民主国家面临着生活条件的恶化。对这些国家来说,如果尚有终止生活条件恶化的希望,那么,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

然而,经济制度的结构性转变是未知的变数;驱动这些转变的,不是可靠的蓝图,而是绝望和希望。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最可能被实施的改革策略不是社会代价最小的策略。把向市场的转变和产权的转变结合起来的策略,是猛药策略。即使这种改革纲领在开始时能得到个人和有组织的政治势力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痛苦的继续,这些支持可能会削弱。在惯性压力下,通货膨胀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失业,哪怕是暂时性的失业,也是难以忍受的。不断增加的不平等给冲突火上浇油,因为它使人们怀疑某些团体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利才支持改革。面对各种政治反应,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中,政府很可能在市场取向的改革所固有的专家治国政治,和为维持共识必需的参与政治之间摇摆不定。政府放弃或推迟一些改革,只是为了在将来再尝试这些改革。而每一次新尝试,政府都会发现它享有的初始信任在减少。最后,财政破产的政府之政策摇摆导致政治上的动荡不安。

因此,权威主义的诱惑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七嘴八舌、众说不一的喧嚣,因必须按程序办事而造成的时机延误,冲突的明显不合理性,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在拥护改革的人们中间引起急躁和不宽容心理。另一方面,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专家决策的风格,代议制度的无效率,都削弱了民众对民主的支持。 189

这些分析对于东欧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有两点启示:东欧的政治发展,与那些在早些时间转向民主制度的国家,将不会有什么不同;经济制度的转变远远达不到蓝图的目标。

期望东欧国家能够避免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期望它不久就会加入西方,主要的理由却是地理因素。东欧人的三段论推理的核心前提是“只有一个欧洲”,一种独特的欧洲文明,东欧国家在传统上是它的成员,仅仅是由于苏联统治的铁幕才使得他们暂时地与欧洲其他部分隔开。现在所需要的是,保加利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找到他们在欧洲民族大家庭中的合适地位。

事实上,地理因素是期望东欧国家走向民主和繁荣的惟一理由。在今天的欧洲,没有非民主政治的存身之地;民主制度是寻求成为这个共同体之成员的必备条件。可是,这种地理位置是否也将吸引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

悬而未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种投资流入并未发生。否则,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相信,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将来应当不同于阿根廷、巴西或智利。

东欧人向来就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拉丁美洲。隔着大洋,他们看到的是一块充满了军事政变、地主寡头政治、平民运动的丛林和海滩,是一块带有异国情调,甚至有点迷人,但却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级的——欧洲的——文化的发源地。他们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军事政变、地主寡头统治、平民运动、民族主义和对外国人的畏憎。然而我知道很多波兰的村庄,那里的人们感到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就像是在自己家里。我感受到了探戈舞曲对波兰人的吸引力;我的双肩感觉到成千上万的人们催促我跪在圣母玛莉亚的圣像、琴斯托霍瓦国女王和三角湾圣地亚哥之蒂朗尼纳像之前的压力。你能想像到西欧的议会在要讨论某些重要的经济立法时,不顾一切地投入一场关于是不是应该把一个十字架放在带有象征性的鹰状王冠上的辩论吗?

190

让我们暂且忘掉地理因素,把波兰放在阿根廷的位置上,把匈牙利放在乌拉圭的位置上。我们将看到的是软弱的国家组织、没有能力代表社会并动员民众的政党和其他社团组织、垄断而又过度保护和过度管制的经济、不能养活自己人民的农业、臃肿的公共官僚部门、零散而且水平低下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难道你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正是在这些状况下,才产生出了抵挡不住大企业压力的政府,产生出了对民主制度怀有可疑承诺的民主运动,产生出了虎视眈眈地坐在一旁的军队,产生出了被专制主义和社会公正扭曲的层级森严的教会,产生出了动不动就刮起排外之风的民族主义的情感吗?

上述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东欧的前途是既定的,也不意味着拉美的前景注定是渺茫的。一方面,迈向繁荣和民主的道路并没有关闭: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成功地避免了贫穷和专制主义,也许韩国,甚至泰国都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当然,这种成功也许极为少见,但它毕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无论在欧洲还是南美洲,各个国家的前途不尽相同:智利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已经承受了经济转变的冲击,而巴西仍然面临经济恶化的趋势;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没有外债,而匈牙利债台高筑;乌拉圭看来已经解决军队问题,而阿根廷继续生活在政变的恐惧下;匈牙利已经建立起合法的机构和政党体制,而罗马尼亚在这两方面都付诸阙如。地理条件,无论它的含义如何,都不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前途。

东欧国家正在拥抱资本主义,但它们还是很穷,这是谁都能看得很清楚的事实。这是东欧人与世界各地都有的,也是梦想繁荣和民主的千千万万人民所共同面临的条件。因此,我们只能预料到,贫穷资本主义常常碰到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它们也不能幸免。东方已经变成了南方。 191

参 考 文 献

- Abalkin, Leonid. 1988. "Politico-Economic Bases of the Radical Refor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In *Sovietskaia ekonomiticheskaia reforma: Poiski i reshenia*, pp. 38–54. Moscow: Nauka.
- Abreu, Dilip. 1988. "On the Theory of Infinitely Repeated Games with Discounting." *Econometrica* 56: 383–96.
- Agabengyan, Abel G. 1988. "Economic Reforms." In *Perestroika, 1989*, pp. 73–109. Abel G. Agabengyan, ed. New York: Scribner.
- Andrade, Régis de Castro. 1980. "Política social e normalização institucional no Brasil." In *América latina: Novas estratégias de dominação*, pp. 87–114. Luis Maira, ed. Petropolis: Editora Vozes.
- Arrow, Kenneth J. 1951.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64. "The Role of Securities i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isk Bear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 91–6.
1971.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of Social Effects and Externalities." In *Frontiers of Quantitative Economics*. M. D. Intrilligator, ed.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Ash, Timothy Garton. 1990. *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Asselain, Jean-Charles. 1984. *Planning and Profits in a Socialist 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 Auerbach, Paul, Meghnad Desai, and Ali Shamsavari. 1988. "The Transition from Actually Existing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70: 61–80.
- Aumann, Robert. 1987. "Correlated Equilibrium as an Expression of Bayesian Rationality." *Econometrica* 55: 1–18.
- Aumann, Robert J., and Mordecai Kurz. 1977. "Power and Taxes." *Econometrica* 45: 1137–61.
- Axelrod, Robert. 1984.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1986.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1095–113.
- Baka, Władysław. 1986. *Czas reformy*. Warsaw: Książka i Wiedza.
- Balassa, Bela, Gerardo M. Bueno, Pedro-Pablo Kuczynski, and Mario Henrique Simonsen. 1986. *Hacia una renovación d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en América latina*. Mexico City: El Colegio de México.
- Balcerowicz, Leszek. 1989. "Polish Economic Reform, 1981–1988." In *Eco-*

- conomic Reforms in the Europea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pp. 42–52.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conomic Studies, no. 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Bauer, Thomas. 1989. “The Unclearing Market.” In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pp. 71–83. Jon Elster and Karl Ove Moene,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ck, Nathaniel. 1978. “Social Choice and Economic Growth.” *Public Choice* 33: 33–48.
- Becker, Gary S. 1976. “Comment [on Peltzm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 245–8.
- Bence, Gyorgy. 1990. “Politic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The Case of Hungary.” Manuscript, Eptvos Lorand University of Budapest.
- Benhabib, Jeff, and Roy Radner. 1988. “Joint Exploitation of a Productive Asset: A Game-Theoretic Approach.” Manuscript, New York University and A.T.&T.
- Bergson, Abram. 1984. “Income Inequality under Soviet Soci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2: 1052–100.
- Bideleux, Robert. 1985. *Communism and Development*. London: Methuen.
- Bobbio, Norberto. 1989.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ogdanowicz-Bindert, Christine A. 1983. “Portugal, Turkey, and Peru: Three Successful Stabilization Programs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MF.” *World Development* 11: 65–70.
- Bowles, Samuel. 1985.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6–37.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 Braybrooke, David. 1976. “The Insoluble Problem of the Social Conflict.” *Dialogue* 15: 3–37.
- Brennan, Geoffrey, and Loren E. Lomasky. 1989. “Introduction.” In *Politics and Process*, pp. 1–11. Geoffrey Brennan and Loren E. Lomasky,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sser Pereira, Luiz Carlos. 1978. *O colapso de uma alianca de classes*. São Paulo: Editora Brasiliense.
1984. *Development and Crisis in Brazil, 1930–1983*. Boulder, Colo.: Westview.
- Bruno, Michael, and Jeffrey Sachs. 1985. *Economics of Worldwide Stagf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szt, Laszlo. 1988. “‘Without Us but for Us?’ Political Orientation in Hungary in the Period of Late Paternalism.” *Social Research* 55: 43–77.
1989. “The Dilemma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Hungary.” *Südost Europa* 38:716–29.
- Buchanan, Allen. 1985. *Ethics, Efficiency, and the Market*.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ad.

- Buchanan, James,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tenko, Anatoli. 1988. *Sovremennyi socializm: Aktualnyie teoreticheskiye problemi*. Moscow: Nauka.
- Calvo, Guillermo A. 1989. "Incredible Reforms." In *Debt, Stab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Carlos Díaz-Alejandro*, pp. 217–34. Guillermo Calvo, Ronald Findley, Pentti Kouri, and Jorge Braga de Macedo, eds.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
- Campbell, Donald E. 1987.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doso, Eliana, and Daniel Dantas. 1990. "Brazil."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pp. 129–54. John Williamson, 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1972. *O modelo político brasileiro*. São Paulo: Difel.
1979. "Authoritarianism at the Crossroads: The Brazilian Case."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Latin American Program Working Paper, no. 93.
1983. "O papel dos empresarios no proceso de transição: O caso brasileiro." *Dados* 26: 9–27.
- Cariaga, Juan L. 1990. "Bolivia."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pp. 41–54. John Williamson, 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Carr, Raymond, and Juan Pablo Fusi Aizpurua. 1979. *Spain: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Carrillo, Santiago. 1974. *Demain l'Espagne*. Paris: Seuil.
- Casper, Gerhard. 1989. "Changing Patterns of Constitutionalism: 18th to 20th Century."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 Castroradiis, Cornelius. 1979. *Le contenu du socialis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Cohen, G. A.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Joshua. 1989. "The Economic Basi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2:25–51.
- Coleman, Jules. 1989. "Rationality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Democracy." In *Politics and Process*, pp. 194–221. Geoffrey Brennan and Loren E. Lomasky,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ard, David. 1978. *Altruism and the Economy: A Study in Non-Selfish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isso, Ellen. 1988. "Market Failures and Market Socialism: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Transition."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 433–65.
1989. "Crisis in Socialism or Crisis of Socialism? A Review Essay." *World Politics* (forthcoming).
- Conaghan, Catherine M. 1983. "Industrialists and the Reformist Interregnum:

- Dominant Clas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Ideology in Ecuador, 1972–1979.”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Conaghan, Catherine M., James M. Malloy, and Luis A. Abugattas. 1990. “Business and the ‘Boys’: The Politics of Neoliberalism in the Central Ande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5: 3–29.
- Córdova, Efrén. 1985. *Pactos sociais; Experiência internacional, tipologia e modelos*. Brasilia: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Relacoes do Trabalho.
- Cortés, Fernando, and Rosa Maria Rubalcava. 1990. “Algunas consecuencias sociales del ajuste: México post 82.” Manuscript, El Colegio de México.
- Coser, Lewis. 1959.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 Covre, Maria de Lourdes M. 1986. *A cidadania que não temos*. São Paulo: Editora Brasiliense.
- Cui, Zhiyuan. 1990. “Marx, Theories of the Firm and the Socialist Reform.”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 Cumings, Bruce. 1989. “The Abortive Abertura: South Korea in the Light of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Left Review* 173: 5–33.
- Dahl, Robert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Manuscript, Yale University.
- Delich, Francisco. 1984. “Estado, sociedad y fuerzas armadas en la transición argentina.” In *Transición a la democracia*. Augusto Varas, ed. Santiago: Asociación Chilena de Investigaciones para la Paz.
- de Pablo, Juan Carlos. 1990. “Argentina.”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pp. 111–29. John Williamson, 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Díaz-Alejandro, Carlos. 1981. “Southern Cone Stabilization Plans.” In *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iam R. Cline and Sidney Weintraub, ed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Diniz, Eli. 1986.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Brazil: A Reappraisal of the Dynamics of the Political Opening.”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1: 63–73.
- Dmowski, Roman. 1989. *Myśli nowoczesnego polaka* (1903). 8th ed. Warsaw: Wydawnictwo Grunwald.
- Dobb, Maurice. 1969. *Welfare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Socialism: Towards a Commonsense Critiq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marancyk, Zbigniew. 1990. *100 dni Mazowieckiego*. Warsaw: Wydawnictwo Andrzej Bonarski.
- Dornbusch, Rudiger. 1990. “Comment.”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pp. 312–27. John Williamson, 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dos Santos, Mario R. 1987. *Concertación política-social y democratización*. Buenos Aires: CLACSO.

- Dunn, John. 1984. *The Politics of Socialism: An Essay i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geworth, Francis Y. 1881. *Mathematical Physics*. London: C. Kegan Paul.
- Elson, Diane. 1988.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 *New Left Review* 172: 3–44.
- Elster, Jon. 1975.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San Francisco.
1984. *Ulysses and the Sirens: 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Rev.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elf-Realization in Work and Politics: The Marxian Conception of Good Lif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3: 97–126.
1989. *Solomonic Judg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and Karl Ove Moene. 1989. "Introduction." In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pp. 1–38. Jon Elster and Karl Ove Moene,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and Rune Slagstad, eds. 1988.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rrand, M., 1966.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4 vol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ischer, Franklin M. 1989. "Adjustment Process and Stability." In *General Equilibrium*, pp. 36–43.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eds. New York: Norton.
- Fontana, Andres. 1984. "Fuerzas armadas, partidos políticos y transición a la democracia en la Argentina." In *Transición a la democracia*. Augusto Varas, ed. Santiago: Asociación Chilena de Investigaciones para la Paz.
1987. "La política militar del gobierno constitucional argentino." In *Ensayos sobre la transición democrática en la Argentina*, pp. 375–418. José Nun and Juan Carlos Portantiero, eds. Buenos Aires: Puntosur Editores.
- Fudenberg, Drew, and Eric Maskin. 1986. "The Folk Theorem in Repeated Games with Discounting or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Econometrica* 54: 533–54.
- García, Manuel Alonso. 1984. "En Torno a una política de relaciones laborales." In *España: Un presente para el futuro*, vol. 2: *Las instituciones*. Madrid: Instituto de Estudios Economicos.
- Gauthier, David. 1986. *Morals by Agre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ddes, Barbara. 1990.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s Bargains among Self-Interested Politicians."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 Golbery do Couto e Silva. 1981. *Conjuntura política nacional: O poder executivo e Geopolítica no Brasil*. Rio de Janeiro: Livraria Jose Olimpio.
- González, Fernando Suárez. 1985. "El Marco institucional de la relaciones laborales." *Papeles de Economía Española* 22: 265–81.
- Grossi, María, and Mario R. dos Santos. 1983. "La concertación social: Una perspectiva sobre instrumentos de regulación económico-social en procesos de democratización." *Crítica y Utopía* 9: 127–48.

- Guilhon Albuquerque, José A., and Eunice Ribeiro Durham, eds. 1987. *Transição política: Necessidades e limites da Negociacao*. São Paul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 Habermas, Jürgen. 1975. *Legitimation Crises*. Boston: Beacon.
- Haggard, Stephan. 1986. "The Politics of Adjustment: Lessons from the IMF's Extended Fund Facility." In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bt*, pp. 157–86. Miles Kahler, e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and Robert Kaufman. 1989. "The Politics of Stabiliz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the World Economy*, pp. 263–74. Jeffrey D. Sach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hn, F. H. 1989. "Auctioneer." In *General Equilibrium*, pp. 62–8.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Newman, eds. New York: Norton.
- Hankiss, Elemer. 1989.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Are There Any?* Budapes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Hansmann, Henry. 1988. "Ownership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4: 267–304.
- Hardin, Russell. 1987. "Why a Constitution?"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 Hardin, Russell, Stephen Holmes, and Adam Przeworski. 1988. "The Constitution of Democracy."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 Hayward, J. E. S. 1983. *Governing France: The One and Indivisible Republic*. 2d e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Herrero de Miñon, Miguel. 1979. "Les sources étrangères de la Constitution." *Pouvoirs* 8: 97–109.
- Hicks, Alexander. 1988. "Social Democratic Corporatism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s* 50: 677–704.
- Hirschman, Albert O. 1985. "Against Parsimony: Three Ways of Complicating Some Categories of Economic Discourse."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1: 7–21.
1986. "On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0 April.
- Holmstrom, Bengt. 1982. "Moral Hazard and Incentives in Team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 324–40.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rwicz, Leonid. 1973. "The Desig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1–30.
- Kalyvas, Stathis N. 1989.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Great Britain, 1973–1983."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 Karl, Terry Lynn. 1987. "Petroleum and Political Pacts: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Venezuel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2: 63–94.
- Kavka, Gregory S. 1986. *Hobbesian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rzner, Israel M. 1988. "Some Ethical Implications for Capitalism of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 165–83.
- Kishlansky, Marc. 1986. *Parliamentary Sele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night, Jack. 1990. "Institutions and Distribution." Manuscript, 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 Kolarska-Bobinska, Lena. 1988. "Social Interests, Egalitarian Attitudes, and the Change of Economic Interests." *Social Research* 55: 111–39.
1989. "Poczucie niesprawiedliwosci, konfliktu i preferowany lad w gospodarce." In *Polacy* 88, pp. 81–159. Warsaw: CPBP.
- Kornai, Janos. 1986.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1687–737.
- Kreps, David M., and Evan L. Porteus. 1978. "Temporal Resolution of Uncertainty and Dynamic Choice Theory." *Econometrica* 46: 185–200.
- 1979a. "Temporal von Neumann–Morgenstern and Induced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 81–109.
- 1979b. "Dynamic Choice Theory and Dynamic Programming." *Econometrica* 47: 91–100.
- Kuroń, Jacek. 1990. *Wiara i Wina: Do i od komunizmu*. Warsaw: Niezależna Oficyna Wydawcza.
- Lamounier, Bolivar. 1979. "Notes on the Study of Re-Democratization."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Latin American Program Working Paper, no. 58.
- Lancaster, Kevin. 1973. "The Dynamic Inefficiency of Capita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1098–109.
- Lane, Frederic C. 1979. *Profits from Power: Readings in Protection Rent and Violence Controlling Enterpris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ange, Peter, and Geoffrey Garrett. 1985. "The Politics of Growth: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1974–1980." *Journal of Politics* 47: 792–827.
-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Published by Latin American Newsletters, London.
- Lavoie, Daniel.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chner, Norbert. 1985. "Pacto social nos processos de democratização: A experiência latino-americana." *Novos Estudos* 13: 29–44.
1986. "Responde la democracia a la busqueda de la certidumbre?" *Zona Abierta* 39–40: 69–94.
- Leijonhufvud, Axel. 1986. "Capitalism and the Factory System." In *Economics as a Process*. Richard N. Langloi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nin, V. I. 1959. *Against Revision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Levhari, D., and L. J. Mirman. 1980. "The Great Fish-War: An Example Using the Cournot–Nash Solu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1: 322–4.
- Lewis, David. 1969. *Conventions: A Philosophical Stud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uan. 1984. "Democracy: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Manuscript, Yale University.
199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143–64.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0. *Political M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Stein Rokkan. 1967.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 Littlechild, Stephen C. 1986. "Three Types of Market Processes." In *Economics as a Process*. Richard N. Langloi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ewenstein, George. 1987. "Anticipation and the Valuation of Delayed Consumption." *Economic Journal* 97: 666–94.
- Lopez, Juan. 1990.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Argentina: Field Work Impressions."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 López-Pintor, Rafael. 1980. "Transition toward Democracy in Spain: Opinion Mood and Elite Behavior."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 Latin American Program Working Paper.
- Lucas, Robert E.,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 Luxemburg, Rosa. 1970. *Reform or Revolution*. New York: Pathfinder.
- McCoy, Jennifer. 1987. "State, Labor, and the Democratic Class Compromise in Venezuela." Paper presented at meeting of the Southeastern Conference o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Mérida, Mexico.
- McKelvey, Richard D. 1976. "Intransitivities in Multidimensional Voting Models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Agenda Contro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2: 472–82.
- Maddison, Angus. 1989.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0th Century*. Paris: OECD.
- Mandel, Ernest. 1986. "A Critique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59: 5–38.
1988.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69: 108–21.
- Manin, Bernard. 1987. "On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Deliberation." *Political Theory* 15: 338–68.
- Maravall, José María. 1981. *La política de la transición, 1975–1980*. Madrid: Taurus.
1990.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The Southern European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SST Working Papers, no. 2.
- Marx, Karl. 1952. *The Class Struggle in France, 1848 to 1850*.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7. *Capital*. 3 vol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tthews, Mervyn. 1986. *Poverty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llor, John W., and Bruce F. Johnston. 1984. "The World Food Equation: Interrelations among Development, Employment and Food Consump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2: 531–74.
- Migranyan, A. M. 1988. "Perehod ot totalitarno-avtoritarnii regimov k demokrat-sii." In *Politicheskie reformy v stranakh sozializma*. E. A. Armbarstumov and J. M. Kliamkin, eds. Moscow: Akademia Nauk SSSR.
- Miliband, Ralph. 1975.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Labour*. 2d ed. London: Merlin Press.
- Moatti, Gerard. 1989. "Les jeunes deviennent capitalistes." *L'Expansion*, 18 May.

- Moene, Karl Ove. 1989. "Strong Unions or Worker Control?" In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pp. 83–98. Jon Elster and Karl Ove Moene,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isés, José Álvaro. 1986. "Sociedade civil, cultura política e democracia: Descaminhos da transição política." In *A cidadania que não temos*, pp. 119–51. Maria de Lourdes M. Covre, ed. São Paulo: Editora Brasiliense.
- Montesquieu. 1905. *Extraits de l'Esprit des lois et des oeuvres diverses*. Camille Jullian, ed.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5.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 Moulin, Hervé. 1986. *Game Theory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2d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urilo de Carvalho, José. 1987. "Militares e civis: Um debate além da contigüidad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l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ANPOCS, Aguas de São Pedro.
- Nelson, Joan M. 1984. "The Politics of Stabilization." In *Adjustment Crisis in the Third World*. R. E. Feinberg and V. Kallab, ed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Nelson, Joan M., 1990.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cy Choice: The Politics of Adjustment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ewbery, David, and Joseph Stiglitz. 1981. *The Theory of Commodity Price Stab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ve, Alec.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7. "Markets and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61: 98–104.
- O'Donnell, Guillermo. 1978a. "Reflections on the Patterns of Change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3: 3–38.
- 1978b. "State and Alliances in Argentina, 1956–1976."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5: 3–33.
1979. "Notas para el estudio de procesos de democratización a partir del estado burocrático-autoritario." *Estudios CEDES* 5.
1989. "Argentina, de nuevo." Manuscript, CEBRAP, São Paulo.
-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Offe, Claus. 1985.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Olson, Mancur, J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Neill, John. 1989. "Markets, Socialism, and Information: A Reformulation of a Marxian Objection to the Market."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 200–211.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0. *Transition from the Command to Market Economy*. Summary of a meeting held at the Vienna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Paris: OECD.

- Ostrowski, Krzysztof. 1989. "The Decline of Power and Its Effects on Democratization: The Case of the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In *Eastern Europe and Democracy: The Case of Poland*, pp. 15–28.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ecurity Studies.
- Ostrowski, Krzysztof, and Adam Przeworski. 1965. "Trade Unions and Economic Planning in Poland." *Polish Roundtable* 1.
- Pappalardo, Adriano. 1985. *Il governo del salario nelle democrazie industriali*. Milan: Franco Agnelli.
- Pareto, Vilfredo. 1927. *Manuel d'économie politique*. 2d ed. Paris: Giard.
- Perez-Díaz, Victor. 1986. "Economic Policies and Social Pacts in Spain during the Transition." In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Neocorporatism*. Ilja Scholten, ed.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Petrakov, Nikolai, and Evgeni Yassine. 1988. "Economic Methods of Planned Centralized Management." In *Sovietskaia ekonomiticheskaia reforma: Poiski i reshenia*, pp. 54–86. Moscow: Nauka.
- Pigou, A. C. 1932.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4th ed. London: Macmillan.
- Pizzorno, Allesandro. 1978. "Political Exchange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The Resurgence of Class Conflicts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68*. Colin Crouch and Allesandro Pizzorno, eds. London: Macmillan.
- Porozumienia Okraglego Stolu*. 1989. Warsaw: NSSZ Solidarność.
- Przeworski, Adam. 1982. "'The Man of Iron' and Men of Power in Poland." *PS* 15: 18–31.
1985.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a. "The Feasibility of Universal Grants under Democratic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15: 695–709.
- 1986b. "Marxism and Rational Choice." *Politics and Society* 14: 379–409.
- 1986c.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vol. 1.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ed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7a. "Democracy as a Contingent Outcome of Conflicts." In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Jon Elster and Rune Slagstad,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7b. "Capitalismo, democracia, pactos." In *Transição política: Necessidades e limites da negociacao*. José A. Guilhon Albuquerque and Eunice Ribeiro Durham, eds. São Paulo: Universidade de São Paulo.
1990.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under Capitalism*. Chur: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 Przeworski, Adam, and John D. Sprague. 1986. *Paper Stones: 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rzeworski, Adam, and Michael Wallerstein. 1982. "The Structure of Class Conflicts under Democratic Capit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215–38.
1988. "Structural Dependence of the State on Capita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11–31.

- Putterman, Louis. 1986. "On Some Recent Explanations of Why Capital Hires Labor." In *The Economic Nature of the Firm*, pp. 312–28. Louis Putterma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inwater, Lee, Barbara Torrey, and Timothy Smeeding. 1989. "Poverty and Low Income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Income Surveys." Manuscript.
- Rasmusen, Eric. 1989. *Games and Inform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 Remmer, Karen L. 1986.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Stabi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19: 1–24.
- Riker, William H.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San Francisco: Freeman.
- Roemer, John. 1989a. "Public Ownership and Private Property Externalities." In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pp. 159–79. Jon Elster and Karl Ove Moene,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b. "Decentralization, Duplicity, and Minimal Equity."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 Roland, Gerard. 1989. "Complexity,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Equilibrium: The Soviet-Type Case." Manuscript,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 Rolicki, Janusz. 1990. *Edward Gierek: Przerwana dekada*. Warsaw: Wydawnictwo FAKT.
- Rousseau, Jean-Jacques, 1986. "Considerations on the Government of Poland." In *Rousseau: Political Writings, Selections*. Frederick Watkins, trans. and e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Rubinstein, Ariel. 1988. "Comment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ame Theory." Paper delivered as the Walras-Bowley Lecture at meeting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etric Society, June.
- Rustow, Dunkwart A. 1955.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A Study of Parties and Cabinet Governments in Swe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337–63.
- Saguir, Julio. 1990. "On the Origins of the Argentine Constitution."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artre, Jean-Paul. 1960.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 Saunders, Peter, and Friedrich Klau. 1985. *The Role of the Public Secto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ECD Economic Studies 4. Paris: OECD.
- Schmitt, Carl. 1988.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1923). 1st English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chmitter, Philippe C. 1974.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36: 85–131.
1984. "Patti e transizioni: Messi non-democratici a fini democratici?" *Ri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14: 363–82.
- Schneider, Ben Ross. 1990. "The Politics of Privatization in Brazil and Mexico:

- Variations on a Statist Theme.” Conference Paper, no. 23, Columbia University.
- Schotter, Andrew. 1981.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he Evolution of Rules.” In *Economics as a Process*, pp. 117–34. Richard N. Langloi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A. 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d ed. New York: Harper Bros.
- Shapiro, Daniel. 1989. “Reviv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A Defense of Hayek against Lang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 139–60.
- Shapiro, Helen, and Lance Taylor. 1989. “The State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Manuscript, MIT.
- Smith, William C. 1987.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Brazil: From Authoritarian Liberalization and Elite Conciliation to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ing New Democracies*, pp. 179–340. Enrique A. Baylora,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 Sola, Lourdes. 1990. “The Politics of Heterodox Shock in Brazil: Tecnicos, Politicians, Democracy.”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 Stallings, Barbara, and Robert Kaufman. 1989. “Debt and Democracy in the 1980s: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In *Debt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p. 201–23. Barbara Stallings and Robert Kaufman, eds. Boulder, Colo.: Westview.
- Staniszkis, Jadwiga. 1984. *Poland's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anton, Kimberly A. 1990. “The Chilean Constitution of 1925.”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Stepan, Alfred. 1978.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igler, George. 1972.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Public Choice* 13: 91–106.
- Sugden, Robert. 1986. *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Welfare*.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er.
- Szelenyi, Ivan. 1989. “Eastern Europe in an Epoch of Transition: Toward a Socialist Mixed Economy?” In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ed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rkowski, Jacek. 1989. “Old and New Patterns of Corruption in Poland and the USSR.” *Telos* 80: 51–63.
- Taylor, Michael. 1976. *Anarchy and Cooperation*. New York: Wiley.
- Theil, Henri. 1976. *Econometrics*. New York: Wiley.
- Thoma, Richard. 1988. “On the Ideology of Parliamentarism.” Appendix to Carl Schmitt,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192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Tollison, Robert D. 1982. “Rent Seeking: A Survey.” *Kyklos* 35: 575–602.

- Torańska, Teresa. 1985. *Oni*. London: Aneks.
- Ullman-Margalit, Edna. 1977. *The Emergence of No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Veen, Robert, and Philippe van Parijs. 1986.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Theory and Society* 15: 635–57.
- Verney, Douglas. 1959. *Parliamentary Reform in Sweden, 1866–192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rnon, Raymond. 1988. *The Promise of Privatization: A Challenge for U.S. Poli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Verou, Pablo Lucas. 1976. *Crítica jurídica-política de la reforma Suárez*. Madrid: Editorial Tecnos.
- Vickers, Douglas. 1987. *Money Capital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icki, Andrzej. 1990. "From Stalinism to Post-Communist Pluralism." Manuscript, Notre Dame University.
- Walras, L. 1874.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 Paris: Guillaumin.
- Ward, Benjamin. 1957. "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566–89.
-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3 vols. G. Roth and C. Wittich, eds. New York.
- Weffort, Francisco. 1989. "Incertezas de transição na América latina." *Lua Nova* 16: 5–47.
- Weil, Philippe. 1990. "Nonexpected Utility in Macro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4: 29–42.
- Wiatr, Jerzy J. 1983. *Polska szansa*. Krakow: Wydawnictwo Literackie.
1989. "Nie sposób zatrzymać lawiny." *Zdanie* 11–12: 2–14.
- Wilk, Marian. 1988. *Człowiek i Stal*. Warsaw: PIW.
- Williamson, John. 1990.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Wnuk-Lipinski, Edmund. 1989. "Nierówności, deprywacje i przywileje jako podłoże konfliktu społecznego." In *Polacy* 88, pp. 18–80. Warsaw: CBPB.
- Wood, Gordon S. 1969.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Zaleski, Edward. 1984. *La planification stalinienne: Croissance et fluctuations économiques en URSS, 1933–1953*. Paris: Economica.
- Zalyguine, Sergeuei. 1987. "Le 'projet du siècle': Détournement des fleuves, détournement de la science par la bureaucratie." *Les Temps Moderns* 42: 171–92.
- Zaslavskaya, Tatyana I. 1988. "Friends or Foes? Social Forces Working for and against Perestroika." In *Perestroika, 1989*, pp. 255–80. Abel G. Agabegyan, ed. New York: Scribner.
- Zaslavsky, Victor. 1987–8. "Three Years of Perestroyika." *Telos* 74: 31–42.

作者索引

(条目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

A

阿尔巴金 Abalkin, Leonid 123
阿布优 Abreu . Dilip . 25n
阿布伽泰斯 Abugattas, Luis A . . 184
阿加本扬 Agabengyan . Abel G . . 122n
安德烈 Andrade, Régis de Castro, 60n,
91n
亚里士多德 otle . 26n
阿罗 Arrow, Kenneth J ., 16, 17, 106,
108
阿什 Ash . Timothy Garton, 3
阿瑟兰 Asselain, Jean-Charles, 118n,
123n
奥尔巴赫 Auethach . Paul . 113n
奥曼 Aumann, Robert, 44, 110
艾克诺德 Axelrod, Robert, 38

B

巴卡 Baka, W adys aw, 126n . 136
巴塞维茨 Balcerowicz, Leszek . 142n .
144n
鲍尔 Bauer . Thomas . 126n
贝克 Beck, Nathaniel . 117n
贝克尔 Becker, Gary S ., 132
贝拉萨 Belassa, Bela, 144n
本斯 Bence, Gyorgy, 95n
本哈比 Benhabib Jeff, 73n

贝格松 Bergson, Abram, 119n
比德勒 Bideleux . Robert, 119n
博比奥 Bobbio, Norberto, 13n, 46n
保戈丹诺维茨-宾德尔特 Bogdanowicz-
Bindert, Christine A . . 179
鲍尔斯 Bowles, Samuel . 107n, 126 .
130n
布雷布鲁克 Braybrooke . David, 39n
布伦兰 Brennan, Geoffrey, 15n
布雷塞尔-佩雷拉 Bresser Pereira, Luiz
Carlos, 68n
布鲁诺 Bruno, Michael, 131
布鲁斯特 Bruszt . Laszlo, 54n, 104n,
139, 160
布坎南 Buchanan, Allen, 103n . 105n
布坎南 Buchanan . James, 15n, 16
布拉韦 Burawoy . Michael, 127
布坚科 Butenko Anatoli, 117

C

卡尔弗 Calvo, Guillermo A ., 168n, 179
坎贝尔 Campbell . Donald E . . 105n
卡多索 Cardoso, Eliana . 178n
卡多索 Cardoso . Fernando Henrique 46n,
56, 68n
卡里加 Cariaga, Juan L ., 162n, 169
卡尔 Carr . Raymond, 46, 57n, 89n
卡里略 Carrillo . Santiago, 31

卡斯珀 Casper, Gerhard, 80n
卡斯托里亚迪斯 Castoriadis . Cornelius,
117n
科恩 Cohen, G . A ., 10g
科恩 Cohen, Joshua, 17
科尔曼 Coleman . Jules . 14 . 15
科纳德 Collard, David, 115n
考密苏 Comisso . Ellen, 56n, 122n,
128n, 157, 161
考纳汉 Conaghan, Catherine M . . 68n,
166n, 184
科尔多瓦 Córdova, Efrén, 184n, 185n
科尔特斯 Cortés . Fernando, 161n
科塞尔 Coser, Lewis, 11
崔之元 Cul, Zhiyuan, 125n
卡明斯 Cumings, Bruce, 79n

D

达尔 Dahl, Robert A ., 10, 86, 130n
丹塔斯 Dantas, Daniel, 178n
德利奇 Delich, francisco . 77n
德塞 Desai, Meghnad . 113n
底亚茨-阿里简德罗 Díaz-Alejandro, Car-
los, 179
迪尼斯 Diniz Eli . 60n
德莫夫斯基 Dmowski, Roman, 92
多布 Dobb, Maurice, 104n
多马让斯科 Domara czyk, zbigniew, 167
多恩布施 Dornbusch . Rudiger, 171n
邓恩 Dunn, John, 101
德拉姆 Durham, Eunice Ribeiro . 186n

E

埃杰沃斯 Edgeworth, Francis Y ., 105
爱森伯格 Ehrenburg . Ilya, 58
伊尔森 Elson, Diane, 111 . 113n

埃尔斯特 Elster, Jon, 42, 81n, 100,
102n, 125, 126 . 127, 155n, 170

F

法兰德 Farrand, M ., 88n
弗西尔 Fischer, Frankilin M . . 107
丰塔纳 Fontana, Andrés, 76
富顿伯格 Fudenberg, Drew, 25n
富西 Fusi, Juan Pablo Arizpurua, 46 .
57n, 89n

G

加尔恰 Gazcía . Manuel Alonso . 185n
加西亚-马尔克斯 García Márquez . Ga-
briel . 48n . 190
加雷特 Garrett . Geoffrey, 131
戈捷 Gauthier . David . 38
盖登斯 Geddes . Barbara . 82
金蒂斯 Gintis . Herbert . 126 . 130n
戈尔伯利 Golbery do Couto e Silva . 60n
贡塔尔斯基 Gontarski . Leszek . 61n
风萨雷斯 González . Fernando Suárez .
185n
格罗西 Grossi, Maria, 185
吉永 Guilhon Albuquerque, José A .,
186n

H

哈贝马斯 Habermas, Jurgen, 14, 17,
160
海伽德 Haggard Stephan, 136n, 166n,
180, 181
哈恩 Hahn . F . H . . 108
汉科斯 Hankiss, Elemer . 68n
汉斯曼 Hansmann . Henry, 124n, 154n
哈丁 Hardin, Russell, 23, 53, 81n, 86

海沃德 Hayward . J . E . S . , 82
埃雷罗 Herrero de Mi ? on, Miguel, 85n
希克斯 Hicks, Alexander, 131
赫希曼 Hirschman, Albert G . , 18, 43n
霍布斯 Hobbes . 38n
霍尔姆斯 Holmes, Stephen, 81n
霍尔特洛姆 Holmstrom, Bengt . 127n
亨廷顿 Huntington, Samuel P . , 182
赫尔维茨 Hurwicz, Leonid, 117

J

约翰松 Johnston, Bruce F . , 111n

K

卡利瓦 Kalyvas, Stathis, 102n
卡尔 Karl, Terry Lynn, 185n
卡罗尔 Karol, K . R . , 58
考夫曼 Kaufman, Robert, 137n . 181
卡万卡 Kavka, Gregory, 23n, 27n . 3bo,
84n, 86n
基尔兹勒 Kirzner . Israel M . . 115n
克劳 Klau . Friedrich, 132n
奈特 Knight, Jark, 28
卡拉斯卡-波宾斯大林卡 Kolarska-
Bobi ska, Lena, 104n, 160, 178
科尔瑙伊 Kornai, Janos, 119n, 123n,
142n
克雷普斯 Kreps, David M . , 170
昆德拉 Kundera, Milan, 60n
库龙 Kuro , Jacek, 93n
科尔茨 Kurz, Mordecai, 110

L

拉蒙尼尔 Lamounier, Bolivar, 14, 54n,
56
兰开斯特 Lancaster . Kevin . 111n

莱恩 Lane, Frederic C . , 25
朗热 Lange Peter, 131
拉瓦伊 Lavoie, Daniel . 115n
李奇纳 Lechner Norbert, 43n, 44, 184n,
185
莱永胡德武 Leijonhufvud, Axel, 125n
列宁 Lenin, V I . , 41
莱维哈瑞 Levhari, D . , 111n
莱维斯 Lewis, David, 38
林兹 Linz, Juan, 10 . 34n
李普塞特 Lipset . Seymour Martin . 14,
96
利特沙伊德 Littlechild, Stephen C . , 12n
罗文斯坦 Loewenstein . George, 170
洛马基 Lomasky . Loren E . , 15n
罗伯茨 Lopez, Juan, 143n, 149
洛佩斯-宾特尔 López-Pinior . Rafael . 54n
卢卡斯 Lucas, Robert E . , Jr . , 13 In
卢森堡 Luxemburg . Rosa, 11

M

麦科伊 McCoy . Jennifer, 185n
麦克维 Mckelvey, Richard D . . 17
马迪逊 Maddison, Angus, 122n
马洛伊 Malloy, James M . . 184
曼德 Mandel . Ernest . 113n
马丁 Manin, Bernard, 19, 43
马拉瓦莱 Maravall, José María, 58n,
178n . 187
玛丽 Mari . Jean-Paul . 64n
马克思 Marx, Karl, 107n
马斯金 Maskin, Eric, 25n
马修斯 Matthews, Mervyn, 131n, 177
梅洛尔 Mellor, John W, 111n
米格拉扬 Migranyan, A . M . , 138
米利班德 Miliband, Ralph, 180

米尔曼 Mirman, L. J., 111n
穆阿提 Moatti, Gerard, 102n
茅伊内 Moene, Karl Ove, 126, 127 .
155n
莫伊塞斯 Moisés, José álvaro, 91n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 26, 46n, 47n
摩尔 Moore, Barrington, Jr, 96
莫林 Moulin, Hervé, 19n
莫里罗 Murilo de Carvalho, José, 77n

N

尼尔森 Nelson, Joan, 165, 166n . 171n,
179
纽伯里 Newbery, David, 107n
诺维 Nove, Alec, 103n, 115n, J 17n,
123n, 124, 125
诺瓦克 Nowak, Stefan, 70n

O

奥唐纳 O 'Donnell, Guillermo, 52, 56n,
63n, 67, 88, 92, 97
奥菲 Offe . Claus . 12
奥尔森 Olson, Mancur, Jr ., 25n, 64n
奥尼尔 O 'Neill, John, 106n . 130n
奥斯特洛夫斯基 Ostrowski . Krzysztof,
54n, 79n, 116n

P

巴勃罗 Pablo . Juan de . 84n
帕帕拉尔多 Pappalardo, Adriano, 184n
帕累托 Pareto, Vilfredo, 105
佩雷迪加 Perez-Díaz, Victor . 185n
彼得拉科夫 Petrakov, Nikolai, 115, 123
庇古 Pigou . A . C ., 105
皮佐尔诺 Pizzorno, Alessandro, 11
波蒂厄斯 Porteus . Evan L ., 170

普沃斯基 Przeworski . Adam . 14n . 18 .
25n . 38n, 46n, 64n, 68n . 74, 81n,
111n, 116n, 130n, 132n, 134n, 184n
帕特曼 Putterman, Louis . 125, 126

R

拉德纳 Radner, Roy, 73n
雷恩沃特 Rainwater, Dee, 128n, 131n
拉斯穆松 Rasmusen . Eric, 72n
雷默 Remmer, Karen L . . 136n, 166n,
171n
里克尔 Riker . William H ., 17, 41n
勒默尔 Roemer, John, 113n . 117n
罗坎 Rokkan, Stein, 96
罗兰 Roland, Gerard, 118n
罗利茨基 Rolicki, Janusz, 57n
卢梭 Rousseau, Jean-Jacques, 36
鲁瓦尔卡瓦 Rubalcava, Maria Rosa, 161n
鲁宾斯坦 Rubinstein, Ariel, 44n, 47n
鲁斯托 Rustow, Dunkwart A ., 81n, 88

S

萨赫斯 Sachs, Jeffrey, 131
萨吉尔 Saguir, Julio, 83
桑托斯 Santos, Mario dos, 184n, 185
萨特 Sartre, Jean-Paul, 64
施密特 Schmitt, Carl, 16
施密特 Schmitter, Philippe C ., 11, 67,
88, 97, 185
施奈德 Schneider, Ben Ross, 143n
斯科特 Schotter, Andrew, 38, 73n
熊彼特 Schumpeter, Joseph A ., 17
沙姆萨瓦瑞 Shamsavari, Ali, 113n
沙皮罗 Shapiro, Daniel, 115n
沙皮罗 Shapiro, Helen, 158
斯拉格斯塔德 Slagstad, Rune, 81n

斯米丁 Smeeding, Timothy, 128n
斯密 Smith, William C., 60
索拉 Sola . Lourdes, 167
斯普拉格 Sprague, John, 18
斯托林斯 Stallings, Barbara . 137n
斯塔林兹科斯 Staniszki, Jadwiga, 123n
斯坦顿 Stanton, Kimberly A., 82
斯图潘 Stepan, Alfred, 12
斯蒂格勒 Stigler, George, 41n
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Joseph, 106, 107n
萨格登 Sugden, Robert . 36
塞伦伊 Szelenyi . Ivan . 56n

T

塔科夫斯基 Tarkowski, Jacek, 156
泰勒 Taylor . Lance, 158
泰勒 Taylor, Michael, 38
泰尔 Theil . Henri . 30
托马 Thoma . Richard . 19
瑟罗 Thurow, Roger . 124n
托利森 Tollison . Robert D . . 17
托兰斯加 Tora ska . Teresa . 70n
托里 Torrey . Barbara . 128n
塔洛克 Tullock, Gordon, 15n . 16

U

乌尔曼-马加利特 Ullman-Margalit, Ed-
na, 38

V

范德梵 van der Veen . Robert . 134n
范帕里斯 van Pazijs, Philippe . 134n

弗尼 Verney, Douglas, 81n
韦尔龙 Vernon, Raymond, 154n
韦鲁 Verou, Pablo Lucas, 10
维克斯 Vickers, Douglas, 158

W

瓦利茨卡 Walicki, Andrzej, 56n
华勒斯坦 Wallerstein, Michael . 14n,
68n, 111n, 132n
瓦尔拉 Walras, L . . 105
沃德 Ward, Benjamin, 127
韦伯 Weber, Max, 54
威廉姆斯 Weffort . francisco . 32n, 102n,
122n
韦尔 Weil, Philippe, 170
维亚尔 Wiatr, Jerry J., 56n, 90n, 123n
维尔克 Wilk, Marian, 116n
威廉姆森 Williamson, John, 140n, 145,
146, 171n, 179
弗努克-利宾斯特 Wnuk-Lipi ski, Ed-
mund, 119n
伍德 Wood Gordon S., 15

Y

亚辛 Yassine, Evgeni, 115, 123

Z

扎列斯基 Zaleski . Edward, 118n
扎雷金 Zalyguine, Sergeuei, 121n
扎斯拉夫斯加 Zaslavskaya, Tatyana I.,
104n, 160
扎斯拉夫斯基 Zaslavski, Victor, 120n

主题索引

(条目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

A

阿达麦克 Adamec, Vladyslay, 61
阿根廷 Argentina, 1, 33 . 46, 52, 75, 83, 84, 85, 90, 122n, 128, 143n . 149, 165, 167
武装力量 armed forces, 79; 东欧 in Eastern Europe, 6; 监护 tutelage by, 74 - 7
奥地利 Austria . 128

B

巴尔塞洛维奇 Balcerowicz, Leszek, 167
巴尔塞洛维奇计划 Balcerowicz plan, 162n, 165
班泽尔 Banzer, General Hugo, 166
比林 Billing, Bishop Gottfrid, 88
玻利维亚 Bolivia, 143, 151, 162n, 166, 168, 169, 184
资产阶级与民主 bourgeoisie and democracy, 68n
保加利亚 Bulgaria, 4, 58n, 59
巴西 Brazil . 1, 51, 56, 58, 60, 68n, 84, 89, 122n, 128, 143, 165, 公共舆论调查 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83n, 120, 167n, 169, 178

C

加拿大 Canada . 128n
资本主义蓝图 capitalism: blueprint of, 105, 批评 critiques of, 105 - 9; 定义 definition of, 101, 不合理 irrationality of . 109 - 12
卡多索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84n, 167

齐奥塞斯库 Ceausescu, Nicolai, 59, 64
智利 Chile, 1, 78, 79 . 82 - 3 . 122n, 138
中国 China . 60
集体行动理论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of, 64n
经济体制比较 comparisons of economic systems: 蓝本与现实 blueprints and realities, 103 - 4 . 阶级偏见 and class-based preferences, 104, 内生偏好 and endogenous preferences, 101 - 3, and 现状 performance, 119 - 22
服从 compliance, 14 - 15 . 替代性观点 alternative views of 19 ~ 24; 定义 definition of, 28; 博弈论 game-theoretical view of . 29 - 32
宪法 constitutions, 35 - 7
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 . 2 . 3 . 4, 8, 51, 120

D

协商 deliberation, 17 - 18
迟到与天主教 democracy: and Catholicism, 93, 含义 definition of, 10, 专政 and dictatorship, 45 - 9, 持久性 durability of, 32 - 4, 36 - 7, 均衡 as an equilibrium, 20 - 1 . 25 - 32 . 民族主义 and nationalism, 92 - 3 . 规范一致 as normative consensus . 23 - 4; 理性 rationality of, 15 - 19 . 91 - 2, 社会同意 social content of . 32 - 3, 社会契约 as a social contract . 22 - 3, 不确定性 un-

certainty of . 12 - 13, 40 - 5

E

东德 East Germany, 3, 4, 56 . 59, 64, 123

转型斯经济条件 economic conditions at the time of transition . 139 - 46

经济改革 economic reforms . 动力 dynamics of, 171 - 4, 收入分配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174 - 8, 政策类型 and policy styles, 183 - 6; 政治结果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180 - 7, 政治支持 political support for 167 - 71 . 程序 programs of, 145 - 6 . 策略 strategies of, 162 - 3 转型效应 transitional effects of, *see* transitional effects of economic reforms

厄瓜多尔 Ecuador, 68n, 184

埃斯腾索罗 Estenssoro, Victor Paz, 166

摆脱权威体制 extrica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egimes . 67 - 9, 武装力量 and the armed forces, 74 - 7, 最优策略 optimal strategy of . 78 - 9, 多次博弈 as a repeated game . 72 - 3

F

法兰西 France . 82

G

基尔赖米可 Geremek, Bronislaw, 167

希腊 Greece, 1, 8, 87

H

昂纳克 Honecker . Erich . 64

匈牙利 Hungary, 3, 8, 56, 59, 84 - 5, 120, 123, 143, 153, 167, 公共舆论调查 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2, 54n, 160

制度 institutions, 26 - 7, 选择 choice of, 80 - 8, 民主的稳定性 and stability of democracy, 35 - 6

I

伊朗 Iran . 51

以色列 Israel . 151

意大利 Italy . 90

J

雅鲁泽尔斯基 Jaruzelski . General Wojciech, 4, 55, 64, 78

K

赫鲁晓夫 Khrushchev N . S ., 2 . 121

克伦兹 Krenz . Egon . 55, 61

L

合法性 Legitimacy, 14, 54

自由化 liberalization: 失败原因 causes of failures of, 61 - 6; 含义 defined, 56n, 解说 explanations of . 56

M

市场社会主义 market socialism: 含义 definition of, 124 - 5, 效率 efficiency of, 126 - 7, 收入分布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128 - 9

梅内姆 Menem, Carlos, 167, 184

墨西哥 Mexico, 59, 122n, 138 . 143, 151

米赫尼克 Michnik, Adam, 64

米尔克 Mielke, Erich, 64

N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92 - 3

挪威 Norway, 128

协定 pacts, 24, 39, 90 - 1 . 184 - 5

P

巴基斯坦 Pakistan, 79

秘鲁 Peru, 143, 165, 184

皮诺切特 Pinochet, General Augusto . 55, 78

澳大利亚计划 Plan Austral . 151

卡勒尔计划 Plano Collor, 169, 173n
克鲁列多计划 Plano Cruzado, 151, 167
波兰 Poland, 2, 3, 4, 5, 8, 48, 51, 53, 58, 59, 60n, 61, 70, 78, 79, 82, 85, 87, 89n, 93n, 143, 150, 153, 162n, 167, 公共舆论调查 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2, 54n, 120, 160, 167n, 178
葡萄牙 Portugal, 1, 8
私有化 Privatization, 8, 154 - 7

R

代表 representation, 89n .
罗马尼亚 Romania . 3, 4, 5, 51, 64

S

社会民主 social democracy, 130 - 133
社会主义 socialism (see also market socialism), 蓝图 blueprint of, 114 . 批评 critiques of, 114 - 17, 含义 definition of, 101, 环境 and the environment . 121, 改革 reforms of, 123 - 4; 不可行 unfeasibility of, 116 - 19
韩国 South Korea, 60, 79, 89
苏联 Soviet Union, 2, 3, 55n, 58, 120, 122n, 123, 138, 影响 impact of, 东欧 on Eastern Europe, 5
西班牙 Spain . 1, 8, 55, 85, 87, 90, 187; 公共舆论调查 public opinion surveys in, 54n, 178n
苏亚雷斯 Suarez, Adolfo, 10

瑞典 Sweden, 81, 87 - 8, 128n

T

全能主义 totalitarianism, theory of, 1 - 3
贸易协会 trade unions, 181
经济改革的转型效果 transitional effects of economic reforms, 137, 147, 分配无效 allocative inefficiencies, 157 - 9; 收入分配 income distribution, 159 - 61, 通货膨胀 inflation, 147 - 51, 失业 unemployment, 151 - 4, 向民主过渡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研究路径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95 - 9, 确定问题 problem defined . 37 - 40, 51 - 4
土耳其 Turkey, 8

U

联合王国 United Kingdom, 128
美国 United States, 87n, 128
乌拉圭 Uruguay, 1, 79, 90

V

委内瑞拉 Venezuela, 90

W

瓦文萨 Wa esa, Lech, 79n, 184

Y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5

后 记

这部译著是集体合作的结晶。从篇章分工上讲,包雅钧翻译了导论、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刘忠瑞翻译了第三章,胡元梓翻译了第四章和结论。但是从整体上说,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探讨,并把这种交流的结果融入到各章中。这一段合作的日子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是值得永久记忆的。当然,囿于学识,这部译著肯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专家、学者、读者批评指正,这也是它不断完善的动力所在。

译 者

2003年10月于北京大学